97 香港回歸風雲



中港台圖書
$10.00

中英香港問題爭鬥的全記錄

東西方政治謀略的集大成

世紀[illegible]背後的驚人內幕

徐彬 編著

利文出版

97
香港回歸風雲



中港台圖書
$10.00

中英香港問題爭鬥的全記錄
東西方政治謀略的集大成
世紀風雨背後的驚人內幕

徐彬 編著

利文出版

'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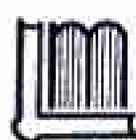
香港回歸風雲

徐 彬 編著

利文出版

'97 香港回歸風雲

編著　徐彬
封面　李中威
出版　利文出版社
　　　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九號12樓
發行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洗衣街245和251號地下
　　　Tel:2381 8251 Fax:2397 1519
美國發行　華文書報雜誌社
　　　Chinese Periodical Distribution,Inc.
　　　507 S. Stoneman Avenue
　　　Alhambra, CA 91801 U.S.A.
　　　Tel:(818) 282 0361 (818) 282 0387
　　　Fax:(818) 282 9370
印刷　彩迅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　1996年 4月 初版
ISBN 962 7766 71 2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本書經原出版者吉林攝影出版社授權在港出版發行

目錄

第一章

觸角秘密伸出



1

港督府裏來了一個常客。麥理浩請來政治顧問閒聊，似乎在無意間作出了暗示。

陽春三月，又是杜鵑花盛開的季節。近看，狀若漏斗的花冠簇生枝頭，爭奇鬥妍；遠看，一片片顏色鮮紅的花兒連綴而開，如錦緞雲霞。

在香港有個觀賞杜鵑花的好去處，那就是位於中環的動植物公園，當地人又叫它兵頭花園。這裏有上千株杜鵑花，盛開時總是會引來絡繹不絕的居民前來賞玩。

在離動植物公園很近的地方，有一座頗爲龐大壯觀的建築，平日裏總是大門緊閉，過往行人只能透過四週的鐵栅欄，看到裏邊露天花園的景色。不過，每年的杜鵑花季，這裏都會對外開放一天，任憑參觀。當然，可以隨意參觀的還是限於露天花園這一部份，參觀者如果試圖登堂入室，就會突然閃出一個人影擋在你面前，彬彬有禮地請來人止步。

這兒就是香港的港督府。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但是在十九世紀中葉就被英國侵佔。一八四三年四月五日，英國維多利亞女王親自簽署《香港憲章》，正式宣佈香港劃歸英國管轄，並設立香港總督職位，代表英國政府對香港實行全面統治。首任香港總督名叫砵甸乍，他還兼任駐港英軍總司令。此後，每隔數年，便有一次新舊港督的交接，卸任者榮歸倫敦，繼任者從倫敦啓程，乘海輪抵港。到一九七九

年時，香港總督已經輪換到第二十五任了。

總督府始建於一八五五年，作為港督辦公及居住的地方，能夠進去居住的除了港督的家眷外，還有很多工作人員，僅管家、司機、廚師、花匠、信差、侍從這一類人就多達六十多，他們的薪水當然全由港督府的日常經費中支出。

歷任港督在任期間，都免不了大興土木，盡其所能加以修繕、擴建，總共耗費掉了多少錢財，已經沒有人能說得清楚了。七十年代港督府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修葺，把全部空調系統整個改造一次，新增加了一座游泳池，還從裏到外粉飾一新。據知情人透露，這次維修耗費約達一千萬元港幣。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下午，港督府的鐵柵門悄無聲息地滑開來，一輛時價十四萬美元的黑色「勞斯萊斯」駛了進去，它徑直穿過環形車道，停在由兩根灰色石柱支撐的港督府正門遮檐下。從車上下來的是港督府的常客，港督政治顧問魏德巍，他的英文名字是戴維・威爾森。迎接他的是港督府現在的主人，香港第二十五任總督麥理浩爵士。他的英文全名是克勞福德・摩利・麥理浩。

像往常一樣，麥理浩把魏德巍讓進樓上的一間小客廳，兩人分賓主坐下，一個皮膚黝黑的印度男僕恭恭敬敬地送上兩份茶點。

麥理浩是以喝午後茶點的名義把魏德巍邀請來的。

在歐美國家，飲用午後茶點被當作一種悠閒而高雅的生活情趣，而英國人對此最為講究，魏德巍知道，外交官出身的麥理浩並不是那種固守傳統的英國紳士，他每次約人來喝下午茶，大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一向老成持重的魏德巍慢悠悠啜着茶水，品着特級龍井的清香，不時還咬幾口精緻的糕餅，似乎吃得津津有味。他知道還不到自己開口的時候。

果然，麥理浩先開口了：

「魏德巍博士，我有一個私人問題想請你予以指教。作為現任港督，我的任期早在一九七六年底就滿了，但女王陛下兩次批准延長我的任期。就我內心而言，任滿回國那是最好的結局。不過，如果女王陛下仍然不批准我離任，那麼在此期間，香港能否像今天一樣和平繁榮呢？」

魏德巍微微一笑。從麥理浩閃爍其辭的話語裏，他已聽出了弦外之音。近日來，從倫敦方面不斷傳來消息，英國工黨內閣有意與中國大陸方面就香港問題進行接觸。臨陣換將，顯然不是明智之舉，而現港督留任則是勢在必行。更何況麥理浩本來就出身於外交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曾在中國工作過，來港前又做過多年的駐丹麥大使。他既熟悉中國情況，又有外交經驗，還是現任港督。要想與中國大陸方面打交道，顯然他是上佳人選。

然而，魏德巍也深知麥理浩的苦衷。歷年來被任命為港督的人選，不外兩個來源：一是出身軍隊的將領；一是資深的殖民地部官員。尤其是對於殖民地官員來說，港督一職是他們晉陞階梯的最高位置之一，豈能不垂涎欲滴，虎視眈眈?!經過一輪輪暗地裏的角逐下來，凡是能登上港督寶座的

人都是大有來頭、手眼通天的人物。麥理浩出任港督卻打破了英國的舊有傳統，招致了很多喪失希望和機會的人的不滿，他們巴望着能挑出若干差錯，趁勢大講麥理浩的壞話。好在麥理浩自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上任以來，一直是治下太平，安然無事，他本人又小心謹慎，因而没遇上甚麼風浪。

假如此刻讓他卸任回國，那當然是功德圓滿。如果讓他繼續留任，參與就極爲敏感的香港問題而進行的中英會談，且不說中國大陸方面的反響，就是在香港當地無疑會引發一連串的「地震」，說不定會把這彈丸之地搞個天翻地覆。那時候他不僅要灰溜溜地下台，還得被國內當成替罪羊拋出去。回首倫敦上下兩院，麥理浩找不到過硬的靠山；瞻望未來中英談判，全然一片雲遮霧罩。權衡利害，斟酌去留，麥理浩爵士的臉上泛出猶疑的神色。

「你一定知道愛德華·卡爾這個名字吧！」迎着麥理浩充滿期待的目光，魏德巍不知爲何把話題遠遠扯開了。

愛德華·卡爾是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麥理浩曾拜讀過他的大作《歷史是甚麼》，怎能不知道他的名字呢？

魏德巍把頭轉向窗户，似乎不願意與麥理浩的目光直接相遇。

「愛德華·卡爾先生說過一句發人深省的名言：『只有藉助於現在，我們才能理解過去，也只有藉助於過去，我們才能充分理解現在。』」

麥理浩還没能咀嚼出魏德巍引用的這句話其中的滋味，魏德巍又旁若無人地說下去：

「你知道我們英國從印度撤走後，給那裏留下了甚麼嗎？」

麥理浩當然知道，印度曾是英國最重要的殖民地，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印度每年向英國「貢獻」一萬三千五百萬英磅到一萬五千萬英磅，因此印度被稱爲英國女王皇冠上的「寶石」。一九四七年，英國被迫允許印度獨立，卻分別向巴基斯坦和印度移交政權，結果使克什米爾問題成爲印巴兩國關係緊張的禍根。

「你知道我們英國從巴勒斯坦撤走後，給那裏留下了甚麼嗎？」魏德巍好像在對自己發問。

麥理浩當然知道，一九四七年英國在結束了對巴勒斯坦長達半個世紀的「委託統治」後，分別許諾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實行自治，鼓勵他們分別組織政府，建立秩序，結果留下了綿長的禍根。從此以後，阿、以雙方都陷入了刀光劍影、血雨腥風之中。

「你知道我們英國人從馬來亞撤退後，給那裏留下了甚麼嗎？」

麥理浩當然知道，當馬來亞艱難地擺脫了英國直屬殖民地的身份後，它卻一分爲二，赫然變成了馬來西亞、新加坡兩個國家。

魏德巍站起身來，走到牆角一排暗紫色的檀香木書櫥前，打開玻璃拉門，抽出一本書來：

「這本書我很喜歡，但是我一直没有張口向你借。我擔心一旦借到手裏，就想不起歸還，甚至還會把它當成我的私人財產。」

「你不必自責，我們每個人都像您一樣，有着人類天然的弱點。」麥理浩大發感慨。他好像根本没有聽懂魏德巍話中露骨的暗示。

魏德巍走回麥理浩對面，卻沒有坐下，他手扶椅背，目光直視過去：

「踏入泥沼的人，並非全都會陷進去，只有那些冒險進入泥沼中心的人，才會難免滅頂之災。」

麥理浩的目光頓時變得柔和起來，他滿懷真誠地說：

「謝謝您的忠告！」

魏德巍告辭。

麥理浩起身相送，來到客廳門口。

他好像無意中想起了甚麼，放緩了腳步，半側過身來，用手臂在虛空中比劃了一下：

「去年十二月，我在這裏接待了來自中國大陸的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强先生。他不像我想像中的共產黨官員那樣古板，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很希望能夠再次見到他。」

魏德巍沉默不語，他在心中想：「總督大人究竟想對我暗示甚麼呢？」

離開港督府，魏德巍才突然回想起來，在他與港督喝下午茶這段不算短的時間裏，竟沒有一個閒雜人前來打擾，就連那個送茶的僕人也沒有來第二次。

這當然不是巧合。

看來，麥理浩爵士對於這次會面早有安排。

兩天以後，即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日，一紙電文從倫敦傳至香港：英國女王第三次批准港督麥理浩任職延期，下限爲一九八〇年四月。

六天以後，即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日，港督麥理浩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强的邀請，赴北京進行友好訪問，其隨行人員有港督夫人、魏德巍博士、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簡悦强。

2 麥理浩經由廣州赴京，忽然想起當年的英使馬嘎爾尼，曾莫名其妙地向一把椅子鞠躬。

三月二十四日，麥理浩爵士一行抵達廣州。

香港與廣州之間早有鐵路幹線相連，即使是按普通旅客列車的速度，四個小時左右也可到達。但由於中間要經過海關檢查，辦理出入境手續，需要多次轉接，不便之處實在很多。麥理浩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與中方商量早日開通穗港直通列車，而其中的諸多細節則要與廣州方面的負責人協商，爲此他計劃在廣州逗留兩天。所謂與中國方面的合作，在麥理浩看來，具體地說來就是與廣州方面的合作。

前來迎接麥理浩一行的是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梁威林。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就任過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麥理浩是第一位正式來訪的香港總督。一九五五年十月九日，第二十二任香港總督葛量洪爵士曾偕夫人到過北京，名義是到英國駐北京代辦處做客，實際上是非官方訪問。在北京停留的六天時間裏，他會見了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同周恩來總理共進了午餐。

當麥理浩得知梁威林的身份後，心中微微失望。他知道中國人的外交禮儀，身份對等是一條原則。他如果是倫敦市長，前來迎接他的也一定會是廣州市長(不，此時應叫廣州市革委會主任)。既

然人家來了一位省級的副主任，可想而知中國大陸方面並沒有把他當成甚麼重要人物。

轉念一想，麥理浩又覺釋然了。假如英國的地盤被人佔了一塊，而那塊地方的行政長官前去英國訪問，一向傲慢自大的英國人會把他當成尊貴的客人嗎？

其實，麥理浩並不希望對他這次訪問過份張揚。跟他同行的人包括他夫人在內，都不知道他此行的真正目的，而他自己也不清楚能否完成那個秘密使命。

由十幾輛灰色轎車組成的車隊駛入廣州市郊的一個高級招待所院内。在車隊經過招待所門口時，麥理浩撩開窗簾向外瞥了一眼，一位持槍的肅立的士兵映入他的眼簾。他心中不禁一動：前不久，裝備並不先進的中國士兵狠狠地教訓了一通越南人，主要戰事就發生在廣西與越南的交界地帶，據說指揮這場戰鬥的許世友將軍就坐陣在廣州，雖說本月五日已宣佈中越自衛反擊戰已經結束，但越南人不會善罷甘休，中國人也不會不嚴陣以待。現在來訪是不是有些不是時候呢？

也許魏德巍也覺察到了這一點，下車後，他故意湊到麥理浩身邊，用英語嘟囔了一句：

「中國人早就提出購買英國最新式的鷂式垂直起降噴氣戰鬥機，可是工黨政府一直不予答覆，這未嘗不是一個失策。」

很快，他們心頭的這片陰雲就被驅散了。

當晚，中方以廣東省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爲麥理浩一行舉行了歡迎宴會。這次宴會的規模不大，但廣東方面的重要人物全都到場了，而且對港督表現出發自内心的熱情。他們隻字未提全世界都在關注的中越戰爭，口口聲聲只説要加强廣東與香港方面的合作。

給麥理浩留下深刻印象的中方官員首先是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習仲勛。他和彭德懷、賀龍曾並肩作戰，組建了西北野戰軍。解放後，他沒有被授予軍銜，但卻被委以重任，全面主持西南方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作爲大走資派被打倒了。打倒四人幫後，他才得以復出。此人沉穩莊重，頗有鎮守一方的大將風範。

另一位官員也很快引起了麥理浩的興趣，他是廣州市革委會主任楊尚昆。他可以算得上個中共元老，曾參加過舉世聞名的遵義會議和長征。

和麥理浩相比，楊尚昆完全有資格稱作老人，他的前額已近全禿，右邊的牙齒也有些殘缺，但他的精力卻顯得十分旺盛。他是那種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的人，而這種人據說都是很長壽的。麥理浩在和楊尚昆談話時注意到，他的談吐和舉止都要比習仲勛隨便一些。要不是在這種場合相見，人們很可能會把他當作一個善良可親的老翁。

麥理浩還注意到，在參加宴會的中國人當中，有幾位顯然是記者，但他們不像西方記者那樣，一個勁兒地糾纏不清，只是較遠距離地拍拍照，而不上來提甚麼問題。

歡迎宴會很快就結束了。

麥理浩回到住處，並沒有準備入睡，而是閱讀起隨身攜帶的一些材料來，他要爲明天舉行的會談做些必要的準備。

除了要商量改善香港與大陸之間的交通運輸問題，他此行還帶來一個棘手的難題：那就是如何阻止大陸非法移民進入香港。香港不過是彈丸之地，人口如果控制不住，將會給它帶來滅頂之災。

而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廣東方面的有力支持，香港方面只能是一籌莫展。麥理浩估計，這次會談並不會輕鬆，中國人一向精明，一定要討價還價的。

然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第二天的會談進行得十分順利。中方顯然早有準備，不僅對麥理浩提出的問題都做了回答，而且連許多細節方面都考慮得很週到。到了這一步，會談就該結束了，但麥理浩發現，中方的負責人似乎意猶未盡，又談起了雙方合作的未來與前景。從楊尚昆的眼睛裏，麥理浩又看到了那種善良的光芒。顯然，中國人並不是在講客套，香港在中國高級領導人心目中佔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會談結束後，麥理浩突然間信心大增。他深信自己已經摸清了中國領導人對香港的真實態度，也許此行能不辱使命，那樣就是爲大不列顛立了大功，女王陛下一定會親自爲他授勳。

四月二十六日傍晚，麥理浩一行乘坐中方安排的飛機離開廣州，直飛北京。

在踏上飛機舷梯的時候，麥理浩突然想起了發生在兩個世紀前的一件往事：

公元一七九二年，英使馬嘎爾尼率領一支龐大的船隊進入中國內海，名義是前去北京爲乾隆皇帝祝壽。乾隆讀完由英國東印度公司轉來的英國人的信函，龍顏大悅，立刻下達聖旨，令浙江、福建、山東等地督撫委派要員，迅速保護英使一行進京。

馬嘎爾尼一行在天津換小船，準備至通州登陸。這時乾隆皇帝忽然又發聖旨，責令直隸總督梁肯堂、長蘆鹽政徵瑞設宴款待英使。梁徵二人哪裏敢拿皇上的聖旨當兒戲，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挽留住英國人，並用碩大的禮盒裝滿精美無比、香氣四溢的食物送上英船。

就在英國人還没弄明白這一切是怎麼回事時，徵瑞等人把馬嘎爾尼引進岸上總督官邸大廳頂端的一個陰暗角落，和顏悦色地對他說：「這裏供着我們大清皇上的聖旨，見聖旨如見御駕親臨，必須對上行禮如儀。」

馬嘎爾尼不知道這是一種甚麼奇怪的禮節，尤其是讓他對着黑暗中的一把椅子行禮，更讓他感到別扭。但礙於禮節，這位頗有涵養的英國紳士還是向那把莫名其妙的椅子鞠了一躬。

到達北京後，馬嘎爾尼並沒有見到乾隆皇帝。徵瑞告訴他，見中國皇帝必須跪拜磕頭。這一次馬嘎爾尼斷然拒絕了徵瑞的要求，只答應見乾隆時只能像見英王一樣，行單腿下跪禮。

既然英使拒絕以屬國使臣的地位跪拜叩見，那麼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也就對他們的來訪提不起興趣來。結果，馬嘎爾尼最終也未能見上乾隆皇帝一面，英國人想在北京派駐常任使節的想法也就落空了。

直到麥理浩走進機艙，在座位上坐穩後，腦海裏還在縈繞着這樣的問題：

「如果我是當年的馬嘎爾尼，能不能委屈自己的膝蓋一下，向中國皇帝行跪拜禮呢？」

3 港督終於亮出了他的底牌。港督夫人忽發思古幽情，醉翁之意不在酒。

雖是三月末，但北京仍然籠罩在冬末的寒意裏。和廣州與香港相比，這裏的氣溫要低七八度，尤其是傍晚時分，氣溫相差要在十幾度以上。

麥理浩剛走出機艙門，就情不自禁地打了個寒噤。正像他早已想到的那樣，北京方面沒有爲他舉行正規的歡迎儀式，前來迎接他的人也不多。他一眼見到的是英國駐華大使珀西·柯利達和夫人。

接下來他又認出了身材不高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王匡。麥理浩知道，新華社香港分社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駐港辦事機關。

儘管他知道曾與他有過愉快交往的李强部長不會來機場，但他還是在歡迎的人群中掃視了一遍。

三月十八日，李强應新加坡政府的邀請，去新加坡做了一次爲期短暫的訪問，二十二日就匆匆回國了。麥理浩知道，這一定與他來訪有關。

經介紹，麥理浩與前來歡迎的人見面。

外貿部副部長賈石是代表李强來的。

外交部長助理宋之光是外交部的代表。麥理浩用心記住了這個名字，在用中國式的禮節與他握手時，有意使了一把勁。

來到北京，麥理浩明顯地感覺到這裏的工作節奏和效率要比廣州慢得多。一直等到二十七日下午，他才見到李强部長。當天晚上，李强設宴招待麥理浩一行。柯利達大使和夫人應邀作陪。中方在座的還是到機場歡迎過他的那些人。

和廣東省革委會舉行的那個宴會相比，這個宴會的禮儀性成份更大一些。賓主寒喧過後，麥理浩就覺得無話可說了。他想趁機與柯利達夫婦多攀談幾句，又恐怕冷落了主人，只好與李强閒聊開來。幸虧彼此語言不通，需要有譯員居中傳達，不然場面就太冷清了。

麥理浩一邊與李强閒聊，眼睛卻不時向坐在對面的外交部長助理宋之光的臉上瞥去，那目光明顯帶有探詢的意味，就好像把宋之光的臉當成一本書來讀。

這本「書」上會寫出甚麽呢？

今天下午，麥理浩請宋之光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租借『新界』九十九年，將於一九九七年期滿，英國希望中國在九七年以後繼續租讓。」

麥理浩的試探氣球終於放飛了。

在弄清楚了麥理浩這番話的意思後，宋之光的臉上閃過一絲惶惑的神情，很顯然他根本沒有想到以親善訪問爲名的港督會提出如此嚴肅的問題。但他很快就鎮定下來，向麥理浩表示，這種事情

要向上級請示，然後才能做出答覆。

他的上級是誰呢？是外交部長黃華嗎？這種事情外交部長恐怕做不了主。不管這個上級是誰，麥理浩都可以肯定，直到現在他還沒有向下級發出指示。

宋之光是個職業外交官，每次與麥理浩那探詢的目光相遇時，都彬彬有禮地頷首致意。如果他已得到上級指示的話，一定會讓對方感覺到他已胸有成竹。

在宋之光的臉上，麥理浩看到了這樣幾個字：

等候指示。

麥理浩不禁得意起來。他好像看到了在自己的「閃電戰」面前，對方是如何地猝不及防。至少在雙方的第一次交手中，他已是穩佔上風。

宴會結束後，麥理浩與中方主人逐一握手告別。在輪到與宋之光握手時，他有意使了一把勁。

三月二十八日，按主人的安排，麥理浩一行在北京參觀。

北京是一個處處都有名勝古蹟的都市，似乎隨便鑽進哪一條胡同裏，都會使你恍惚間回到幾百年前。不過，街道兩旁有很多水泥紅磚的建築，差不多把這種韵味破壞光了。

麥理浩興致勃勃地遊覽着，但他的心裏卻開始焦躁起來。中方爲甚麼還沒有動靜呢？按他原先的設想，他的那個建議一提出來，對方的外交部官員一定要急不可耐地與他會談。可是現在，對方卻任何表示都没有做出來，真讓他摸不清頭腦。

滿頭金絲捲髮的麥理浩夫人似乎看出了丈夫的心思，她尋思片刻，突然笑容滿面地向走在她身旁的魏德巍問道：

「尊敬的博士，我們來自香港，也帶來了一個有關香港的問題，我想知道香港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

魏德巍莞爾一笑。他一下子就看破了港督夫人的心思，不過是想藉這個話題來吸引陪同參觀的中國外交部官員，以便趁機從他們口中討出一些信息來。魏德巍正好可以賣弄自己的學識，便不慌不忙地講起來：

「香港這個名稱的由來衆說不一。有人說是從莞香而來。香港原屬廣東東莞縣，從前以出產香料著名，叫作莞香。當時的莞香多數由東莞運到九龍尖沙咀，再渡海到香港石排灣集中，換載大眼鷄船，沿海北上，銷往各省及日本。由於香料都集中在這個港口起運，所以這裏就取名爲香港。

「還有人說，薄扶林附近，即現在的『香港仔』，當年是一個小漁村，村裏有一道泉水流注入海，成了一個小小的港口。來往船隻上的水手發現這裏的水甘香可口，便常常到這裏來汲水上船作爲飲料。一來二去，這道泉水就得名爲香江，它的港口也就自然被叫香港了，諸位如果有興致的話，到薄扶林香港牛奶公司牧場附近轉轉，還會找到當年的那條香江，不過如今已是臭氣熏天了。」

中方陪同參觀的官員們全都聽得津津有味，可是卻無人插嘴。

沉寂片刻，港督夫人又開口了：

「尊敬的博士，我有一個小小的問題總也沒有想通，當年清政府把香港租借給我們英國，租借期爲甚麼偏偏是九十九年，而不是一百年呢？」

魏德巍偷眼看了一下港督。他覺得港督夫人這個問題提得太露骨，一旦對答得不得體，或犯了歷史錯誤，那會引起對方的誤解，甚至會引來外交麻煩。但是從港督的臉上，看不出他是甚麼態度。

魏德巍靈機一動，哈哈笑道：

「這也許是中國人偏愛九十九這個數字吧！」

魏德巍說的是玩笑話，今天的中國人也都可以開這樣的玩笑，但如果倒退一個世紀，談起香港來中國人可沒有如此輕鬆的興致。

香港地區位於廣東省南部海岸，由三個部份組成：香港島，面積七十五點六平方公里，鴉片戰爭後由一八四二年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割讓給英國；九龍半島位於目前的界限街以南，面積爲十一點二平方公里，根據一八六〇年簽訂的《中英北京條約》連同昂船州一起割讓給英國；新界，面積爲九百七十五點一平方公里，包括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九龍半島北部大片土地以及附近的二百三十五個島嶼，根據一八九八年簽訂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給英國，租期爲九十九年。

在中國近代史上，先後出現了三個租期爲九十九年的不平等條約，而最先出現的是一八九八年

三月六日訂立的《膠澳租界條約》，它以法律條文的形式把租借九十九年的時間規定下來，從此沿襲下來。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國藉口其傳教士在曹州巨野(今屬山東)被殺，派艦隊强佔膠州灣，次年又强迫腐敗的清政府簽訂租借膠州灣的條約。當時清政府的總理衙門忙去詢問德國駐華公使海靖，問他有甚麼條件。海靖提出六條要求，大致是：將膠州灣四週百里租借一百年；由膠州至膠南的鐵路歸德國建築；路旁百里內的礦山也要歸德國開採。總理衙門覺得他這是獅子大開口，條件太苛刻了，就懇求他讓一點步。海靖傲慢地說：「讓一點步可以，那就把租期一百年讓掉一年，就算九十九年吧！別的不能讓步，否則立即奪佔東三省。」總理衙門知道無法再商談了，只好允准。

一百年和九十九年相比，實在是沒有甚麼差別。不過從這件事上，卻是充分暴露出當時的清政府是何等無能。

同樣，香港地區的被割佔和租用，也是清政府對外屈膝投降的結果。

十八世紀初，英國開始對華進行鴉片貿易。

當時，無論是出於軍事還是商業上的考慮，英國人都想在廣東沿海佔領一個海島，以作爲入侵中國大陸的墊腳石。一八三〇年，曾有四十七名英國商人聯名上書英國政府，要求佔據中國的一個海島。一八三九年六月三日，林則徐在虎門銷煙，五十七家英商被驅逐出境，他們便下決心佔領香港島，作爲永久的根據地。

香港很小，在世界地圖上，它小得像兩根細線繫成的結，但它的重要性卻不容低估，正如林則

徐所說：

「廣東水師大鵬營所轄洋面，延袤四百餘里，其尖沙咀一帶，東北負山，西則有急水門、雞踏門，東則有鯉魚門、佛堂門，而大嶼島又即在其西南。西面環山，藏風聚氣，波恬浪靜，水勢寬深。英夷船已久欲依為巢穴，而就粵省海道而論，則凡東越惠潮，北往閩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該處經過。萬一中途梗阻，則為患匪輕。」

一八四〇年六月，英國悍然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香港已經成為英軍北犯的總站。一八四一年一月，英軍宣佈「正式」佔領香港。一八四二年英軍侵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清政府屈辱求和，於同年八月二十九日同英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這個條約共十三條，其中第三條規定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其實，早在這之前香港島已在英國人的控制之下，現在不過是補辦一個「手續」罷了。

侵略者貪婪的野心是難以滿足的。英國人佔領了香港島之後，又把眼睛盯向了九龍。

一八五六年十月初，廣東水師登上停泊在珠江口炮台附近的一艘名叫「亞羅」號的船，逮捕了船上的海盜。這艘船本來是中國人的，可是英國駐廣州領事卻硬說是他們的。英國人以此為藉口，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一八五八年十月，英法聯軍侵入廣州。一八六〇年三月英軍以「找尋住宿地」為藉口，進駐九龍半島今尖沙咀一帶。英法聯軍接着打進了北京城。十二月二十四日，英國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中英北京條約》，其中第六條規定割讓九龍司地方(即目前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給英國。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西方列强競相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英國自然不甘落後，也要大大地分上一杯羹。於是，在英國的武力要挾下，《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於一八九八年六月出籠了：

「溯查多年以來，素悉香港一處，非拓展界址不足以資保衛。今中英兩國政府議定大略，按照黏附地圖，展擴英界，作爲新租之地。其所定詳細界線，應俟兩國派員勘明，再行劃定，以九十九年爲限期。又議定：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其餘新租之地專歸英國管轄。至九龍向通新安陸路，中國官民照常行走。又議定：仍留九龍城原舊馬頭一區，以便中國兵商各船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將來中國建造鐵路至九龍英國管轄界，臨時商辦。」

香港「新界」這個地名，就是由這個《專條》而來。所謂「新界」，就是新拓展的地界。按照這個《專條》，香港「新界」地區的租借期到一九九七年六月底正好滿九十九年，應該歸還中國。但今天的英國人心裏明白，香港地區能夠存在至今，不僅在於它的地理條件，更在於中國共產黨人對它的態度。香港的歸還必然是涉及整個香港地區的問題。中國人要麼整個收回，要麼繼續維持現狀，決沒有只收回一半的道理。

在香港地區還有一個特殊的地方，那就是九龍南部的九龍城寨。按照一八九八年簽訂的條約，那裏的中國官員將繼續行使管轄權，但要與保護香港的軍事要求保持一致。港英政府的官員不能進入，但從租借的第二年開始，清政府就沒有派官員駐守。晚清至民國初年，中英雙方就九龍城寨的

交涉權，有過多次交涉，但沒有甚麼結果。於是，這個地方就成了三不管地區，「黃、賭、毒」肆虐橫行，鴉片吸食者、娼妓、逃犯把這裏視爲天堂。無牌照行醫也是這裏的一大特色。這裏的醫生收費便宜，招引了許多香港人也來就診。

一九六三年一月，港英政府決定進入九龍城寨，拆除一些房屋，重新安頓了大約二千名居民。對此，中國方面抗議英國「侵犯中國的主權」，要求英國政府指示港英政府立即撤消這個決定。

二十多年後，也就是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四日，港英政府宣佈三年内全面清拆九龍城寨，改建公園，香港法律也從即日起適用於九龍城寨。

由於中英雙方此時已經簽署了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中國政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整個香港地區恢復行使主權的問題已經獲得圓滿解決，因而中國方面的態度便有了根本的轉變。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說：「九龍城寨和香港其他地區一樣，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但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我們對於港英政府準備採取妥善措施，清拆九龍城寨，並在原地址上興建公園的決定，表示充分理解。」

至此，九龍城寨問題總算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殘破的九龍城寨如今也不復存在，放眼望去是一片紅花綠草。

焦慮的等待終於結束了。

4 中國外交部明確表態：「中國要收回香港。」麥理浩黯然而歸。

中國外交部正式答覆麥理浩：「中國要收回香港。」

宋之光在一字不差地傳達了上述指示，又意味深長地補充了一句：「續租的建議並不是甚麼新東西。」

麥理浩知道對方所指何在。早在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一日，英國國會下議院在辯論有關香港前途問題時，工黨議員黎增義就曾提議，英國應藉貸款之機，向中國提出續租「新界」。當時很多議員都認爲，這個建議「在目前並不切合實際」。因此，英國外交部次官在答覆議員詢問時，隻字未提「新界」租約問題。

中國方面對這個建議並未作出反響，但在此之前三月八日出版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爲《評美國共產黨的聲明》的文章，其中有幾段話把中國政府的立場表達得再明白不過了：

「香港、澳門這類問題屬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强加於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問題。」「我們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之前維持現狀。」

彈指一揮間，二十六年的時光飛速流逝，可是麥理浩發現他彷彿又回到了二十六年前。

又是對華貸款。——三月四日，英國工業大臣埃里克·瓦利訪華，在北京代表英國與中國簽訂

了一項長期經濟合作協定，計劃在今後的七年內，兩國經濟活動總額達一百四十億美元。同時，英國方面還慷慨地向中國提供五十億美元的貸款。

又是租約延期。——不過這次換了個人，不是議員黎增義，而是由他現任港督親自提出來。

二十六年前的那個續約建議，以「不合時宜」的理由被束之高閣了。那麼二十六年後舊事重提，會不會仍然「不合時宜」呢？

麥理浩知道一句名言：歷史總是有着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

宋之光委婉地告訴麥理浩，按計劃，二十九日上午，鄧小平副總理將接見麥理浩一行。外交部方面希望在他會見鄧小平時，不要提續約這個問題。二十九日下午，外交部長黃華將會見麥理浩，那個時候正好談一些具體問題。

麥里浩做了一個含糊不清的手勢，不知道他是同意還是沒同意。

三月二十九日上午，鄧小平副總理會見麥理浩一行。中方參加會見的主要官員除了李强外，還有一位是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承志。

廖承志是中共元老級人物，在外交界享有很高的聲望。他兩鬢斑白，戴着一副黑邊眼鏡，頗有一些學者風度。

在沒見到鄧小平之前，麥理浩的腦子裏早就裝滿了關於這位傳奇式人物的軼聞。在他的想像中，這位在中共黨內曾被打倒三次，又復出三次的人物，一定有着鋼鐵般的意志。然而，他畢竟已

是七十五歲高齡的老人，政治鬥爭的大風大浪不能不給他留下深深的創傷，他應該和許多中國人一樣，變得世故了、圓滑了。如果是那樣的話，他完全可以用漂亮的外交辭令讓他一無所獲，而在這方面，鄧小平的聰明才智是舉世公認的。

一九七八年十月，鄧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偕夫人卓琳對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並出席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儀式，陪同他出訪的就有今日在座的廖承志。

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鄧小平在東京日比谷的日本記者俱樂部召開記者招待會。

據說，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在出訪時第一次同意以「西歐方式」公開會見記者，直接面對懷着各種動機的記者提出的各種刁鑽古怪的問題。來自時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衆國際社、美聯社、法新社等著名通訊社的四百多名記者早早地就來到日本記者俱樂部。有些慣於獵奇的記者正在緊張地開動腦筋，企圖從這位共產黨領導人的即席發揮中找些破綻出來，以便製造「爆炸性新聞」。

招待會開始了。四台電視轉播車和三十多台遠鏡頭照相機在忙碌地動作着，按快門、作記錄的聲音接連不斷。

鄧小平從容不迫地回答着記者們提出的一個個問題。

突然，一位日本記者站了起來：

「請問鄧副主席，既然中日雙方已經締結了和平友好條約，那麼中國爲甚麼不承認尖閣列島歸屬日本所有呢？」

話音剛落，會場裏的氣氛刹時間緊張起來。大家都屏住呼吸，想聽聽鄧小平如何來回答這個微妙的難題。

尖閣列島是日本的叫法，中國叫釣魚島，是台灣省的附屬島嶼，甲午戰爭後被割讓給日本。一九七二年田中首相訪華時，曾要求周恩來總理明確該島的歸屬權，周恩來表示：「現在還是不要討論，地圖上又沒有標，出了石油就成了問題。」於是，這個問題一直擱置至今。

鄧小平環顧了一下四週，神色顯得更爲輕鬆自如了：

「尖閣列島我們叫釣魚島，雙方叫法不同，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我們雙方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雙方也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倒是有人想在這個問題上挑些刺，來阻礙中日關係的發展。我們認爲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等十年也沒有關係。我們這一代缺少智慧，談這個問題達不成一致意見，下一代總比我們聰明，一定會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日本記者俱樂部裏立刻爆發出一陣雷鳴般的掌聲，鼓掌最熱烈的人當中就有剛才提問的那個記者。

會見之前，麥理浩已在暗中下決心，一定要向鄧小平當面提出香港續借問題，但一回想起這件記憶猶新的往事，他就不由得猶豫起來。他擔心鄧小平會不動聲色地把話題引開，或者「顧左右而言他」，讓你摸不着頭腦。

按照慣例，有關國家的大事都要由國家一號人物來表態，而鄧小平目前在中共黨內並沒佔據這

樣的位置，他能直言不諱嗎？

趁雙方寒暄之機，麥理浩打量起鄧小平來。他身着灰色中山裝，皮膚黝黑，走起路來步履平穩，說起話來聲音洪亮，看上去非常健康，全然不像七十五歲的老人。

雙方坐定。麥理浩注意到，在他與鄧小平之間的後方，除了坐有一位年輕的男譯員之外，還坐着兩位身穿小翻領上衣的女子，好像是擔任記錄。

這個細節使麥理浩警覺起來，中方安排鄧小平會見自己，很可能並非完全出於禮儀。看樣子中方很重視這次會見。

麥理浩向鄧小平介紹了一些香港目前的情況，鄧小平在注意傾聽着。有時候他轉頭朝向廖承志，可能是有些地方不太清楚，要求廖承志給予解釋。

鄧小平也提出一些有關香港經濟方面的問題，請麥理浩回答。

看得出來，鄧小平對香港很感興趣。

慢慢地，麥理浩先前那種局促不安的感覺消失了。鄧小平語調平和舒緩，手勢親切活躍，眼睛裏還不時閃出一絲愉快的笑意，這一切都使麥理浩覺得自己是在和一個智慧老人談話。

「鄧先生，有一個問題我想請你回答。」麥理浩終於耐不住心頭的躁動。「我們都知道，『新界』的租約一九九七年到期，如果英國政府提出續約的要求，中國政府能予以考慮嗎？」

鄧小平用略顯詫異的目光瞥了一眼麥理浩，便毫不猶豫地說：

「我們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總督先生想必一定很清楚。」麥理浩一時間無言以對。

一陣難堪的沉寂。

麥理浩輕咳一聲：

「我想請副總理閣下注意，香港的政治、經濟體制完全不同於大陸，而香港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繁榮起來的，如果中國一定要收回香港，很可能會在香港引起人心恐慌。」

鄧小平做了一個有力的手勢，對麥理浩說：

「請你回去轉告香港的投資者，讓他們放心好了。我這句話你可以回去公開聲明。」

「謝謝！」

麥里浩頗有禮貌地向鄧小平點頭致意。從表面看，他的臉色很平靜，但他的內心卻很不平靜：「鄧小平對於新界租約問題沒有表態，這怎麼能讓香港的投資者放下心來呢？」

三月三十日上午，麥理浩一行離開北京，前往西安、蘭州訪問參觀。

四月三日，麥理浩回到廣州，在春色滿園的泮溪酒家舉行答謝宴會，習仲勛、楊尚昆以及梁威林等人應邀出席。

四月四日，麥理浩一行乘坐廣東至九龍的第一班直通旅客特快列車返回香港。從此以後，穗港直通列車正式啓用，每日對開兩班。這也算是麥理浩此次訪華所取得的成果之一。

列車在飛馳，距離香港越來越近，麥理浩的心情也越來越複雜。應該說他此行已經完成了既定的使命，然而他卻有一種打敗仗的感覺。好像在甚麼地方有些不大對頭，但又說不清楚差錯出在哪

裏。

魏德巍可不像麥理浩那樣心事重重，他興致勃勃地說：

「在北京，一位英國記者給我講了這樣一件趣事：北京街頭的灑水車每天都定時出動，有時候灑水車出動時正好趕上天降大雨，可它還是照樣灑水不誤。」

没等別人發笑，魏德巍自己先大聲笑起來。

「要説官僚主義，我們英國政府可比人家厲害。這次我就扮演了一回灑水車司機的角色，在下雨天把灑水車開到了北京街頭。」麥理浩苦笑着說。

「中國有兩句成語，一個是百廢待興，一個是當務之急。」魏德巍曾在香港大學修習過兩年中國語文，對漢語頗爲精熟。「中國人剛剛打倒『四人幫』，經濟建設全面展開，這就叫百廢待興。與此相比，一九九七年的事情能叫當務之急嗎？」

麥理浩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列車逐漸慢下來，九龍紅磡車站遙遙在望。

第二章

小心翼翼的探路人



1 鄧小平面對英國工黨領袖卡拉漢侃侃而談，卻不談香港問題。卡拉漢發現中國人對香港問題並不着急。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三日，英國國會下議院就港督麥理浩訪華一事展開辯論。工黨議員馬丁·弗蘭納利詢問，麥理浩訪華時是否討論過香港這個時代錯誤的產品，一九九七年香港是否要歸還中國。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皮特·布力克針鋒相對地反駁說，香港並不是時代錯誤的產品，而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布力克還故作從容地表示，英國政府對於香港問題並不急於解決，再說現在也並非討論香港問題的最佳時機。

英國人不急，中國人急嗎？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訪問英國，外交部長黃華等人隨行。據外電報道，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與華國鋒會談時，沒有討論「新界」租約以及香港的主權問題，但談到了香港的未來，雙方均同意維持當地的繁榮與安定，並同意就此問題保持接觸。

中國方面的最高級領導人在與英國首相的會晤中居然不提香港問題，這說明中國人真的不急。

但是中國人對香港的未來卻並非漠然不顧。黃華外長在代表華國鋒總理出席記者招待會時，又重複了鄧小平對港督做過的承諾，當解決香港問題的時機來臨時，中國將會考慮投資人的利益，使

他們的利益不受損害。

精明的西方評論家猜測，鄧小平和黃華的兩次談話都在傳達這樣的信息：中國政府對收回香港信心十足，但對香港的未來還把握不大。

中國人要收回的是一個繼續繁榮發展的香港。這着急不得。

英國人難道也真的不着急嗎？布力克說出了一半的真話，英國政府不是不急，而是還沒有尋找到適當時機。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日傍晚，正是萬家燈火時分，一架大型客機在北京機場悄然降落，從飛機上悄然走下一位英國人。

他就是英國工黨領袖卡拉漢，他此次是應中國政府的邀請來華訪問。

隨行的人不多，除了他的夫人外，只有工黨總書記羅恩・海沃德等數人。

前來歡迎的人也不多，除了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及夫人外，只有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韓克華和夫人，外交部長助理宋之光。

當這兩行短短的行列靠攏在一起時，卡拉漢的心頭不由得升起一股淒楚落寞之感。如果是在一年前來到這裏，他將受到元首級的隆重歡迎。

那時他不僅是工黨領袖，還是堂而皇之的英國首相。

去年三月，英國保守黨領袖戴卓爾夫人向國會提交了對工黨政府的不信任案。二十八日舉行表

決，結果以三百一十一票對三百一十票獲得通過。以卡拉漢爲首的英國工黨被迫下台。

對如此戲劇性的表決結果，卡拉漢實在是心有不甘。表決那天，工黨議員布勞頓爵士正好生病，而且病得十分厲害，以至於無法用救護車把他送到議會的投票廳。假如沒有這個意外事件的話，誰勝誰敗還真不好說呢！

卡拉漢畢竟是老練而成熟的政治家，他坦然地面對失敗，而沒有怨天尤人。

五月四日，隨着保守黨在大選中獲勝，戴卓爾夫人被英國女王任命爲首相。卡拉漢立即驅車去白金漢宮向女王遞交了辭呈，隨即向記者發表談話。他說：「一個婦女佔據這個位置，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是一件大事。」「我們都必須祝福她，祝她成功，她將需要健康、力量和持久力。」

卡拉漢說這番話時並非言不由衷。當時的英國陷入經濟嚴重危機之中，國內外矛盾重重。卡拉漢希望他的繼任者能夠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重振大英帝國的雄風。據他的觀察，戴卓爾夫人具備的勇氣和魄力是許多男人望塵莫及的。

卡拉漢並沒有看錯。戴卓爾夫人上任伊始，就大膽限制政府的作用，鼓勵發展私人企業，許諾讓人民得到更多的錢，負更多的責任，在國內引來一片喝采。接着，在對外關係上，她也一改英國的衰敗風氣。五月十日，她在與西德總理施密特舉行會談時，突然表示：「我們要判斷甚麼是英國的利益，我們將堅決地保衛它。」戴卓爾夫人的强硬立場，引得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對她刮目相看。

卡拉漢從心底還是佩服戴卓爾夫人的。因此，他在成行之前才會把行蹤告知戴卓爾夫人，並打算認認真真地爲她當一回「信使」。至於說兩個人之間有甚麼政治恩怨，那倒全然没有放在卡拉漢

的心上。

五月十二日上午，鄧小平副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卡拉漢一行。會見之前，鄧小平還同客人們照了相。

賓主落座後，鄧小平首先談起國際形勢來。他告訴卡拉漢，中國的對外政策有三個主要立場：一是絕不做超級大國；二是絕不對別人稱霸；三是繼續做第三世界國家。

接下來，鄧小平又興致勃勃地談起中國的經濟來。他告訴英國客人，要想發展中國的經濟，就必須增加農業的產量，而要想增加農業產量，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鄧小平可能是恐怕卡拉漢聽不明白，又補上了一句：「因為中國缺少耕地呀！」

鄧小平又談到中國政府的遠期目標是在本世紀末，把國民收入增加到每人每年一千美元。「那時候，每個中國人掙的錢都要比現在多三倍。」

卡拉漢發現，鄧小平在說這句話時，眼睛裏閃動着興奮的光芒。

鄧小平的侃侃而談大出卡拉漢的意料之外。照這麼個談法，他只有充當看客的份兒，而他這次可不是只帶耳朵來的。為了這次會面，卡拉漢做過一個詳細的談話提綱，他要向鄧小平解釋英國政府對待蘇聯入侵阿富汗的立場。他要提請鄧小平注意，關於英國飛機開闢到北京的直飛業務的協定，至今仍遲遲未有進展。他還想要鄧小平知道，戴卓爾夫人希望能就香港問題與中國政府高級領導人會談。不過，在他的那個備忘錄裏，香港問題被故意排在最後。

眼看着兩個半小時的會談就要結束了，卡拉漢這才似乎漫不經心地問道：「鄧先生，中英雙方還有一個香港問題。我個人認爲，在適當的時機，應該相互間開展討論。」

「我贊成你的意見，但現在還不到時機。」鄧小平答道。「我們國内還有許多比這更重要的問題要應付。我還是那句老話，投資者可以放心大膽地在香港投資，將來不論採取甚麼樣的處理方法，我們都不會讓投資者的利益有所損失。」

會見結束後，鄧小平親自把卡拉漢送到大廳門口。望着鄧小平步履輕鬆的樣子，卡拉漢不禁想起最近西方報刊上鋪天蓋地的謠傳，有的說鄧小平生病了，有的說鄧小平住院了，還有一位塔斯社記者更是說得有鼻子有眼睛，說甚麼鄧小平已經遭到軟禁，目前生死不明。

這也怪不得那些記者們。他們每月拿着上萬美元的高薪，要是不能經常挖出一兩條有「價值」的新聞，無論如何也交待不過去。

卡拉漢由此又聯想起一件往事：當年，老伯爵斯弗爾扎任意大利外交部長時，意大利駐莫斯科的一位代辦，每天都往齊吉宮(原意大利外交部所在地，現爲總理府)發出好幾份電報，開頭總是：「據傳說……」斯弗爾扎伯爵忍無可忍，便給這位代辦發去了一封電報：「暫停發報，待傳說停止後再寫。」

卡拉漢很想把這個故事講給鄧小平聽，但他最終還是忍住了。

2

戴卓爾夫人降尊紆貴，謙恭地把年已六旬的前首相希思請進唐寧街十號。她請求希思接受一個秘密使命。

在英國倫敦中心有一條很不顯眼的胡同，這裏有一幢同樣不顯眼的三層灰磚樓房。這樣一個外表普普通通的地方，卻有着極不普通的氣氛。周圍崗哨林立，戒備森嚴，綠樹掩映中不時閃動着便衣保鏢警惕的眼睛。任何人想不經允許便從地面接近那座小樓，簡直要比登天還難。

這裏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寧街十號，操縱英倫三島風風雨雨的地方。自從十七世紀喬治時代以來，它一直就是英國首相府的官邸。

如今，這座官邸的主人就是人稱「鐵娘子」的戴卓爾夫人。

戴卓爾夫人一九二五年生，原名瑪格麗特·希爾達·羅伯茨。她的父親是林肯郡格蘭瑟姆小鎮上的一個雜貨商。瑪格麗特從小精明過人，而且很有主見，當然，她的眼光也要比當雜貨商的父親遠大得多。在家人不支持的情況下，她毅然進入牛津薩默維爾大學學習，畢業時獲化學理學學士學位，後來又獲文學碩士學位。

一九五一年，瑪格麗特與一位名叫丹尼斯·戴卓爾的石油公司經理結婚。婚後生有一對雙胞胎，這使得她後來獲得了一項世界之最：世界上第一位生有雙胞胎的女性國家元首。

瑪格麗特·戴卓爾的政治生涯是從一九五九年起步的。當時，她作爲中產階級在倫敦北部芬乞累地區的代表進入國會，很快她就獲得了英國保守黨領袖愛德華·希思的青睞。希思一向不近女色，終生未娶，對女性時常發些「奇談怪論」，這使得他失去了許多女性選民的選票。但他唯獨對瑪格麗特·戴卓爾夫人寵愛有加，甚至當衆拍她的肩膀，稱她爲「我的可愛的小戰士。」

戴卓爾夫人擔任的第一個重要職務，是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四年在希思首相領導下的政府裏擔任教育大臣。在此期間她幹的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下令取消了免費給學童的牛奶，以示節約，結果引來一片噓聲，她也因此得來一個綽號「搶奶人」。至於她在保守黨內部擊敗了一手把她提拔起來的希思，成了保守黨的女黨魁，那則是後話了。

如今的戴卓爾夫人已經不是當年那個活潑可愛的小姑娘了，而是一個威嚴端莊的女首相。即使在家中，她那已經退休的丈夫丹尼斯也能覺察到她的「不言自威」。丹尼斯總是稱她爲「頭兒」，凡事都聽從這位「頭兒」的指揮。

不過，戴卓爾夫人卻不想把「鐵娘子」的作風帶回家中。她每次回到家中，只要得閒，她就會換上便裝，親自下廚燒菜。她的家中沒有僱女管家，她也不喜歡讓傭人住在自己家中。她還有一個很少有人知道的小秘密：她從不用餐後甜點。儘管已是五十六歲的年齡了，但她仍然注意保持線條，所以飯量很小。一天緊張忙碌的工作完了，煎個荷包蛋端到樓頂層的卧室裏享用，那是再愜意不過了。

今天晚上，戴卓爾夫人沒有動手做晚飯，她要在官邸接受《每日郵報》兩位記者的採訪。

英國記者都知道，戴卓爾夫人幾乎從不舉行記者招待會，她更喜歡在爐火旁發表電視講話。戴卓爾夫人答應在官邸裏接見記者，這可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

記者提的問題直截了當：「請問首相對英國國會議員代表團訪華一事有何評論？」

前不久，也就是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五日，英國國會議員代表團應邀正式訪問中國。他們在北京會見了中國政府的兩位高級官員——姚依林副總理和彭冲副委員長。英國議員催促中國盡早討論香港問題，而他們卻不緊不慢地回答：「中國方面已經注意到了你們的意見。但香港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現在不着急，要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方式加以解決。」這兩位官員還表示，香港應該保持一個自由港的地位，也應該保持繼續繁榮。

戴卓爾夫人輕輕啜了一口微帶甜味的茶水：

「我們早就注意過中國政府方面官方的表示。香港目前由英國政府管理，那裏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要由英國政府負責。如果說在香港問題上我們比中國人着急，原因就在這裏。」

「請問首相，你對香港的前途有何看法？」

「未來的香港，主權應該屬於中國，但它必須是一個作爲自由港和商業中心的城邦存在。」

戴卓爾夫人突然感到心緒不寧起來。她三言兩語打發走了記者，便靠在長沙發上沉思起來。茶桌上的糖茶已經涼了，但她心中卻好像翻湧着一股難以名狀的灼熱。

中國人到底打的是甚麼牌？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日，港督麥理浩回到倫敦，緊急約見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卡林頓勳爵。

不久前，英國頒佈了新的國籍法，按新法規定，香港居民必須符合很苛刻的條件，才能獲得英國國籍。一時間，香港人心惶惶。麥理浩催促英國政府盡快處理香港新界租約問題，以挽回投資者的信心。

四月一日中午，英外交大臣卡林頓抵達北京。當天下午，他就與黃華外長舉行了會談。四月三日，鄧小平又會見了卡林頓。鄧小平對中英貿易關係和經濟合作關係的前景表示樂觀，並重申中國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

四月三日下午，卡林頓在北京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卡林頓向記者們透露了一些消息：鄧小平副主席「一再向我强調，香港的投資者可以放心。他强調的語氣，比兩年前對港督麥理浩强調時更重。」「鄧小平還坦率地表示，他是以中國政府的地位的充分權力來説話的。」

記者招待會快要結束時，卡林頓甩出一句外交辭令：「如果有必要的話，我相信兩國政府將進行接觸。」

「總是老一套！」想到這裏，戴卓爾夫人在心中不滿地嘟囔了一句。

自從港督麥理浩訪華之後，英方不斷派遣官員與中方上層領導人接觸，但始終沒有摸透中國領導人的真實意圖。

卡拉漢訪華後，得出這樣一個感覺：中國人需要優先處理並解決的事情太多了，起碼在兩三年內，香港問題還排不到中共高級領導人的議事日程上，但是中國人在對香港問題似乎一直沒有表現出强硬的立場，因此一旦時機成熟並抓住它，英國人將獲得一個滿意的協議。

戴卓爾夫人十分信服卡拉漢的感覺，因而有一度她對香港問題也來了個「冷處理」，但進入一九八二年以後，她的這一套不靈了。

從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七年正好是十五年，而地產和抵押合同的有效期一般都是十五年。十五年之後，英國對新界乃至整個香港的統治行將結束，英國法律的有效期也將告終。所以，從一九八二年年初開始，香港就再也沒有簽定過任何地產和抵押合同。

香港面臨抉擇：要麼穩住形勢，要麼天下大亂！

要想穩住香港的形勢，必須得到中國政府實質性的承諾，中英雙方必須達成共識。

戴卓爾夫人下定決心，再選派得力人員前往北京。

第二天一大早，戴卓爾夫人就來到她的辦公室，對她的隨身秘書尼克爾·維爾斯交待了一個特別任務：務必把希思先生請來。

戴卓爾夫人還特別叮囑，要派她那輛用了九年的達莫萊牌轎車迎接希思先生，她的貼身警衛維克斯和外交顧問艾布爾要隨車前往。

住在鄉村別墅裏的希思，突然接到戴卓爾夫人的邀請，實在有些意外。

他認爲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恥辱，就是被一個他親手提拔起來的女人所打敗，如今這個女人請他進入唐寧街十號，他實在不情願。他不想舊地重遊，觸景生情。

然而，從來人的面部表情和談吐中，希思已經感覺到此行關係重大，他是非答應不可。

愛德華·希思一九一六年出生，他的父親當時是一個木匠，後來成了一名第一流的建築師。希思從父親那裏繼承來了優秀工匠那種獨立和腳踏實地的精神，但有時顯得過於刻板，且近於冷酷。

希思年輕時有過一次刻骨銘心的戀愛，從此後便與愛情絶緣，獨身終生，也許是這個緣故，他不大願意出頭露面，性格有些孤僻。在社交場合，他顯得拘謹膽怯，絲毫没有很多政治家那種逢場做戲、隨機應變的本領。然而，這種個性又使他容易給人留下可以信賴的感覺。

晚年的希思，性格更加内向，幾乎完全沉醉在音樂之中。希思在音樂方面造詣極高，一九七四年作爲保守黨領袖訪華時，曾客串過中央樂團的指揮。

在那次訪華期間，他見到了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也見到了鄧小平副總理，而且他們都跟他談到了香港問題。

戴卓爾夫人正是看中了這一點，才下決心請他出山，前往北京探路。

在一位女工作人員的引導下，希思走進了首相官邸的會客廳。

希思曾經當過一任英國首相，對這裏的一切那是再熟悉不過了，但他還是盡量控制住自己的視線。以免使人産生誤解，以爲他還在爲自己曾作過這裏的主人而感到自豪。

首相官邸的會客室佈置得十分優雅，長條沙發和靠椅都是深棕色的。窗户朝向聖·亞莫斯公園，送進來一種鄉間式的寧靜氣氛。

戴卓爾夫人已經站在會客廳門口迎接希思了。這是首相的一次破例。

今天，戴卓爾夫人打扮得很樸素，摘下首飾，洗盡脂粉，還精心挑選了一件顏色素淡的套裙。她想給不喜浮華的希思留下一個好印象。

戴卓爾夫人謙恭地請希思入座，然後自己才在他對面的靠椅上坐下來。

「希思先生，現在我需要你，英國需要你！」

沒有任何開場白，戴卓爾夫人爾便把自己的意思合盤托出。

希思並不感到突兀。當年他就喜歡瑪格麗特的率直，今天，她的直言不諱仍然能引起他的好感。

「希思先生，你一定還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人佔領了香港，港督楊慕琦豎起白旗投降。那時的英國人並不感到震驚，至多不過是丟失了一塊殖民地。如今要是有人把香港從英國政府手中拿走，英國人能允許嗎？」

「如果是中國人把它拿走，那就另當別論了。香港的主權不屬於我們。」希思答道。

「但是香港今天的繁榮卻是英國人的功勞。」戴卓爾夫人有些憤憤不平起來。「中國人的頭腦是世界上最複雜的。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人一直有機會收回香港，但至今也未收回，同時他們又一直在念念不忘對香港的主權。他們的心裏到底是怎麼想的呢？我想請你用你的智慧之鑰，去打開中國人的心靈之鎖。」

「如果中國人不想說出來，別人沒辦法讓他們開口。一位英國記者告訴我，他在北京呆了三年，除了從官方得到一些消息外，從未在普通人當中進行過一次成功的採訪。」

「希思先生，你非一般記者可比。」戴卓爾夫人覺得有必要給對方打點兒氣。「你與中國最有權威的領導人鄧小平打過交道，他對你可能會透露一些秘密。」

戴卓爾夫人的口氣突然變得沉重起來：「你也知道，我們和阿根廷政府關於福克蘭群島歸屬的談判已經破裂，如果形勢進一步惡化，雙方免不了兵戎相見，我們決不能讓香港變成第二個福克蘭群島。中國也不是阿根廷，當年的炮艦政策對它不管用了。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有一個人能去摸清中國領導人的底細，至少能勸說他們盡快與我們開始談判。我個人認為，你是完成這個任務當之無愧的最佳人選。」

希思迎着戴卓爾夫人滿懷希望的目光望去，過了好大一會兒，他才微微點頭道：

「我需要先看材料，然後再把我的決定告訴你。」

3 希思先生一頭扎進英國情報部門提供的秘密檔案中。他發現，當年的國民黨政府也想收復香港。

戴卓爾夫人的隨身秘書尼克爾·維克斯把希思引進一間小書房。

維克斯打開擺放在桌面上的一個標有「ER」王室印記的紅色提箱，裏邊整齊地擺放着一摞摞的卷宗。

「這是首相親自指示情報部門爲您提供的，按程序，閱完後請您簽上您的名字。」

希思不耐煩地揮了一下手，維克斯知趣地退了下去。

希思緩緩地摸出一副玳瑁邊的老花鏡，但他卻沒有戴上。面對着這一大箱一般人連望一眼都沒有資格的秘密檔案，他冷眼凝視着，好像在注視着一個不知甚麼年代的出土文物。他覺得自己與過去曾無比熱衷過的政治已經距離十分遙遠了。

他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強迫自己把思緒拉回來，隨手打開放在最上邊的一册卷宗。根據卷宗正面的説明文字，他知道這裏邊的材料與國民黨政府有關。希思對這一段歷史並不大熟悉，便從裏邊抽出一些材料讀起來。

一九二九年，中英談判交還威海衛，英國提出以「新界」交換威海衛，企圖永遠佔有「新界」。

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軟弱無力，幾乎沒有地位，因而不平等條約既未廢除，香港也未能收回。

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國對日宣戰，中英美成了戰略上的盟友。為了鼓勵國民黨政府抗戰到底，不要和日本人媾和，英美提出終止在華的治外法權，同時締結新約，把中國法院根據中國法律審理各國籍公民的權力交還給中國。

和美國的談判進行得十分順利，但中英談判卻因為香港問題而觸礁了。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和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在重慶會晤，就交還租界、雙方締結平等新約等問題舉行談判。

中國方面提出了一個條約草案，要求廢除新界租約。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卻認為，這個問題超越了關於治外法權條約的範圍，建議抗戰勝利後再討論「租借的條款」。

雙方立場相去十萬八千里。

如果香港問題解決不了，本來談好的一切就都得推翻重來，雙方原定於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簽約的計劃也就面臨告吹的危險。

宋子文十分惱火，又無計可施。恰好國民黨政府駐英國大使顧維鈞此時正回國述職，宋子文立刻登門求教，請他幫忙想個妥善的解決辦法。

顧維鈞有外交奇才之稱。他畢業於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先後獲文學學士、政治學碩士、國際公法及外交博士等學位。二十七歲那年，他接受袁世凱的邀請，出任總統英文秘書兼外交參事。第二年，他代表中國出席巴黎和會。當時，日本企圖侵吞我國山東。顧維鈞面對各國首腦，作了這樣

一個比喻：「孔子有如西方之耶穌，山東有如西方的耶路撒冷，中國不能放棄山東，猶如西方不能放棄耶路撒冷。」

一語既出，四座皆驚，從此顧維鈞在外交界聲名大振。

顧維鈞與英國人打過多年的交道。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間，他曾跟隨袁世凱與英方就西藏問題進行過談判，一談就是三年，中國人甚麼便宜也沒佔到。後來，英國人的船隻艦隊在中國的內河外海橫行霸道，爲所欲爲，與中國軍隊屢次發生衝突。顧維鈞四處奔走，對英國人的蠻橫行爲給予嚴正的抗議和譴責，但最終還是不了了之。

這次，顧維鈞在倫敦風聞中英將進行談判，就事先搞了個調查。他發現，有相當一部份英國人主張把香港歸還給中國。他們認爲，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那裏的居民又都是中國人，理應歸還中國。再說，香港距離英國萬里之遙，無法進行守衛，不如早日卸掉這個包袱。

顧維鈞甚至還就此事專門會晤過英國首相丘吉爾。爲了藉助中國的抗日力量，丘吉爾曾在美國總統羅斯福面前慷慨地呼籲過取消在華的殖民特權，但一涉及香港問題，他的態度就變得曖昧起來。他含含糊糊地告訴顧維鈞，香港遲早是要歸還中國的。但究竟甚麼時候爲好，卻要視其他情況而定。現在是戰爭期間，還是暫且不談此事爲好。

顧維鈞將丘吉爾的話如實轉告給宋子文。

宋子文沉吟道：「我也是這個意見，目前以戰爭大局爲重，可是蔣委員長卻不這樣看，他認爲英國人不爽快，既然表示對中國友好，要將治外法權歸還，爲甚麼不將香港一併歸還中國呢？我看

還是你親自去向他解釋一下吧！」

當晚七點左右，顧維鈞隨同宋子文來到蔣介石的住處。

作爲駐英使節，顧維鈞對英國戰爭方面的情況瞭解得最多，而蔣介石正想瞭解這方面的情況，因而，剛開始的談話基本上都是顧維鈞一個人在講。

大約過了半小時工夫，蔣介石突然站了起來，沒頭沒腦地問了一句：

「英國人把香港留在手裏究竟想幹甚麼？」

宋子文對顧維鈞使了個眼色。

顧維鈞耐心地向蔣介石解釋，英國人從未想過把香港歸還給中國，他們這次能同意與中國政府談判，歸還治外法權，主要是給美國人一個面子，當然也有拉攏中國之意。所以，畢其功於一役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現在比較明智的辦法就是他們歸還甚麼，我們就毫不猶豫地接收甚麼。但是在接收的過程中，我們要告訴他們，我們很不滿意，你們應該把更多的本來屬於我們的東西歸還給我們。當他們送來第一份禮物時，我們高高興興地收下，再設法讓他們知道，我們還在等待着第二份禮物……

蔣介石聽了顧維鈞的話，覺得有幾份道理，同時又對這種隨機應變不大滿意，但是一時間找不到更好的辦法，只好採納了顧維鈞的建議。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宋子文照會英國駐華大使：「關於交還九龍租地問題，英國政府不以現時進行談判爲宜，本代表認爲憾事。」「本代表通知閣下，中國政府保留日後重新提請討論此問

題之權。」

一九四五年，在前蘇聯的雅爾塔舉行了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香港作為一個政治交換的籌碼被拋了出來。

羅斯福找到丘吉爾，說服他把香港歸還給中國，但要把它闢為自由港。這樣就可以對中國的大連做出同樣的安排，滿足斯大林進入這個北方不凍港的要求。

丘吉爾堅決反對這一意見，他的激烈反應令羅斯福大吃一驚。

「要拿走香港，先從我的屍體上跨過去吧！」

為了得到蘇聯的支持，丘吉爾急忙與斯大林舉行會談。在會談中，丘吉爾以同意斯大林在波蘭放手行事為誘餌，以換取斯大林支持英國重新佔領和保留香港。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誰在香港接受日本投降呢？這是一個涉及主權歸屬的關鍵問題，中英雙方誰也不肯讓步。按照日本天皇的訓令，駐港日軍本應向中國第二方面軍投降，但丘吉爾再次說服了杜魯門總統，使他出面做出了有利於英國人的調停。

八月三十日，英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夏愨少將率隊在香港登陸，從日軍手中接收香港，英國的米字旗再次在香港上空飄揚起來。

國民黨政府也想佔領香港，曾命令少量部隊進入「新界」，負責接收日軍的武器和裝備。但遭到英國方面的拒絕和反對後，再加上來自美國的壓力，便乖乖地撤走了。

八月二十四日，蔣介石極不情願地宣佈：「中國不會派軍隊去香港接受日軍投降，……以免引

起盟軍誤會。」

不久，中國爆發內戰，國民黨忙於對付共産黨，也就無暇顧及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了。

4　人民解放大軍攻佔廣州後，為甚麼沒有揮師香港呢？希思終於解開這個歷史之謎：毛澤東、周恩來早已制定出「長期利用香港」的戰略方針。

畢竟是歲月不饒人，希思剛看完幾十頁的材料就感覺有些疲倦了。他打了個哈欠，又伸了個懶腰，但還是强打起精神從擺在最上邊的一册卷宗中抽出一疊顏色有些發黃的材料來。

希思的思緒很快被帶到四十年代末期的中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令英國人且憂且懼的新生政權在開國大典上嚴正宣佈，它將審查中國歷屆政府與外國簽定的一切條約，並且根據條約內容分別予以承認、廢除、修改或重新談判。不言而喻，清政府與英國簽定的那幾個有關香港問題的不平等條約，新中國是沒有必要承認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廣東。這支剛剛與蔣介石的美式裝備軍隊交過手並連戰皆捷，在中國大陸所向披靡的大軍鬥志正盛，憑着幾條木船就敢橫渡瓊州海峽，解放海南島，甚至要攻克台灣，更何況一個區區的小香港。只要一聲令下，已經陳兵邊界的解放軍戰士不須吹灰之

力就能踏平香港。

一年前，眼見得蔣介石政權大勢已去，港英政府就對香港的存亡擔起心來。一九四八年十月，推出新的《公安條例》，以「防止和鎮壓暴動」。十一月舉行海陸空軍警「防暴演習」。十二月實施《香港防衛軍條例》，規定除英軍外還可多招募六千名新軍。一九四九年三月，英國政府又把正在馬來亞叢林中與馬共作戰的啹喀兵調防香港。

啹喀兵能征慣戰，是英國陸軍的精銳，但是憑他們能擋得住人民解放軍的前進步伐嗎？連英國國防部的高級官員也認爲没有把握。

五月二十六日，英國首相艾德禮召開緊急會議，內閣各位部長全部出席，討論的議題是：「中共對香港可能採取的態度以及英國應該作出的反應。」

會上，以國防部長亞歷山大爲首的一伙人堅決主張阻止共產黨軍隊進攻香港，亞歷山大等人認爲，如果英國人在香港被趕走，「不僅會使我們在全世界威信掃地，而且還會給東南亞帶來直接影響並將極大地增加我們在這一地區的防禦負擔。」亞歷山大主張，加緊調兵遣將，做好反擊準備，把香港當作「東方的柏林」，遏制共產主義在東方的擴展。

英國內閣批准了國防部提出的爲抵抗中共大規模進攻而增加香港防備力量的方案。

六月，亞歷山大親臨香港視察軍事防禦情況，駐港英軍驟然增至三萬人。

香港也許能成爲風雨飄搖中的一葉安穩的小舟？

許多與行將滅亡的國民黨統治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人，一廂情願地這樣期望着。

於是，從一九四九年初開始，在十個月裏，就有五十萬人越界進入香港，其中大多是國民黨政權的大小官員和工商階層人士，國民黨政府的民航飛機也大部份飛到香港。

解放軍攻佔廣州後，香港的氣氛更加緊張起來，許多香港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兒，但是解放軍遲遲沒有動作。這是怎麼回事呢？誰能打開這個悶葫蘆呢？

港督葛量洪是最早醒悟過來的英國人之一。在新中國未成立前，他就注意到香港的左派報紙《文匯報》發表了一篇題爲《論中英關係與香港的前途》的社論，這篇社論中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香港正遇着最有利形勢，新中國開始建設以後，貿易將空前高漲。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運之前惶惑起來，不積極對新中國採取友好措施，這將是歷史的不智。」

當時有許多人認爲《文匯報》是替共產黨說話的，因而對它發表的文章不肯相信，但葛量洪卻敏銳地意識到，這是北京向港府發出的一個再明確不過的「信號」，如果能抓住這個機會，香港的現存地位會維持很長一段時間。

葛量洪的預感很快被證明是正確的。

中國政府通過秘密途徑傳來了周恩來總理的三項條件。只要港英政府很好地遵守這三項條件，香港就可以長期維持現狀，這三項條件的基本內容是：

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基地；

二、不許進行旨在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威信的活動；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港人員必須得到保護。

這三條要求很合理，港英政府欣然接受，並和北京方面約定，將此秘而不宣，就算是中英之間的約定俗成吧。

一九五一年春，當時的新華社社長黃作梅去北京請示對港政策，周恩來總理做了指示。很快，未經核實的周恩來總理的談話主要內容就傳到了香港，又被一些報紙披露出來。

「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全局戰略部署的一部份。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佔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來作決定的。我們在全國解放之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從長期的全球戰略上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更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

「一九四九年建國後，英國很快承認我們，那是一種半承認，我們也收下了。艾德禮政府主要是爲了保全在英國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國在遠東的殖民地位。香港是大英帝國在遠東政治經濟勢力範圍的象徵。在這個範圍內，英國和美國存在着矛盾和鬥爭。因此，在對華政策上美英也有極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國要蠶食英國在遠東的政治經濟勢力範圍，英國要力保大英帝國的餘輝。那麼，保住香港，維持對中國的外交關係，就成了英國在遠東的戰略要點。」

「所以，可以這樣說，我們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比收回來好，也比落入美國人的手上好。」

「香港留在英國人的手上，我們反而主動。我們抓住了英國人的一條辮子。我們就拉住了英國，使它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戰略部署跟得太緊，靠得太攏。這樣我們就可以擴大和利用英美在遠東問題上對華政策的矛盾。」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對我們大有好處，大有用處。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地開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支持我們的反美鬥爭，支持我們的國內經濟建設。」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是我們通往東南亞、亞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將是我們的瞭望台、氣象台和橋頭堡。它將是我們突破以美國爲首的西方陣營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的前沿陣地。近兩年來的發展證明，我們在解放全國時留下個香港是正確的。」

「你們一定要認識這個重大的戰略意義，一定要相信中央這個重大決策。你們要好好保護它，不要破壞它。要維護香港的現狀和地位，包括英國的殖民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要承認香港在英國的遠東勢力範圍內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

「當然，我們也要反對英國過份支持美國孤立中國的反華政策超過我們的安全和國家利益所能容忍的程度。還有，英國不讓我們利用香港的可能。此外，我們只抓一條，反對英國支持美國在亞洲鎮壓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例如朝鮮和越南。」

中共方面對於香港問題的指示和態度，雖然都是經由周恩來總理之口表達出來的，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後面起決定作用的一定是毛澤東。

毛澤東本人對於香港的想法，一直到一九五九年才被外界獲悉，當時，中蘇關係已經出現危機但尚未完全破裂，毛澤東指示說：「目前香港對我們有利，最好暫不收回香港，我們不要倉促行動。」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希思在北京會見了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他們都明確地向他表

示，香港作爲英國管理下的亞洲貿易和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最少在目前是如此。

希思覺得「最少在目前是如此」這句話包藏深意，便在歡迎宴會上以請教的名義向鄧小平副總理提了出來。

鄧小平没有直接回答他提出的問題，但他告訴希思，香港問題在將來適當的時候加以解決。新中國的領導人對於香港問題所做出的決策是無比正確的，今天看來，即使把「遠見卓識」、「高瞻遠矚」這類詞彙全都搬出來加以形容，也實在不過份。

一九五〇年，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在美國的操縱下，通過決議下令其會員國不得與新中國通商。日本、加拿大、比利時、法國、緬甸等國家先後對中國實行禁運，港英政府也下令禁止九十六種軍事物資輸出。

後來，華盛頓方面覺得把香港劃在禁區之内不合適，便允許香港進口貨物，但仍維持對中國大陸的貿易禁令。於是，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就成了中國通向資本主義世界必不可少的門户。

一九五〇年底，港督葛量洪的辦公桌上出現了這樣一份數據：一九四八年，香港與中國内地的貿易總值爲六點一億港元，輸出二點八億港元，輸入四點三億港元，入超一點五億港元；一九五〇年，香港對中國内地的貿易一下子從入超轉爲出超，其出超數額達五億港元之多。

香港商人笑了。中國人也笑了。他們所需要的各種寶貴物資，正通過香港這個窗户源源不斷而來。

直到今天，英國外交部的一些元老們仍然認爲，當年的香港之所以能夠留在英國人手上，不是中共領導人的英明決斷，而是他們積極務實精神所帶來的回報。

新中國成立前後，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採取了觀望甚至敵視的態度，而英國政府卻沒有消極對待。當時，英國在中國有着龐大的經濟投資，總數超過十億美元。如果像美國人那樣與新中國政府爲敵，在華財產必然要被凍結以至沒收，那損失可就太大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英國外交大臣貝文在聯合國向新中國「暗送秋波」：英國政府不打算干涉中國人選擇他們的政府，但希望新中國能實現對某些國家承諾的義務。

十月三日，貝文表示，中國政府如能善待英國僑民，英國就可以考慮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十月十日，英國外交部訓令其駐廣州的外交人員，不得跟隨國民黨方面前往台灣。

十一月，英國在馬來西亞的柔佛召開駐遠東外交人員會議，由英國駐東南亞高級專員麥克唐納主持。這次會議討論的中心問題，就是英國是否應該承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多數與會代表認爲，承認勢在必行，既然如此，那就宜早不宜遲。

十一月九日，英美法三國外長在巴黎討論武裝西德問題，貝文趁機將英國準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算通知了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美國人大爲惱火，要求英國政府與美國政府保持一致。貝文要了個小小的花樣，答應艾奇遜可以把承認新中國的時間往後推延。

英國人説推延就推延，但推延的時間卻不長。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貝文就致電周恩來，表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願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建立外交關係，同時，英國宣

佈撤銷其對國民黨集團的外交承認。

三月二日，中英開始建交談判。

據一位當年參加過中英建交談判的英國外交部官員回憶，中國人對英國政府能在西方世界帶頭承認新生的人民政權，內心中存有很大的謝意。作爲這種感情的反應，中國人似乎不好意思開口提出香港問題，也許這是他們以沉默的方式送給英國政府的一份回禮。

這篇回憶文章希思早就看過，但他對它的真實性有所懷疑，他寧肯相信這是外交部的那些人在搶功勞，如果說香港殖民統治的保持是一種交換的話，那麼英國人付出的是甚麼呢？中英建交談判是開始了，但卻毫無結果。英國外交部在宣佈承認新中國的當天，就發表了一項聲明，表示英國雖然在承認問題上與美國有分歧，但這並不能改變和美國一道「反對共產主義的長期目標」，「英國有決心阻止共產主義潮流越出中國國境。」

在這項聲明中還舉了一個例子：英國在三十年代也曾承認過臭名昭著的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政權，這與目前承認中共政權是相似的，因爲「承認一個政府決不等於承認這個政府的政策。」

五月二十四日，英國下院就中英建交問題舉行了一場外交政策辯論。英國外交大臣貝文有些惱火地說：「英國宣佈承認中共政權是一件不愜意的決定。」

由於英國一直堅持敵視中共的立場，因而雙方建交就成了虛話，只是長期維持着代辦關係。

五十年代，中英關係日趨緊張，中國曾經因多種原因向英國提出過抗議，但卻沒有試圖破壞香港的現狀。一個最有力的證明就是，一九六〇年前後，中國國內經濟面臨着嚴重困難，再加上自然

災害，餓死人的事情時有所聞。但周恩來總理卻專門下達指示：香港這個地方日益重要，要做好對港澳地區的水、食物、原料的供應，要把這當作政治任務來完成。

希思從一國首相的角度，對周恩來總理的話有着深刻的理解：一九六〇年夏天，蘇聯取消了對中國的一切援助，撤回了所有的技術人員。周恩來知道，必須同非社會主義國家開展貿易，尋求援助，而這種形勢就使得香港對中國變得比以前更重要了。

香港人對於周恩來保證香港供應的安排是十分感謝的。香港地區所需要的食物和水都需要內地供應，如果內地切斷供應，香港就會成爲一座「死城」。一九二五年爆發香港工人大罷工，連賣菜的小販也拒絕去香港賣菜，垃圾也無人打掃，結果香港變得臭氣熏天，簡直無法居住。

對那段歷史記憶猶新的人，當聽說粤港雙方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五日達成協議，該協議規定由深圳水庫全年供應香港五十億加侖用水，每千加侖收水費人民幣一角，不由得欣喜若狂。

希思心中暗想，中國人之所以不急於收回香港，也可能是因爲太胸有成竹了。他們掐着香港的生命線，只要一抖這條生命線，不需一兵一卒，一刀一槍，香港就會乖乖來降。

5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名解放香港。香港當局採取鎮壓行動。狂熱的紅衛兵一把火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

希思先生忽然在一册卷宗上發現了這樣一行說明文字，眼睛頓時一亮，剛剛湧上來的困意登時一掃而光。

「香港——中國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熱潮席捲中國大陸的時候，希思已是年過五旬。他雖然是一個性情古板的人，但卻從不拒絕新生事物。從遙遠的中國傳來的那一件件新鮮事情，總是能使他興奮不已。

在英國的留學生很快就受到了感染，他們拋下學業，一天到晚嚷着要鬧革命。他們整夜整夜不睡覺，背誦毛主席語錄，吵得周圍鄰居睡不着，只好請警察來干預。

這些留學生很快就找到了革命對象。他們闖進中國駐英代辦處，凡是他們認爲不是無產階級的東西就砸，說是破「四舊」。

希思對於這些年輕人的行爲起初並不反感。他認爲，愛胡鬧是人的天性，更是年輕人的「專利」。西方有愚人節、假面舞會、萬聖節，讓人堂而皇之地胡鬧。

然而，隨着中國國內形勢的不斷惡化，誰也不敢再對這場「文化大革命」視若兒戲，自然希思也在其列。

香港不歸中國管，當然可以不搞「文化大革命」。但由於地理等原因，香港卻無法與中國大陸相絕緣。

「文化大革命」的熱浪終於炙熱了香港。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香港新蒲崗人造塑膠廠裏發生了一起簡單的勞資糾紛。這種糾紛以前也有發生，通常很快就能得到解決。但如今情況卻不同了。香港的下層群衆爲國內如火如荼的政治鬥爭所吸引，早想大幹一場。港英政府唯恐文革之火燒進香港，一有風吹草動，立刻如臨大敵。

於是，這起勞資糾紛就成了日後嚴重衝突的導火索。

先是塑膠廠的工人採取强硬態度，行爲過激，設置非法糾察線，接着港英政府派遣二百名警察到工廠進行鎮壓，毆傷多名工人，逮捕二十一名工人糾察隊員，事後又拘捕了前往警署抗議的工會主席和工人代表。

香港的工人和青年學生們在香港左翼新聞媒介的鼓勵下，開展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並成立了一個「反壓迫鬥爭委員會」，來領導這場鬥爭。

港英政府不甘示弱，連續出動警察進行鎮壓。到五月十四日爲止，逮捕示威群衆已達四百多人。

五月十五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譴責港英政府鎮壓群衆。外交部副部長緊急約見英國駐華代辦，向英國當局提出最緊急最强烈的抗議，要求「港英當局的法西斯暴力必須立即停止。」

港英政府對中國政府的抗議未予理睬。港督戴麟趾公開聲稱，港英政府的政策就是以「不偏不

倚的方式維護法律」，至於中國政府的抗議，由英國政府去答覆好了。英國政府則發表文告，「全力支持香港政府履行其責任。」

中國政府的插手干預，港英當局的强硬立場，都導致了事態的擴大。五月十六日，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成立，仿效國內文革方式，開展大規模的群衆運動。街頭上貼滿了醒目的反英標語，反英口號震耳欲聾。有些人開始尋找武器襲擊港英警察，土製手榴彈和土製炸彈的爆炸聲時有所聞。

與此同時，在北京舉行了有中央領導人參加的十萬人群衆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內容有三點：

一、英國必須停止以香港作爲軍事基地；

二、香港國民黨特務迫害親共人士的罪行決不饒恕；

三、傳播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決不能受到干擾。

英國方面對此没有作出回答，中國政府立即要求英國在四十八小時内關閉駐上海領事館。以上這些作法無異於火上燒油。五月二十二日，香港再次發生衝突，有二百多人受傷，很多人被捕，港英政府匆忙宣佈《緊急法令》，卻遏止不了事態的發展。

五月二十六日，英國政府以參加軍事演習爲名，派遣航空母艦「堡壘」號開往香港，載來四百五十名全副武裝的英國士兵。援兵一到，港英政府態度更加强硬，警察、防暴隊、職業軍人奉命紛紛出動，暴力衝突接連不斷。

就在事態如此嚴重之際，六月三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在這篇社論中，除了一些嚴厲的措辭，還有一行令港英政府膽戰心驚的話：「香港愛國者要組織起來，準備偉大祖國一旦發出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統治。」

這段話的含意再露骨不過了，那就是號召採取行動解放香港。香港的左派領導人顯然受到了鼓舞，更加積極地組織「造反」。六月三日當天，就有五百人被捕，六月二十三日，在一次暴力衝突中，有五十三人被捕，四人死亡。六月二十四日，左翼工會組織舉行聯合大罷工。幾天以後，中華全國總工會籌集了一千萬港幣，支援香港同胞。

面對來自中國方面的壓力，港英政府並未退卻，反而更加努力地進行鎮壓，到七月三十一日爲止，被捕入獄者竟高達五千二百多人。

與此同時，一向安寧無事的邊境也變得緊張起來。七月八日，在沙頭角召開了一次群衆大會並舉行遊行。港英軍警聞訊趕去，先是向返回港界的居民施放催淚彈並開槍射擊，接着又向中國境內開槍。結果雙方發生衝突，引發一場槍戰。中國居民有一人被打死，八人受傷。英方公佈有五名軍警死亡，十二人受傷。港英政府急調啹喀步兵第十一旅所轄部隊開進沙頭角接替警察。

有趣的是，事後雙方都謹慎地聲稱中方武裝部隊沒有參與射擊。

八月七日，英軍接替警察開始在新界巡邏。十日，港英政府封閉了除羅湖之外的整個邊界。十月十日，港英軍警在中國農民的耕地上架設鐵絲網，中國農民百餘人過境交涉，英方拒不接受，雙方對峙，港英政府又關閉了文錦渡。

港英政府對在這次事件中起推波助瀾作用的左派報紙和記者恨之入骨，先是在七月份逮捕了新華社香港分社、《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的多名記者，接着又在八月份封閉了三家左派報紙，逮逋了十九名記者和三十四名工作人員，並向法院控告中共控制下的《大公報》、《鏡報》和兩家印刷公司犯有非法煽動罪。

通過官方宣傳媒介的渲染，身處內地的中國人再次被激怒了。他們突然發現，世界上不僅有最壞的美國佬，還有最壞的英國佬。

八月二十一日，北京再次舉行群衆大會，有人喊出了「收回香港」的口號。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想不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上，怎麼會容忍米字旗的飄揚。他們强烈地感到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侮辱。

被狂熱衝昏頭腦的紅衛兵忍耐不住了，他們放起一把大火，焚毀了英國駐華代辦處。

英國人震驚了！

香港人惶恐了！

誰知道下一步會發生甚麼呢？

唯一能控制住這種混亂局面的毛澤東主席終於發話了。九月初，他下令禁止暴力鬥爭，香港的左翼勢力接到了來自國內的指示，匆匆鳴金收兵，香港的反英活動明顯減少。中國對英國駐華代辦處被燒事件正式表示道歉，肇事者受到了嚴肅處理。

十月底，中國外交部召見英國駐華代辦，要求拆除深圳邊境的鐵絲網，重新開放文錦渡，恢復

邊境正常交通。香港政府欣然接受中方全部要求，並很快付諸實施。

一九六七年底，香港事態基本恢復正常。

讀完這段歷史，希思反倒覺得自己肩頭的擔子變輕了。英國的很多殖民地都是在主權國的人民群衆的一片同仇敵愾中被收回去的，而那些主權國的領導人無不利用了人民群衆的這種愛國熱情。中國人的激情在「文化大革命」中應該說是達到了頂點，但他們的最高領袖卻尚未失去理智。即使是在中港關係急劇惡化的那幾個月裏，由中國供應的水、食物、原料等也從未中斷過。這說明中共領導人並未真正打算收回香港。

在香港發生衝突期間，中國駐倫敦代辦緊急約見英外交大臣，敦促他接受北京方面的要求，釋放在香港的被捕人員。當時，這位代辦提醒英國外交大臣注意，一九六一年周恩來總理曾在北京對來訪的英國著名元帥蒙哥馬利說：「如果雙方尊重他們相互的利益，香港的利益就可以維持。」

這位代辦說的話顯然代表了中共高層的意見，他們需要一個穩定的香港。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整個動蕩期間，港英政府一直採取了強硬態度，寸步不讓，中國政府方面雖然很惱火，但十分克制。即使英國派出援軍後，中共的軍隊也未有調動的跡象。

希思暗想，應該馬上讓戴卓爾夫人知道，除非發生極端情況，中共決不會以武力收回香港。

6

如果說每個人都有弱點的話，那麼鄧小平有沒有弱點呢？希思細細地研究鄧小平，好像找到了突破口。

「應該研究一下我們的談判對手了！」希思一邊自言自語，一邊拿起了一冊標有「鄧小平」字樣的卷宗。

鄧小平現年七十八歲，要比希思還大十二歲，但就身體而言，希思恐怕更有資格稱作老人。

鄧小平在學生時代就愛上了足球運動，是班上球隊的一名虎將。他個頭矮小，動作靈活，常常能在人縫中巧射得分。從那以後，他就成了一個足球迷，終生癡情不改。北京舉辦亞運會期間，他簡直被「粘在熒屏上了」，並把足球比賽實況錄下來，深夜時重看一遍。

按照西方心理學家的觀點，喜歡觀看體育比賽，尤其是激烈對抗性比賽的人，都是性格外向，熱情樂觀，心中總是有所不滿足，鄧小平是這樣性格的人嗎？

早在五十年代時，鄧小平在四川工作，又迷上了橋牌。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重新擔任黨和國家領導工作。雖然國務繁忙，但還是樂此不疲。他說：「唯獨打橋牌的時候，我專注於牌上，頭腦才可以充分休息。」

鄧小平還喜歡打桌球，而且打得很出色，一次可以拿上百分的高分。

中國有句哲言：「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鄧小平既愛山，又愛水，他倒底是仁者還是智者

呢？

來到渤海之濱的棒槌島，鄧小平幾乎每天都下海暢游。他時而側着身子漂浮向前，時而俯着身子雙臂迎浪搏擊。有時一個巨浪撲來，警衛人員想助他一臂之力，他卻示意不必。

七八月間，他經常帶着全家到北戴河度假。他每天堅持游泳一小時，連下雨也不例外。

一九七八年七月，已經七十六歲高齡的鄧小平來到黃山腳下，開始了艱險而有情趣的攀登。他不顧年事已高，堅持在前邊開路，花了三天時間，他踏遍了黃山崎嶇的險道，飽覽了黃山壯美的景色，感嘆道：「爬了黃山，天下的名山都不在話下嘛！」

說鄧小平是仁者，有這樣一個小故事可以作證。

一九四九年五月，古城南京剛剛解放。當時擔任二野政委的鄧小平從北京開會南歸，來到浦江渡口指揮部。負責接待的二野特種兵縱隊副政委譚善和考慮到首長的安全，就建議打電話給野戰軍司令部，要他們派車來迎。鄧小平堅決不同意。譚善和只好陪着鄧小平乘渡輪過江。

過江之後，譚善和找來一輛黃包車，請鄧小平上車。鄧小平見那車伕面黃肌瘦，身體很弱，說甚麼也不肯坐車，只是把隨身攜帶的物品放在車上，自己則和警衛員一起跟在車後步行。從中山碼頭到中山北路是一段上坡路，黃包車伕拉車十分吃力，鄧小平便叫警衛員和他一起在後邊推車。

鄧小平就這樣跟在黃包車後邊步行進了南京城。

說鄧小平是智者，這同樣也有很多例子可以作證。

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出訪美國。在與卡特總統會談結束之後，由美國國務卿萬斯陪同用完

午餐，來到國務院休息室。一群記者蜂湧而上，紛紛探詢鄧小平與卡特談論了些甚麼問題。鄧小平詼諧地回答：

「我們無所不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一句話把記者們的提問擋得嚴嚴實實。一位西方記者欽佩地寫道：「這句話充分反映了鄧小平的靈敏反應、機智和幽默。」

鄧小平的才華在中共高級領導人中是公認的，周恩來非常器重鄧小平的才華，對他經常是讚不絕口。

一九五〇年，周恩來在與薄一波閒聊時，曾對劉伯承和鄧小平這兩位共事多年的老戰友的工作方法做過總結。他概括了八個字：鄧小平的工作方法是舉重若輕，劉伯承是舉輕若重。周恩來承認他很欣賞鄧小平的「舉重若輕」，但是他卻做不到這一點。

對於希思來說，他還不能完全領悟東方人的智慧，但是從自己當首相的經歷中，他懂得只有那些絕頂聰明的人，才有可能輕鬆自如地應付重大問題。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才華也是十分愛惜的。毛澤東曾經親手打倒過他兩次，但每次都沒有把他置於絕境，還給他保留了中共黨籍，這與對劉少奇的處理形成了鮮明對照。一九七三年，又是毛澤東大筆一揮，恢復了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的職位。一九七四年，「四人幫」陰謀整倒鄧小平，毛澤東卻依然認爲「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强。」

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知道鄧小平有一句名言：「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在文化大

革命中，這句話遭到了瘋狂的批判，而對於這種批判毛澤東本人肯定是贊成的。

毛澤東也談過貓。

那是在五十年代末，有一天，毛澤東向劉少奇和周恩來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你們用甚麼辦法才能讓貓吃辣椒呢？」

「那還不容易，」劉少奇首先說，「讓人把貓抓來，把辣椒塞進貓嘴裏，然後用筷子捅進去。」

毛澤東擺了擺手，「每件事都應該是自覺自願的。」

周恩來接着說：「我首先讓貓餓上三天，然後把辣椒裹在一片肉裏，貓餓急了，就會囫圇吞棗般地全吞下去。」

毛澤東又擺了擺手，他也不贊成這種方法。

周恩來和劉少奇不約而同地望向毛澤東。

毛澤東笑着說：「這很容易，你可以把辣椒擦在貓的屁股上，當它感到火辣辣的時候，就會自己去舔掉辣椒，並爲能這樣做而興奮不已。」

不知道毛澤東是否拿這個問題問過鄧小平，如果問過的話，鄧小平會怎麼回答呢？

如果按照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推衍下去，他是不是會說「不管甚麼方法，只要讓貓把辣椒吃進肚子裏就是好辦法」呢？

希思忽覺眼前一亮，鄧小平的實用觀點也許可以爲戴卓爾夫人所利用。如果戴卓爾夫人許諾以

相當的實惠，鄧小平會不會在香港問題上讓步呢？

讀着英國情報人員盡其所能收集到的有關鄧小平的點滴材料，希思又覺得他是一個有着完美藝術追求的人。

一九四九年，二野佔領南京，先頭部隊衝進南京總統府，在總統府的一間廂房裏，掛着一幅蔣介石全身刺繡肖像，有三米多高，兩米多寬，用各種彩色絲線和金銀線繡成，閃閃發光，極爲精美。據説這是國民黨浙江省主席在一九四六年邀請高手名匠特製而成，贈送給蔣介石六十壽辰的賀禮。

有些解放軍戰士一見這幅肖像，就像見了蔣介石一樣氣憤，挺直刺刀狠捅，結果捅出了好幾個窟窿。

鄧小平聽説這件事後，立刻嚴肅地批評那幾個戰士。鄧小平説，刺繡是高手藝匠創作的藝術珍品，是歷史留下來的東西，破壞這些藝術品是愚昧的行動。

鄧小平隨即發出指示，要對南京總統府、中山陵園、國防部、國民黨中央黨部、美軍顧問大樓以及一些歷史建築、文物古蹟進行保護，加派警衛，必要時還要進行修葺和整理。

香港有「東方明珠」之稱，如果英國政府能以保護香港的現狀，支持香港的進一步繁榮爲條件，鄧小平會不會作出一些讓步呢？

希思知道，鄧小平有個十分和睦的家庭，他也很重視享受天倫之樂。一九七九年訪美，他與送行者一一告別後，還特地擁抱了他的小孫女。出訪歸來後，是他的小孫女第一個跑向舷梯，同爺爺

擁抱。這雖然是個很小的細節，但在中共其他高級領導人中卻是罕見的。據說，鄧小平在家中還常常和孩子們一起看電視。

然而，希思注意鄧小平有個習慣，他從來不在家談政治。這和戴卓爾夫人很相似，她也從不在家談政治，恐怕會由此給她的家人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和危險。

鄧小平的內心深處有沒有他的恐懼呢？他在長長黑夜中作沒作過惡夢呢？

一九六六年底，鄧小平已經預感到將有大禍臨頭，便告訴他的孩子們：「如果是人民內部矛盾，家庭關係還可以保留；如果是敵我矛盾，可以斷絕家庭關係。」

他的兒子鄧樸方沒有聽父親的用心良苦的勸說，拒絕開口鬥爭他的父母，便被一群紅衛兵關進一間遭受放射性物質污染的實驗室裏，並把門封死。作爲清華大學物理系的學生，鄧樸方知道在這裏呆久了必死無疑，他便想翻窗逃走。不幸的是，他從八米高的地方摔落地面，脊椎骨受重傷，紅衛兵拒絕讓他去醫院治療，結果從雙腿癱瘓發展成腰以下半身不遂，最後發展成高位截癱。

一九七一年，經過鄧小平夫婦的多方申請，鄧樸方才來到被軟禁在江西的父母身邊。從此，鄧小平的生活中又多了爲兒子洗澡、翻身等內容。

如果能讓鄧小平知道，如果中方不顧一切收回香港，就會給許許多多的香港青年人帶來不幸，那麼鄧小平會不會動一下惻隱之心，在香港問題上讓一讓步呢？

在今天的中國，鄧小平是個身份獨特的人物，他不是中共中央主席，也不是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但他是極具實權的中央軍委主席。按中共的慣例，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是一人兼任

的。西方有很多觀察家在這個問題上大作文章，但希思卻對此不以爲然。任何一個文明社會都不會拒絕老人的智慧和經驗。中國人需要鄧小平的智慧和經驗，就像英國政府也需要他一樣。

希思在一瞬間裏下定決心，要到中國走一趟，他要證明老人的作用有時會超過年輕人。

7 希思親耳聽到鄧小平對他說，現在是考慮處理香港問題的時候了，中英兩國政府可以進行談判。

一九八二年四月四日下午。

初春的北京不時呈現旱象，從蒙古颳來的風沙紛紛揚揚從空中灑落，把整個天空都染得黃澄澄的。

一架銀灰色的客機在首都機場安全降落，艙門開處，鑽出了一位西裝革履的英國紳士。他就是希思。

希思雖然上了年紀，但身體還很結實，看上去倒像一個十足的中年人。

希思此行是作爲戴卓爾夫人的特使而來，肩負英國首相重託，因而對行程嚴加保密。中國方面也心領神會，沒有張揚此事，只派出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郝德青等少數不大引人注目的官員來歡迎他。

在此之前的三月份，是由胡耀邦主席倡導的文明禮貌月。也許是這個原因，希思先生覺得處處看到的都是笑臉。

希思先生以前也來過北京，但即使是在服務週到的國賓館裏，他也很少能看到服務人員的笑臉。也是那次北京之行後他才得知，中國的女服務員寧肯客人喊她多少號，也不願意喊她小姐。她

們認爲小姐這個稱呼是一種嚴重侮辱。同樣，她們侍奉這些資產階級不過是出於一種政治需要，不管怎樣無微不至，也不能喪失階級立場。

從北京人那一張張笑臉上，希思清晰地感覺到中國邁向文明社會的步伐。同文明人打交道總是令人愉快的。

文明禮貌月的春風也吹進了中南海。

在這裏，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笑容滿面地接見了他，趙向英國貴賓介紹了中國改革開放五年來取得的成就。中國大陸已經逐漸擺脱了貧困，出現了經濟騰飛的趨勢，尤其是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的形勢更是喜人。

希思先生真誠地表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是舉世公認的，他向勤勞勇敢的中國人表示祝賀。

希思並沒有與趙紫陽深入地談香港問題，主人也没有深問。

四月六日，在中南海另一間寬敞的會客廳裏，希思終於見到了鄧小平。

希思此行是隻身前來，没有帶甚麼隨從，只有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陪同他。

中方在座的人也很少，除了郝德青之外，另一個是外交部副部長張燦明。

這樣的安排烘托出了私人友好會面的氣氛。

「歡迎你，老朋友！」鄧小平也是滿面笑容，大老遠地就把手伸出來。

「真高興我們又見面了。」希思頗有幾分動情地說。

賓主坐定，話題首先從最近因爲馬爾維納斯群島的歸屬而引發的英阿衝突開始。

馬爾維納斯群島，英國人叫它福克蘭群島，位於大西洋南部，總面積爲一萬一千七百平方公里，現有居民二千多人。它距離阿根廷的領土有近千公里之遙。當然，它距離英國就更遙遠了。自從一八三三年被英國佔領以來，它就一直是英國的屬地，英國人自然就把它認定是自己的領土，在島上派駐總督和少量軍隊。阿根廷方面則認爲，這是一塊被掠奪的土地，英國應及早將其主權歸還阿根廷。近年來，該群島的海底發現了石油儲藏，英阿雙方對它的主權要求全都變得强硬起來。

今年二月，雙方談判破裂。阿根廷藉地利之便，首先採取行動。四月一日夜裏，阿根廷的警察部隊包圍了英國設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大使館和貿易機構，阿航空公司也宣佈取消所有飛往倫敦的班機。四月二日凌晨，阿根廷陸、海、空三軍一齊出動，迅速攻佔了馬爾維納斯群島，總督雷克斯・亨特宣佈無條件投降。阿根廷方面用飛機把亨特和七十八名毫無鬥志的駐島英國皇家海軍送到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把已降下來的英國國旗送還給英國駐阿大使館。

英國方面對此反應强烈，四月二日當天，外交大臣卡林頓就宣佈與阿根廷斷交。

四月五日，英國政府派出以「無敵號」、「赫姆斯」爲先導的三十六艘艦隻組成的特混艦隊，從英國南部的朴茨茅斯港出發，橫渡大西洋，去對付共有十五艘艦隻的阿根廷艦隊。這是自一九五八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以來英國派出的最大的艦隊，佔英國全部海軍戰鬥力的三分之二。由於距離遙遠，這支船隊至少要在兩個星期後才能到達馬島。

希思唯恐引起中國的誤解和反感，用詞謹慎地解釋說，英國雖然派出了特混艦隊，但還是積極

爭取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爭端，目前美國國務卿黑格已在居中調停，很可能英阿雙方會重新回到談判桌旁。

希思還含蓄地表示，福克蘭群島與香港有着本質的不同，英國對前者擁有主權，因而要竭盡全力保衛它，而對後者不擁有主權，因而只能是盡心盡力地治理它。

鄧小平似乎聽出了希思的弦外之音：

「主權和治權是分不開的。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遲早是要收回來的，到時候我們可不希望看到甚麼特混艦隊。」

希思尬尷地笑了笑。

在英國國內早就流傳着這樣一種看法，那就是利用歸還香港主權之機，讓中國把香港的管理權讓給英國。也就是說，即使是一九九七年以後，香港目前的行政管理模式也不改變。

就在希思與鄧小平會見的同一天，在倫敦發行的《每日郵報》上發表了署名薩金特的專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現在英國政府所嚮往的是某種安排，使中國延長租借期限比如說五十年（雖然，我們決不再用租借這種字樣），交換條件是我們承認中國對整個香港——不僅是新界一地都擁有主權。」

這段話說出了戴卓爾夫人的心思。她希望希思在這次訪華期間，能向中國領導人試探一下有沒有上述可能性。聽完鄧小平的話之後，希思覺得此事還是暫且不提爲好。

「主席先生，我們還是來談一談香港的前途問題。」希思及時地把話題引開。「隨着一九九七

年的迫近，香港的五百萬居民對香港的未來深感焦慮不安，投資者也有恐慌情緒。爲了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我們兩國政府必須公開聲明，立即爲簽定新的協議進行談判。」

「無論將來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香港的經濟現狀都會保持不變，投資者大可放心。」類似的話鄧小平講過，中國的其他領導人也講過，但在事實上卻未產生真正效果，就在去年四月份鄧小平接見卡林頓之後，香港最大的商業銀行匯豐銀行就開始大規模地集資套現，準備撤離香港，回英國開辦業務。

匯豐銀行雖是商業銀行，但它卻享有香港政府授予的中央銀行的某些特權。它可以印發鈔票，是港英政府的金庫、出納，並且替港英政府管理監督金融機構，負責香港銀行的結算。匯豐銀行的董事長也就是香港銀行公會的主席，被香港人戲稱爲金融「港督」。由此可見，匯豐在香港金融界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有一段時間，匯豐銀行準備與英國的萊斯銀行合併，實際上是以合併爲名，行撤退之實。就在這時候，前來北京訪問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帶來了戴卓爾夫人的口信：匯豐銀行準備與萊斯銀行合併，不是英國政府的意見，而是匯豐商業上的決定，匯豐希望把業務擴大到歐洲去，因此要把總部搬往英國。

中國方面請基辛格帶口信給英國人，中國政府不贊成匯豐搬到倫敦。在這之後，匯豐放棄了與萊斯合併的打算，但在暗地裏卻加緊收購萊斯的股票，最終在一九八九年把總部遷往倫敦。

匯豐銀行的這一系列舉動，顯示出它對中國的香港政策沒有信心。匯豐在一九四九年從中國大

陸撤出時，受到很大損失，也許這一次是心有餘悸吧。不管怎麼說，它對香港居民，尤其是有錢的香港人影響極大，就連一些愛國的資本家，也把錢從香港取走，存入其他國家的銀行裏。

希思簡單地介紹了匯豐銀行的情況，委婉地表達了他的憂慮。

「我相信，只要香港有錢賺，逃走的錢還是會回來的。我還相信，大部份人是有遠見的。」鄧小平顯得很樂觀。

「鄧先生，我本人很相信你的話，但是香港人期望有一些更具體的東西，比如中英雙方的協議……」

鄧小平不像希思那樣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他說話很乾脆：

「如果可能，我們願意同英國政府正式接觸，通過談判來解決香港問題。」

希思心中大喜，他希望聽到的就是這句話。但他還是有點不大放心，故意反問道：

「您是否覺得現在談判有些倉促呢？」

「希思先生，還記得一九七四年我們見面時，我對你說過的話嗎？」鄧小平說。「那時候我說香港問題將在適當的時機解決。現在這個時機到了。一個是我們有辦經濟特區的經驗，一個是我們有逐漸好轉的國際關係。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希思先生，現在是考慮處理香港問題的時候了。」

由於英阿衝突不斷升級，就在與鄧小平會見之後，希思就提前結束了對中國的訪問，匆忙飛回英國。

8 英國以慘重的代價換來了奪取馬爾維納斯群島的勝利，也換來了戴卓爾夫人的自信心。她要去北京會會中國領導人。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八日。

一列由清一色高級轎車組成的車隊駛出了白金漢宮。在這列車隊中央有一輛達莫萊牌轎車，從外表看它只是保養得好一些，並沒有甚麼特殊之處，但裏邊坐的卻是當今全世界都矚目的人物——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

戴卓爾夫人剛剛拜見了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通知她政府已經做出了進攻馬爾維納斯群島的決定，只是進攻時間尚未最後確定。

這雖然只是例行公事，但女王還是很關心地詢問了她的身體狀況，叮囑她多休息，這使得戴卓爾夫人十分感動。

女王還破例地邀請戴卓爾夫人陪自己在白金漢宮中四處轉轉。

白金漢宮是英國王宮，位於倫敦詹姆斯公園的西端，一七六一年由英王喬治三世購下，作爲其妻的住宅。一八二五年，喬治四世將它作爲王宮加以重建。一九三六年再次修建，成爲維多利亞女王的主要宮室。此後的英國女王都在這裏居住並處理國務活動。

白金漢宮是一座四方形的建築群，建築很是宏偉，佔地達二百七十畝，它的西部是御花園，栽

滿奇花異草，環境十分幽雅。女王特地把戴卓爾夫人領到這裏來，用心十分良苦。戴卓爾夫人也很領女王的情。此時此刻的她太需要關心了。

戴卓爾夫人號稱「鐵娘子」，西方記者又經常稱她爲「富有戰鬥精神的女戰士」、「新的冷戰鬥士」。人們之所以這樣評價戴卓爾夫人，主要是因爲她在政治上奉行鐵腕政策，不管對内對外，凡事以强硬二字當先，即使是對待多年的盟友美國，也敢頂上三分。戴卓爾夫人的許多作風都容易使人聯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首相丘吉爾。

强硬使戴卓爾夫人在政治上贏得了許多尊敬，起碼没有任何人敢因爲她是女人而輕視她半分。然而，隨着英阿衝突的急劇升級，她卻對自己的强硬産生了懷疑。她時常這樣想：「中國人有句古話：退一步天寬地闊。難道我現在應該退一步嗎？」

可是退一步之後又能怎麼樣呢？

合衆國際社的一篇評論準確地描述出了戴卓爾夫人此時所面臨的兩難選擇：

「是發動一場耗費巨大而充滿危險的軍事行動來恢復這個遠離倫敦八千英里的小小殖民地，還是把這個群島讓給阿根廷，忍受一次政治上的失敗，而這樣一次失敗肯定會使她的政治生涯在下一次大選中宣告結束。」

如果注定要失敗，不如冒險一搏，也許能起死回生。這是常識，有頭腦的人都懂，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那樣的勇氣和魄力，戴卓爾夫人恰恰既有頭腦，又有勇氣和魄力。

四月二十五日，英國海軍陸戰隊員在戰艦的支援下，乘直升飛機攻佔了位於馬爾維納斯以東一

千二百六十七公里的南喬治亞島。

四月二十八日，英國國防部宣佈，從四月三十日格林威治時間十一時開始，對馬島周圍二百英里實行空中、海上全面封鎖，凡是未經英國防部許可而進入封鎖區的，都將被視爲敵對行爲。

五月十日開始，英國空軍對馬島實行大規模轟炸。

自從英國的特混艦隊出發後，戴卓爾夫人就沒有過一天安靜日子。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的反對聲音主要來自保守黨內部。憤怒的保守黨議員們不顧一切地站在工黨、社會民主黨一邊，指責她狂妄自大，獨斷專行，甚至謾罵她是個女魔鬼，會把英倫三島拖進地獄，就像越南戰爭給美國人帶來的災難一樣。

更使她感到震驚的是，她的得力幹將，六十二歲的外交大臣卡林頓勳爵也來勸說她取消進攻馬島的決定。戴卓爾夫人沒有接受他的勸告，卡林頓竟宣佈辭職。不過在給戴卓爾夫人的信中，他還是大大地幫了她一把忙，他說「福克蘭群島遭到入侵而使英國受到了當衆丟臉的恥辱」，他要對「導致這種侮辱的政府負責」。

戴卓爾夫人忍痛批准了他的辭呈，急派皮姆接替了他的職位。

與之相比，阿根廷總統加爾鐵里的日子就好過多了。阿軍佔領馬島後，阿根廷人民紛紛走上街頭，歡慶勝利，一時間加爾鐵里成了民族英雄，然而在英軍的大規模進攻下，他開始害怕起來。他怕自己在這場政治賭博中輸個精光，他急忙通過新聞媒介向戴卓爾夫人「眉目傳情」：阿根廷願意在一個適當的期限內通過和平途徑獲得對馬島的主權，但這個期限不應像一百四十九年那樣長。

加爾鐵里的「溫言軟語」使戴卓爾夫人看到了勝利的天平開始向自己這邊傾斜。

五月十三日，在英國國會下院就馬島危機舉行的第一次辯論中，戴卓爾夫人以更强硬的姿態表示：「不能因爲談判而停止作出軍事選擇。」

戴卓爾夫人的强硬立場終於迫使美國放棄了中立，開始向阿根廷施加壓力。這個變化使戴卓爾夫人信心大增，立場更加强硬。

蘇聯提出抗議，戴卓爾夫人指示外交部發表聲明，拒絕蘇聯指責。

意大利總理佩爾蒂尼提出和平建議，戴卓爾夫人不予理睬。

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出面請英阿兩國恢復談判，戴卓爾夫人表面敷衍，但卻毫無誠意。

如今拜會完女王，又得到精神上的慰藉，這使得她的情緒出現了少有的愉快。

離開白金漢宮，戴卓爾夫人直接返回首相官邸，準備參加爲款待外交界人士舉行的一個招待會。

對於這類招待會，戴卓爾夫人十分重視來客的名單，這次也是如此。她經過一番仔細審核後，特意把麥理浩的名字放在顯眼的位置上。

五月八日，港督麥理浩任滿離港返英。五月十三日，尤德爵士抵港，他將在二十日就任第二十六任香港總督。

這項人事交接是完全按計劃進行的，但給人的印象卻好像是戴卓爾夫人有意爲之。她一方面加

緊佈置攻佔馬島，一方面加强與北京的聯繫和友好關係，而尤德恰好能擔當起這個任務。尤德曾四次任職於英國駐華使館，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八年間擔任英國駐華大使，在中國交往廣泛，是個中國通，又通曉漢語。

不管別人是怎麼想的，反正戴卓爾夫人在作出進攻馬島的決定時，心中就這樣想過，如果這次英國能大獲全勝，日後在與中國進行香港問題談判時，就可能獲得更多的好處。

招待會於晚上七時準時舉行。

戴卓爾夫人要了一杯加蘇打水的英格蘭威士忌，一邊慢慢地啜飲着，一邊朝正在人群中高談闊論的麥理浩爵士走去。今晚她要請麥理浩暢談他關於香港的高見。

五月十九日上午十時。英國戰時内閣舉行緊急會議。

二十二名内閣成員陸續走進會議大廳，在鍍金的天花板下各就各位。他們進來的時候，戴卓爾夫人並沒有站起來，而是坐着迎接他們。她認爲，一個搞政治的女人如果過份講禮貌，會使男人們誤以爲她軟弱可欺。

會議開始了。戴卓爾夫人把身體朝棕色的橢圓形會議桌前靠了靠，用略顯冷漠的目光迅速掃視了一遍與會者，然後提高嗓音説道：

「我高興地通知大家，女王熱情地向我表示，她同意内閣作出的有利於維護大不列顛王國的任何決定。」

戴卓爾夫人把臉轉向新上任的外交大臣皮姆：「至於目前在聯合國舉行的英阿談判，我認爲決不能容忍阿根廷人利用這種方式無止境地搪塞下去。我請你去明白地告訴阿根廷人，最遲也要在二十日晚，也就是明天得出我們滿意的結果來，否則的話，無論用甚麼辦法也阻止不了我們採取軍事行動。」

皮姆輕聲問道：「首相，我想知道對福克蘭群島發起全面進攻的時間是否已經確定下來了。」

戴卓爾夫人的身體稍稍側開，不無幽默地說：「這個問題你可以請教我們的國防大臣諾特先生，不過我想他也許還得打電話去問我們的特混艦隊司令。」

戴卓爾夫人的話音剛落，便引來一片笑聲，多少沖淡了一些這裏的緊張氣氛。

五月二十一日，英軍發動突然襲擊，在東馬爾維納斯群島强行登陸。三支突擊隊和兩個傘兵營很快在沙灘上建立起了橋頭堡，增援兵力迅速達到四千人以上，橋頭堡陣地擴大到二十五平方公里。

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戰事的發展並不像英國軍方原先預想的那樣順利。截止二十四日，英國海軍已經損失了三艘軍艦，還有幾艘軍艦被打壞。地面部隊死亡七十三人，八十六人受傷。尤其是英國最現代化的裝有世界上第一流武器和反導彈電子干擾設備的「謝菲爾德」號驅逐艦，被戴卓爾夫人譽爲「英國皇家海軍的驕傲」，竟然被阿根廷從法國購買的「飛魚」式導彈擊中，沉沒在南大西洋的冰水之中。英國朝野震驚，很多人必勝的信念開始動搖。

戴卓爾夫人卻毫不動搖，她親自給特混艦隊下令，要求他們不是在幾週而是要在幾天之內奪回福克蘭群島的首府斯坦利港，她還告訴世界各國企圖勸和的人們，在沒有奪取福克蘭群島之前，英國決不會與阿根廷認真談判。

五月二十六日，英軍的「考文垂」號導彈驅逐艦，「大西洋運送者」號大型運兵船又先後被擊沉。人員死亡總數超過一百人。迄今爲止，特混艦隊已損失全部艦隻的十分之一。英國皇家海軍遭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慘重的損失。

與此同時，戴卓爾夫人在倫敦保守黨婦女會議上發表講話說：「儘管損失慘重，無論我們的決心還是我們的信心都沒有減弱。」

戴卓爾夫人雖然不精賭技，但卻懂得賭博的一種數學法則：押上一元錢輸了，再押上兩元錢；兩元錢輸了，再押四元錢；四元錢輸了，再押八元錢……總是按照兩倍的數字增加。這樣下去，只要贏上一把，就會連本帶利一起撈回來。這種賭法沒有技巧，只要有一股咬緊牙關堅持到底的精神就行。

戴卓爾夫人現在就是在咬緊牙關堅持。

戰局終於開始向有利於英軍方面的方向發展。

五月二十八日，英軍攻佔馬爾維納斯群島東部的索萊達島上的達爾文港和古斯格港。緊接着，由「伊麗莎白女王二世」號客輪運來三千多名增援部隊，登上索萊達島。

五月二十九日，英軍登陸部隊兵分三路，向馬島首府斯坦利港逼進，六月二日，英軍推進到距

離斯坦利港不足十公里的地方。

由於補給困難，英軍一再拖延總攻時間，只好實施輪番轟炸。但戴卓爾夫人的心情已經不那麼焦急了，她知道勝利的到來只是遲早而已。

她故作姿態地向新聞界宣佈，阿根廷如果想避免決戰，就必須在兩週之內撤兵。緊接着她又補上一句：「我懷疑阿根廷人會那麼做。」

六月十二日凌晨，英軍向斯坦利港發起總攻。十四日中午，英軍佔領無線嶺、欲墜山、威廉山三個戰略要地，並推進到離斯坦利港市區四公里處。阿軍節節敗退，最終掛出了白旗。

六月十五日，身着絳紫色套裙的戴卓爾夫人一臉輕鬆地出現在新聞發佈會上，她驕傲地宣佈：「阿根廷在福克蘭東、西群島上的軍隊及其輜重，已於昨晚當地時間九時，即格林威治時間今天凌晨一時，在梅嫩德斯將軍的率領下向英軍投降。」

宣佈完這條鼓舞人心的消息後，戴卓爾夫人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來政府秘書長羅拜爾・阿莫斯特龍先生，請他立即着手安排她的遠東之行。她要親自到北京去，會會中國領導人，談談香港問題。

9 新任港督尤德在香港搞起了調查研究。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批評香港居民是野蠻人。

尤德一上任就趕上中英香港問題談判即將開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將於九月下旬訪問中國，這些都是百年不遇的重大事件，他實在說不清自己的心情是喜是憂。他只知道自己要大忙一通了，甚至連這對自己的前途究竟是福是禍也無暇考慮了。

在尤德正式走馬上任的前夕，港英政府布政司進行了一批司級官員大調動，其中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保安司司長戴宏志退休。戴宏志是個英國人，英文名字是路易斯·戴維斯，他在香港任職多年，而且負責保衛和情報工作，對這裏的地理環境，風俗人情，各界人士乃至三教九流，都相當熟悉。因而，尤德沒有讓他回英國享清閒，而是把他留在身邊，先協助自己搞些調查研究工作。

尤德在北京任駐華大使期間，曾搞到一本有紅色聖經之稱的《毛主席語錄》，他懷着極大的興趣把它通讀了一遍，記住了許多富有深意的話，其中有一段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如今他要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驗證一下毛澤東的這句名言。

按照戴宏志擬定的名單，尤德分別會見香港各界有代表性、有影響力的人物，請他們談一談香港的現狀和前途。

尤德很欣賞戴宏志擬定的這份名單，其中有不僅香港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議員，如鍾士

元、鄧蓮如、利國偉等，也有工商界的豪富巨頭，如香港金王胡漢輝、船王包玉剛、希慎興業公司主席利銘澤等；有親大陸的著名人士，如李嘉誠、查濟民、霍英東、曾憲梓等，也有親台灣的人士，如香港中國聯合銀行董事長余兆麒；有教育界人士，如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中文大學校長馬臨，也有著名報人，如《明報》的董事長，以寫武俠小說揚名海內外的查良鏞、《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等，還有演藝界的代表，如無線電視台的金牌主持人汪明荃、演功夫片的大明星成龍等。

戴宏志有意把這份名單開得很長很長，以便讓尤德能有所選擇。尤德則認爲，這份名單上的人都應該見上一見，只是他擔心自己的精力和時間是否容許這樣做。

一時間，港督府外車水馬龍，港督府內貴客盈門，既蒙港督相召，香港人無不欣然而至。

就這樣迎來送往過了二十多天，再加上閱讀了一些戴宏志送來的材料，尤德自認爲他這個港督已經洞察「民情」了。

香港的面積很小，把港島、九龍、新界加在一起，不過一千零六十六平方公里。儘管香港小如彈丸，自然資源也近乎於零，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短短四十多年時間裏，卻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城市，發展成爲一個以服務業爲基礎的國際性大都市。

香港的人口有五百三十六萬多，在世界上只能排到第九十九位，但就其經濟實力而言，卻可以排到世界第十位，超過了許多大國。據統計，一九八二年時，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達二千六百多億港元，人均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九港元，折合一萬五千美元，直追日本，按這樣計算，香港的每個人都可以算得上百萬富翁。

香港是一個華人城市，中國人佔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外國人不到百分之二，英國人所佔比例更少，還不到百分之零點幾。從民族感情上講，香港回到祖國的懷抱，香港人應該全都歡欣鼓舞才對。但尤德卻驚異地發現，與他交談的部份中國人對香港回歸卻不那麼興奮。

這是怎麼回事呢？尤德向戴宏志請教，戴笑而不答，卻遞給他一份人口統計資料。

在香港的五百多萬居民中，有一半以上是從中國大陸來的。來港人數比較集中的有兩次，一次是一九四九年前後，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九四九年前後，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撤退，其各級大小官員以及一些有錢人紛紛湧到香港，這些人大多害怕、仇視共產黨，至少對共產黨缺乏瞭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據說有六十多萬人從大陸逃到香港，他們在國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所以才離鄉背井出走。

「原來如此呀！」尤德好像一下子懂得了許多，也不由得對戴宏志刮目相看，原來他早已有着自己的看法。

「香港人對於香港的前途有甚麼想法呢？」

尤德又提出這個問題向戴宏志請教，戴依然笑而不答，又遞給他一些早已整理好的材料，並向他提出了一個古怪的建議：

「如果不是你的身份特殊，倒可以去沙田看看跑馬，滿有意思的。好在每場跑馬電視台都搞現場直播。」

尤德一時間沒有弄懂戴志宏的話中有甚麼含意，但還是接受了他好心的建議。這幾天忙得頭昏

腦脹，正好藉此機會輕鬆輕鬆。

尤德對於香港的跑馬活動早有耳聞，但親眼看到跑馬的場面還是大爲吃驚。儘管沒有親臨現場，但他彷彿感受到了現場的火爆氣氛，賽場内賽馬在狂奔，賽場外幾萬名觀衆在狂叫、狂跳，也有人在狂哭、狂笑。跑馬場外還有上百萬人在關注比賽的結果，因爲他們事先都下了注。一旦中彩，轉眼之間就會成爲暴發户，而這樣的機會在六月至九月間每個星期都有兩次。

尤德一邊看電視，一邊順手翻開戴宏志送來的材料，正好看到一頁有關跑馬會的，便情不自禁地看了下去。

香港的馬會是全港贊助慈善事業出錢最多的團體，每個賽季都要從獲利中抽出近十億元作爲慈善福利用途。但是，它實質上卻是個賭博團體，一場賽馬投注額高達幾千萬，一個賽馬日投注額上億，一年達幾百億，主辦者的贏利數目可想而知，因而有人說，香港人參加跑馬投注，其實是在向政府自願納税，儘管如此，香港人還是熱衷於此道，以此來滿足對發財的渴望。從這個意義上講，把跑馬會說成是香港人精神上的統治者一點也不過份。

讀到這裏，尤德已經領悟了戴宏志讓他觀看跑馬活動的深意，於是對他提供的其他材料興趣大增。

這些材料不像是專業情報人員提供的，更像是甚麼人在業餘時間搞的報紙剪貼，但内容都是評價香港人的。

一位香港家庭婦女對日本記者松永成太郎說：「香港人對於未來没有信心，不是把錢存入銀

行，而是存入肚子裏。」

香港記者何敬之說：「香港是個沒有前途的社會，在香港，正常人是要發瘋的。」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批評說：「香港居民是野蠻人，在生活迅速城市化的同時，失去了社會道德觀念和正常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說：「香港人只以金錢衡量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但這錢是通過正當工作掙來的，還是通過走私、販毒，或者貪污得來的，就不去過問了。大多數香港人是沒有道德觀念的。」

這批材料中還夾着一份詳細的案情匯總，這可能是戴宏志利用職務之便搞來的。

一九八一年的聖誕節之夜，香港一派新年氣氛，主要街道上全都是燈火輝煌，明亮如同白晝。一輛高級小轎車開過來。幾個年輕人可能是看着不順眼，衝上去便是一陣拳打腳踢，把車窗打得粉碎，還有人用硬幣在鋥亮的車身上亂劃。

這些胡作非爲像瘟疫傳染開來。附近的文華酒店旁邊停着一些小轎車，很快就成了狂熱者的襲擊目標。

狂熱的人越來越多，他們搬來垃圾箱堆成路障，與趕來鎮壓的警察對峙。

這場騷亂一直持續到次日凌晨五點。據警方統計，有二千多人參加了騷亂，十二輛汽車被砸壞，十一名警察、五十名市民受傷，十六人被捕，都是十五歲至二十七歲的學生或工人。

警方經過認真調查後認定，這場騷亂沒有任何政治背景，也沒有甚麼組織計劃，完全是「偶發

事件」。

偶發事件？尤德若有所思地搖晃着頭。

第二天，尤德請來戴宏志，直截了當地讓他談一談中英雙方會以甚麼方式來解決香港問題。面對這樣一個嚴肅而敏感的問題，戴宏志這次沒有笑，他認真地建議尤德出去走走看看。尤德上任以來，雙腳未曾邁出港督府一步，尚未來得及熟悉管區的環境。戴宏志的建議再次讓他覺得正中下懷。

在戴宏志的巧妙安排下，沒有驚動任何人，尤德就坐進了滙豐銀行大廈頂樓宴會廳的一個小包間裏。

滙豐大廈是香港屈指可數的高層建築，坐在這裏，香港全景盡收眼底。隔着封閉的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到對面的維多利亞港，該港港闊水深，終年不結冰，與舊金山、里約熱內盧並稱爲世界三大最優良的天然港，當時它還是世界第三大貨櫃碼頭，僅次於紐約和鹿特丹。

戴宏志遞過來一個軍用高倍雙筒望遠鏡。

藉助於望遠鏡，尤德看得更清楚了，對於不懂航海的他來說，這簡直是世界上最令人驚恐的碼頭了。形狀不一，大小不等，舊的、新的、快的、慢的，無數的船隻在這裏進進出出，相錯而過的船隻之間的距離只有數英寸，尤德親眼看到，一條高速行駛的汽墊船從一條渡輪的船頭前急駛而過，又衝入波濤之中，這驚險場面差點兒驚得尤德冒出冷汗來。

戴宏志在一旁向尤德介紹說，維多利亞港背靠中國大陸，佔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運要衝，無論航向哪裏，這裏都是中途站，每年有八千多艘遠洋輪船在這裏進出，裝卸量達二千三百多萬噸。中國南方的貨櫃貨物和散裝貨物，主要是通過這裏吞吐。因此，中國人務必要很好地利用它。

尤德又一次領悟了戴宏志領他外出觀光的用意。

「尤德爵士，這兒有一份小資料，你不妨研究一下。」戴宏志遞過來一張小卡片。

這張小卡片上記着一些公開發表的統計數據，尤德以前都見過，但此刻見到卻覺得意義非同尋常。

——香港是亞洲的首席金融中心，在世界上僅次於倫敦和紐約。

——香港是亞洲最大的黃金貿易中心，在世界上僅次於倫敦和蘇黎世。

——香港是世界最大的高級成衣進出口地區。

——香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手錶出口地區，在世界市場上，平均每三隻石英錶中，就有兩隻是香港製造的。

——香港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出口地區。

——香港的空運載貨量佔世界第二位。

——香港是世界上排位第三的鑽石貿易中心，僅次於美國和日本。

——香港是世界上第三大珠寶貿易市場。

——香港人的生活水準居亞洲第二位。

當尤德的目光從這張小卡片上移開時，戴宏志適時開口了：

「我還有一張卡片，上邊記載的是中國大陸在以上各方面的統計數據。把它們放在一起比較是很有趣的，它只能使人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一日不可無香港。這就像一個貧窮的家長少不了一個能掙很多錢的兒子一樣，只要這個兒子孝順。」

戴宏志見尤德聽得有些入神，又接着說下去：

「目前，中國每年可以從香港得到近百億美元的外貿收入，這對正在努力擺脫貧困的中國來說，是一筆可觀的財富，此外，香港還可以協助中國引進外資、科技、管理技術，一旦戰爭爆發，香港又可以成爲中國的後勤生命線，這一點在朝鮮戰爭中已經得到了證明。我如果是中國領導人的話，一定不會急於收回香港，而會同倫敦續約三十年至五十年。」

「親愛的戴維斯，你說的太精彩了！」尤德興奮得差點兒跳起來。「我要把你的意見全部寫進報告，面交首相。另外，我還有一個私人要求，請你協助我和布政司處理由於香港前途問題會談而帶來的額外工作。」

10

尤德上任才數月，就兩度返英，北上廣州、深圳，忙個不亦樂乎。戴卓爾夫人突然提出讓他陪同前往北京。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港督交椅剛剛坐熱的尤德，就急匆匆地懷揣兩份有關香港前途和民意的調查報告，飛返倫敦述職。

七月二十八日，戴卓爾夫人在唐寧街十號接見了港督尤德。

戴卓爾夫人事先看過了尤德轉呈的那兩份報告，對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這麼大成績深表滿意。今天，她想請尤德詳細談一談香港的現狀，還要請他爲即將開始的中英談判出謀劃策。

「尤德爵士，」戴卓爾夫人和顏悅色地問道：「你注意到最近鄧小平發表的有關香港的談話了嗎？」

身爲港督，對這種談話尤德豈能不注意。

上個月十五日，鄧小平在北京接見了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工商界人士王寬誠、湯秉達等十二人，明確表示要在一九九七年前後，恢復行使香港主權，鄧小平還意味深長地說：「要找出一個妥善辦法來，以保持香港的安定和繁榮。」

在北京的消息靈通人士中間，已經流傳出這樣的說法：鄧小平其實已經找到了解決香港問題的金鑰匙。

在戴卓爾夫人已經決定訪問中國的前夕，北京方面放出這種風來，是真的胸有成竹，還是故弄玄虛呢？

尤德知道戴卓爾夫人一向喜歡敢於直言又有主見的下級，於是沒等她再問下去，便徑直說道：「鄧小平能夠想出的最好辦法，莫過於爭取香港的民心，而據我瞭解，香港的民心並不在北京政府那一邊。我在北京工作期間，曾聽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人在進攻共產黨軍隊佔領的陣地時，就抓來一些中國老百姓走在前頭。他們不忍心打傷自己的同胞，只好放棄陣地。這個辦法今天依然好用，如果能讓香港人出面爲我們說話，兩國之爭就變成了他們內部之爭，我們則可以坐收漁利。」

戴卓爾夫人沉吟片刻：「你說的辦法一定會見效，日後也一定能用上，但這打頭陣的事情還是讓我來幹吧！」

尤德見首相對北京之行如此着迷，也就不好再堅持甚麼，便轉開話題：

「對於香港問題最敏感、反應最強烈的還是那些商人們，他們投下資本，就要有保證，香港前途一日不明朗，商人們就一日不能放心地投資，這對於我們的政府的利益是有損害的。」

「是啊，誰願意把金錢扔進大海裏呢？盲目的、沒有把握的投資，就等於把金錢扔進大海。」戴卓爾夫人說。「我這次到北京去，就是要讓他們看到我們英國有辦法，有能力維護香港的穩定，他們完全可以放心大膽地在香港做買賣。」

「您這次北京之行事關重大啊！」尤德有意提醒一下這位好似勝券在握的女首相。

「你認爲香港問題提出來後，中國領導人會怎樣表態？」戴卓爾夫人又問。

「我覺得，如果非讓中國領導人對香港的前途表態的話，他們一定會堅持維護中國領土主權的原則。」

「是啊，中國人是不會承認那三個條約的。毛澤東在世時就從未在這個根本問題上讓過步，我想鄧小平在這上邊也不會稍有逾越。這件事情可能不大好辦！」戴卓爾夫人坦率地承認道。

戴卓爾夫人所說的三個條約，就是十九世紀清政府屈服於英國的炮艦而簽訂的一系列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英國政府就是憑藉它們對香港地區實行了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

「那麼你準備怎樣跟鄧小平談呢？」尤德關心地問道。

「第一步當然是爭取香港的主權，我要親口告訴他們，那三個條約至今仍然是有效的。如果實在無法保持香港主權，那也不妨做一下讓步，讓中國政府收回香港的主權，把管理權留給我們英國。」

尤德補充說：「最好是能做出某種安排，使中國政府延長新界的租借期限。」

「好！」戴卓爾夫人站起來，果斷地說，「就這樣定下來。我們就按這個方案與鄧小平談判。」

尤德告辭首相，又匆匆登機返回香港。

然而，不到半個月，八月九日他又和夫人匆匆北上，訪問了廣州、深圳，與廣東省委書記任仲

夷、廣東省副省長曾友石、深圳市委書記梁湘等人面談。

剛剛接手港督一職，事務繁多，他哪裏有閒情逸致到中國參觀遊覽。因此，很多有經驗的觀察家都猜測他此行是一次秘密外交，可能與戴卓爾夫人訪華有關。

對於這些議論，中國方面始終保持緘默，甚至在新聞媒介上也找不到關於尤德訪問的報道。

八月二十四日，英國政府宣佈，戴卓爾夫人將以政府首腦的身份對中國進行首次正式訪問。唐寧街十號首相官邸的一位官員說：「有關香港的問題將在戴卓爾夫人訪華的議事日程上佔有突出位置，其他議程包括貿易、國際事務等。」這位官員還說，港督尤德是否陪同訪華，目前還確定不下來。

然而，没過多久，港督尤德又在九月上旬回到了倫敦，同行的還有香港行政局、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五人。

九月七日，戴卓爾夫人在首相官邸舉行午餐會，招待尤德一行。她親切地告訴那幾位議員，在與中國領導人會談時，她將充分闡述五百萬香港人民的意願和權力。她又故作神秘地告訴尤德，他已被列在陪同首相訪問中國的英國官員名單之中。

戴卓爾夫人的講話傳到香港，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響：「長久以來，港英政府都强調英國人繼續留在香港，有助於中國外匯收入和經濟發展，到了戴卓爾夫人訪華前會見非官守議員時，更是渲染港人意願論調。」

九月十四日，戴卓爾夫人接見日本記者。她明確表示，她將在東京準備把話直截了當地説明

白，「事情應當是互惠的，生活中應該有來有往。我們開放市場，同時也希望別人向我們開放市場。」

當有記者問到她到北京將說些甚麼時，戴卓爾夫人拒絕透露任何信息：「到時候你們自然就知道了。」

戴卓爾夫人一明一暗，一實一虛兩種不同風格的回答，引來了各種各樣的猜測和評論：

——戴卓爾夫人在東京將扮演一個「鐵女子推銷員」的角色，而在北京，她能扮演甚麼角色呢？

——據接近首相的英國人士透露，戴卓爾夫人已經找到了解決香港問題的折中辦法。

——據與戴卓爾夫人相交密切的英國官員說，戴卓爾夫人此次訪問北京，只是把她的想法告訴給趙紫陽和鄧小平，不會提出甚麼具體建議。

戴卓爾夫人還沒有離開倫敦，卻早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香港問題處在了世界各國政治家手中放大鏡的焦點上。

第三章

戴卓爾夫人的中國之行



1

一架英國皇家空軍的專機降落在首都機場，戴卓爾夫人儀態萬方地走下舷梯。英國首相「猶抱琵琶半遮面」，中國總理也不便單刀直入。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六日，戴卓爾夫人開始了她的遠東之行。陪同她訪問的除了她的丈夫丹尼斯·戴卓爾先生外，還有香港總督尤德、英國貿易部副次官格雷、首席新聞秘書英厄姆、外交部助理次官唐納德、首相的私人秘書巴特勒等一大批官員，還有十六名記者獲准同行。

在這些隨行人員中，最特殊的人物就是丹尼斯·戴卓爾。在家中，他喜歡一個人看電視連續劇，在户外，他喜歡打馬球。他不希望自己因爲妻子而獲得更多的出頭露面的機會。然而，他陪同戴卓爾夫人要比歷屆首相夫人陪同首相的次數還要頻繁。這倒不是因爲他想留連於上層圈子中，而是因爲他覺得自己的妻子雖然貴爲首相，但還是時刻需要自己的關心、幫助乃至保護。

近一年來，他越發感覺到自己的妻子需要更多的心理支持。尤其是在英阿衝突那些日子裏，戴卓爾夫人在别人面前是個叱咤風雲的鐵腕人物，只有他知道她有過軟弱、恐懼、退縮。因此，這次他堅持陪同她出國訪問。

戴卓爾夫人對於丈夫也從來都是很器重的。甚至在内閣會議上，她也會經常宣稱她就這事或那事徵求過丹尼斯的意見，而這些便是她丈夫的看法。當戴卓爾夫人驕傲地說出丹尼斯的名字時，她

的那些男性內閣成員們總是會大感臉上無光。

戴卓爾夫人這次遠東之行的安排是這樣的：第一站日本，第二站中國，第三站香港，然後在歸國途中，在新德里與印度總理英・甘地夫人共進早餐。

戴卓爾夫人訪問日本的目的很明確。她要提醒日本人注意他們的巨額貿易順差，爭取向日本出售更多的英國產品。

在新德里停留的短短七個小時裏，她將與世界上另一位「鐵娘子」商談預定明年在印度舉行的英聯邦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會議，她們還將互相介紹訪華、訪蘇(甘地夫人預定九月二十日前往莫斯科進行訪問)的情況。

明眼人一看便知，戴卓爾夫人此次遠東之行的重點在中國，而焦點卻是香港——戴卓爾夫人是爲香港而來，儘管她不願公開承認。

嚴格地按照既定計劃，戴卓爾夫人在日本停留了六天。

在這六天時間裏，戴卓爾夫人同日本政府官員和工商界人士進行了一系列的討價還價。儘管她對於商業談判不大在行，但她仍然不肯讓隨行的貿易部官員代她出面。她覺得自己在心理上也像在身高上一樣，可以俯視日本人。

你們日本不過是「日出之國」，而我們大不列顛卻是「日不落國」，想當年，我們的殖民地要比本土大一百一十倍，它們遍佈世界五大洲，英國的國旗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太陽照到。

誰說我們大英帝國衰落了？請看我們特混艦隊，遠渡重洋攻佔福克蘭群島，不照樣還是海上霸主的氣魄嗎？你們日本人不就是有幾個錢嗎？真打起仗來試試！

這樣的想法不僅戴卓爾夫人有，恐怕隨行的英國人心中都有一些。馬島之戰的勝利確實大大地激起了英國人的自豪感。

日本首相鈴木善幸下個月也將訪問中國，於是他和戴卓爾夫人專門拿出時間就雙方都特別關心的對華關係問題進行了會談。

英日兩國首相達成以下兩點共識：中國將會繼續堅持現代化路線；中國希望國際和平，整個西方世界應該加强同中國的接觸。

在日本訪問期間，唯一使戴卓爾夫人感到有趣的事情，是在她的身邊形影不離地跟着一位日本婦女。

她乘坐的專機剛剛在東京羽田機場降落，日本方面負責保安的官員就把這位婦女强行塞到戴卓爾夫人的隨從隊伍中。據介紹，這是一位女警察，擅長射擊、擊劍、空手道，中國功夫也十分了得。據說日本的極右分子將在戴卓爾夫人訪日期間搞破壞活動，抗議英國侵佔馬島。配上這位女保鏢，是爲了專門保護英國女首相的安全。

這位女警察看上去身體比較單薄，文文靜靜的，一點也看不出身懷絶技的樣子。戴卓爾夫人倒是真的希望她能有個展示本領的機會，可惜一直到她離開日本，這個機會也没出現。戴卓爾夫人心中暗自責怪起日本人來，極右分子再怎麼厲害，還能比得上阿根廷人的「飛魚」式導彈嗎？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一點二十分，一架塗有英國皇家空軍標誌的 VC10 型飛機在首都機場徐徐降落，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儀態萬方地走下了專機舷梯。

前往機場迎接戴卓爾夫人的中國外交部長黃華及夫人、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及夫人、中國駐英大使柯華及夫人、西歐司司長王本祚等人迎上前去。戴卓爾夫人與他們一一握手問候。

在歡迎的人群中有一位是號稱「船王」的包玉剛先生，他是香港環球航運集團的主席。戴卓爾夫人已經知道他會到機場上歡迎自己，因而看到他並未吃驚。

戴卓爾夫人一行乘坐的車隊風馳電掣般地駛過飄動着無數面中英兩國小國旗的北京大街，開進了著名的釣魚台國賓館。在這裏，米字旗和五星紅旗第一次並排飄揚起來。

戴卓爾夫人住進了釣魚台裏的十二號樓。

這是一幢樣式極爲普通的二層小樓，窗户不大，但房間卻很寬敞，各種設施也很齊全，至於這裏的接待服務更是無微不至，無可挑剔。

推開窗户，可以看見她十分熟悉的一百多棵歐洲甜櫻桃樹，還有荷蘭、法國的溫室花卉，一片生機盎然。北京的秋天天高氣爽，氣候本來就很宜人，這裏的景色就更加恬靜了。

稍事休息後，戴卓爾夫人覺得連日來的緊張疲勞之感已經一掃而空。

一位中國服務小姐爲她送上來一杯濃濃的咖啡，還帶來兩片維生素C。

戴卓爾夫人驚奇地笑了：「中國人怎麼會知道我的生活習慣呢？」

她喝了幾口溶進維生素C的咖啡後，重新變得精神飽滿起來。

下午四時，燦爛的陽光斜斜地照射在天安門廣場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廣場上。時任中國政府總理趙紫陽在這裏爲第一位訪華的在任英國首相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

少先隊員向戴卓爾夫人和戴卓爾先生獻上了鮮花。戴卓爾夫人低下頭去親吻獻花兒童的臉蛋，她的臉上笑容可掬。

軍樂團奏出了中英兩國國歌。

在趙紫陽的陪同下，戴卓爾夫人檢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

北京的少年兒童揮動着花束和鈴鼓向英國貴賓歡呼致意。

中國人向來是好客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孔子的名言。戴卓爾夫人來華的當天正好是孔子誕辰二千四百六十三年紀念日。孔子主張和爲貴。戴卓爾夫人來到這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孔子的故鄉，她是爲和平而來嗎？

隆重的歡迎儀式結束後，戴卓爾夫人一行走進人民大會堂的一間大廳裏，在一張鋪着綠色桌布的長桌前依次入座。

兩位首相級官員對面而坐。他們的身邊分別坐着英方的港督尤德、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中方的黃華外長、章文晉副外長和中國駐英大使柯華。

中英政府首腦的第一輪會談開始了。

誰都知道戴卓爾夫人此行是爲舉世矚目的香港問題而來，誰都知道香港問題是當今世界上最棘

手的問題之一，很多人都希望中英兩國能就香港問題進行友好的會談，如今，兩國領導人坐到一起來了，可是「鐵娘子」此刻卻變得「羞羞答答」起來，她先向中國總理介紹起了蘇聯的天然氣管道情況以及英國政府對於歐洲形勢、裁軍問題、東西方關係問題的看法。她甚至還熱心地爲美國人說起好話來，除非蘇聯人能大規模削減SS——20中程導彈，不然美國在西歐佈署巡航導彈就大有必要。

既然戴卓爾夫人「猶抱琵琶半遮面」，趙紫陽也只好主隨客便，向她介紹起中國的對外政策來：「中國一向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們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我們一向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一切國家發展關係……我們不依附任何大國，我們對美國不打蘇聯牌，對蘇聯不打美國牌，也不允許其他國家打中國牌。」

戴卓爾夫人對趙的原則性表態並不太滿意，她希望中國領導人能和她一道强烈地譴責蘇聯，但出於禮儀，她還是對中國的外交政策表示讚賞。緊接着她又說：「阿富汗被佔領這個問題不應被人忘記，蘇聯侵略阿富汗，這是蘇聯的一大錯誤。」

趙紫陽說：「我們一貫反對霸權主義，一貫反對侵略。」

關於柬埔寨問題，中英兩國的立場接近於一致。戴卓爾夫人表示：「我們堅決支持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支持民主柬埔寨在聯合國的席位，不承認韓桑林政權。」

趙紫陽代表中國政府表示：「柬埔寨問題的實質是越南對一個弱小鄰國進行侵略。最近柬埔寨形勢有了新的發展，三派抗越愛國力量聯合起來，組成了聯合政府，這標誌着柬埔寨人民捍衛國家

的獨立和主權，反對越南侵略者的正義鬥爭進入了新的階段，新成立的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理應得到國際上更積極的支持。」

英國攻佔福克蘭群島是侵略還是內政呢？算不算以强凌弱呢？戴卓爾夫人注意到，中國領導人對這個問題連半點暗示都沒做。難道他們也承認現實和實力嗎？戴卓爾夫人心中一陣暗喜。

會談持續了兩個多小時。

會談結束後，戴卓爾夫人的新聞秘書英厄姆立刻告訴記者：「今天的會談確實是熱情友好的，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一致意見。整個會談活躍而認真。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戴卓爾夫人的隨從們發現今天首相的情緒很好，興致也很高。在會談和歡迎宴會之間短暫空當兒，她竟興致勃勃地拿出捲髮器來自己做頭髮。

在中國訪問期間，戴卓爾夫人外在唯一沒有變化的就是她的頭髮，始終是那樣平整光潔。

當晚，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裏燈光通明。趙紫陽總理在這裏舉行盛宴，招待來自英國的貴賓。

宴會按照中國的習慣舉行，先由客人致祝酒辭。用來款待嘉賓的照例是中國的名酒——茅台。茅台度數很高，喝慣了加蘇打水酒的西方人剛開始很難喝慣。據說尼克松訪華時喝了一口茅台酒，竟誇張地大叫道這是航空燃料。不過，喝過一次之後，它那醇香的回味卻會令人經久難忘。

戴卓爾夫人空着肚子站起來致祝酒辭，這略微使她感到有些不快。不過，入鄉隨俗吧。中國人從來都是先致辭，再喝酒，最後用餐。致辭前酒和飲料都端上來，開始致辭時客人們才手忙腳亂地往杯子裏倒酒和飲料。

戴卓爾夫人的祝酒辭時而熱情洋溢，時而慷慨激昂，雖然未能使宴會廳外長安街上川流不息的自行車大軍停下來，卻使得那些服務員們停止了走動，靜靜地聽她講話。

戴卓爾夫人說：「我是在一個重要時刻來華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性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剛剛結束，爲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英國工業的競爭力大大增强，我們願意幫助中國實現雄心勃勃的現代化計劃。」

她將話題一轉：「我們知道，要維護和平，我們必須强大，認爲有另一種有效的辦法是一種幻想。」她在這裏指的是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我們決不能容許侵略得逞，用中國的老話說：『我們不要爲虎添翼』。」

在即將結束祝酒辭時，她輕鬆地帶出了一句：「今天我與趙總理進行了第一輪會談，但還没有討論香港問題。我期待着明天同趙總理研究這個主要的問題。」

迎着戴卓爾夫人投過來的探索的目光，趙紫陽不動聲色地開始唸他的祝酒辭。

他也像戴卓爾夫人一樣，先把矛頭對準蘇聯的霸權主義，但同時也没有忘記譴責英國的盟友美國的霸權主義以及以色列「對無辜的巴勒斯坦平民的血腥屠殺」。

接下來他說，戴卓爾夫人這次來訪是兩國關係中的大事，是兩國關係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標誌。他表示相信，通過雙方的共同努力，這次訪問將會是有成果的，兩國間的經濟、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將進一步得到加强。

「當然，在我們的雙邊關係中也還有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有待於商談解決。」趙紫陽也把敏感

的香港問題放到祝酒辭的最後。「只要我們雙方都能用長遠的戰略觀點看待並發展中英關係，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爲準則處理我們之間的問題，我相信這類問題是不難解決的。」

英國客人帶頭鼓起掌來。頓時，宴會大廳裏掌聲如雷。照相機閃光燈的銀光頻頻閃動，各種顏色的液體高舉過頭，可以讓英國首相填飽肚子的時刻來到了。

2 戴卓爾夫人睡進了男性房間，卻把她的男性隨從打發進了女性房間。趙紫陽提前來到會談現場，有意無意地向香港記者「吹風」。

昨天晚上雖然喝多了一點茅台酒，但幸好這種酒不上頭，今天早上戴卓爾夫人仍然起得很早，而且神志清爽。

她有早起的習慣。平時對於她來說，晚上睡上五六個小時就足夠了。在倫敦的首相官邸裏，往往是早餐還沒開始，她已經把需要處理的文件、外交電函和部長們的匯報都瀏覽了一遍。

昨晚，她睡在釣魚台國賓館十二號樓的總統套房裏。十二號樓的總統套房分總統和夫人臥室，都在二層，各自都有五十多平方米，但格調卻截然不同。總統套房裏的擺設體現出明顯的男性化色彩，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張重達一點二噸的龍床，上邊雕着一百一十六條姿態各異的龍。這張龍床是仿照明代皇宮龍床複製的，上有厚重的暖閣，足以讓享用它的人大發思古之幽情。總統夫人的套房則相應地擺放着一張鳳床，裏邊的擺設突出了女性化的淡粉色。

戴卓爾夫人自己住進了男性味十足的總統卧室，而打發她的隨行人員們去住夫人卧室。這種安排在十二號樓的歷史上，雖然不敢說是絕後，但肯定是空前。

用過中國廚師爲他們準備的英國式早餐，丹尼斯・戴卓爾先生和幾位英國人就興衝衝地走了。他們今天上午要去遊覽長城。

收回帶有些許嫉妒的目光，戴卓爾夫人帶上她的幾位助手，乘車前往人民大會堂，與趙紫陽進行預定的第二輪會談。

就在戴卓爾夫人剛剛出發的時候，趙紫陽出人意料地提前出現在會談現場。

這次中英會談，世界各國的新聞機構都極爲重視，紛紛派出自己的頂尖高手前往北京，力爭採訪到最有價值的新聞。香港的新聞記者們更是不敢怠慢，今天一大早他們就來到了人民大會堂。當他們用獵豹似的目光搜索到了趙紫陽的身影後，不禁大喜過望，一窩蜂似地擁了上來，趕緊抓住這個罕見的良機問這問那。

趙紫陽今天談興很濃，幾乎是有問必答。

香港記者當然最關心香港的前途。一位女記者把話筒遞到了趙總理的嘴邊，用粵語腔的普通話問道：「請問趙總理，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未來有何打算？」

趙紫陽胸有成竹地答道：「這一點我可以明確地告訴大家，香港的主權中國當然是要收回的。我這裏所說的香港，不僅指的是新界，而是包括整個香港地區。關於香港的主權，我不打算與戴卓爾夫人商談。」

「那麼你打算與英國首相談些甚麼？」那位香港女記者緊追不捨。

「我們要談的事情很多。在香港問題上，我們希望得到英國方面的合作。只有雙方真誠合作，香港地區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才能實現平穩過渡。」

一位香港男記者搶過話頭：「請問趙總理，中國政府宣佈收回香港主權，會不會令五百萬香港人對自己的前途感到不安？」

「他們有甚麼感到不安的呢？」趙紫陽意味深長地瞅了那位男記者一眼。「我認爲香港同胞沒有必要爲自己的前途感到不安。我還認爲，主權問題並不會影響香港的繁榮。」

「中國政府收回香港的主權後，將採取怎樣的行政管理呢？」又一位記者提問。

「如果中國收回了香港主權，必定會採取一系列措施保證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其中包括中國政府對香港採取一些特殊政策。對不起了，各位記者，會談就要開始了。」趙紫陽及時刹住了話頭，轉身離去。

望着趙紫陽離去的背影，咀嚼着剛才他說的那些話，聰明的記者們很快就回過味來：中國總理提前到場，是不是在有意無意地向香港記者「吹風」，讓他們知道中國領導人在香港問題上的意向呢？

中國總理與英國首相的第二輪會談開始了，照例對記者保密，但是有些性急的香港記者已經開始往回發報道了，他們認爲自己已經知道了中國總理在這一輪會談中將說些甚麼。

英國首相會說些甚麼呢？

記者們做過種種猜測，但很少有人能說得準。

今天的會談與昨天完全不同。趙紫陽總理一開始就主動出擊，向戴卓爾夫人表達了中國政府將

在一九九七年全面收回香港地區的決心。

中國人不是在跟你商量，而是把他們的決定告訴你。這簡直不像談判！戴卓爾夫人有些惱火。

「對於香港的主權嗎，我們英國一向尊重中國政府的意見。」戴卓爾夫人故意放慢速度，尋找着反擊的突破口。「說到主權，我倒想起了十九世紀留下來的那三個條約。按照國際法的慣例，這三個條約至今仍然有效。既然如此，那麼到一九九七年，中國只能收回租借出去的新界的主權，港九的主權還要另當別論。」

「夫人不要忘記了，那三個條約是臭名昭著的鴉片戰爭帶來的後果。對於我們來說，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塊完整的領土。」趙紫陽冷靜地反駁道。

「既然在這個問題我們有分歧，可以暫且不談。」戴卓爾夫人拿出一副職業談判家的架式。「我們英國政府完全可以考慮中國方面的主權要求，也充分尊重中國人民的感情，但我們英國人對於香港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因而我們希望中國政府同意在一九九七年之後繼續由我們治理香港。」

戴卓爾夫人毫不掩飾地說出了她的圖謀。

這是中英首次討論香港問題，她知道不可能有太大深入，不應抱太大期望。再說中國人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許多實質性問題恐怕不是中國總理一個人能說了算的。她看得出來，趙紫陽今天是有備而來，許多問題表述得異常清楚準確。而對於她突然提出的問題，他則用比較得體的語言閃避開來。

戴卓爾夫人知道不可能從趙紫陽嘴裏得出最終的答案，她把信息傳遞出去了就是勝利。她開始準備退場了，告訴趙紫陽她希望爲「某種逐步解決辦法而做好準備工作」。

第二輪會談結束後，首相的新聞秘書英厄姆沒有像昨天那樣通報消息，但戴卓爾夫人依然像昨天那樣興高采烈，好像她已經打了一個大勝仗。

當天下午，她帶上隨行人員，由中國文化部副部長周巍峙、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陪同，先後到中國音樂學院和中央美術學院參觀訪問，領略一下富有中國特色的東方藝術。接着，她又前去參觀由英國文化委員會在北京舉辦的圖書展覽會。在那兒，她與參觀英國書展的中國兒童親切交談，合影留念。

她還來到了海淀區的農貿市場，在那兒她購買了一大袋葡萄。

她覺得在中國要比在日本開心得多，起碼看不到保鏢，也就沒有如臨大敵的感覺。她曾留心過她身邊的那些中國人，沒有一個像是幹「那一行」的。

戴卓爾夫人一眼就能看出的是那些記者們，他們的照相機和攝像機是隱藏不住的。她每到一處，總有一大群記者尾隨在後邊，好像成了她的專業保鏢。

每當有記者出現在視力可及的範圍內，戴卓爾夫人的臉上總是露出標準的笑容來。在這方面她是訓練有素的，再怎樣精明强幹的記者也別想從她的臉上捕捉到任何細微的情緒變化。

晚上，她又回到釣魚台十二號樓，又躺在那張碩大無比的龍床上。她今天晚上沒喝茅台酒，但卻有些失眠了。白天極力抑制住的緊張和不安，像小蟲子一樣偷偷地爬上了她的心頭。

明天，她將與中國的決策人物鄧小平會談。就在前不久的九月十三日，鄧小平當選爲由一百七十二名受尊敬的中共高級老幹部組成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主任。作爲最有權威的政治家，作爲一切政策與方針的總設計師，他顯然要比任何人都難對付。更何況他還是對付帝國主義最有經驗的老手。而她卻缺乏與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打交道的經驗。

關鍵是明天，決戰在明朝。

深深的憂慮使戴卓爾夫人難以成眠……

3

戴卓爾夫人走到離福建廳門口六七米遠的地方，大門依然緊閉，主人依然未露面。鄧小平的第一句話就讓「鐵娘子」吃了個軟釘子。

不管戴卓爾夫人晚間睡得怎麽樣，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的早上，太陽照樣昇起。戴卓爾夫人按時起床了。她今天顯得比平時任何時候都輕鬆，幾乎甚麽事情都没有做，只是喚來專門爲她做頭髮的隨從。

一邊做頭髮，她一邊徵求對她今天穿着打扮的意見。她不像準備參加會談的女政治家，倒像是個演出前夕等在化妝間裏的女演員。用過早餐，有人提醒她離會談只有半個小時了。她並没有顯出着急的模樣，又坐了一會兒，才站起身來，通知港督尤德等人同她一起前往人民大會堂。

這時，人民大會堂前已經被各國記者們擠得水洩不通。爲了佔據一個有利的位置，他們你推我擁，全然失去了平日裏的斯文模樣。

戴卓爾夫人走下紅旗牌轎車，笑容可掬地登上了寬大的石階。今天她的打扮十分考究，穿的是一襲藍底紅點的絲質西裝套裙，腳蹬黑色高跟鞋，手挽黑色手袋，脖子上掛着一條珍珠項鏈，顯得雍容華貴，艷光四射。

她首先來到人民大會堂的新疆廳。已故總理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等在門口迎接她。戴卓爾夫人

與鄧穎超親切握手，同時獻上了一束鮮花。

一九七七年時，戴卓爾夫人曾作爲英國保守黨領袖訪問過北京，那時就見過鄧穎超。時隔五年，兩人又在北京相見，都顯得非常高興。

戴卓爾夫人首先詢問了鄧穎超的身體情況。她注意到，鄧穎超在行動時，身旁有一個年輕女子在攙扶着她。看來她的身體狀況已經大大不如五年前了。

鄧穎超的頭腦還很清晰，還記得起當年的一些情景。她對戴卓爾夫人作爲英國第一位首相，特別是女首相訪華表示熱烈歡迎，還預祝她此次訪問獲得成功。

告別了鄧穎超，戴卓爾夫人向隔壁的福建廳走來，她將在這裏與鄧小平會談。

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馬上就要見面了。這是一個搶鏡頭的時刻，記者們當仁不讓，在他們中間又起了騷動。

北京電視台的一位攝影師一不小心把鏡頭撞在了另一位外國記者身上，那個外國記者可能心中正有火，回身一腳踢來，正好踢在那位攝影師的腰部，他怒不可遏，立刻便要還擊，對方也做好了迎擊的準備。可是兩人又不約而同地擺擺手，搖搖頭。他們哪裏敢因爲個人之爭誤了眼前的大事！

「鐵娘子」從新疆廳的那一頭向福建廳走來。這段路並不長，但戴卓爾夫人卻越走越覺得不對勁，臉上的表情變得凝重了，腳下的步子變得緩慢了。

剛才她會見鄧穎超的時候，鄧穎超雖然身體有病，仍然老早地就在門口佇立恭迎。而現在她已經走了一半，福建廳的大門依然緊閉着，更是無從看到鄧小平的身影。

戴卓爾夫人的心中升起了一個個疑問：

難道說鄧小平還沒有到？

難道說鄧小平突然身體欠佳？

難道說中共領導人對自己昨天突然提出的難題……

就在她走到離福建廳大門還有六七米遠的地方，門卻訇然洞開，鄧小平滿面笑容地走出來，走上前五六步，與戴卓爾夫人握手。

在鎂光燈的照耀下和一連串快門的按動聲中，戴卓爾夫人稍稍彎下腰來，與鄧小平雙手握在一起：

「我作爲現任首相訪華，看到你很高興！」

「是呀！」鄧小平顯得很隨便地說，「英國的首相我認識好幾個，但我認識的現在都下台了。歡迎你來呀！」

鄧小平說的是實情，但此時此刻說出這種話來，戴卓爾夫人卻不知如何應答才好，一時竟愣在那裏。

鄧小平說的這句話確實容易讓那些善於揣摩弦外之音的人胡思亂想，有些記者已經暗自偷笑起來。

好在這一尷尬的場面很快就過去了，賓主雙方謙讓着步入福建廳內，一一落座。

鄧小平和戴卓爾夫人作爲這次會談的主角，自然佔據中間位置。在他們落座的沙發中間放着一

個矮茶几，上邊擺着已經沏好的茶水和兩個話筒。後邊坐着一老一少兩位女譯員。

鄧小平和戴卓爾夫人坐在同樣的沙發上，面對着同樣的方向，但好事的記者們很快就對他們的坐姿作出了對比：鄧小平半靠在沙發上，雙手相疊放在胸前，其狀輕鬆舒怡；戴卓爾夫人正襟危坐，雙手平放在膝上，其狀恭謹莊嚴。

此刻的戴卓爾夫人，心中是否還在琢磨着剛才見面時鄧小平那句開場白的含意呢？會談正式開始前，還要給記者留下拍照的機會，他們的話題只能停留在寒喧階段。

戴卓爾夫人說：「我聽說你剛從外地回來，一路辛苦了！」

鄧小平答道：「我陪同朝鮮的金日成主席去了一趟四川。」

「此行一定很愉快吧？」戴卓爾夫人又問道。

「不錯。我們在四川吃了好幾次川菜。我本人是四川人，自然很喜歡川菜。在我們中國，川菜和粵菜最爲著名。夫人路過廣州的時候，一定不要忘記嚐一嚐呀！」

鄧小平對飲食的興趣似乎很濃厚，他又轉過頭來問坐在另一側的港督尤德：「尤德爵士，你在中國當過多年外交官，一定吃過川菜，也吃過粵菜，你喜歡哪一種呢？」

尤德微笑着回答：「兩樣我都喜歡。不過，我的外交生活正是從四川方面開始的。」

鄧小平打趣地說：「這麽說你也是四川人，咱倆是老鄉了！」

鄧小平的談笑風生使戴卓爾夫人忘掉了剛才碰的那個軟釘子，在一旁插嘴道：「尤德爵士不愧爲外交官出身，說話很有外交辭令。」

她稍微停頓了一下，接着鄧小平的話頭說下去：「我對中國的菜餚沒有研究，凡是中國菜我都願意吃。不過，我倒覺得蘇州菜的風味不錯。」

她這並不是隨便說說。五年前她到中國訪問，去蘇州參觀過，吃過正宗的蘇州菜，給她留下了難忘的美好印象。

鄧小平卻笑着搖了搖頭，表示不同意戴卓爾夫人的說法：「作爲遊客，總是到哪裏說哪裏的菜好吃。看來我有必要請夫人吃一頓川菜了。」

戴卓爾夫人聞言笑出聲來，連連點頭。

說到這裏，記者們被請退場。

會談馬上要開始了。

4

戴卓爾夫人走出人民大會堂北大門時，時鐘的指針比原定時間多轉了五十分鐘。她神情恍惚，一腳踩空，跪倒在地。

福建廳的大門緊緊地關上了。

被請離場的記者們並沒有馬上散開。這次會談前鄧小平沒有對記者發表任何談話，而事先中國外交部新聞司的有關人員曾表示過，鄧小平有可能對記者們說幾句話。於是，他們就把希望放在了會談結束後。尤其是香港記者們抱的希望更大，他們盼望着能在會談後鄧小平送客出門的時候，衝上去攔住他，請他對香港同胞說幾句話。他是不會拒絕關心香港前途命運的香港同胞的這個請求的。

福建廳內的會談已經開始，雙方很快就轉入了正題。

雙方的陣營不相上下，可以說是旗鼓相當。

中方：鄧小平、黃華(外長)、章文晉(副外長)、柯華(駐英大使)。

英方：戴卓爾夫人、尤德(港督)、巴特勒(首相私人秘書)、柯利達(駐華大使)。

會談一開始，戴卓爾夫人依然老調重談：必須遵守有關香港問題的三個條約。條約雖然寫在紙上，但任何手段都不可能消除它存在的事實。

面對以强硬著稱的「鐵娘子」，鄧小平不急不躁，但口氣卻變得冷峻起來：

「夫人，如果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後還不能把香港收回來，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那就意味着我們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我們這些中國領導人就成了李鴻章。我們的人民是充分信任我們政府的，讓我們等待了三十三年，如果十五年後還不能收回，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了。我們政府就應該自動下野，別無其他選擇。」

戴卓爾夫人沒有估計到鄧小平的反應會如此激烈。鄧小平這番話大義磅礴，表達了中國政府決不妥協、決不退讓的立場，使戴卓爾夫人無言可對。

一時間，會談出現了冷場。

尤德輕輕咳嗽了一聲，試圖打破僵局：

「鄧先生，你一定知道，那三個條約是有區別的……」

鄧小平有力地揮動了一下手臂：

「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沒有迴旋餘地。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們，中國在一九九七年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

「既然如此，我們又有甚麼可以討論的呢？」戴卓爾夫人反問道。

「當然有。我們雙方可以討論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和方法。但是這必須有個前提，那就是必須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否則就不能坐下來談判。」

「香港問題的解決不可能像鄧先生想像的那麼簡單呀！」戴卓爾夫人帶着譏諷的口吻說。

「我看這個問題很簡單。」鄧小平說：「最遲一兩年就能解決。中國方面可以馬上宣佈收回香港的決策，也可以等上一兩年。為甚麼要等呢？就是要留出足夠的時間給中英兩國政府進行友好磋商，我們也非常高興地希望聽到英國政府給我們提建議，這些都需要時間。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長的時間了。」

戴卓爾夫人本來希望這次在北京能看到一個善於妥協的鄧小平，没想到卻見到了一個絲毫不肯讓步，出語斬釘截鐵的形象，不禁大為惱火，口氣也變得嚴厲起來：

「我不知道中國政府的領導人是否考慮過，中國如果宣佈收回香港，就會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我這決不是危言聳聽，這個影響在今天就已經有跡象可尋了。」

戴卓爾夫人話中的威脅意味流露無遺。

「甚麼災難性影響？不就是出現一些波動嗎！」鄧小平輕蔑地一笑，「我的看法是小波動不可避免，如果真的出現大的波動，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

鄧小平用犀利的目光直視戴卓爾夫人：

「我還要告訴夫人，中國政府在做出收回香港決策的時候，各種可能就都估計到了。我們還考慮到了我們不願意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麼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

戴卓爾夫人頓覺脊背上升起一股寒意。和她對面而坐的這個小個子男子雖然比她還矮小，但卻是個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職業軍人，又是中國的軍委主席。他親自指揮的戰役要比英國人為之

自豪的攻佔馬島規模大得多，氣勢也豪邁得多。他說的話是算數的！

鄧小平繼續說下去：「如果過渡時期沒過渡好，就會出現很大的混亂，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爲的。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的是你們英國人，製造混亂是容易的。我希望我們兩國政府要各自加以約束，不要做妨礙香港繁榮的事。」

「香港的繁榮對中國現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是有利的。我們英國政府不希望因爲收回香港而影響貴國的建設。」戴卓爾夫人話中有話。

「影響不能說一點沒有，但說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建設，這個估計不正確。如果中國把四化建設能否實現放在香港是否繁榮上，那麼這個決策本身就是不正確的。不要擔心香港的外資撤走，只要我們的政策對頭，走了還會回來的。」

「香港今天的繁榮證明，我們英國的管理是極爲成功的。如果貴國政府允許的話，我們願意繼續提供在管理方面的聰明才智，也可以在貿易方面採取優惠政策。」戴卓爾夫人本想像和趙紫陽總理會談時一樣，直接提出主權與治權的交換要求，但話到嘴邊卻變成了委婉的方式。

鄧小平沒有和她繞圈子，直接回答道：

「保持香港的繁榮，我們希望取得英國的合作，但這不是說，香港繼續保持繁榮必須在英國的管轄之下才能實現。中國既然要收回香港，就要把它置於中國的管轄之下，但香港現行的許多制度還是可以保留的。」

戴卓爾夫人此次來北京商談香港問題，本來是想挾馬島之戰的勝利餘威，重振大英帝國的雄

風，志在必得。即便不能保持對香港的主權，也要用它換來治權，然而，到頭來她卻落個兩手空空。她的心頭湧上一絲悲涼，不得不暗中承認自己原先的算盤打錯了，中國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福克蘭群島。

鄧小平似乎看出了戴卓爾夫人心中的失望，又説：

「夫人，我向你提個建議，咱們可以先達成一個協議，雙方同意通過外交途徑開始進行香港問題的磋商。」

「那好呀！但談判要是不成功怎麼辦呢？」戴卓爾夫人不懷善意地説。

「中國希望和平收回香港，談判收回。」鄧小平説到這裏稍稍停頓了一下，又加重語氣道：「如果談不成，中國也要收回。」

戴卓爾夫人默然不語。

原定一個半小時的會談時間早就超過了，但福建廳的大門仍然緊閉着。

記者們耐着性子在站立着等待着。

會談終於結束了，但時鐘的指針比原定時間多轉了五十分鐘。

記者們失望了。他們只看見戴卓爾夫人走了出來，卻沒有看見鄧小平的影子。

戴卓爾夫人臉色凝重，失去了來時的笑意。她緩步走下人民大會堂北大門的石階，抬眼望見聚集在石階右下方的記者，機敏地突然綻出笑容，轉過臉來向記者們點頭示意。這時候，她正踏上倒

數第二級石階，也許是她的高跟鞋後跟太高，讓石級絆了一下，身體頓時失去平衡，一下子跪倒下去，皮鞋、手袋甩到了一邊。幸好她將到平地，這一跤摔得並不重。

走在她身旁的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港督尤德，還有一名軍人以及一名穿灰色中山裝的工作人員見狀，急忙上前在同一時間內將她扶了起來，另外有人為她拾起掉在地上的手袋，並拍掉沾在上邊的灰塵。

戴卓爾夫人這一跤跌得很狼狽，但她很快就鎮定下來，起身後神態自若，看不出一絲驚慌失措的樣子，接過別人遞過來的手袋時還不忘道謝。她輕挽裙擺低頭鑽入停在石階下的紅旗牌轎車內，坐好後又向記者揮手微笑，好像剛才根本沒有發生那一幕似的。

一向注重儀表，舉手投足極有分寸的戴卓爾夫人為甚麼會「失足」呢？這件事立刻成了街談巷議的話題，敏感的輿論界更是大做文章，立刻，一系列有關報道躍然紙上：

——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的會談針鋒相對。戴卓爾夫人碰了硬釘子，受挫折極深，內心如翻江倒海，以致神情恍惚。

——戴卓爾夫人鋒芒畢露，鄧小平棉中寓針。儘管戴卓爾夫人受丘吉爾影響極深，儘管她堅持「鮮明的傳統保守主義哲學和強硬的經濟政策」，但在鄧的面前，她畢竟還年輕。

——戴卓爾夫人有着英國人的通病：高傲自負，不通事理，盛氣凌人。這次她在北京可遇上了對手，被結結實實地教訓了一頓。

至於這次會談的具體內容和詳情，英國官員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沒有提供任何情況，只是說會談

是「令人滿意的」，氣氛是「好的」。

既然如此，會談時間的延長又意味着甚麼呢？

5

戴卓爾夫人把滿肚子怨氣撒在倒霉的記者頭上。她一到香港，就一頭鑽進總督府。離港之前，她大談三個條約。

在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會談結束後，熱情好客的中國主人安排英國客人遊覽著名的頤和園。戴卓爾夫人徜徉在這裏的湖光山色之間，不時忘情地說着，笑着，還拉來記者爲她和丈夫拍照留影。她好像完全被這裏美麗的景色陶醉了，誰也看不出她剛剛受過重大挫折。

中午，黃華外長宴請英國客人，戴卓爾夫人頻頻舉杯，對中國主人的熱情款待表示感謝，誰也看不出她憋了一肚子火。

晚上，她和丈夫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答謝宴會，她和趙紫陽總理又是用茅台互相多次敬酒，誰也看不出她心中深深的失望和痛苦。

面對宴會大廳裏的數百名中外人士，她的臉上蕩漾着真誠的笑容，用樂觀的語調告訴大家，這次中英會談取得了富有價值的、令人鼓舞的成果。

她又好似發自內心地對中國領導人表白：「在我到達北京之時，我覺得我已經很瞭解貴國的外交和國內政策的要點。但我們的會談使我對中國事務理解得更深，也使我個人對於中國政府的觀點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在致辭時，戴卓爾夫人還引用了一句中國的古詩：「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她記得，一

九七二年尼克松訪華時，曾在致辭時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詩「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結果贏得了中國人的極大好感，今天她不妨重施故伎，果然她看到附近許多中國人的臉上露出了笑意。

戴卓爾夫人畢竟是地球上最著名的女政治家，她既有根源於政治的强硬，也有根源於知識的明智。她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喜怒哀樂，做到喜樂不形於色。她這是代表一個國家在出訪，她不能容許自己在外交場合有任何失態的表現。

還有一點更重要的，那就是她還是一個女人，她有着根源於女性的聰敏、靈活和細緻。

在接受美國《時代》週刊採訪時，她曾從女政治家的角度這樣評論女性：

「我認爲女人往往更注重實際，而不尚空談，不會意氣用事。她們更多地着眼於將來，因爲她們關切的是自己的子女將來生活的世界。有管理經驗的女人要比男人多得多，因爲她們是管家的。她們擁有作出決定的經驗，而不是把責任推給別人。她們比男人理智得多，而不是姿意妄爲。」

然而，戴卓爾夫人也是人，有火也要發出來。她沒有靈丹妙藥，可以把積壓她心頭的怒火化爲烏有，她要發火，只是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時機和對象。

當天下午，她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招待會。

戴卓爾夫人一露面，熟悉她的記者就覺得她今天有點異樣。她的臉上失去了往日溫和的微笑，舉止也失去了往日的文雅得體，更沒有像往日那樣對記者們頷首致意，而是斜眼瞥了一下坐得滿滿的會場，目光裏流露出來的竟然是挑釁和嘲弄。

戴卓爾夫人向中外記者宣讀中英兩國政府擬定的聯合聲明。她的聲音一度變得嘶啞，但她還是

堅持一口氣念完了這段只有八十三個字的聲明：

「今天兩國領導人在友好的氣氛中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雙方領導人就此問題闡述了各自的立場，雙方本着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這次訪問後通過外交途徑進行商談。」

就是這樣一段簡短的聲明，中國方面顯然也有所保留。新華社在發佈這段聯合聲明的同時，還附上了一段中國單方面的強硬聲明：

「至於中國政府關於收回整個香港地區主權的立場是明確的、衆所週知的。」

這段話要比那個聯合聲明含意更深，更耐人尋味。

難道這次萬里迢迢來到北京訪問，所得到唯一的收獲就是一段只有八十三個字的聯合聲明嗎？戴卓爾夫人實在是心有不甘。

戴卓爾夫人正在心中自悲自嘆的時候，一位高個子的英國記者站起身來，他想提問。可能他太着急了，不免有些手忙腳亂，手裏的記錄本掉在了地上。他彎下腰去拾記錄本，口袋裏的甚麼東西又滑了出來，在他的周圍響起了一陣笑聲。

「我的記者先生，我看你應該像我們英國的小學生那樣，把東西全裝進書包，再揹着它進教室。」戴卓爾夫人冷言冷語地嘲諷道。

那位記者沒有理會她的戲弄，仍然堅持提出他要提出的問題：

「請問首相，你在上午與鄧小平先生的會談中，是否提出解決香港問題的新建議？鄧小平是否

接受了您的建議？」

「我建議你直接去問鄧小平好了！」戴卓爾夫人没好氣地回答。

一位好心的美國記者站起來。他見戴卓爾夫人態度如此惡劣，以爲是微妙的香港問題使她感到煩惱和不知所措，便想把這個話題引開。

「請問首相，我想請您談一談對華貿易政策……」

戴卓爾夫人絲毫不領這位美國記者的情，她尖刻地說：

「我用不着你幫忙！你要是想改換話題就自管改換好了！」

一位不識趣的香港記者站起來，操着略帶地方口音的英語提問。

戴卓爾夫人故意側過耳朵，煞有介事地問道：

「你說甚麼？我聽不懂你的話。你說的好像不是英語。」

那位香港記者羞得滿臉通紅。他一屁股坐下去，氣鼓鼓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記者招待會就這樣不歡而散。

戴卓爾夫人的表現激怒了記者們，他們用刀子一樣的筆毫不留情地攻擊她，即使是在英國的報紙上，也出現了大塊大塊批評她的文章：

——她缺乏打動普通人的本領，麻木而遲鈍，卻不肯放過任何顯示不饒人作風的機會。

——她像一個狂熱的鬥牛士滿場奔跑，她冷漠而强硬，但是她拙笨得像那頭她逗引的牛一樣，因而決不會贏得喝采聲。

——北京之行充分暴露了她的弱點，她需要先磨掉一些鋒芒，才能成爲合格的政治家。其實，戴卓爾夫人完全用不着記者們教訓，她很快就平息了心頭的怒火，又恢復了雍容大度的女首相形象。

在離開北京前往上海參觀訪問之時，她向英國廣播公司電台記者戈登．馬丁發表談話。這次談話是事先安排好的，她的用詞又像在官方場合一樣嚴謹了。

問：首相，雖然以前你去過中國，但是這次顯然你是第一次作爲首相同中國領導人舉行高層會談。總的來說，你們會談的氣氛如何？

答：同趙總理和鄧主席的會談氣氛都是友好的。我們承認有分歧，但是我們認爲，我們有共同的東西，我們共同的目的，大於我們有分歧的東西。

問：你們顯然會談了所有國際關係問題。在談香港問題之前，我能不能問一下中國同蘇聯的關係如何，你對它們的關係的評價如何？

答：一些人正在認爲它們的關係有了改變。我得到很深的印象，它們的關係根本没有改變。

問：現在來談香港問題。聯合聲明說，現在將通過外交途徑開始會談，共同的目的是保持這個領土的穩定和繁榮。首相，你是否發現中國領導人强烈地認爲，保持繁榮和穩定是符合每一個人的利益，包括他們的利益？

答：我認爲我們大家都認識到這一點。

問：首相，你星期天到達香港時，香港的許多人很希望你會給他們帶來某種使人對他們的前途

感到放心的信息。你是否認爲聯合聲明滿足了那個願望？

答：在我去中國之前，香港來的一些人說，要緊的是穩定和繁榮，是穩定和繁榮的前途。要穩定，並不是出人意外的，沒有穩定，人們做不了很多事情，而繁榮是他們已經建立了的東西。那就是他們在使用共同的目的是要保持穩定和繁榮這一措詞時放在前面的兩件事，我希望他們會發現那是令人放心的。

九月二十五日上午，戴卓爾夫人告別了前來送行的趙紫陽，離開釣魚台國賓館十二號樓，乘車前往首都機場。她將在那裏乘專機去上海訪問。

陪同英國客人去上海訪問的有副外長章文晉夫婦、駐英大使柯華夫婦。

到了上海，戴卓爾夫人一行參觀了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接着，她又驅車前往上海江南造船廠，親自主持一艘散裝貨輪的交航典禮。這是江南造船廠爲香港環球航運集團建造的第二艘二萬七千噸散裝貨輪，該集團的主席就是那位包玉剛先生。

這艘新船被命名爲「世誼」號。戴卓爾夫人在祝詞中說，她希望「世誼」號把友好的情誼帶到天涯海角。

然後，她舉起了一柄銀色的小斧頭，砍斷了一條紅絲繩，一瓶香檳酒應聲而落，摔碎在船首上，金風飄香，一塊朱色絨幕啓開，露出黃色的中英文船名——「世誼」。

離開上海後，她又率領隨行人員飛赴廣州，出席了中國南海石油聯合服務總公司、廣東省郵電

管理局和英國倫敦大東電報局公共有限公司「關於向南海油田提供電信服務意向書」的簽字儀式。

在中國的大地上，戴卓爾夫人總是神采奕奕，容光煥發。

看到首相不似作僞的高興模樣，就連知道內情的戴卓爾夫人的隨行官員們心中也不禁疑惑起來：難道這真是一次友好而愉快的訪問嗎？

九月二十六日，戴卓爾夫人乘坐的專機降落在香港的啓德機場上。

香港是戴卓爾夫人此次遠東之行的第三站。她也是第一位訪問香港的英國現任首相。

爲了迎接首相來訪，港府成立了專門的接待委員會，還爲此撥出一大筆款項。香港的大富翁們自然不甘落後，凡是富豪排行榜上有名的人，紛紛慷慨解囊，用以組織非官方的接待行動。他們要讓現任英國首相親身體驗一下香港的繁榮和富裕。

然而，戴卓爾夫人一到香港，就鑽進了港督府。與此同時，香港政府的高級官員們全都應召進入總督府。戴卓爾夫人將在這裏向他們介紹中英會談的詳細情況。

這些官員們已經風聞中英會談不順利，因而都猜測首相一定會和他們商討採取甚麼對策，來報復中國政府。然而出乎他們的意料，戴卓爾夫人並沒有對北京方面耿耿於懷，反而叮囑他們注意發展與中國大陸的友好合作關係。

「通風會」結束後，戴卓爾夫人徑直登上港督府二樓。這裏有三間陳設豪華，佈置高雅的大套房，許多英國皇室成員、政府官員以及外國貴賓，訪港或路過此間，都曾以此處作居停，戴卓爾夫

人一行也被尤德安排住在這裏。

首相的私人秘書巴特勒通知衆人，夫人連日來奔波勞碌，十分疲倦，需要休息，恕不單獨接見。

戴卓爾夫人足不出户，看來是真的休息了。但港督府的管家卻心裏有數。在他的秘密引導下，香港的幾大英資財團，如滙豐、怡和、太古、渣打的主席或董事長，先後走進戴卓爾夫人的房間。這位管家不知道他們商談了些甚麼，但卻看到他們走出來後臉上表情都很嚴肅。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戴卓爾夫人在香港舉行記者招待會。

香港是一個信息發達的城市，其報刊密度在世界範圍內是少有的，光報紙就有一百七十多份，其中每天印行的有七十餘份，雜誌有六百多種。既然有這麼多報刊雜誌，那麼就得有數十倍於此的編輯和記者。他們形成了一支龐大的部隊，在香港可以說是無處不在。有人開玩笑說，在香港即使有人放個屁，也會被記者嗅到。

戴卓爾夫人要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消息一傳出去，各報刊雜誌的記者們立刻蜂湧而至。招待會還未開始，大廳裏已是人頭攢動，擠得水洩不通。

戴卓爾夫人準時露面了，她換了一身純黑色的套裙，表情嚴肅冷峻，與在北京時的愉快表情恰好形成鮮明的對照。這時的戴卓爾夫人倒是顯示出了「鐵娘子」的本色。

還没等記者提問，她已經開始講起來了：

「英國對香港居民有一種清楚明確的責任。香港政府重要的就是要盡到英國政府對香港居民的

道義責任。我這次訪問香港的目的，就是要尊重英國對香港人的承諾。」

開場白說完，很快轉入正題：

「中國對於香港的主權問題有他們自己的看法，英國則有三個條約，其中有兩份涉及到永久性的統治權，一份是租約，於一九九七年到期。你們必須把這些東西都考慮進去。如果真的這樣考慮問題，你們就會瞭解我們爲甚麼要進行商談。這些商談不僅要解決中英兩國之間的分歧，而且要討論香港的未來和希望。」

一位記者猛地站起來，有些不大禮貌地打斷了戴卓爾夫人的話頭：

「請問夫人，你一再說要重視香港人的意見，但是我們香港人怎麼能知道你所真正重視的不是那些銀行家、商人的意見呢？」

戴卓爾夫人似乎不願意在這類問題上糾纏下去，她故作輕鬆地一笑，反問道：

「在香港的行政、立法兩院裏，有那麼多商人嗎？」

戴卓爾夫人按照自己的思路說下去：

「我在北京的時候，就告訴過中國領導人，那三個條約是有效的，不應單方面推翻，而只能由雙方加以修改。雙方的分歧可以解決，同時也可以達成一項新的協議，它應該使中國人、英國人和香港人都感到滿意。一九九七年是不可忽視的，可以肯定，香港的投資者決不會忽視這個……」

大廳後邊突然出現了一陣騷動，戴卓爾夫人的話被打斷了。遠遠地，她看見兩個學生模樣的人正在向會場前邊衝來，可是很快就被維持秩序的警察攔住了。好事的記者們又都一窩蜂似地擁上

去，會場秩序大亂。

原來，那兩個人是香港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的代表，他們是來向英國首相遞交抗議書的。這份抗議書說：「《南京條約》、《北京條約》都是不平等條約，應予廢除。」「不能接受英國首相『修改』條約的建議，這樣就等同於承認這些條約，無疑令我們的民族尊嚴再次受損。」

與此同時，就在招待會外邊的廣場上，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的數百名學生，正在舉行遊行示威，橫幅標語上寫着「反對不平等條約」、「侵華條約不容肯定」等字樣，遊行隊伍裏還不時傳出整齊響亮的口號聲。

一位機靈的記者立刻抓住機會，向戴卓爾夫人提問道：

「您一再說英國政府和香港政府不會破壞這些條約，但看樣子港人卻不願意接受這些條約，您能就此談一些看法嗎？」

「當然可以。」戴卓爾夫人談話的興致似乎並沒有被遊行示威所破壞，她繼續接下去。「中國人可以不承認這些條約，但英國人要承認，因爲這些條約是有法律根據的，因而是有效的。如果任何國家想就這樣推翻條約的話，那麼情況就嚴重了。因爲，如果一個國家不遵守這個條約，就不會遵守另一個條約，所以我們雙方要進行磋商，因爲磋商會使情況好一些。如果有人不喜歡這些條約，解決的方法是由雙方進行討論，經雙方同意而生效，但不能毀約。想廢除條約，則任何新的條約也就沒有信心執行……」

戴卓爾夫人痛痛快快地講完了她要講的話，才心滿意足地結束了記者招待會。

戴卓爾夫人剛回到倫敦，北京方面就對她在記者招待會上那番放肆的講話做出了强烈的反應。九月三十日，外交部新聞發言人重申了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的決心。政治觀察家注意到，中國人已經把收回主權的説法改成了收回領土，這説明中國人的態度更加强硬。

十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評論員的文章，再次抨擊戴卓爾夫人在香港的講話，指出「中國人民絶對不能接受」三個條約繼續有效的説法，「香港是事關十億中國人民(包括香港的中國居民)的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大事，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才有權利説，對香港的中國居民負有一個主權國家的責任。」

早餐之前，戴卓爾夫人就把這些材料瀏覽了一遍。她沒有動怒。她現在承認了中國人的口舌之利舉世無雙，但英國人手裏卻操着可以致香港於死地的殺手鐧。

她在盼望着好消息。

十月二十七日，從香港傳來消息，港幣匯率指數跌至七十九點七，爲空前低點，香港外匯市場每一百美元兑港幣六百九十四元，創下戰後以來最高紀錄。

香港的中文報紙和倫敦的英文報紙紛紛在第一版上登出令人觸目驚心的黑色大字標題：

「中國尚未收回香港，已現衰退跡象。」

「一九九七年以後的香港還會繁榮嗎？」

「人心不穩的香港將變成地獄！」

「中共當局有可能改變對香港問題的原則立場。」

倫敦唐寧街十號首相官邸的主人開心地笑了。

第四章

決定香港命運的談判



1 議員們群起圍攻，戴卓爾夫人卻沒有像以前那樣奮起反擊。香港一家雜誌稱戴卓爾夫人曾寫信給趙紫陽，英國外交部卻堅決否認。

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

倫敦，這個以霧都聞名於世的英國都城，今日難得有個好天氣。暖和的微風從泰晤士河上吹來，略帶一點潮濕，給人帶來些許春天的氣息。

下午三時，戴卓爾夫人乘車來到國會下議院，這裏將就英國屬土問題舉行辯論。

戴卓爾夫人像往常一樣，坐在政府的席位上，離反對派的坐席只有三米之遙。

這是習慣性的强詞奪理爭辯會，有理的不見得能據理力爭，無理的卻可以破口大駡。甚麼英國紳士的風度，在這裏的紳士身上蕩然無存。

辯論開始了。

像往常一樣，戴卓爾夫人總是不動聲色地聽着。不管聽到多麼刺耳的話，也難以讓她出現異樣的表情。

然而，沒有任何人敢因爲她的沉默而忽視她的存在。下議院裏的議員們幾乎没有一個人没嘗到過她雷霆一擊的威力。她像一個躲在灌木叢中覓食的母豹，只要找準時機，就會一躍而起，目光逼人：「可敬的先生，至少應該知道您剛才說的甚麼吧……」

議員詹姆斯·邦納率先發難：

「首相訪華已經半年多了，可是迄今爲止，香港問題依然是没有出現亮色。而造成這一後果的原因，就是首相在北京發表了很多不負責任的言論，而且没有經過外交部門，對於首相這次訪華的巨大成果，我想引用我們英國《衛報》的一段評論：『戴卓爾夫人訪華之行只是起到了宣揚中英雙方存在的分歧的作用，提醒中國人在一九九七年之前很久就恢復對香港的主權，又提醒了中國人打算遠不是在名義上掌握香港的管治權。』」

四週響起一片不懷好意的嘻笑聲。

戴卓爾夫人面色平靜如水，好像甚麼也没有聽見似的。

議員喬治接着發言：

「首相一再告訴世界，香港是我們根據上個世紀的三個條約得到的。首相恰恰忘記了，這三個條約恰恰是我們大英帝國不光彩的歷史。順便説一句，一百年前，當我們把鴉片賣給中國人時，國内卻嚴禁吸食鴉片，違者處以極刑。今天，我們僅僅是因爲某種一貫性而讓它繼續保持下去，卻忘記了我們在那裏的責任已經完成，没有道義和權力繼續留在那裏。我們無法讓米字旗在那裏無止境地飄揚下去，當一九九七年來臨時，它將更換，對此我們無能爲力。作爲聰明的首相，應該考慮怎樣使我們英國光榮地撤退。像現在這樣頑固不化，只能使我們國家蒙受羞恥。」

四週響起一陣稀疏的掌聲，還有人在叫好。

戴卓爾夫人依然面色平靜如水。

第三個發言的是保守黨議員約翰・梅里，他向來是戴卓爾夫人的忠實支持者，沒想到今天卻一反常態，把矛頭指向了首相：

「我想提醒尊敬的首相注意，中國官員在各種場合多次表示過，一九九七年以後要維持香港現狀不變，繼續維持那裏的居民過着目前的生活方式並維持那裏的自由港及金融中心的地位。用鄧小平先生的話說，這就是一個中國，兩種制度。也就是說，中國雖然收回香港，但英國卻可以保持在那裏的既得利益。作爲具有政治家風度和遠見的英國首相，應該趁此機會爲國家爭取更多的利益，而不應該像現在這樣，一口咬住主權不放，致使中英談判陷於僵局。」

戴卓爾夫人訪華後，中英兩國外交官就開始爲香港問題的談判程序進行交涉。這個交涉一直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進行，幾乎連一點消息都沒有透露出去。記者們只探聽到這個交涉有時在倫敦舉行，有時在北京舉行，英方的負責人是駐華大使柯利達，中方的負責人則不清楚，只有鄧小平在接見記者時透露過一句：「存在着處理這一工作(香港問題)的機構。」至於交涉的具體內容，更是無從得知。路透社記者斯圖爾特在想盡一切辦法都得不到這方面的任何消息後，既惱火又悲哀地說：「說到中國人時諱莫如深，論及香港和英國人時更是諱莫如深。」

然而，交遊廣闊的梅里議員卻盡知這裏的內幕，英國方面堅持要把主權問題列入談判內容，中國方面則堅持主權不容談判，只談如何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雙方都不肯讓步，結果僵持、膠着至今。

「梅里先生，您不要忘記，」戴卓爾夫人終於開口了。「就在上個月，英國外交部還致函中國

外交部，重申願意再次進行談判，但希望不要帶有先決條件，有跡象表明，中國方面正在考慮接受這一建議。我相信，過不了多久，中英雙方還會再次坐到談判桌前。」

戴卓爾夫人一改往日咄咄逼人的作風，這多少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

她的話音剛落，一位名叫比利的議員就迫不及待地發言了：

「諸位先生們，我好像此時不是置身於英國的下議院，而是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剛才發言的那幾位先生，也好像不是英國的議員，而像中國的人大代表。」

比利目光一轉，話鋒也隨着一轉：

「剛才，梅里議員好像在代表中國人向我們信誓旦旦地保證，他們一定會尊重並維護香港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這話誰敢相信呢？共產黨人的目標不就是要埋葬我們的資本主義嗎？如果有人相信中國人做出的保證的話，我可要提醒他，中國人在這方面的紀錄是很差的。」

梅里並沒有被這種公開挑釁所激怒，他用不疾不緩的語調說：

「可能我們每個人都有不能履行諾言的記錄，但這往往不是出自本意，而是環境使然。中國人目前處在甚麼樣的環境中呢？這個民族歷來追求統一。而台灣一天不回到中國的懷抱，中國人心裏就一天不舒服。鄧小平作爲中國老一代領導人碩果僅存的代表，今年已經七十九歲了。他此生最大的願望可能就是促成中國的統一。然而他清楚地知道，統一的關鍵在於大陸能夠提出讓台灣能夠接受的條件，中國人提出在香港搞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更遠的着眼點在於讓台灣放心。中國領導人必須讓這一模式在香港獲得成功，然後才可能讓台灣人接受。」

「梅里議員，請注意，不要離題太遠。」議會主席及時地提醒說。

「對不起，主席先生，」梅里向議會主席點了一下頭。「讓我們回到正題上來，我認爲，就特徵和本質而言，香港都有別於英國的其他屬地。」

梅里的意見得到了很多人的附合。議員保羅・布賴恩激動地說：「假如把香港和英國的其他屬地等同對待，那無疑是對香港及英國統治的一種侮辱！」

「我有不同看法……」

反對意見的附合者也很多。參加爭論的人越來越多，爭論也越來越激烈，聲調也越來越高，最後連誰說了甚麼都聽不清楚了。

每次辯論會都是在這樣的不了了之的混亂中收場。

在辯論會快要結束時，戴卓爾夫人表示，她將在適當時機對議員們提出的問題做一個書面答覆。

辯論會結束後，議員們三三兩兩地來到議院餐廳。那些方才爭得口乾舌燥、面紅耳赤的議員們，在這裏可以要一些飲料，還可以鬆弛一下緊張的神經。但更多的人是想到這裏來聽一聽來自各方面的消息。

在靠近門口的一張餐桌旁坐着一位衣冠楚楚的長者，他就是保守黨議員、議會英中事務小組主席羅伯特・艾德利。坐在他對面的是英國《衛報》的記者埃丁先生。

侍者送上來兩套銀製的餐具，這裏的餐具全是特製的，造型別致，圖案精美，據說總價值高達五千萬美元。

艾德利突然發現，在他使用的餐具上貼着號碼牌，而這是以前所沒有的。他還發現，埃丁先生使用的餐具上也貼有不同的號碼牌。

艾德利喚來侍者。侍者委婉地向他解釋，這裏的餐具實在太精美了，因而被很多議員們請來的客人拿去當紀念品。爲了防範這種情況發生，餐廳經理才出此下策。

艾德利苦笑一聲，揮揮手讓侍者退下。

埃丁似乎並不在乎餐具上有號碼牌，他神秘兮兮地掏出一本雜誌，翻開一頁遞過來。

這是一本香港出版的《遠東經濟評論》，打開的那頁上有一段話立刻引起了艾德利的注意。

「據最可靠的消息，戴卓爾夫人於三月三日派特使送給趙紫陽總理一封密信，信中表示她對中國的主權立場已經有所瞭解，不反對中國以自己對香港擁有主權的立場進入談判，並表示她本人願將香港主權問題移交國會重新討論。戴卓爾夫人如此讓步，會有效地打破僵局，從而開始中英雙方關於香港問題的實質性談判。」

這能是真的嗎？一向以强硬著稱的「鐵娘子」怎麼會突然退卻呢？這可不符合她的性格。

艾德利沉吟半晌也沒有作聲。

一位中年紳士慢步踱過來，他的手裏端着一杯威士忌，他叫伯納德·布雷恩，是艾德利的好朋友。

布雷恩從艾德利手裏接過那本雜誌，漫不經心地掃了一眼，似乎還是漫不經心地說：「外交部馬上就要發表聲明，指出這則消息中關於香港主權問題的說法是錯誤的，它不反映英國的立場。」

艾德利知道布雷恩與新任外交大臣賀維爵士私交密切，與專門負責香港事務的國務大臣盧斯也交往頻繁，因而從他口中說出的關於外交方面的話可信度很高。

埃丁不失時機地追問道：「那麼首相究竟寫沒寫那封信呢？」

「外交部既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埃丁先生，你可以相信有其事，也可以相信無其事。」布雷恩故作高深地說。

「請談談你對此事的看法好嗎？」埃丁轉向艾德利問道。

「我認爲香港那份雜誌提供的消息十分可靠。」艾德利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說。

在下午的辯論會上，艾德利就覺察到首相有些反常，當時他還不知道原因何在，現在他才恍然大悟，原來那些議員們正在空談的東西已經被她變成了實際行動。

「你們說，如果中英雙方爲香港問題發生爭端，首相還會派出特混艦隊嗎？」沒等對方回答，艾德利就徑直說下去：「絕對不能！這並不僅僅是因爲中國比阿根廷強大，根本原因在於首相沒有那個必要，我們英國更沒有這個必要。首相目前正在忙於競選，爭取連任，她需要的是穩住已經得到的東西，而不是拿它們去冒險。我們英國主要是想從香港那裏得到經濟利益。這些都決定了我們不可能爲了香港與北京開戰，在談判桌上，香港的前途就掌握在北京的政治家手裏，否認這一點就

等於否認現實。戴卓爾夫人雖然强硬，但從來不否認現實。她以往犯的錯誤是只看到了中國政府不能公開承認香港的資本主義對它有用，卻錯誤地理解了對方立場中的細微差別。一旦她看到了大勢所趨，就會現實地促成談判。談要比不談得到的東西更多。很多事情還是可以談起來再說。」

布雷恩插嘴說：「中國人管這個叫緩兵之計，當年毛澤東和蔣介石和談時就是談談打打，打打談談。」

埃丁問：「艾德利先生，我可以把您剛才的那些話發表出去嗎？」

「只要你不把這裏的銀餐具拿走當紀念品就行。」艾德利沒有正面回答，卻說了一句俏皮話。三個人一起笑起來。

《衛報》發表了艾德利的談話後，據說戴卓爾夫人專門約見了艾德利，與他進行了一番長談，但這次談話的內容卻始終沒有透露出來。

2 鄧小平給中英會談設立最後期限，屆時不能達成協議，中國將單方面宣佈收回香港的方案。港督尤德失口洩漏天機。中國外交部拒絕曹廣榮的入境申請。

戴卓爾夫人可以對英國人保得住密，但她的密信卻是確確實實地送到了趙紫陽總理的手中。戴卓爾夫人在信中所表現出來的立場，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強硬了，而是體現出較大的靈活性。只要雙方能夠暫時擱置主權之爭，就可以打破目前的僵局，進入實質性會談。而這又是雙方都希望出現的結果。

四月份，趙紫陽總理覆信戴卓爾夫人，表示中國政府同意盡快舉行正式會談。

中英再開始會談的綠燈已經亮起。

爲了備戰中英第二階段的會談，中國方面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早在一九七九年麥理浩訪華提出續約要求時，中共中央的高層領導人就產生了警覺。鄧小平親自掛帥，會同胡耀邦、趙紫陽、廖承志等人，會見了幾十位香港各方面的人士，廣泛聽取意見，又組織有關部門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由廖承志主持起草了關於恢復行使香港主權問題的十二條基本方針，其主要內容是：

1. 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2.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權，國防、外交由中央管理；

3.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立法、司法和終審權，現行法律基本不變；

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員由行政長官提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門任職的外籍公務人員和警務人員可以留用，可聘請外籍人士擔任顧問或某些公職；

5.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依法保障居民的權利自由和私有財產；

6.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地區的地位；

7.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繼續開放外匯、黃金、證券、期貨等市場，資金進出自由，港幣自由兑換，繼續流通；

8.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財政獨立，中央不向香港徵稅；

9.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同英國和其他國家建立互利的經濟關係；

10.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各國、各地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

11.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負責維持治安；

12.中國將以「基本法」規定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及對這些方針政策的具體説明，五十年不變。

這十二條基本方針成爲中方對英第二階段談判的原則，也是制定香港回歸一系列政策的基礎。

在參加中英會談的人員名單上，肯定找不到鄧小平的名字，但他卻是中方的主帥，也可以説是

左右這次長談一年之久的歷史性會談的關鍵人物。

早在中英第二階段會談之前，鄧小平已經制定好了這次談判的基本策略，並且傳達給直接參加談判的人員。

鄧小平的策略主要有兩點：

一、談判開始後，先不談主權問題，而先談一九九七年以後如何管治香港的問題，九七年以後的管治解決了，主權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二、談判日期要設限，以一九八四年九月爲最後期限，不能任由英國人無限期地拖下去。要讓英方知道，屆時如仍未談成，中國將單方面宣佈收回香港的方案。

至於中國不得不單方面收回香港的具體限期，鄧小平並没有明言，但他卻指出了兩種可能性：一種是談判没有結果，但中國還是要忍耐到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强制收回；另一種是英國人不肯合作，又在香港搗亂，「折爛污」，或者香港發生意外的動亂或暴亂，那麼中國就得提前收回，不至於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關於鄧小平給談判設立最後時限的策略，當時有些中國人也未能理解到它的威力所在，但隨着談判的深入，英國人卻嘗到了這一招的厲害。他們發現自己好像成了戴着鐐銬的跳舞者，又像拴上籠頭的野馬，只能在人家規定好的空間裏自由活動。在談判桌前，他們總是感覺到自己好像是一場大戰的戰敗者，不管你怎樣花言巧語，最終還是得在勝利者事先擬好的文件上簽字認輸。

六月份，鄧小平在會見赴北京參加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的港澳政協委員會時，再次將談判設

限這一信息傳遞出去。中英會談如果在一九八四年九月尚未達成協議，中國屆時將公開宣佈自己的解決方案。

英國人感到時間緊迫，再也拖不下去了，需要立刻作出反應。

六月二十二日，英國女王在英國國會年會上發表談話，公開説「政府將會繼續就香港前途與中國進行會談，以期達到一項爲本議會、中國以及香港居民都能接納的解決辦法。」

七月一日，中英兩國政府同時發表新聞公報，宣佈香港前途問題的第二階段會談將於七月十二日在北京舉行。

中國方面的發言人稱：「在一九八二年九月兩國領導人會見以及後來進行的一系列有益的交換意見之後，雙方同意就香港的未來舉行第二階段的會談。」

英國方面的發言人稱：「在迄今爲止已經進行的重要而有益的交換意見之後，新的一輪會談將會更加具體。」

雙方商定，雙方會談内容絕對保密，就連會談地點也不向外界透露。

會談尚未開始，便被鎖在層層神秘的雲霧之中。

來自北京的各種消息不斷傳到倫敦，而這些消息又無一遺漏地擺上了戴卓爾夫人的辦公桌。

戴卓爾夫人總是選擇吃午餐之前的時候，對着辦公桌上那個插着野花的高頸花瓶，瀏覽那些來自北京的消息。

上午的大部份時間，她都用來處理和競選有關的事情。爲了阻止保守黨再次組閣，阻止她連任首相，她的那些敵手正在不遺餘力地大造輿論。英國工黨主席不惜危言聳聽：「如果戴卓爾夫人連任，英國將面臨全國性的大罷工。」英國裁軍協會主席肯特警告說：「如果戴卓爾夫人當選，全國將出現大規模的動亂。」

戴卓爾夫人則針鋒相對地對全體英國人民許諾：「在保守黨執政的第二任內，英國將享有穩定的經濟，强大的國防。」

她不想因爲香港問題失去選民對她和她的政府能力的信任。如今中英重開會談，對她來說是個好事，她可以趁機再次顯示自己的外交才能和維護英國利益的決心。但是近日來，她越發感到自己的對手過於强大，談判還未開始就擺出了志在必勝，胸有成竹的架式，而自己卻落入被動挨打的境地。

她要設法擺脱這個不利的處境。

她控制住自己紛亂的思緒，開始認真地研究起那些材料來。她的興趣很快被一份由駐華大使館匯總的材料吸引過去了。

執筆這份材料的人想必非常熟悉北京的情況，早在一九八二年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之前，他就探聽到在中共高級幹部中流傳着鄧小平治港的十六字方針「收回主權，港人治港，制度不變，保持繁榮。」

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在接見以黃鑒爲首的香港

廠商聯合會參觀訪問團時，也把中國政府對香港未來的政策概括成以上十六個字，這就從側面證實了以前的傳言。

黃鑒回到香港後，向新聞界透露了廖承志的談話，立刻成爲社會各個階層的熱門話題。有不少香港人擔心，中國恢復行使香港的主權之後，會事事出主意，處處發指示，把香港控制在中南海的掌心之中。

有人形象地把鄧小平的治港方針比作「如來神掌」。

如來神掌就是如來佛的手掌。在中國的著名古典小說《西遊記》中，有一個神通廣大的孫悟空，一個跟頭能翻出十萬八千里，但儘管如此，仍然翻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這種說法傳到鄧小平的耳朵裏後，他微微一笑：

「我們可不是甚麼如來神掌，港人治港嘛，要讓香港的中國同胞自己管理自己。」

「好厲害的中國人，一下子就把香港的民心抓過去了。」戴卓爾夫人自言自道。她的目光移到「港人治港」那幾個字上便不動了。過了許久，她突覺眼前一亮，隨手抓過筆來寫了一個便條：

「通知尤德，提前返英。」

六月三十日，港督尤德返回倫敦，隨同他回來的還有九名港府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

尤德此時返英在情理之中，英國政府要與中國重新談判解決香港問題，自然要聽一聽他這位現任港督的意見。但那幾名香港議員所爲何來呢？

尤德一行飛抵倫敦後，稍事休息就受到了外交大臣賀維和負責香港事務的國務大臣盧斯的接見。

這不是一次禮節性的會見。因爲他們緊接着就預定了共進午餐的時間。吃飯不過是幌子，實質是會談。

七月四日，戴卓爾夫人在唐寧街十號會見了尤德及香港議員代表，賀維和盧斯在座。這次會見足足用了一個半小時的時間。當然不是爲了彼此見面，還是會談。

當晚，首相府發表聲明：

「首相和外交大臣重申他們對香港承擔的義務和他們設法達成協議的目的。這些協議應該是議會、中國和香港人民都能接受的。……他們强調了堅持行政局意見的重要性，在會談中將繼續徵求行政局的意見。」

與此同時，首相向國會遞交了一份書面答覆：「在中英談判的每個階段都要繼續充分考慮香港人民的意見。」

香港人樂了。大陸的同胞説要讓港人治港，英國人又説要讓香港人説話算數，香港真是人見人愛呀！

可是，稍有一點政治頭腦的香港人卻在心頭升起了疑雲：自從英國人佔領香港以來，就一直以此地特殊爲由，不許這裏搞民主政治。這次英國人怎麼會大發善心呢？誰敢説這裏沒有不可洩漏的天機？

天機不可洩漏，但終有洩漏的時候。

七月七日，尤德自倫敦返港舉行記者招待會。這時記者們已經獲悉英國談判代表團的名單中有尤德，而且排名第二，便問他中英第二階段的會談與第一階段有何不同，尤德詼諧地回答：「不同之處是有我參加。」

又有記者問英國是否準備放棄香港的主權，尤德重複英國外交部的聲明，說那純屬猜測。記者們還一再追問尤德：「你是代表英國參加談判，還是代表誰？」尤德支吾再三，終於說出這樣一句話：「我是以港督身份代表香港市民參加談判，我不代表他們又能代表誰呢？」

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香港的左翼報紙首先對尤德進行口誅筆伐：「你尤德是英國人，怎麼能代表香港人呢？」「你是香港總督不假，可是你這個官兒卻是英國人封的。」「中英兩個國家談判，把香港人弄進去幹甚麼？香港人是哪個國家的。」

在對尤德的討伐聲中，固然有不少冷嘲熱諷，但也不乏冷靜深刻的分析：「英國人現在玩的花樣可以稱之爲『三腳櫈』，也就是在中英雙方會談中擠進一個代表香港的席位，這樣在談判中就可以以香港民意爲藉口，來進行討價還價，香港回歸祖國，北京自會尊重並徵求香港同胞的意見，那是中國政府應做之事，無需英國代勞。」

「有跡象表明，英國人正在玩弄一個陰謀。如果中國政府落入圈套，那麼就會面對着與自己的

同胞——香港人作戰的尷尬處境。如果香港人落入圈套，就會爲英國人盡義務，把辛辛苦苦從大陸爭來的好處全都讓給躲在後邊的英國人。」

對於尤德的說法，北京方面也及時地作出了强烈反應。七月八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我們注意到了這個消息。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會談是中英兩國政府之間的雙邊會談。尤德先生是作爲英國政府代表團的一個成員參加會談的，因此他在會談中只代表英國政府。」

港英政府一見情況不妙，急忙發表聲明，承認尤德「當然將作爲英國代表團的成員參加會談。」

至此這件事還沒有完。

尤德赴京之前，港英政府現職新聞處長曹廣榮向中國有關方面遞交了入境申請，理由是以港督私人新聞主任的身份隨同尤德赴京參加會談。

七月九日，中國外交部拒絕了曹廣榮的入境申請，理由是曹廣榮係港英政府的文職人員，不在英國政府代表團名單之列，因而沒有資格參加涉及中英兩國事務的會談。

面對中國方面義正辭嚴的强烈反對，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只好宣稱，英國政府不堅持曹廣榮赴北京參加會談。

正式會談尚未開始，中英雙方已經鬥了兩個回合，現在看來只能說打個平手。看來，更激烈的爭鬥還在後邊。

3 中英兩國都派出了精兵强將參加談判。六名中國官員人人能講英語，五名英國官員都會講流利的普通話。談判桌下的較量更加緊張激烈。戴卓爾夫人告訴美國記者，香港本來應該像新加坡一樣獨立。

北京。

七月流火。

七月十二日，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第二階段第一輪會談如期舉行。會談地點設在北京市中心一座不大引人注意的賓館——台基廠頭條三號外交部賓館。當然，這是絕對對外保密的。

早在七月五日，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就對外公佈了中方談判代表團成員名單：

姚　廣，外交部副部長；

李菊生，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長；

邵天任，外交部法律顧問；

魯　平，外交部西歐司顧問；

柯在鑠，外交部西歐司參贊；

羅家歡，外交部西歐司參贊。

這是一支非常出色的談判班子，六名中國官員都會講英語。

中方派出的談判人馬又是在人數和級別上與英方相對應。

英方派出的談判代表團成員分別來自駐華使館和香港：

柯利達，英國駐華大使；

尤德，英國駐香港總督；

麥若彬，港英政府政治顧問；

歐威廉，英國駐華大使館一等秘書；

畢瑞博，英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

史棠穆，英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

這同樣是一支非常出色的談判班子，五位英國官員能夠操中國標準的普通話進行交流。

更爲難得的是，這十二個人當中有兩人熟諳香港流行的廣東方言。

會談於上午九時開始，姚廣作爲主人，來到會談大廳門口迎接以柯利達爲首的英國客人。

這兩隊國籍不同但卻肩負着共同歷史使命的人們走到一起來了。從此，他們將共同完成雙方商定的必須保密的工作。

七月十三日，會談結束。中方談判代表團團長姚廣告訴中外記者：「雙方進行了有益的和建設性的會談。」與此同時，英方官員也以同樣的措辭回答了中外記者。

他們都是老練的外交家，休想從他們的臉上看出甚麼異樣來。

人們對這次會談做出了樂觀的猜測。

親英的香港報紙說，中國政府答應暫時不提香港主權，並向英國政府作出保證，將對中國的憲法作出某種修改，以使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之後仍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享有與大陸各省不同的地位。

左翼的香港報紙說，英國政府不再堅持對香港地區的主權，原則上同意在一九九七年將香港主權歸還給中國。

七月二十四日，在中英第二階段第二輪會談開始之前，柯利達大使滿面春風地對記者們說：「我十分渴望即將開始的實在繁忙和有益的兩天。」

聽其言，觀其色，人們還是傾向於對中英會談作出樂觀的猜測。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第二輪會談開始，姚廣仍然到會談大廳門口迎接英國談判代表團。

又是談了兩天，會談結束。齊懷遠在新聞發佈會上告訴中外記者：「雙方進行了兩天有益的會談。」

有記者問：「下一輪會談中方的談判代表團成員有無變化？」

齊懷遠回答：「根據我的瞭解，這方面沒有變化。」

又有記者問：「會談地點有無變化？」

齊懷遠回答：「九月份的會談地點尚未確定。」

還有的記者問：「第三輪會談定在八月初，而第四輪會談卻定在九月下旬，爲甚麼間隔這麼長時間？」

齊懷遠答：「在這段時間裏，姚廣副外長將出訪北歐，而柯利達大使將休假。」標準的記者招待會，毫無破綻的問答，給人的感覺是一切都在按原計劃正常進行。

八月二日，還是上午九時，第三輪會談開始。姚廣還是來到會談大廳門口迎接柯利達等人。這次會談開始前，允許記者進入大廳拍照。這件事情雖小，卻似乎可以從側面說明中英會談進展良好。

然而，當以兩天一輪的固定頻率進行的第三輪會談結束後，一直密切關注中英會談的香港輿論界就發現情況有些不對頭：前兩次的新聞公報中都有「有益的和建設性的」這樣的詞句，而這次卻不見那表示談判氣氛良好的字眼。

難道說中英會談突然起了波折？

局外人最容易被表面現象所迷惑。其實，從第一輪會談開始，中英雙方就發現彼此政府的原有立場並沒有改變，他們除了重申過去說過的話之外，無法進入具體內容的協商。

英國人仍然認爲香港的主權在英國手裏，十九世紀簽訂的那三個條約至今仍然有效。

中國方面想繞過主權之爭，先談香港回歸後的管治問題。這其實是釜底抽薪之計，但英國人不肯輕易就範，他們堅持要先解決主權問題。

第一輪會談還未結束，雙方已經發現他們再度陷入了僵局。

從第二輪會談開始，英國人的策略有所變化，一上來就作了讓步，同意擱置主權之爭。但緊接着又提出一個新建議：香港的主權可以歸中國，但要由英國繼續管治，理由是把治權轉到港人手中

實現本地化，需要過渡，現在距離一九九七年只剩下十四年，時間長度不夠，至少需要三十至四十年的過渡，香港才能保持穩定。在整個過渡期間，香港都要由英國來管治。

英國人使的是退半步，進一步的花招。退半步是同意中國在名義上獲得香港主權，進一步是長久保持對香港實際上的控制權。

英國人終於把謀劃已久的「以主權換治權」的策略推上了談判桌。

中國人也有策略，那就是以不變應萬變：任你花樣百出，我就是要限期收回香港。

弱者對於强者可以不變，那是無奈；强者對於弱者更可以不變，那是不爲。

誰見過礁石躲避過海浪？

誰見過大山躲避過狂風？

話不投機半句多。中英雙方談不下去了。

八月四日，尤德參加完第三輪會談後直接返港。

回到香港後，他没有休息，立即召集行政局會議，通報中英會談的經過。

按照常理，作爲港督他應該爲目前的狀況感到憂心忡忡，可他卻没有顯出一絲一毫焦慮的模樣，反而得意洋洋地大講英國人怎樣在會談中佔下風。

尤德用手拂了一下頭頂事實上並不存在的頭髮，用幸災樂禍的語氣說：

「看來我們是鬥不過中國人了，對於香港只有撒手不管了。我非常贊成鄧小平的主張，港人治

港嘛。香港向何處去，香港的未來怎樣發展，全靠香港人自己去爭取。」

通報會結束後，尤德又立即找來港府新聞處長曹廣榮。

「香港的記者真厲害，中英談判那麼保密，他們竟然也能探出消息來。」尤德讚嘆道。

曹廣榮不知道尤德此話從何說起，因而沒有接話。

尤德又接着說下去：「香港人心裏想甚麼，你比我清楚，只是過去總是在背後議論得多一些，你這個新聞主任，應該幫他們找個公開發表的地方。」

曹廣榮心領神會，唯唯告退。

尤德暗中發笑，他爲自己的精心設計而得意地發笑。

尤德臉上的笑容保持了很長時間，因爲香港的輿論要比他想像的還要熱鬧，社會上出現了各種各樣代表英方立場的言論和方案。

有人熱心地向北京方面建議：中國收回香港後，可以借鑒國外經濟公司的作法，由中國方面當香港的「董事長」，聘請英國人當「總經理」，繼續管理香港。他們認爲英國在這方面有經驗，駕輕就熟，香港的人心可以穩定，投資可以放心。

還有一些人把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話當作一面揮舞的旗幟。據說李光耀訪問香港時，曾在匯豐大廈頂樓宴會廳裏說過這樣的話：「香港應該是西方世界和中國社會主義之間的絕緣體，起這個作用。」

宣揚這個觀點的人其實就是在鼓吹香港獨立，他們甚至乾脆公開提出，希望在聯合國或英國的

監督之下進行公民投票，看看香港居民是否贊成獨立。

有一些學者則建議用波多黎各方式來解決香港問題，認爲波多黎各是美國管轄下的一種「半獨立」的或「準獨立」的自治模式，香港應該借鑒。他們的這個建議其實是希望香港成爲變相的「獨立」實體。

還有一些人提出了妥協方案：將香港劃分爲若干個實驗特別行政區，分階段回歸中國。言下之意是，如果在分階段分區實驗過程中出現麻煩，就可以停止回歸。

尤德躲在港督府裝有空調的房間裏，搖頭晃腦地設想着：如果他把這些「香港同胞」的建議都拿到談判桌上，中國官員臉上會出現甚麼樣的表情呢？

第三輪會談結束後，柯利達大使飛回英國休假。臨行前他告訴記者，此時離開主要是爲了躲避北京夏季的酷熱。

柯利達回到倫敦後，並沒有認真休假，而是成天忙着會見保守黨的主要議員。對於每一位客人，他都提出同樣的建議：「去香港看看，聽聽香港人的意見。」

於是，那些希望對敏感的香港問題提出獨特見解的議員們，一窩蜂似地湧到香港，又一窩蜂似地湧回倫敦，急不可待地大發高見。一夜之間，倫敦好像冒出了無數個香港問題專家。

他們能從香港人的嘴裏聽到甚麼呢？

香港市政局民選議員葉錫恩寫信告訴那些不瞭解真相的英國議員：「顯而易見，他們所吸收的

是一些高貴而富有的中國人的意見，這些高貴的人自然希望香港繼續在英國的管治下，以期保留他們家族的特權……」

然而，那些同樣高貴而富有的英國議員們都自以爲摸到了香港問題的脈搏。

英國保守黨外交委員會秘書賈・伊尼漢先生自信地告訴香港《虎報》的記者：「我發現英國在香港所起的作用是經濟穩定的關鍵。爲了保持香港的經濟穩定，英國不能放棄對香港的管理權。」英國《金融時報》援引訪港議員的意見：「確保香港繼續繁榮和穩定的最好辦法就是繼續實行有英國參加的管理體制。」

英國國會議員比利提出了一個解決香港問題的變通辦法：中國收回主權，英國繼續管治，雙方另立新租約，使香港成爲半自治半獨立的政制形式，屆時香港便屬於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共通混合體，從而保證香港繼續保持安定、繁榮與發展。

港英律政司的祁理士也不甘落後，著文聲稱：「英國管治香港是維繫信心的基石，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

英國人越說越得意，好像香港問題已經解決了，用不着和中國人談判了。

在這一片英國人的「大合唱」聲中，還缺少一個「歌聲」出衆的「領唱」。九月二十三日，這位「領唱」冉冉來遲，她就是一向不甘寂寞的戴卓爾夫人。

她在倫敦接受美國記者的訪問，卻大談起香港問題來：

「英國在香港問題上無論如何也不能被稱爲殖民主義。英國的前殖民地如新加坡等早已獨立若

干年了，如果不是因爲香港的地位特殊和有個新界的租約，如果香港是英國的一個一般的殖民地，那麼它在若干年前就已經獨立了。」

「香港由於前途不明正面臨重大的金融和政治動蕩，英方談判是爲了香港人的利益，英國未從香港拿走一個便士。」

「很明顯，由於一九九七年以後的國際貸款正在被取消或將要被取消，香港的前途存在着經濟上和政治上最不穩定的情況。」

當時，中英第四輪會談尚未結束，「鐵娘子」說出這番話，用意究竟何在呢？

在英國人不斷强化的攻勢面前，從中國人的陣地上卻幾乎聽不到「槍聲」。這當然不是中國人不想反擊，而是各有各的打法。

槍法差的人喜歡打亂槍，神槍手卻總是期待着雷霆一擊正中紅心。

中國方面由新華社記者出面，請出了一位「神槍手」——中國民主同盟主席、著名的女法律學家史良。

耄耋之年的史良女士仍然保持着良好的記憶力，她隨口就背出了《奥本海國際法》中的一段話：

「根據公認的國際法準則，主權是最高權威，是一個對世界上任何其他權威獨立的權威，無論是在國土之内或是國土之外，它都是獨立的。」

史良女士進一步解釋說：「主權是指一個國家固有的處理自己國内事務和國際事務並不受他國

干預或限制的最高權力，而治權則是政府對國家事務治理的權力，包括立法、行政權等。主權是建立在治權的基礎之上的，而治權則是一個國家主權的體現，如果沒有治權，主權它不是成了一句空話嗎？」

史良女士告訴記者：「主權治權不可分割。英國政府在名義上讓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卻企圖繼續維持對香港的統治，這只能是對我國主權的侵犯。」

史良女士從法律學家的角度告訴記者：「主權和治權分開，這在法律上和法理上都是說不通的。」

史良的談話發表後，那些鼓吹以主權換治權的人頓覺理屈詞窮。

巧婦難爲無米之炊。「神槍手」也需要彈藥。國家統計局及時地送來了大批「彈藥」。

你不是說香港的穩定和繁榮全靠英國人嗎？請看下列事實和數字：

一九七三年，世界發生能源危機，香港的傳統石油供應減少了百分之十，引起一片恐慌。港英政府十萬火急地向中國政府求援。十一月二十日，由內地運去五千噸輕柴油，十二月底，又運去上萬噸輕柴油。一九七四年，內地供應香港的各類石油產品達三十萬噸。

當時，石油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炙手可熱，中國內地的石油產品也十分緊缺，但還是首先支援香港。

再看香港的淡水供應。一九六一年，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人興建了深圳第一期供水工程；一九六八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國內經濟十分困難，但還是興建了第二期供水工程；如今

又興建了第三期供水工程，全年可以保證香港十個月的供水，總量達三點五億萬噸，使香港人不再爲缺水而發愁。

再看一看香港的市場供應：一九八二年，內地向香港實銷活豬二百四十七萬頭，佔香港市場的百分之九十七點二四；活魚三萬噸，佔香港市場的百分之八十五點一；鮮蛋佔香港市場的百分之八十二；大米佔百分之五；就連香港人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衛生紙，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二也是由內地人供應的。

香港不是一向靠做買賣發財嗎？那麼請看一九八二年，世界性的經濟不景氣，香港出口貨物進入低潮，但對內地的出口額卻從二十九點二四億港元上升到三十六點零六億港元，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中國內地一躍成爲香港的第四大買家。而英國當年購買港貨的總額卻減少了五點二三億港元。事實勝於雄辯。中國內地的大力支援是香港繁榮和穩定的重要因素。就連那些一向親英的香港人，對此也不得不加以承認。

中英在談判桌下的較量持續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從表面看，還是難分勝負。

4

港幣大幅度貶值，香港出現搶購風潮，港英政府卻袖手旁觀。中國經濟學家在香港指出，英國政府改打「經濟牌」，無非是想增加談判桌上英方的籌碼。

九月下旬的北京，秋老虎正在肆虐。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中英兩國談判代表團的成員第四次坐到一起。

這輪會談尚未開始，就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從香港到北京，處處彌漫着凝重的氣氛。很多人都產生了不祥的預感，這輪會談存在着隱憂，前途很不樂觀。

中方再次對會談實施嚴格保密，取消了會談前記者到現場拍照的機會。

九月二十三日，第四輪會談還未結束，中國新任外長吳學謙就在紐約機場告訴記者，香港會談是否有進展，關鍵在於英國是否改變它的態度。

吳學謙外長此刻發表這樣的談話，其隱含之意不難品出：英國沒有改變它的態度，所以會談沒有進展。

果然，第四輪會談結束後，中英兩國發表的新聞公報中還是沒有「有益的」、「建設性的」字眼，只是定下了下一輪會談的日期。

不久，內幕消息就傳了出來。一上談判桌，柯利達就把「以主權換治權」的方案提了出來，堅

持一九九七年以後繼續管理香港，而且表示這是英國政府作出的最大讓步，在此界限上絕不後退。

姚廣副外長代表中國政府嚴正拒絕了英方的要求，再次重申香港的主權和治權都要收回，在這一點上不能談判。

談判陷入僵局，雙方不歡而散。

中英第三輪會談結束後，香港社會就出現了惶恐心理，由此而帶來了經濟形勢的動蕩，股市、地產不振，港幣幣值節節下降。九月十六日，港幣兑美元匯價更是一路狂跌，破八算。

香港輿論界頓時嘩然，很多平時態度中立的報刊，此時也跟在親英人士後邊，批評北京不該採取强硬立場，以致出現如此嚴重的後果。

更耐人尋味的是，各個國家在其幣值失控時，其政府通常的做法都是極力進行干預，盡快達到穩定。以往當港幣出現危機時，港英政府也是積極採取干預措施，曾讓港元退出英鎊集團，同美元掛鈎，也曾採取過浮動匯率等辦法來穩住港元幣值。比如，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港幣因爲跟隨英鎊浮動匯率，一下子損失了八點九億港元。七月六日，港英政府立即宣佈，停止港元隨英鎊浮動，同美元掛鈎，其比率爲一美元兑換五點六五港元。這一次港英政府卻一反常態，不急不躁，放手不管，任港元下跌，好像損失得越多越好似的。

一九八一年，由太古洋行主席的位置上退休下來改任港府財政司的彭勵治(舊譯爲畢烈治)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説：

「港幣貶值的主因是政治前景，香港在自由市場環境下，沒有政府可以控制幣值的趨勢。」

「中國在香港談判中的言論及作法直接影響了港幣的表現，除非中方在談判中有明確的表示，否則港幣的弱勢將會持續下去。」

當時，中國內地的著名學者許滌新、宦鄉、錢俊瑞、于光遠等正在香港訪問，他們從港府財政司的暗示中發現，這場港元暴跌風波大有來頭，肯定是有人在打「經濟牌」，企圖以此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增加英國在談判桌上的籌碼。

他們的分析判斷很快傳到北京，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當即指示，英國從打「民意牌」發展到打「經濟牌」，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新動向，應該及時加以揭露。

第二天，經濟學家許滌新出席香港中華總商會舉行的招待會，有記者問他，對於港幣下跌有何看法，許老直截了當地指出，誰發鈔票誰負責。他說：

「香港當局應對港元匯價下跌負責，這道理很明顯。政府發鈔票，用會計學上的名詞說，那是負債。發行鈔票如同向人民開出借條一樣。因此政府發行鈔票，必須對人民負責，至少要保值，保持香港的購買力。」

經濟學家錢俊瑞向香港記者分析貶值的真正原因，他指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港英政府長期以來實行的高地價政策造成了經濟的畸型發展，再加上長期貿易逆差，通貨膨脹，新出現的財政赤字，都是導致這次港元暴跌的導火線。可以這樣說，港元下跌是正常的，而反常的是港英當局所謂的「不干預」態度。

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外交學家宦鄉也指出，港英政府其實不想把現時香港不穩定的經濟盡快穩

定下來，它自稱對港元採取不干預政策，實際上是含有政治目的，企圖把罪責轉嫁給中國。

香港的輿論也並非一邊倒。《大公報》就及時地提醒人們注意：英國政府打「民意牌」人們最近看得多了，現在又打「經濟牌」，這是偶然的嗎？

《信報》在九月十八日發表了題爲《損人不利己的險招》的文章，指出有人以爲，不妨可以亂一下，或許可以加强英方的討價還價的能力，這實在是太愚蠢了。「港英如爲爭取談判桌上的優勢，再亂一亂，再一次犧牲港人的利益，最後連恐共的人都會反感的。」

然而，以上這些冷靜而客觀的分析並沒有被很多人所接受，港英政府更是希望壓在人們心頭上的陰雲越濃越好。

中英第四輪會談結束後，本來就已經十分險峻的香港經濟形勢變得一發不可收拾。香港金融外匯市場立即發生了瘋狂拋售港幣、擠兑美元的狂潮，許多散户蜂湧到銀行購買美元。

一位香港記者對爭兑美元的情況這樣描寫道：「銀行出現兩條人龍，一條是兑換美元或提取美元的，另一條是把美元放進保險箱裏的。」

九月二十四日，中英第四輪會談結束後還不到二十四個小時，港元匯價就已破九算，從一美元兑八點一二港元急劇下降至九點七港元，大有破十之勢，黃金每司兩狂升至四千七百零五港元。人民幣半日內調價三次，賣價達每百港元二十二點一二元。

在超級市場裏，也颳起了一股强勁的搶購風。蜂湧而來的搶購大軍頃刻間就把貨架掃蕩一空，好像他們手裏握的不是錢而是紙一樣。

人們把搶購的重點放在食品上，大米、花生油一再脱銷。一些商販見有機可乘，立刻把食品價格一再提高，原來十八元一包的大米竟然賣到了二十三元。

參加搶購的人並非都是没有頭腦，容易聽信他人宣傳的傻瓜，一位大學講師這樣説，他明知搶購食品是毫無必要的，但也不得不去搶購幾罐奶粉，因爲家裏的嬰兒是不能没有奶粉的。

這就是所謂的「九月風暴」。九月八日，颱風「艾倫」襲擊香港幾天幾夜，整個港島風雨交加，銅鑼灣避風塘裏擠滿了上千條大小船隻。如今颳起了一場經濟颱風，人們又能到哪裏找到屬於自己的避風港呢？

香港報刊對那幾天的描述是：整個市場「癲」了。二十三日是「黑色星期五」，二十四日是「黑色星期六」。

當初英國人把香港經濟形勢惡化歸罪於北京政府時，有不少香港人跟着推波助瀾，如今香港人深受經濟颱風之害，輿論真的變成一邊倒了，一致批評港英政府，可是該對此事負責的財政司彭勵治在哪裏呢？此刻他正在國外遊哉悠哉地休養呢！

港英政府不是説自由市場貨幣不容政府控制嗎，如今也得硬起頭皮來進行干預了。

九月二十四日，港督尤德匆忙從北京返回香港，立即召集行政局會議討論港元匯率問題。二十五日晚，他又發表聲明，勸告市民不要輕信謠言，强調港元兑換相當不合理，不能反映香港經濟和政治的實況。

十月十五日，港英政府出台穩定港元的措施：固定匯率，一美元兑港幣七點八元，取消百分之

十的港元存款利息稅。

這些干預措施很快就見了成效。十月十七日，美匯下跌爲八點零三元，金價下降爲每司兩三千八百三十五元。

港幣就此穩定，直至現在。

一場震撼港島的經濟颱風颳過去了，但留給人們的教訓卻是非常深刻的。

首先，英國人開始反省了。倫敦大學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施拉姆教授指出：「英國政府幹了一件大蠢事，它想把戴卓爾夫人的恐嚇——香港災難性的未來——變成一次綵排。可是看了這幕並不驚心動魄的獨角戲後，北京政府卻無動於衷。結果，我們用一場真的災難換來了一個真知：不管發生了甚麼事，中國人非要收回香港不可。」

施拉姆教授還提醒英國政府注意這樣一件事：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主席劉少奇的內弟王光英從廣州乘火車抵達香港，籌建中國內地第一家總部設在香港的大型私人公司——光大實業公司。王光英任這家公司的董事長，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成爲該公司的一名高級顧問。據王光英介紹，這家公司將利用香港現代化的通訊設施和各種便利條件，向中國引進各種先進技術和工業設備。

有了一個光大，就會有第二個、第三個光大。當一大批光大在香港站穩腳跟並發展壯大起來後，香港的市場就不能受英國人隨意操縱了。

也許所有的英國人都不如一位美國人聰明。他的名字叫馬丁，是一位美國銀行家，香港美國商

會的會長。當有些公司準備從香港撤走資本時，他卻動員美國的多家公司到香港投資。到一九八二年初，美國人在香港的投資已達五十億美元。

在一次聚餐會上，有人曾問馬丁先生爲甚麼敢於如此冒風險，他笑着反問道：「你爲甚麼認爲我是在冒險呢？真正的商人是從來不冒險的。」

馬丁先生即席談了他的看法：香港成功的原因之一，在於對貨幣流通不加限制，私人和公司都可以儲蓄外匯，而這在許多國家都是被嚴格禁止的。香港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實行低稅率，對個人徵收所得稅最高爲百分之十五，對公司徵收的所得稅最高爲百分之十六點五。另外，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控制保持在最低程度，這也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如果這些條件保持不變，香港沒有理由不能繼續成爲經商和開辦企業的最好地方。

那麼，中國收回香港後，能不能改變這些條件呢？馬丁先生以一個銀行家的經驗指出，中國人通過香港獲得大約百分之十的外匯收入，因此不能對香港的經濟和金融結構作出變動。

馬丁先生這次談話很快被整理成文字材料，送到了港督尤德的辦公桌上，尤德又很快將它轉呈給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

戴卓爾夫人讀完這份材料，不由得憤憤不平起來：「難道這真是當事者迷，旁觀者清嗎？我們英國人苦苦地與中國人在政治上相爭，卻把經濟上的好處讓給別人，難道英國人是傻瓜嗎？我們在政治上堅持的那些東西到底有多大實際價值呢？」

戴卓爾夫人拿起筆來，決定給中國領導人寫一封親筆信。

5

希思先生絕對想不到，戴卓爾夫人會做出重大讓步。戴卓爾夫人派特使送來密信，中英第五輪會談如期舉行。英國人的新策略只有四個字：「保持聯繫」。

一九八二年九月初，英國前首相希思先生又來到了北京，這次他既不負秘密使命，又不帶英國首相的旨意，但鄧小平還是親切地會見了這位老朋友。

希思先生已經知道中英談判不太順利，但他希望兩國政府能夠找到滿意的解決方法。他還自告奮勇地對鄧小平表示，回國後他要親自去找戴卓爾夫人，勸她改變目前的立場。

鄧小平當然不能打擊這位熱心人的熱情，便順勢請他轉告戴卓爾夫人，用主權換治權的作法是行不通的，英國政府最好及早改變態度，以免出現中國不得不單方面公佈解決香港問題方針政策的局面。

九月十日，希思先生途經香港回國，港英政府爲他舉行招待會，在招待會上，希思剛開口講了幾句話，在座的幾位非官守議員就對他大加嘲諷，説他是中國的代言人，還有人用他聽不懂的廣東話謾罵他。希思先生一氣之下，没等招待會開到一半就退席了。

希思回國後，把鄧小平的口信轉達給了戴卓爾夫人，但是卻没有得到任何反應。

希思先生本想找個機會約見戴卓爾夫人，履行自己對鄧小平許下的諾言，但他很快就發現自己

是多此一舉，因爲有人已經把她的答覆公開說了出來。

九月二十八日，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國務大臣盧斯在香港舉行記者招待會，當記者問到鄧小平對中英會談設立時間限度時，他說：「我已注意到中國政府想給會談設定一個最後期限，那是無益的，而且效果可能適得其反。」盧斯還告訴記者：「中國政府方面公開評論英國的立場，對於找到一項解決辦法這一共同目標沒有幫助，這種做法既無益又可悲。」「會談如果失敗而又找不到解決辦法，就會出現騷動，就會受到衝擊。」

希思先生徹底失望了，看來戴卓爾夫人已經下了決心，決不向中國人退讓，即使中英談判破裂也在所不惜。希思清楚戴卓爾夫人的爲人和性格，她不會因爲別人的勸說而改變自己的主意，也不會因爲自己的主意受挫而不堅持到底。

但這一次希思先生卻估計錯了。

很多人形容戴卓爾夫人有着鋼鐵般的意志，其實這話並不完全正確。她更像鋼，而不像鐵，這不僅是因爲她像鋼一樣比鐵更堅硬，而是因爲她像鋼一樣比鐵更有彈性。

作爲決定一國命運的首腦，她就像一艘大船的船長。面對急流險灘，敢不敢衝上去，這需要船長的勇氣和魄力。但明知是礁石，卻仍然往上衝，這卻是愚人之舉。她已經看到了礁石，但她不是愚人，她決定繞過去。

十月七日，戴卓爾夫人在唐寧街十號接見了尤德率領的由香港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組成的代表

團。會談進行了兩個半小時，會談結束後，尤德向記者表示，港英對香港問題見解一致，有望找出擺脫目前困境的辦法，其興奮心情溢於言表。但當記者加以追問時，尤德卻三緘其口。同時，首相辦公室和外交部也以相互默契的「無可奉告」打發掉了那些記者。

這些前來打探消息的記者們即使不走，也絕對探聽不到這樣的消息：第二天，戴卓爾夫人在首相官邸秘密約見了尤德和負責香港事務的外交國務大臣盧斯，並讓他帶齊所有有關中英會談的材料。

隔着一張寬大的辦公桌，盧斯把一疊整理好的材料遞給戴卓爾夫人，用幽默的口吻說：

「中國人似乎對首相並不友好呀！」

「中國人對你這位盧斯先生也不客氣呀！」戴卓爾夫人友好地反唇相譏。

兩人會意地相視一笑。

最近一段時間，北京方面在香港問題上的態度明顯地變得強硬起來。八月三十日，外交部副部長錢其琛告訴來訪的日本客人，中英談判不宜拖長，中國正在密切注視談判進展情況。

同日，在國慶招待會上，趙紫陽總理對着上千名中外賓客說：「我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立場是眾所週知的，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方針。」

國慶招待會結束後，姬鵬飛氣憤地告訴香港記者，有人說香港人不希望恢復中國對香港的管理權，那是在撒謊。

十月五日，新華社發表未署名評論，指責英國在香港問題上搞「殖民主義」，戴卓爾夫人九月

二十三日對美國記者的談話「再次表明英國爲了繼續維持對香港的殖民統治，阻撓中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製造新的藉口。」「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和强烈譴責任何企圖肢解一個國家，分裂一個民族的言行。」

十月六日，《人民日報》又發表評論員文章，抨擊盧斯在香港的講話實際上是煽動騷亂，並將所有的責任都委過於北京。

近來，國際輿論也對英國大大不利。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博士公開發表談話，認爲中國在政治上完全有權收回香港，「這是它的領土，我毫不懷疑它將在一九九七年由中國管轄，我並不是在替中國講話，這是一個涉及公理的問題。正如我們說南極洲不屬於首先到達那裏的國家一樣，我要說香港也並不屬於那些曾經憑藉武力奪取這塊土地的人。」

「這個馬哈蒂爾，真是多管閒事！」戴卓爾夫人在心中恨恨地說。

「假如我們繼續和北京對抗下去，你們認爲會出現甚麼結果呢？」她向盧斯和尤德詢問道。

尤德瞥了一眼盧斯，見他沒有回話的意思，便開口道：

「我在北京得到了一個確切消息，中國高級領導人表示過，除非英國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否則將採取更强硬的手段。中國願意接受一個繁榮的城市，但是它寧肯接受一塊不毛之地，也不願屈服。」

尤德說得很慢，好像不希望首相聽漏一個字。

沉默。

戴卓爾夫人在沉默中突然抬起頭來：

「尤德先生，假如香港再颳起一場九月風暴，會對中國發生甚麼影響，會對我們英國帶來多大損失呢？」

尤德告訴戴卓爾夫人，根據滙豐銀行的估計，英國銀行控制着香港當地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的業務。英國股票經紀人控制着香港股票市場大約百分之三十的交易。英國六十多家保險公司的業務佔香港市場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英國船隻擔負着北歐與香港之間四分之一的貨運量。來往於英國和香港之間的乘客有百分之五十以上乘坐英國航空公司和英國喀里尼亞航空公司的飛機。另外，香港還是英國貨在亞洲的第二大市場。香港已經成爲英國在國外最大的投資地區。

尤德不再說下去了。如果中國單方面强行收回香港，英國在經濟上的損失不言而喻。

對於那場尚未完全過去的金融動蕩，尤德更是心有餘悸。他含蓄地告誡首相，這張「經濟牌」千萬不能再打了。

香港有兩家銀行有權發行紙幣，一家是滙豐，另一家是渣打。它們在發行貨幣前，要將一筆外滙交給香港政府，收回一張欠單，銀行就按欠單上的數額發行貨幣。如果銀行發行的港幣多於法定的數額，政府就可以控告銀行。如果銀行憑欠條索取外滙政府拒付，銀行也可以控告政府。一句話，香港的貨幣就是這兩家銀行的本票。香港的貨幣問題完全是英國銀行和香港政府之間的問題，根本無法把中國牽涉進來。英國首相歷來兼任財政大臣，戴卓爾夫人應該瞭解這些情況。

戴卓爾夫人轉向盧斯問道：「國內有甚麼值得注意的動向？」

盧斯看透了這位女首相的心事，她如此看重香港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她不允許自己的形象被中英會談的失利破壞。在最近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中，新上任的工黨領袖金諾克只比她落後五分。她現在必須藉助中英會談提高自己的威信。

「有一個人物很值得注意，他就是議員羅伯特•艾德利。此人一貫反對首相的對華政策，主張盡快把香港歸還中國。」盧斯說。

「他不過是個無足輕重的後座議員，能掀起甚麼波浪來嗎？」戴卓爾夫人不屑地說道。

「他儘管是個後座議員，卻在議會中擔任着英中關係小組主席的職務，這個地位使得他說話帶有權威性，有好多議員圍着他轉，有消息說，他準備在一定時機提出對香港問題進行議會辯論，而這個要求又是不能拒絕的。」

盧斯稍稍停頓了一下，見首相一言未發，又接着說下去：「艾德利和《星期日電訊報》的記者霍爾廷利私交很好，霍爾廷利根據艾德利的意見寫了一篇文章，過幾天就要發表，我派人把原稿搞到手了，我看了覺得並非毫無道理，我希望首相也能抽時間拜讀一下。」

戴卓爾夫人既未點頭，也未搖頭。

尤德和盧斯走後，戴卓爾夫人一個人默默地坐了很長時間。她已經寫好了給中國領導人的信，對中國人的立場表示理解，也含蓄地做了一些讓步，但現在她覺得那些讓步還不夠。中英會談一旦破裂，無論於公於私都是損失巨大。

她從盧斯帶來的材料中找到霍爾廷利寫的那篇文章，認真地閱讀起來。看了好大一會兒，也沒看出盧斯說的「道理」在哪裏。

對於戴卓爾夫人來說，這篇文章講的全是些老生常談。開篇就像許多流行小報一樣，把她描寫成一個魯莽拙笨的女海盜，揮舞着彎刀，先是殺上福克蘭群島，又殺向香港。霍爾廷利告誡她，香港和福克蘭群島不可相提並論。阿根廷的人口只有我們的一半，軍事力量只是我們的一個零頭。而中國跨越新界邊境兩側，又是個有着十億人口的大國。英國人膽敢訴諸武力，肯定會撞個頭破血流。

戴卓爾夫人剛想把這篇文章丟開，目光剛好落在文章後部的一段文字上：「我們並非沒有解決香港問題的手段，我們完全可以利用中國人所看重的香港回歸的象徵意義。可惜戴卓爾夫人是個瞎子。」

她眼前一亮，急切地讀下去。

「我們爲甚麼不能承認十九世紀同中華帝國簽定的那幾個條約是不平等的呢？假如這種承認能夠說服北京容許我們在將來的香港繼續發揮某些行政作用，既保全了中國人的面子，又保持了英國與香港的聯繫，這就可能促成一筆相當不錯的交易。」

戴卓爾夫人此刻的心情就好像在黑暗中摸索的迷路人，突然間發現前邊有一絲光亮，便立刻迫不及待地向那絲光亮撲去。

她馬上找回那封已經寫好的信。她要重新寫。

在北京的駐華使館區中，英國駐華大使館的建築並沒有甚麼出奇的地方。它那小巧精緻的造型，倒使它更像一座鄉村別墅。

在中國工作多年的柯利達大使已經養成了午睡的習慣，但今天他卻睡不成了，戴卓爾夫人派特使送來一封密信，讓他轉交給鄧小平和趙紫陽，他知道此事關係重大，立刻約見姚廣，並特地囑咐他只一個人來。

自從中英會談開始後，雙方一直在進行非正式會談，地點大多選在英國駐華使館。這是一件更爲機密的事情，但還是被神通廣大的記者們探聽到了。當有的記者向姚廣就此事提問時，姚廣回答說：「我同柯利達大使進行過多少次非正式會談，這是一個很次要的問題。」柯利達對姚廣的這個回答大加讚賞，認爲這是機智的外交官語言。

姚廣如約前來。柯利達笑容滿面地把他讓進自己的辦公室，而不是像以前那樣把他讓進會客廳。

雙方坐定，姚廣首先以個人名義向柯利達表示祝賀。

上個月，英國政府就宣佈，調柯利達回外交部任次長，負責中英會談，並任首相外事顧問。但他沒有立刻離開北京，因爲他還要參加中英會談。

柯利達順着姚廣的話頭說下去：「我雖然調任回國，但外交部對我的工作並不滿意，中英會談一開始，我們雙方就約定要嚴守秘密。但貴國的一些領導人和報刊，卻一再就中英會談發表評論，

這其實是違反了保密約定。而我以前從未作過提醒，這是我的失職。」

姚廣笑道：「大使先生，你一點錯誤也沒有。我國政府從來沒有公開過中英會談的進程和具體議事日程，違反保密約定無從談起。至於我國的領導人和一些報刊，向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中國人闡明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這還要和貴國商量嗎？」

柯利達連連擺手：「不！不！你不要誤解我的意思，你們當然有權闡明你們的立場，只不過這樣一來我們就弄得很被動。很多香港人向英國政府施加壓力，讓我們公開在會談中的立場，以表明我們是積極的，是不搞殖民主義的。」

「難道英國政府連這樣的態度都不肯表嗎？」

柯利達有些尷尬地笑了笑，緩緩地打開文件箱，拿出一個又寬又大的黃色信封遞過來：

「英國政府馬上就可以表態了。這是我們首相的親筆信，請你馬上轉交給鄧小平先生和趙紫陽總理。」

柯利達起身送客。走到門口時，他熱情地拍了拍姚廣的肩膀，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

「也許我倆今後用不着在談判桌上多費口舌了。」

十月十九日、二十日，中英談判代表在北京舉行了第五輪會談。大約有三十多名香港記者擁到北京，想報道這次會談的情況，但他們發現，這次會談的保密工作比以前還嚴密，一點消息也挖不出來。在中國外交部每週一次的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人拒絕對這次會談做任何評論。

香港記者從英國同行那裏得到一些風聲，不久前，戴卓爾夫人給中國領導人寫過一封密信，原則上同意把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同時歸還給中國。但是當他們找到英國官員核實此事時，人家卻一口否認，並說這「純屬猜測」。

香港記者們只好回過頭來老老實實地看中國報紙，倒是看出了一些名堂，這輪會談後發表的公報中又出現了「有益的」、「建設性的」這樣的字眼，這顯然是好的跡象。

十月三十日，戴卓爾夫人在英國廣播公司對全世界播出的「電話談話」節目中，進一步透露出這樣的消息：「在最近舉行的一輪中英談判之後，我感到振奮多了。我們正在探討意見分歧的每一個方面，以便達成某種安排。」「我們認為，英國保持與香港的聯繫是十分重要的，因為英式管治體制是香港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應該探討香港的成功是怎樣造成的，應該怎樣使這種成功繼續下去。而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和中國政府正在達成一個較好的基礎。」

細心的人從戴卓爾夫人滿懷喜悅的談話中還是能看出問題來的。英國人已經改變了策略，不再堅持以主權換治權，而是要加強與香港的聯繫。這種聯繫不僅是要在一九九七年以後在經濟上保持下去，還要盡可能地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繼續保持下去。

甚麼叫「保持聯繫」？說穿了，就是英國政府採取了務實的態度，盡量在香港問題上為自己多撈好處。

英國政府想撈到的好處，戴卓爾夫人在給中國領導人的信中已經明確地提出來一些，其中有建議在一九九七年以後由英國人任香港總督，香港政府中要有英籍和外籍人士的顧問，保安部隊中也

要有外籍顧問。這樣做的理由是，香港必須同英國政府相聯繫，保證英國人以某種形式或形態保留下來，香港人才能接受妥協。

從第五輪會談開始，英國談判代表就陸續把英國人想要撈到的好處推上了談判桌：香港特區政府最好不要直轄於中央政府，它要享受「最大程度的自治」，而不是中方提出的「最高自治」；中方要承諾不在香港駐軍；英國要在香港派駐性質不同於其他國家駐港總領事的「英國專員」代表機構；持香港身份證的海外官員可以在香港特區政府中擔任「公務員系統中直至最高層官員」；中方要承諾在一九九七年後原封不動地繼承香港政府的結構，還要尊重在過渡時期裏英方可能做出的改變，等等。

英國人挖空心思地提出的這些主張，實質上是想把未來的香港特區變成一個英聯邦成員或准成員，變成接受英國影響的某種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而這直接與中國的主權原則相抵觸，中方理所當然地要加以反對，根本不會採納。

中英會談的主要障礙還是沒有完全拆除，在很多方面對立嚴重，因而會談進展不大。

不過這一次中英雙方都接受了教訓，沒有讓這些分歧露出任何蛛絲馬跡來。

英國外交大臣賀維在十一月三日回答議員提問時，對剛剛結束的一輪中英會談閉口不談，雖然不得已承認中英雙方存在着非常困難的方面有待於通過談判解決，但馬上又跟上一句：「我們從這一輪會談中得到鼓舞是千真萬確的。我毫不懷疑，我們的共同願望是可以通過談判達到的。」

不知情者興高采烈。知情者憂心忡忡。

6

英國新任駐華大使伊文思上任。中英談判代表團團長雙雙陣前換將。記者們對中英會談嚴格的保密措施大為惱火。羅保動議的通過給中英會談蒙上陰影。

十一月十五日，英國新任駐華大使理查德·馬克·伊文思飛抵香港，很快就見到了剛剛參加完中英第六輪會談歸來的港督尤德。

他們倆雖然算不上老朋友，卻能算上老熟人，見面勿需客套，很快就把話題轉到了中英會談上來。

「原以爲首相做了那麼大讓步之後，會談就順利了。沒想到一切還是老樣子！」尤德輕輕地嘆了口氣。「誰要是能說服中國人讓步，我們就應該認他爲上帝。」

「那只有我們的首相讓步了。」伊文思笑着接口道。

尤德的上身向前探去，問道：「你這次上任，帶來了甚麼新的指示嗎？」

「你別急嘛！我的任命是十一月八日由女王陛下宣佈的。僅隔一天，賀維爵士就找到了我。他讓我參加一個特別小組，專門研究齊懷遠的答記者問。」

十一月九日，中英第六輪會談開始前四天，中國外交部首席發言人齊懷遠在新聞發佈會上回答外國記者提問時說：「我們希望在明年九月之前能同英國達成協議，如果屆時還達不成協議，中國

政府將單方面宣佈自己對香港的政策方針。」

鄧小平給中英會談設限雖然已經不是甚麼秘密，但明確地公開宣佈這一設限卻是第一次。英國外交部的發言人一改以往「無可奉告」的託辭，向記者們發表評論：「我們的看法是，重要的是要找到恰當的解決辦法，而不要匆忙行事。」「不管中國政府說不說，女王陛下的政府都認爲會談應該是慎重的。」

外交國務大臣盧斯這次收斂了許多，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出言十分謹慎：「我們希望會談迅速進行，但是我們不同意給會談設立一個最後期限，人爲的期限將會增加會談的難度。」

以上這些情況尤德都知道，也知道齊懷遠的講話引起了英國政府的高度重視，但他不知道英國政府和首相的最後決定。

伊文思告訴尤德，他們那個特別小組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不是在搞威脅，他們正在失去耐心。他們給首相提出的建議是，如果中國人的耐心全失，那麼和平解決香港問題的機會也就永遠失去了。

「那首相決定怎麼辦？」尤德迫不及待地問。

「決不能讓中國人從談判桌前離開。」伊文思答道。「首相告訴我，今後的中英會談要以合乎中國人胃口的方式進行，適當堅持原有的立場。」

「首相真精明呀！」尤德讚嘆道。

當着伊文思的面，尤德沒有把真正的心裏話說出來。他認爲戴卓爾夫人是在耍小聰明，既然想

讓中國人滿意，那就堅持不了原來的立場。也許首相真的想徹底讓步，只是一時還找不到合適的台階。

尤德陷入沉思之中，以致於沒有注意到伊文思已經做出了告辭的表示。

十二月七日、八日，中英代表團在北京舉行了第七輪會談。會談開始前，中英官員興致勃勃地談論着網球和網球比賽，尤德還一個勁兒地做手勢。進入會議廳時，雙方官員全都笑容滿面。會談結束後，在例行的聯合公報中多出這樣一句話：「雙方回顧了會談的進程和迄今所取得的進展。」這是自戴卓爾夫人訪華以後，中英雙方第一次公開宣佈在香港問題上有了進展。

全世界不希望看到中英會談陷入僵局的人，全都露出了笑臉，這裏包括那位可敬的希思先生。中英會談的良好氣氛似乎也感染了遠在倫敦的戴卓爾夫人。在英國議會裏，面對着議員們咄咄逼人的質問，她胸有成竹地告訴他們：「我完全有信心找到一個解決方案，既能保證香港的穩定和繁榮，又能讓諸位議員接受。」

對於她充滿信心的回答，就連準備了一大堆「炮彈」的羅伯特·艾德利也覺得多言無益，只好以自我解嘲的口吻說：「這個解決方案越少戲劇性越好，最好不要使本院感到意外。」

戴卓爾夫人在議員們面前又恢復了尖刻好鬥的形象，而不像從前一提到香港問題，就總覺得心裏發虛。

當自由黨領袖斯蒂爾別有用心地引用戴卓爾夫人的原話，讓她回答福克蘭群島的民意和香港的

民意究竟哪個是「至高無上」的，她一躍而起，用大家熟悉的譏諷口吻答道：

「尊敬的斯蒂爾先生，你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福克蘭群島是我們的，而香港是租來的。」

四週響起一片笑聲。

一年一度的歲末民意測驗很快公佈出來了，投戴卓爾夫人信任票的人數量激增。她雄視英國政壇，一時間竟然找不到一個像樣的對手了。

辭舊迎新又一年。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中英第八輪會談將按原計劃舉行。

這次會談開始前，中英雙方代表團團長同時易人。中國外交部長助理周南接替姚廣，柯利達被新任駐華大使伊文思取而代之。

尤德卻告訴柯利達，中國人向來講究對等的原則，英國換人了，中國也要換人，也許事情就這樣簡單。

柯利達釋然一笑。他相信尤德說的有道理。

自從柯利達向姚廣提出了保密的問題後，中英雙方都開始約束自己的言行，不以任何方式透露中英會談的任何內情，就連每次會談結束後發表的公報，也千篇一律地使用「有益的和建設性的」這樣的字眼，以杜絕產生任何不愉快的聯想。

新上任的代表團團長周南和伊文思似乎比他們的前任更知道怎樣對付記者。每次會談前記者在

場拍照時，他們都是笑容滿面，彼此大聲地說着客套話，談論着天氣，把氣氛弄得很融洽，記者們當時覺得挺熱鬧，可事後一翻採訪本，卻甚麼有價值的東西也沒有記下來。

這一下可急壞了那些香港記者們。每一輪中英會談，香港記者都要來三十多名，如此興師動衆，如果不發回一些內幕新聞，又能對得起誰呢？可是，他們又採訪到了甚麼呢？

一月二十五日第八輪會談開始前，他們從伊文思嘴裏只挖出這樣一句話：「期望雙方能相互合作。」

二月二十二日第九輪會談結束後，他們攔住了中方談判代表魯平，從他嘴裏挖出這樣一句話：「會談正在加速進行，情況良好。」

忙了兩個多月，就得到這兩句話，能不被上司罵個狗血噴頭嗎？有的香港記者急了，開始罵人了。

英國記者的日子也不比香港記者好過。他們知道在北京很難弄到有價值的消息，便希望改走他途，但照樣碰壁。

一月二十二日，英國記者塞爾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透露，長達一年之久的中英談判有了重大突破，戴卓爾夫人於去年十二月中旬親自指示，要將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同時歸還給中國。

英國記者們連忙去外交部核實此事，可是得到的答覆卻是「純屬猜測」。外交官的發言人還一本正經勸說他們不要打這方面的主意，中英會談從一開始就是保密的，而秘密談判效果最好。

記者們又在加拿大的渥太華找到了正在那裏訪問的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吳學謙，讓他談一談中

英會談情況。吳學謙告訴他們，中英會談正在進行之中。至於細節，他是一個字也不肯透露。

記者們還不死心，又馬不停蹄地趕到香港。二月八日，尤德參加完生力啤酒廠的揭幕儀式後，發現自己立刻被記者們圍住了，他甚麼也不想說，誰也拿他沒有辦法。

第九輪中英會談結束後，尤德和伊文思一起返回香港。英國外交國務大臣盧斯已經到香港好幾天了，名義上是廣泛聽取民意，加强與香港各界人士的接觸，實際上是專程與尤德和伊文思會面，商談中英會談的進展情況。

會面安排在總督府裏進行。尤德拿出中國特產烏龍茶招待客人。英國人喜歡喝紅茶，對烏龍茶並無興趣。但尤德勸他們還是嚐一嚐，據説常飲烏龍茶有保護肌膚的作用，因而被日本人譽爲「美貌和健康的妙藥」。

一邊啜茶，尤德一邊講起自己被記者包圍的經歷。他半真半假地說：「幸虧會談是在北京舉行，要是在倫敦舉行，我們非得讓記者們吃了不可。」

伊文思不想繞圈子，他一開口就把談話引入了正題：

「我們可以製造樂觀，但實際情況卻不容樂觀。現在的中英會談完全處於停步不前狀態，既沒有大的障礙，又沒有大的突破。」

「要想有大的突破，就需要由我國政府給中國人一個公開的承諾，完全放棄對香港地區的主權和治權。」尤德接着説。

「現在的麻煩就在公開這兩個字上。新界是租來的，當然要歸還，可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頂端卻是永久割讓給了英國。如果我們公開宣佈放棄，國內就會有人罵我們是賣國賊。所以首相指示，要進行悄悄的外交。」盧斯說。

「有些英國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亂。」尤德憤憤地說。「他們知道嗎？在香港手持英國護照的人就有二百七十萬。如果我們不向中國人讓步，矛盾一旦激化，這些人湧到英國去，那麼英倫三島就會被壓進大海裏去！」

「親愛的尤德爵士，你不要激動。」盧斯笑道。「首相和外交大臣對你們的工作從來都是大加讚賞，這次又讓我帶來了新的指示。四月份外交大臣將去北京訪問，關於香港主權和治權的爭論由他去解決。你們要盡快觸及細節，盡可能多地達成能夠約束中國人未來行動的協議，不要讓香港人罵我們出賣了他們。如果中英會談的結果公佈後，香港人還都願意生活在這個地方，那就是我們最大的勝利。」

伊文思沉吟道：「中英談判最大的難題，就是如何讓中國人作出實質性的保證。」

尤德瞥了伊文思一眼：「中國人早就做出多次保證了，五十年内保證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可是你能相信嗎？退一步說，即便中國人的政策不變，那麼又有誰能知道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中國人會怎樣履行他們的諾言嗎？」

「尤德爵士，你們的擔心是很有道理的，首相與外交大臣和你們深有同感。」盧斯不緊不慢地說：「對於前一種擔心，我們是無能爲力；對於後一種擔心，我們要盡其所能去努力。」

伊文思皺起眉頭說：「不知你們注意到沒有，談判剩下的時間越少，中國人反倒不提最後期限了。這決不是個好兆頭。這其實是中國人在向我們施加無形的壓力。」

尤德兩手一攤，做出個無可奈何的姿勢：「在談判桌上，我們就像赤手空拳的戰士一樣，別說致命的武器，就連常規武器也沒有，不能指望這樣的戰士會打勝仗。」

盧斯有意壓低了嗓音：「我這次就是奉命給你們送先進武器來了。」

二月二十八日，盧斯離開香港前往吉隆坡訪問。臨行前，他在啓德機場告訴記者，中英會談進展良好，達成協議是有希望的，但不應倉促行事。更爲重要的是，香港人應該有充分的時間對這份協議加以評價，作出反應，發表他們的意見。

很多人都認爲盧斯的講話是官樣文章，也很少有人由此聯想到，這幾天在英國下議院裏有好幾位議員提出同樣的意見：「中英政府任何有關香港前途的建議，除非採取適當步驟，保證已考慮了香港人對建議的接受程度，否則本院不予認可。」

英國人好像在鬧內哄，要讓他們派往北京的談判代表團變成說話不能算數的尷尬人。

然而，過不了多久，人們就漸漸地明白過來了，盧斯臨走時說的那番話別有深意。

三月十四日一大早，一架來自倫敦的班機就降落在啓德機場。在這架飛機上有兩位不同尋常的乘客，他們是英國工黨議員羅伯遜和克拉克。

這兩位議員一下飛機，就被港督尤德親自派人接到了香港立法局。他們將出席今天在立法局舉

行的辯論會。

以往香港立法局也舉行辯論會，但從來都是冷冷清清，今天的氣氛卻大不相同。會議廳裏，四十七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的座位坐得滿滿的，旁聽席上也是座無虛席，各界代表加上記者，足有二百多人。港督尤德和港府布政司夏鼎基也來到會場。

今天辯論會的中心人物是首席非官守議員羅德里歐・海恩德曼・羅保，他是一個葡萄牙人。不久前，他提出了一項動議：「任何有關香港問題的建議，在未達成最後協商前，必須在本局辯論。」

誰都明白，所謂「最後協商」，就是指中英目前正在進行的秘密談判。

圍繞着羅保提出的動議，議員們分成了兩大陣營。一派呼籲議員們要慎重行事，不要節外生枝，以免妨礙中英談判的進展，使港人蒙受不利影響。

另一派則認爲香港人要爲香港的前途負責，香港人的利益要靠香港人自己去爭取。

前一派的呼籲使人清醒，後一派的反問則令人心動：「假如中國人和英國人達成了不利於香港人的協議，難道我們也要接受嗎？」

經過一整天的緊張辯論，立法局最後以微弱多數通過了羅保動議。

辯論結束後，夏鼎基喜形於色地代表港英政府講話：「這項動議是合乎情況而又可以理解的。」

羅伯遜和克拉克當場表示，他們回國後也要在英國國會提出一項內容相同的動議。

尤德這回也不再躲着記者了。他主動發表談話，稱這次辯論是很有啓發性的和建設性的。他還告訴記者，明天就要飛往北京參加中英第十輪會談。「我們注意到了中國方面提出的最後期限，我們很想加快談判速度。」

記者們似乎品出了他的弦外之音，繼續往下追問，尤德微微一笑，無論如何也不肯往下說了。

尤德要是不及時刹車，就會説出心裏話來。這回再坐到談判桌前，英國代表就可以裝模作樣地大吐苦水了：你看，我們也着急，但是光着急有甚麼用？西方國家有議會，它的權力可大得很喲，我們訂的協議再好，它要是不批准也没有用！要是説辦法也有一個，那就是訂的協議盡量滿足那些議員們的胃口，照顧照顧嘛，這樣人家也會照顧咱們。

真得好好感謝盧斯，他送來的真是一件絶妙的武器。只要能堂而皇之地拖下去，中國人説不定就會來個大減價。有了這個新武器，英國人在談判桌上就靈活多了，隨時把責任推到本國議會和香港立法局頭上，而他們又可以隨時用投票表決的結果來加以天衣無縫的配合。

尤德甚至可以想像到談判桌上會出現甚麼樣的情形。他禁不住嘻嘻笑起來。過去，中國人總是用最後期限來嚇唬我們。如今，我們可以用推諉戰術來對付你們。這回就要打一場神經戰了，誰的神經衰弱，就會首先表示妥協。

自從中英談判開始以來，尤德這是第一次懷着愉快的心情，登機前往北京。

7 參加中英會談的全部人馬直遷釣魚台國賓館。英外交大臣賀維為排憂解難來訪。鄧小平告訴他，中國的現行政策五十年不會變。英國公開宣佈將如期歸還香港。

三月十六日，中英第十輪會談在北京舉行，地點還是台基廠頭條三號的外交部賓館。

像以前一樣，有三十名香港記者被允許進入會談地點，也允許他們拍照，但提問受限制。記者們很想聽一聽中國方面對於羅保動議的反應，但害怕碰上軟釘子，只好閉上嘴巴。

嘴巴能閉，耳朵卻閉不上。會談正式開始前，中英雙方談判代表都會提前露面，在這段短暫的時間裏，他們總要說點甚麼。記者們全都有意湊到他們身邊，支起耳朵捕捉能夠聽到的每一字。

像往常一樣，記者們又洩氣了。中英談判代表面帶微笑，若無其事地談着北京的天氣。

不過，這一次記者並沒有完全失望，因爲他們總算探聽到了一點有價值的消息：這輪會談後，中英全班談判人員將直遷釣魚台國賓館二號樓。此舉意味着甚麼呢！也許是爲了工作便利，也許是意味着會談的格調的提高。不管是甚麼原因，這個舉動都表明中英談判已處於關鍵的敏感的階段。

記者們還探聽到了一個消息，這次會談後相隔九天就要開始第十一輪會談，而不是像以往那樣要相隔一個月。會談間隔大大縮短，這說明雙方都要加快會談進程，也說明雙方面臨着很多急待處理的具體問題。對於中英兩國的談判代表團來說，爲新的一輪會談作好準備，九天的時間是不能再

少了。

香港記者們的臉上終於露出了笑容，彷彿又找回了無冕之王的感覺。他們發現，中英談判的神秘帷幕正在一點點掀開，這使急於知道內情的人又驚又喜。

於是，香港的報紙上關於中英會談的報道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實質性內容：

中英雙方已談到了貨幣、外貿等具體問題，也接觸到了人事、政務安排等問題。英方關注香港的長期建設、投資等方面。

對於羅保動議，中方來了個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新華社香港分社派人告訴記者，中國政府在恢復行使香港主權問題上，一貫重視並聽取香港同胞的意見，中英會談所達成的協議也要提交全國人大通過，否則也是無效。

中國方面堅決要求在協議中明確表述中國收回香港是恢復行使主權，英方先後提出的草案都含有三個不平等條約的含意。雙方出現嚴重分歧。爲了解開這個死結，雙方共同研究出了一個高招，即各行其是：中國政府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英國政府則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收回來，一個交回去，同樣大大方方。

中英談判納入正軌，不再像以前那樣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是朝着彼此的立場靠近。三月二十七日中英第十一輪會談結束後，伊文思以外交家的口吻評價說這是一輪相當標準的國際談判。

四月十一日，中英舉行第十二輪會談。

儘管會談內容依然保密，但很多人都猜測到中英談判代表在這一輪談判中的主要任務是最終確定中英協議的草案框架。再過幾天，英國外交大臣賀維就要來北京訪問，他隨身帶來一位法律專家，顯然是要幫助他審閱這份草案大綱。

會談開始前，中英談判代表又像往常一樣聚在一起閒談。尤德來得稍晚一點，立刻被一大群香港記者圍在當中。尤德一邊往外擠，一邊大聲說：「我告訴你們一個最好的報道題目，賀維要來訪問了。」

尤德擠到伊文思和周南身邊，他倆也在閒談，中心話題是花。尤德覺得有趣，就站在一旁當聽衆。

周南告訴伊文思，北京的桃花開得最早，樹葉還沒有長出來，粉白色的桃花就掛滿了枝頭。還有白色的桃花，遠遠望去，就好像一樹白雪。

伊文思告訴周南，他在倫敦時，特別喜歡觀賞黃水仙花。它比桃花開得還早，冬季就能開花。花開時就像撐開了一把把小陽傘。

周南說，水仙雖然耐寒，但畢竟只能生長在室內，不像桃花，能在大自然的風風雨雨中開放。

伊文思頷首表示贊同。

這兩位談判對手還真有閒情逸致，足足談了五分鐘花草，才肩並肩向會談大廳走去。

這輪會談完全是例行會議，要解決的問題基本上都解決了，因而談判代表們出現了難得的輕鬆

心情。

中英第十二輪會談照例進行了兩天。會談結束後，尤德沒有像以前那樣返回香港，香港的記者們也留在北京沒走。

他們都在等一個人，這個人就是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賀維。

四月十五日下午，這位備受矚目的賀維抵達北京，受到了吳學謙、伊文思、尤德等人的歡迎。

對於賀維大臣的這次出訪，輿論界普遍抱有樂觀的期待，認爲他將結束中英關於香港地位的意識形態方面的爭論，不失尊嚴地接受中國的全部條件，從而開闢中英會談的新階段。

然而賀維本人卻對這次出訪大唱低調。早在三月二十二日，他就在倫敦告訴記者，中英會談不會很快取得突破，雙方需要有極大的耐心才能達成一項能使各方面都滿意的協議。因此不要對他的出訪抱太大的期望。

四月六日，戴卓爾夫人會見了尤德以及他率領的由十名非官守議員組成的代表團，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談話，賀維當時也在場。事後他告訴記者，中英會談正在按計劃進行，不能預告它會持續多久，他的出訪不會縮短正常進程。

到達北京後，賀維沒有接見記者，而是由新聞秘書向記者們散發了一份書面講話。在這份書面談話中，儘管賀維禮貌地承認中英會談前景令人鼓舞，但又告誡人們還有很多更複雜更困難的問題沒有解決，「我們這次訪問僅僅是爭取以最佳方式達到使香港繼續保持穩定和繁榮這個目標達成協

了。」

議。」「現在是由部長一級來研究情況，決定我們怎樣才能以最好的方式，繼續談判下去的時候

賀維的新聞秘書向記者暗示，最近發生的怡和遷册事件給英國政府帶來很大震動。

香港怡和有限公司是一家老牌英資公司，解放前就在內地有不少投資，南京大橋旁的江蘇肉聯加工廠，過去就是怡和的一個大企業。解放後，怡和在內地的資產遭到没收，損失很大。三月二十八日，怡和的董事長西蒙・凱瑟克宣佈，怡和將把總公司遷至百慕大，理由是「面對香港的長遠前途問題，令本集團處於不利位置。」

怡和的遷册是一個警告，中英談判應該及早有個初步結果，會談時間再拖長，對中英雙方都没有好處，對香港的經濟更是極大的打擊。

四月十六日上午，中英兩國外長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會談。

會談開始前，吳學謙樂觀地預測這個會談會順利地進行下去。

與此同時，賀維的助手卻向英國報界吹風說，不要指望這次會談會發表重大聲明。

四月十七日下午，趙紫陽總理與賀維會談。會談開始前，趙紫陽詢問賀維這次訪問的日程，建議他抽時間到中國其它地方走走看看。

賀維對趙的好意表示感謝，但卻無奈地說：「不行啊，在這樣緊張的討論中我太忙了。」

趙紫陽在談話中，明顯表露出及早結束中英談判的急切心情。他告訴賀維，只要雙方具有誠意，本着互相信任的精神，完全可能使香港問題得到圓滿解決。

賀維聽出趙的暗示，如果中英會談能早些結束，中國方面還是會做出些讓步的。

會談結束後，賀維的發言人依然大唱低調：「現在談甚麼時候能達成一項滿意的協議還爲時尚早。」「一項令人滿意的協議比一份時間表更重要。」

中國人的熱情，賀維的冷淡，中國人的急切，賀維的不緊不慢，恰恰形成意味深長的對比。

賀維不急，記者們卻開始着起急來，難道他此次訪華就想空手而歸嗎?到了這個時候，中英談判一旦破裂，後果不堪設想，賀維究竟想幹甚麼？

其實，賀維爵士比誰都着急。這次出訪，首相給他的指示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越是這樣，他越要謹慎，尤其不能讓新聞界的發燒提起公衆的高度期望。此外，他謹言慎行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沒有從中國方面得到最權威的保證。

直到四月十七日晚，他才等到了他最希望聽到的消息：鄧小平準備接見他。

四月十八日上午，鄧小平提前來到人民大會堂，近些日子，鄧小平很少會見外國客人，關於他健康的謠傳又起。但當鄧小平出現在記者們面前時，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容光煥發的形象，那些謠言再一次不攻自破。

約定時間未到，賀維還沒有來，鄧小平和記者們間談起來。記者們請鄧小平對中英會談發表一點意見，鄧笑着擺了擺手，說：「香港問題太敏感了，我可不能同你們談，咱們還是換個話題吧！」

高齡的鄧小平還是那樣幽默。

身材高大的英國人賀維來了，陪同他前來的是身材更高大的伊文思。中方參加會見的是吳學謙和周南。

賀維快步上前，笑容滿面地與鄧小平握手。

當着記者的面，賀維談起了這次訪華的感受。他告訴鄧小平，一九七八年他來過一趟北京，這次舊地重遊，發現中國的確發生了很大變化。

記者們未能聽到太多的東西，便被請出了現場。

鄧小平與賀維進行了一百分鐘的會談。

鄧小平告訴賀維，中國政府多次宣佈一九九七年以後還要保持香港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是隨隨便便、感情衝動講的，而是考慮到了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中國現在制定了一個宏偉的目標，就是國民生產總值要在兩個十年內，即到本世紀末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達到這個目標後，中國還有一個雄心壯志，那就是要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前後算一算，這起碼需要五十年的時間，只要知道了我們的這個想法，就會相信我們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是完全可靠的。

賀維以開玩笑的口吻問道：「鄧主任，那麼五十年以後呢？」

「五十年以後，我們同國際上的經濟交往更加頻繁，更加相互依賴，更不可分，我們的開放政策就更不會變了。」鄧小平似乎看穿了賀維的心思，又接着説道：「我知道有人懷疑我們的承諾，我要告訴英國朋友，也要告訴全世界的人，中國是信守自己的諾言的。」

「對於鄧主任我們是完全相信的，但是我們這一代人都不見得能作下一代人的主。」

「這種擔心也不必要。決定的因素是這個政策對不對。如果不對，就可能變。如果是對的，就變不了。中國現在實行的政策一旦變了，百分之八十的人生活就要下降，那就會喪失人心。你說誰敢變？我們的路走對了，人民贊成，就變不了。」

鄧小平用樸素的語言闡述着樸素的道理，賀維卻覺得自己幾乎被完全征服了，心頭的疑慮一掃而空。他相信，如果戴卓爾夫人聽到這些話，也會產生與他同樣的感受。鄧小平不是以他個人的名義作出保證，而是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未來在擔保。

鄧小平開出的是一張世界上最有信譽的「保險單」。

結束了與鄧小平的會談後，賀維於當天下午就來到香港。一下飛機，他就告訴記者，他在訪華期間與中國領導人進行的會談是友好的、認真的和有成果的。他樂觀地相信中英雙方能夠達成一項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協議。當然，這項協議也會被香港人和工商界人士接受。

第二天，賀維與香港行政局官員進行了三個小時的會談，接着又出席了香港社區組織的午餐會，並即席發表講話，出席午餐會的七十多個人都帶着這樣的印象離席：英國所有的影響和控制都將在一九九七年結束，而英國人目前所能給予的就是對香港人的憂慮深表同情和理解。

四月二十日，賀維在離港前又發表了一份聲明說：「要達成一項使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以後仍由英國管治的協議，是不切實際的設想。」「英國的方針是與中國政府研究怎樣可以達成會確保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以後，在中國主權下得到高度自治權，同時會使香港的生活方式和現行制度的本質得

以維持不變的安排。」

這是英國官方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宣佈放棄對香港主權和治權的要求。

中英關於香港主權、治權之爭終於以英國人的全面讓步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8 香港行政、立法兩局的議員代表到倫敦活動，卻一無所獲。鍾士元等人又到北京反映香港「民意」。鄧小平告訴他們，不承認「三腳櫈」。在整個會見期間，鄧小平始終沒有笑容。

賀維離開北京後，中英會談的速度明顯加快，從四月二十七日開始的第十三輪會談，到七月二十五日結束的第十九輪會談，這七輪會談平均每兩週一次。對於如此關係重大的國際談判而言，這樣短的間隔已經是不能再短了。

中英兩國的談判代表更是感覺到了時間的緊迫。五月九日第十四輪會談開始那天，伊文思和周南雖然也談了幾句天氣，伊文思還說他最近參觀了北京郊區的十三陵，但記者們注意到，他們用於閒談的時間減少了許多，就連往常時時可聞的笑聲也少了許多。英國駐華大使館的一秘歐威廉告訴記者，有許多具體的工作等待着他們去做，笑是浪費時間的。

六月十三日中英第十六輪會談結束後，雙方宣佈成立一個專職工作小組，中方由柯在鑠掛帥，英方則由倫敦派來了魏德巍。這個魏德巍就是當年陪同麥理浩訪華的那個港府政治顧問，一九八一年調回英外交部任南歐司長，後升任助理次官，主管亞太地區事務。這次英方派他來，不僅僅是爲了增加人手，也考慮到他熟悉中國事務，對處理具體問題有所幫助。

從六月二十一日起，由柯、魏二人爲首的十二人工作小組一頭扎進北京國際俱樂部，在正式會

談期間，每週以五六個整天的時間討論雙方提出來的所有文件，對所有的文件進行字斟句酌。

談判桌上一切既緊張又順利，談判桌下卻有了麻煩。這個麻煩不是出在英國，而是出在香港。賀維原以為，公開宣佈放棄對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後，很可能會在國內引起一場政治風波，可結果卻是意外的平靜。先是工黨對外事務和聯邦事務發言人羅伯遜宣稱：「我們不會給困難的中英會談增加困難，這不符合英國的利益。」接下來各政黨發言人和政界人士紛紛表態，聲稱不想從中英談判中撈取任何政治上的好處。

賀維在香港逗留期間，就隱隱約約地感覺到某些香港高層人士對於英國人的不滿正在悄悄蔓延，他們認為香港人被英國出賣了，他們要為自己的利益抗爭了。

當初，英國人為了增加談判籌碼，打出了「民意牌」，可是並沒有多大效果。如今在英國人期望談判順利進行的時候，那張「民意牌」卻自己不識時務地蹦了出去。

很快，賀維就發現自己的擔心是正確的。

五月十日，由九名香港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倫敦，領頭的是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鍾是香港知名人士，又是華人在港英政府中的最高級官員之一，年齡也比較大，行事持重，以前這種代表團都是由港督帶隊，而這次是要和英國人講理，所以不能讓港督當團長，於是眾人一致推舉了鍾士元。

鍾士元想的倒真是週到，他告訴其他幾位代表團成員，師出必須有名，咱們此行是去會見英國

政府的各位大臣及國會議員，搶在英國國會辯論香港問題之前，讓他們聽聽香港人的呼聲。

那幾位議員對鍾士元的提議同聲贊同，於是就起草了一份《香港前途問題的聲明》，並在臨行前散發了出去，並準備到倫敦後分送各有關方面。

這份聲明警告英國人，不要冒險去和中共簽訂協議。香港和中國的政治體制各異，即使不至於互相敵對，也是互不相容的。中方很可能日後藉着協議與基本法有所抵觸的理由，單方面廢除協議。爲了保證中方遵守協議條款，他們在聲明中呼籲英國在一九九七年以後不要完全撤出香港，而要在行政、法律、經濟等方面保留若干程度的地位。

鍾士元等人已經預料到，這個聲明一定會引起北京方面的不滿。果然，四天之後，中國全國人大副秘書長就聲色俱厲地表示，鍾士元等人的聲明代表不了大多數香港同胞的意願，對於香港問題的解決有百害而無一利。

鍾士元等人沒有想到的是，香港人和英國人對他們的這一手也沒有表現出應有的熱情，而是大潑冷水。香港輿論指責他們的這個聲明既不得體，又降低自己的威信，只會阻礙中英雙方達成協議。

賀維在倫敦告訴英國的議員們，中英談判正處在一個複雜的、難以應付的時期，英國的主要目的是修築一座橫跨兩個國家和三個社會的相互信任之橋。現在看來，這個目的完全有可能達到。因此，他反對在香港搞公民投票。

議員們說起話來可不像這樣含蓄了：「香港人不就是中國人嗎？他們的民意要是和中國人的民

意不同，這豈不是最大的笑話嗎？」

五月十五日，戴卓爾夫人在唐寧街十號接見了鍾士元一行。過去，英國首相總是要强調一番英國政府將充分考慮香港人的意願，這次她卻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模樣，只是說完全理解他們對香港未來的不安情緒。

鍾士元等人在英國一無所獲，還惹了一肚子氣，憤憤不平地回到香港。返港後，他們還有些不死心，於是找到新華社香港分社，請轉告中共高級領導人，他們要前往北京，爲香港人民「請命」。

北京方面很快做出答覆，同意他們赴京訪問。令他們感到吃驚的是，鄧小平還決定親自接見他們。

鍾士元挑選了兩位議員同他一道赴京。一個是聰明伶俐的女議員鄧蓮如，另一個是年壯氣盛的利國偉。

就在鍾士元三人動身之前，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已經到達北京，領頭的是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唐翔千，香港總商會主席唐驥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倪少傑。

六月二十二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香港工商界訪京團的全體成員並合影留念。然後，唐翔千以訪京團全體成員的名義請鄧小平講幾句話，鄧小平欣然允諾。

接見大廳裏立刻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此刻對香港人講話自然要講香港問題。鄧小平告訴在座的各位，中國人有兩個傳統，一個是不信邪，在甚麼樣的大風大浪面前都穩如泰山，對甚麼樣的風浪都不害怕；再一個就是中國人從來說話都是算數的。我們說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就是不變，沒有甚麼好擔心的。

鄧小平又說，中國有香港問題、台灣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出路何在呢？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從世界歷史上看，有哪個政府制定過我們這麼開明的政策？從資本主義歷史看，從西方國家看，有哪一個國家這麼做過？我們採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也不是玩弄手法，而是完全從實際出發，是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的。

那些未能親臨會見現場的記者們通過電視機畫面注意到，在整個長達兩個多小時的會見中，鄧小平臉上的表情始終很輕鬆愉快，不時還浮現出笑容。記者們還注意到鄧小平說過這樣一句話：「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這個事例可能爲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有益的線索。」由此推斷，中英談判進行得很順利，很可能不久就會達成最後協議。

然而，僅僅過了一天，鄧小平的情緒就完全變了。

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三位香港兩局非官守議員來到人民大會堂。工作人員告訴他們，鄧小平準備在四川廳接見他們。

在一位接待員的引導下，鍾士元三人向四川廳門口走去。

按照慣例，鄧小平每次接見賓客時，都要與賓客合影留念，最起碼也要迎出廳外。這一次卻是

例外。鍾士元三人一直走到四川廳門口，也不見主人出迎。

守候在四川廳門口的港澳辦工作人員鄧强請他們稍候，便一個人進去通報。鄧小平這時才站起來，走到四川廳中央。

鄧强返回身來，引導着鍾士元三人走進四川廳内。鄧小平站在原地未動，鍾士元趨前與鄧小平握手，說：「鄧主任，您好，我是香港來的鍾士元。」接着，鍾士元把身後的鄧蓮如和利國偉介紹給鄧小平。

鄧小平與他們一一握手，在和鄧蓮如握手時，鄧說：「咱倆還是本家呢！」

鄧蓮如笑道：「那我可是高攀了。」

雙方落座。鄧小平既沒有說客套話，也沒有與他們閒談，而是開門見山地說：「我歡迎你們以個人身份來北京走走。聽說你們有不少意見，我們願意聽取。」

鍾士元一聽不對頭，立刻接口道：「我們三個是香港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議員，很榮幸能有這個機會拜見鄧主任及其他在座的中國領導人。我們這是頭一次到北京，能到北京參觀，我們感到非常榮幸。」

不知道是鄧小平沒有聽懂鍾士元講的那口結結巴巴的普通話，還是别的甚麼原因，鄧小平對鍾士元的話沒有作出反應，只是聳了聳肩。

鍾士元本來想好了很多話要說，但鄧小平的開場白卻把他的計劃打亂了，一時間不知從哪裏說起才好。

在他們三個人當中，以鄧蓮如最爲聰敏，普通話說得也最好，她不想讓鍾士元難堪，便及時地把話題扯開：

「這次到北京，我們想好好參觀一番。」

鄧小平說：「那我們表示歡迎呀！你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瞭解一下北京，瞭解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瞭解一下我們這個中華民族。我相信這對你們很有好處。」

鍾士元見氣氛有所緩和，又開口道：「我們這次來是想反映香港人民的意願，這與目前正在進行的中英談判有關係。我們香港人希望中英協議能充分考慮到我們的要求。」

鄧小平用力揮動了一下手臂，顯然他已經有些不耐煩了：

「你們前不久去了一趟倫敦，情況我們都瞭解。你們想要說甚麼都可以，但是我要講一句，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的方針、立場和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不管這些方針、政策有多少人理解，我相信這是符合五百萬香港人民利益的。我們聽到不同觀點的人有不同的意見，但我們不同意這些意見是代表香港人利益的。香港的問題我們會同英國政府談判解決，不容許受到任何干擾。過去有所謂的『三腳櫈』，我們一直不承認，我們只承認兩腳，不承認三腳。」

鍾士元爲人雖然老練，但卻很有些固執，明知道鄧小平不高興，仍然要把他要說的話說出來：

「鄧主任說過港人治港，我們是舉雙手贊成，但我們擔心港人沒有這個能力。香港如果管不好，那損失就太大了。」

鄧小平搖了搖頭，說道：「不相信中國人有能力管好香港，那是老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思想狀

態。昨天我就告訴過香港工商界的朋友，我完全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難道非得讓英國人來管不可嗎？香港人要有民族自豪感。香港過去的繁榮，主要是以中國人爲主體的香港人幹出來的。中國人的智力不比外國人差，中國人不是低能的，不要總以爲只有外國人才幹得好。目前中英會談的內容還沒有公佈，很多人對中央政府的政策不瞭解，一旦真正瞭解了，是會完全有信心的。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如果還繼續讓外國人統治，香港人也是決不會答應的。」

鄧小平似乎意猶未盡，稍加停頓又講下去：

「港人治港有個界限和標準，就是必須是由以愛國者爲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的香港特區政府可以請幾個外國人當顧問，但主要成分必須是愛國者。甚麼是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就是尊重自己的民族，我們不要求他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但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我相信你們幾位都是愛國者。」

鍾士元等人連連點頭。

香港電視台的記者把這次會見的全過程都拍攝了下來，事後在看錄像時發現，鄧小平的臉上自始至終沒有笑容，鍾士元不安地坐在那裏，一臉尷尬相。

鍾士元沮喪地回到香港。

先去倫敦，後去北京，他們都是打着「爲民請命」的招牌。可是奔波了一兩個月，他們爲香港請到了甚麼呢？鍾士元覺得自己難以向香港人交待。

很快鍾士元就發現自己甚麼話也不用說了，因爲北京方面已經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將鄧小平的

談話在香港全文發表出來了。鄧小平談話中那段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的內容很得人心，香港輿論界反過來責怪鍾士元等人不該充當英國人手中的「民意牌」，更不應該給中英會談製造困難。

鍾士元沒有料到自己幹了一件三面不討好的事。

他好後悔呀！

9

鄧小平大發雷霆：中國既然收回香港主權，就有權在香港駐軍。連這一點權力都沒有，還叫甚麼中國領土？香港記者仰天長嘆：「這一下香港可要陸沉了！」

每年的七月，香港總是要颳幾場颱風。天文台一會兒掛出一號風球，一會兒又改掛三號，一覺醒來，說不定又掛出了八號風球。

每年的五月，香港可是風平浪靜。可是今年的五月，香港卻颳來了一場政治颱風。與以往不同的是，這場「颱風」是從北京颳過來的。「颱風眼」是香港的駐軍問題。

關於香港駐軍問題，中英會談有所涉及，但雙方並未發生大的爭執。

英國國會的一個小組曾有過一個提案，要求英國政府考慮在一九九七年以後繼續在香港駐紮少量部隊，以保護英國人的利益。國防大臣韓俊廷表示，英國的士兵將在香港堅守到一九九七年。言下之意，英軍將在一九九七年之後撤出香港。

英國在香港的駐軍人數不多，但費用很大。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英國政府同港英政府達成協議，由一九七六年四月開始，香港在第一年負擔駐港英軍的費用從當時的一點一億元增加到二點二億元。在以後的六年合約期內逐年增加，第二年爲二點八一億元，第三年起每年爲三點三七億元。

很顯然，駐港英軍每年都要花掉香港納稅人的很多錢。因此，他們希望英軍撤走，但是一想到中國軍隊將腳跟腳開進來，有些人心裏就產生了疑慮。

這種疑慮情緒原本沒有造成實際影響，但沒有想到後來它卻找到了迅速蔓延的機會，鬧得全香港人心惶惶，好像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似的。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一九八四年五月，人大六屆二次會議、政府六屆二次會議同時在北京召開。「兩會」做出了一個創舉，首次邀請港澳記者赴京採訪。這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第一遭。

五月二十四日晚，港澳地區的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接到大會秘書處的通知，明天上午十點鐘將有中央領導接見。至於是哪位中央領導，卻沒有明說。

稍晚一些時候，港澳地區的記者從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那裏得到消息，讓他們明天上午九時十分在人民大會堂集合，十時有重要人物接見。

這個重要人物是誰呢？記者們猜測可能是鄧小平。

他們真的猜對了。第二天一早，當記者們集合出發時，便得到正式通知，鄧小平將會見出席人大和政協會議的港澳地區代表和委員，並與他們拍照留念，港澳記者們是躬逢其盛。

記者們乘車到達人民大會堂時，剛過九點半。工作人員正忙着擺放照相用的多層梯子，挨個座位貼名字，以便對號入座。記者們閒來無事，便你一言、我一語地擬好了四個問題，等待一會兒看到鄧小平時，派代表提問。

鄧小平要比記者們還要早一些就來到了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他已經通過自己的辦公室發出通知，讓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副主任李後提前半小時到福建廳，要聽他們匯報一下香港的情況。

鄧小平走進福建廳，與姬鵬飛等人一邊握手，一邊笑着說：「你們好啊，今天給我講點甚麼呢？」

姬鵬飛拿過一張香港出版的以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的報紙，指着上邊的一篇文章，對鄧小平說：

「我們對香港同胞宣講中央政策的工作做得不夠。還有一些負責人，講了一些和中央政策不符的話，包括少數中央負責同志在內，增加了香港社會的不安與疑慮。」

鄧小平的眉峰一聳，立刻變得警覺起來：「是哪幾個負責人？」

姬鵬飛望了望李後，兩個人都在斟酌着如何開口。

他們可以舉廣州市計委主任麥揚的例子。此人竟然在公開場合說：「香港未來會包括在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經濟圈內。」幸好很快麥揚就收回了以上說法，才沒有在香港人心中引起更大的疑慮。

麥揚畢竟是個地方官員，他說的話與中央領導層中人物說的話有着完全不同的影響。比如，有一位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據說在人大湖南小組會上講：「中國軍隊不駐香港。」香港記者立刻對這一說法做了報道。而這一說法與鄧小平說過的要在香港駐軍的說法大相徑庭。

據說黃華也說過：「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以後駐聯合國代表團中，可以有香港代表。」

姬鵬飛把以上情況做了簡要匯報，鄧小平聽了甚麼話也沒有說，但臉色明顯地變得陰沉下來。

十點鍾，鄧小平緩步走進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在他的身後跟着吳學謙、姬鵬飛、楊靜仁等人。這時，人大、政協的港澳代表和委員們已經在階梯上站好了，等待合影留念。

鄧小平與站在前排的港澳人士握手問好，港澳記者們抓住這個機會攝取鏡頭。

合影完畢後，鄧小平從座位上站起來，轉身向左邊的港澳人大、政協代表和委員們含笑致意。

記者們本想在合影完畢後，立刻派代表向鄧小平提問。但合影之前，大會方面已打過招呼不讓提問，並說鄧小平在會場接見代表時，記者一律不准入内。

記者們感到很失望，只好眼巴巴地望着人家排成隊走進東大廳會場。正在這時，大會又臨時通知記者們可以進會場拍照五分鐘，但仍然不得提問。

能夠進去拍照畢竟也是好的，數十名港澳記者一擁而入，對着鄧小平又是照相，又是攝影，一時間銀光閃閃，快門聲不斷。

五分鐘的時間很快就要過去了。大會工作人員開始請記者退場。但記者們依然不肯放過最後的機會，一邊後退一邊搶鏡頭。

就在這時，一直坐着未發一言的鄧小平突然打破了沉默，一邊向記者們招手，一邊高聲說道：

「你們香港記者留下來，我要講幾句話！」

聽到這個令人振奮的消息，記者們又驚又喜，又像潮水一樣湧回大廳。

會場立刻響起熱烈的掌聲。

然而，記者們很快就發現事情不對頭。鄧小平臉色陰沉，毫無笑意，難道說他要發脾氣了?!

鄧小平重重地吐出了一口粗氣，似乎有不吐不快之意：

「今天我要發表聲明。第一，中央政府對香港問題的發言，我說是正式的，趙總理說是正式的，還有一個是我們的港澳辦公室，另一個是外交部，有部長和主管這個問題的發言人。除此之外，所有其他人的發言都是無效的，都不算數！」

「第二，我要闢個謠，有人講的香港駐軍問題不是中央的意見。你們去登一條消息，沒有那麼回事。香港是要駐軍的，既然是中國領土，爲甚麼不能駐軍呢？」

在場的記者們不知道鄧小平爲甚麼發這麼大火，更不知道他說的香港駐軍是所爲何來，一個個驚慌失措，有的手忙腳亂地在尋找甚麼東西，有的臉色鐵青，呆若木鷄。

曾經就香港問題採訪過黃華的亞洲電視台女記者沒有聽懂他那四川口音很濃的地方話，只聽見一句甚麼「胡說八道」，還以爲指的是她們發出的新聞，直嚇得花容失色，連麥克風都無力舉起來了。

坐在鄧小平旁邊的香港《大公報》社長、中國記協副主席費彝民，是港澳地區的首席代表，他的臉色也是紅一陣、白一陣，不知所措地說：「五分鐘的拍照時間過去了！」他的用意是想制止鄧小平往下說，但鄧小平此時顯得特別激動，依然旁若無人地講着：

「英國首(外)相傑弗里・豪(即賀維)和我會談時，他也承認中國政府既然收回主權，就有權在

香港駐軍。當然，他也希望中國不駐軍，採取另一種形式。這個明確得很。沒有駐軍這個權力，還叫甚麼中國領土！」

說到這裏，鄧小平可能過於激動，連聲咳嗽起來，下面的話也就被打斷了。

費彝民乘機打住話頭，讓記者退場，工作人員也急忙來幫腔，平時那些三番五次都請不走的記者們，此時卻一反常態，聞聲即三步併作兩步地離開會場，慌慌張張地像逃命一般。

記者們聚集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又聽了一遍鄧小平的講話錄音，一個個不禁面面相覷。

當時的香港民情浮動，謠言橫飛，尤其是香港駐軍問題，更是牽動了好些敏感的香港人的神經。有爲數相當多的人主張不要在香港駐軍，他們擔心解放軍會干預地方事務，不遵守地方法令。還有人主張將軍隊駐在深圳，需要他們時再由特區政府邀請他們來。

如今聽鄧小平的口氣，中國不僅要堅決在香港駐軍，而且還要行使更大的權力。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一旦發佈出去，給香港社會帶來多大的衝擊波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位香港記者仰面長嘆：「這一下香港可要陸沉了！」

有的記者提議先不要把這條消息發回去，立即有不少人贊同，但可惜爲時已晚，有兩家一向彼此競爭的電台記者早已手腳麻利地把消息發了回去。電台傳播消息是最快的，現在恐怕已經播放出去了。

儘管如此，記者們還是熱心地圍在一起商討對策，不希望香港發生「地震」。

經過一番商討，記者們決定守候在大廳口，待會見結束後攔住姬鵬飛、吳學謙這兩位爲鄧小平所認定的正式發言人，請他們對鄧小平剛才說的那番話做一下解釋。

這時，費彝民走了出來。記者們立刻把他圍了起來，要求他說一說鄧小平在記者退場後說了些甚麼。

費彝民告訴記者們，鄧小平剛才說，駐港軍隊人數不必多，大概有三五千人就夠了，這些軍人只是負責防禦、防止暴亂的工作，不管具體治安，不會干涉香港內部事務。

當天下午，負責處理香港記者採訪事宜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宣傳部副部長韓力，將鄧小平關於駐軍問題的談話迅速整理成一份書面材料，分發給記者們，供他們做報道參考。

從各種消息來源證實，鄧小平在記者們退場後這樣指出：「駐軍是象徵性的，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的象徵，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也是香港穩定和繁榮的保證。」「港人治港是最廣泛的自由，除了駐軍之外，幾乎沒有甚麼象徵了。」「應當估計到一九九七年以後會有人搗亂，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亂子不可能不出現，不出現才怪。有了軍隊就不能胡作非爲了。等到亂了再派軍隊，就不同了。」

記者們終於鬆了一口氣。但是他們還是不敢怠慢，立刻發回新的報道，全面解釋和補充鄧小平的講話精神，有的記者還告訴讀者，現在英國駐軍的費用，香港要負擔四分之三，而將來中國駐軍，費用不用香港負擔。既不花錢，又有人幫自己應付突然事件，何樂而不爲呢？

這些報道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得香港的輿論未能產生大嘩，因而也就未能引起人心的大規

模浮動，但造成的影響畢竟無法挽回了。鄧小平關於香港駐軍的講話經香港傳媒報道後，恒生指數下降了三百點。

消息傳到倫敦，引起的卻是另外一種反響。

《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署名文章指出：鄧小平激昂的情緒告訴希思先生和戴卓爾夫人，他們以前看錯人了。鄧不僅信奉實用主義，而且原則性極强，因而才會有這樣的大發雷霆。鄧的動怒是有理由的，一個主權國家對其領土有着排他性的管轄權，其中包括軍事部署。英國人通過傳媒傳出不希望甚至反對中國政府在香港駐軍的意向，這不能不讓鄧大爲反感，以至於公開批評另一位中共高級領導人。如果在此之前我們還幻想鄧能有所讓步的話，在此之後就永遠不要存此幻想了。

戴卓爾夫人和希思先生分別看到了這篇文章，看完後扔下報紙，他們都沉默了很久很久。

這裏還有一個小插曲：鄧小平動怒之後，他又得知自己錯怪了黃華，黃華沒有講駐軍問題。於是他做了自我批評。三天後，他在接見船王包玉剛時，還表示：「黃華同志沒有說過駐軍問題，我不該錯怪他。」

當鄧小平出以公心而動怒時，人們能夠體諒他，當他以知錯就改的精神勇於認錯時，人們又欽佩他的政治家風家。這樣有情有性的領袖，令人感到親切無比，又不能不肅然起敬。

10

柳暗花明前邊出現山重水復，中英談判出現危機，賀維風塵僕僕趕到北京。鄧小平談了他的五點希望，尤德聽了心中暗暗吃驚。北角印務局燈火通明，連夜趕印中英聯合聲明。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中英會談已經到了最後衝刺階段。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中英會談進展順利。許多有經驗的國際觀察家預測，中英會談很可能提前結束，而不用等到最後期限。

七月二十四日，中英第十九輪會談開始前，中英兩國的談判代表在一起談天，還是那個老話題——天氣。北京即將進入酷暑，而一談起北京的酷暑，英國人就不免談虎色變。倫敦的緯度和中國最北端的黑龍江省漠河差不多。倫敦人要比北京人更怕熱。

周南首先把話題拉到談判上來，這可是第一次：

「今後的十五天，也許是我們最忙碌的日子。」

他轉向尤德：「你會特別忙。」

伊文思說：「去年冬天我們也很忙碌。」

周南說：「酷暑時期也許會比嚴寒時期更忙碌。」

在場的記者們把這番對話迅速地記下來，迅速地報道出去，又迅速地作出同樣的預測：中英談

判忙碌過十五天後就會宣告結束。

就在性急的人們準備好了慶祝勝利的美酒時，卻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中英會談似乎遇到了一個很大的麻煩，中英會談面臨着在最後關頭擱淺的危險。

七月五日，英國政府召開特別會議，討論中英談判問題，伊文思和尤德作爲特邀代表出席會議，會議的內容對外保密，但據首相府內接近首相的人士透露，中國方面提出了一項英國政府不能接受的提議。

七月七日，尤德自倫敦返回香港。他告訴人們不要聽信謠傳，中英會談正在正常進行之中，沒有任何戲劇性的情況發生。

與此同時，英駐華使館發言人英克斯特鄭重表示，中英談判没有出現任何危機。

七月十二日，盧斯突然抵達香港，英國外交部對此作出的解釋是，盧斯此行是大臣們經常性的訪問的一部份，没有必要大驚小怪。

盧斯在啓德機場告訴聞訊而來的記者：「我們需要有正確地觀察事物的能力，我們需要避免喋喋不休的議論而使我們產生危機感，我們要保持鎮定。」

七月二十五日，賀維離開倫敦希思機場，前往香港。他没有像以往那樣發表聲明，但誰都知道他此行是去訪問北京。

據熟悉内情的人透露，戴卓爾夫人之所以挑選賀維出訪北京，不僅僅因爲賀維是外交大臣，更因爲賀維言行謹慎，没有脾氣，有「死綿羊」的綽號。在咄咄逼人的中國人面前，正需要他這種性

格去委屈求全，化解危機。

七月二十六日，賀維在香港告訴記者：「雖然有許多重要問題仍有待於解決，但中英談判是按規定的軌道前進，沒有出現任何危機。」

左一個沒有危機，右一個沒有危機，這正應了一句常言：越描越黑。就連那些一直相信中英談判在順利進行的人也開始產生懷疑了。

七月二十七日下午，賀維一行冒着攝氏三十多度的炎熱，從香港飛抵北京。與他同行的有伊文思、尤德、柯利達等人。

吳學謙前往機場歡迎英國客人。趁賀維乘坐的飛機尚未到達之機，記者們向吳學謙詢問賀維此次訪華的用意。吳告訴記者，中英雙方還需要進行廣泛深入的會談，只要雙方本着合作信任的態度，就會取得新的進展。

同一天，英國駐華使館的發言人英克斯特接受外國記者採訪，他說的一番話就不像吳學謙那樣讓人放心了。

英克斯特說，談判雙方遇到了一些難以處理然而對協定來説又是實質性的問題，顯然，達不成協議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或者説談判的失敗也是想像得到的，即便達成協議，也無法讓我國的議會接受。但我們非常希望不要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正在盡力不讓這種情況出現。我們的目的是要找出在一定的前提之下能夠取得一致意見的東西。關於這一點，只有到整個事情有了一個結局之後，我們才有話可説。

英克斯特的閃爍其辭更讓人疑竇叢生：莫非中英談判真的出現了危機嗎？

的確如此，中英談判醞釀着危機，而且由來已久。

自從第十二輪會談雙方轉入討論過渡時期香港的安排和有關政權移交的事項後，中方就提出了一個建議，在香港設立常設性的中英聯合小組，其任務是協調中英協議的執行，商談有關實現政權順利移交的具體措施。

賀維四月份訪華時，鄧小平親自向他提出，在過渡時期裏有許多事情要做，沒有一個機構怎麼行？鄧表示可以考慮這個小組設在香港，輪流在香港、北京、倫敦開會。賀維當場表示在此基礎上雙方可以協商。

但是，在談判桌上，英方卻堅決反對中方的那個建議，他們表示哪怕是一個設想也很難接受。按他們的意見，一九九七年一到，我們把香港交給你們就是了，哪來的甚麼「過渡時期」，因而不應該設立任何常設機構，以免造成中英共管的印象。

中方不斷地向英方解釋，聯絡小組既不是權力機構，更不是權力執行機構，只是在雙方遇到可能發生的重大問題時，由它來組織商討解決辦法，它既不參予香港政府的行政管理，也不對其起監督作用。

儘管如此，英方還是不予接受。他們說，英國不願意當「跛腳鴨」。

「跛腳鴨」是個美國俚語。新總統當選而舊總統尚未卸任時，舊總統實際上已很難有所作為，所以被稱為「跛腳鴨」。

英國人過去指責中方不遵守會談的保密約定，這次他們是明知故犯，有意將這個消息透露出去，並引導香港人把聯絡小組想像成香港的第二權力中心，或者是凌駕於港英政府之上的權力組織。

這個消息一透露出去，立刻在香港社會引起軒然大波。許多不瞭解實際情況的香港人紛紛表示反對，還有很多組織發表聲明，指責中方設立這樣一個聯絡小組是不明智之舉，容易引起海外人士的誤解，又會導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權威遭到破壞。

由於雙方立場嚴重對立，致使中英談判在這個問題上陷入僵局。

英國人着急了，他們下決心不讓步，但又害怕會談延期，中國人真的單方面宣佈解決香港問題的處理方案。

中國人也着急了。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五週年國慶，全國上下都希望在此之前簽訂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的中英協議，以此向國慶獻上一份厚禮。

賀維滿懷憂慮匆忙而來，中國人滿懷希望盼他前來。

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中國外交部長吳學謙和英國外交大臣賀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談，雙方各帶十名高級官員當助手。

會談一連進行了兩天。兩國外長在七月二十八日談了五個多小時，七月二十九日談了兩個多小時，接着又分別指示其屬下談了兩個多小時。

密切注視着中英外長級會談的記者們找到了賀維的發言人，希望他能透露出一點內情。他告訴

記者，賀維希望澄清某些問題。但究竟是甚麼問題，他賣了個關子：「不便告訴諸位。」

七月二十九日晚，記者們發現這次會談朝着好的方向發展的跡象。賀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答謝宴會時，他用頗爲自豪的口吻説，他此行就是爲了掃清障礙而來，而且雙方已經朝着目標邁進了一大步。

七月三十日上午，趙紫陽接見了賀維，讚揚他爲中英會談增加了新的動力。

賀維謙遜地表示，真正推動中英會談的還是鄧小平。

賀維到達北京後，鄧小平也從中國著名的海濱療養地北戴河回到了北京。在北戴河療養期間，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始終注視着中英會談的進展情況，鄧小平指示，在原則問題上不能妥協和讓步，但中英會談也不能觸礁，要想辦法繞過去。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精神，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先後建議，可以把聯絡小組的工作時間延續到一九九七年以後不久，這樣就可以讓英國人和香港人明白，中國人根本不想讓聯絡小組長期存在下去，同時也給英國人一個台階下。

鄧小平採納了這個建議。

吳學謙接到來自北戴河的指示後，便據此與賀維進行商談。賀維認爲中方建議可行，雙方很快就達成了協議：聯合聯絡小組自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起以香港爲主要駐地，將一直工作到二〇〇〇年一月一日爲止。

關於這個小組的職權，雙方作出如下規定：

1.就中英簽訂的《聯合聲明》的實施進行磋商；

2.討論與一九九七年政權順利交接有關的事宜；

3.就雙方同意的問題交換情況並進行磋商。

至此，籠罩在中英談判上空的最後一片烏雲徹底消散。

天空晴朗，前途光明。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近十時，鄧小平來到人民大會堂，他將在這裏會見英國外交大臣賀維。陪同他接見英國客人的有姬鵬飛、周南以及中國新任駐英大使陳肇源。

鄧小平今天的興致特別高，對於記者的提問他幾乎是有問必答。對於衆人都十分關心的中英兩國外長會談，他告訴記者，這次會談是在互諒互讓的氣氛中進行的，雙方談得很好，效果也很好，值得祝賀。

十時整，賀維、伊文思、尤德、柯利達等英國客人走進會見大廳。

鄧小平與英國客人一一握手並互致問候。

鄧小平對四個月内兩度訪華的賀維說：「大臣閣下，你好辛苦呀！」

賀維笑着答道：「不辛苦。在工作間隙的時間，我休息得很好。」

在記者們忙着拍照的時間裏，鄧小平與賀維閒談起來。

鄧小平告訴賀維：「我記得上次我對你說過，現在我打算盡量少幹工作，工作都留給別人去

幹，這樣我就成了中國最大的官僚了。」

賀維被鄧小平的話逗笑了：「中國很多事情還需要你操心。」

鄧小平笑道：「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活到一九九七年，那時我將完全退休，甚麼事情也不幹。那樣我完全可以多活幾年。」

賀維真誠地祝願鄧小平健康長壽。

鄧小平又請賀維轉達他對戴卓爾夫人的問候：「戴高樂將軍結束了法國的殖民主義統治，我們要說，戴卓爾夫人結束了英國的殖民統治。」

記者們退走後，雙方的談話進入正題。

鄧小平告訴賀維，「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從中國解決台灣和香港問題的實際出發的。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永遠不會改變，但是根據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證它們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

鄧小平又說，現在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會談基本上達成了一致，這說明「一國兩制」是行得通的。這件事會在國際上引起很好的反應，而且爲世界各國提供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一個範例。

賀維接着表示，解決好香港問題，對雙方都很重要。鄧小平主任提出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極有遠見，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振奮人心的概念，它能夠保持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以後的繁榮和穩定。

鄧小平坦率地告訴賀維，他並不擔心一九九七年以後的事情，卻非常關注從現在開始的過渡時期。他希望香港在過渡期內，不要出現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希望不要出現動搖港幣地位的情況。港幣的信譽好是因爲儲備金雄厚，多於發行量，不要改變這種狀態。

第二，我們同意可以批出一九九七年後五十年內的土地契約，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動用這種賣地收入，但希望用於香港的基本建設和土地開發，而不是用作行政開支。

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隨意增加人員和薪金、退休金金額，那將會增加將來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負擔。

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過渡時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將來强加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勸說有關方面的人不要讓英資帶頭轉走資金。

賀維一邊聽一邊點頭。

伊文思一邊聽一邊心中暗暗佩服。他原以爲今天只是個禮節性的接見，没有想到鄧小平談得這麼具體，而且都是決定香港能否順利回歸以及回歸後能否穩定繁榮的關鍵問題。直到這一刻他才明白，中方談判代表團的真正團長，就是眼前這位娓娓而談的古稀老人。

尤德一邊聽一邊心中暗暗吃驚，作爲港督，他知道港英政府中有不少人在打過渡期的主意。可是這些正在背地裏策劃的見不得人的東西，全讓鄧小平一一點破了，陰謀一旦曝光，還能起甚麼作用嗎？

會見結束後，賀維稍事休息，就前往首都機場。周南和齊懷遠爲他送行。在機場，周南等人被記者圍住，詢問中英會談的進展。

齊懷遠回答：「主要問題已經解決，但是還有一些工作要做。」

周南則吟出一句宋代大詩人陸游的《遊山西村》中的詩句：「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們兩個人的回答一文一詩，一實一虛，相得益彰，相映成趣。

四個半小時後，已經回到香港的賀維告訴記者，中英關於香港前途的協議，將在九月底草簽。

八月一日，賀維在香港召開記者招待會。這一次用不着記者們刨根問底，也用不着他們推測弦外之音，賀維將中英協議的主要條款合盤托出：

1.保持香港熟悉的法律制度和目前在香港沿用的一切法律。

2.使香港可以繼續維持決定其本身的經濟和貿易政策，維持其自由港和主要製造業及貿易地區的地位。

3.保持香港單獨關稅地區的地位，可以繼續參加國際經濟和貿易協定。

4.使香港能夠自行處理制定貨幣和金融政策。

5.使港元繼續成爲自由兌換的貨幣。

6.使香港現在任職的公務人員和司法人員可以留任，退休有保障。

7.保持香港現有的外匯、證券、期貨市場以及自由匯兌體制。

8.讓香港居民享有自由旅遊、自由出入的權利。
9.維持香港現有的教育制度。
10.維持香港人目前所享有的各種權利和自由。
賀維還主動告訴記者，餘下幾輪中英會談將主要研究解決土地、國籍、民航等問題。

八月九日，中英第二十輪會談剛剛結束，中英談判代表團各自抽調人馬，以中方魯平、英方麥若彬牽頭又成立一個新的工作小組，專門研究土地出售、民航着陸權等尚待解決的問題。

八月二十二日，中英第二十一輪會談結束，伊文思告訴記者，中英會談很可能要到第二十四輪才會結束。同時，記者還獲悉，由柯在鑠、魏德巍和魯平、麥若彬分別領導的工作小組正日以繼夜地工作，真正留給他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九月五日，中英第二十二輪會談在釣魚台國賓館開始。參加這一輪會談的正式代表，中方有六個人，英方只剩下四個人，其餘的人都參加了那兩個小組的工作。

同往常一樣，周南和伊文思又以閒談拉開了會談的序幕。

周南告訴伊文思，九月十日是中國農曆的八月十五，也就是中秋節。按中國人的習俗，這一天要賞月吃月餅。周南答應請英國談判代表團的全體成員吃月餅。

伊文思高興地表示感謝。

周南又說：「現在已經是秋天了。記得大使先生正是秋天來的，那麼就經歷了三個季節了，春

天、夏天、秋天——秋天是收穫的季節。」

此話不難理解：中英會談的圓滿結束指日可待。

與往常不同的是，工作小組的成員在這一天從國際俱樂部搬進了釣魚台國賓館，開始與談判代表團同地工作。工作小組的成員每天連續工作長達十個小時。

在這一輪會談中雙方商定，將協定的全部內容寫成具有明確約束力的法律條文，排印成文本，經核實後提交給中國國務院和英國內閣審閱。

細心的人們注意到，此次會談後發表的公報指出，第二十三輪會談的時間待定。

英國駐華大使館的發言人英克斯特告訴記者，中英間有些問題還懸而未決，工作小組正在舉行非正式會談。雙方可能還需要進行一輪會談，以解決行政方面的一些問題。

九月六日，尤德返港。他第一次可以不用字斟句酌地向記者發表談話：「你們注意到了下一輪會談的日期沒有公佈，但是我可以向你們保證，這沒有甚麼可擔心的。正如你們知道的，我們的目標是在九月底以前完成我們的工作。」

他又告訴記者們：「那兩個工作小組很忙，而且工作很努力，所以我們考慮這一次要保持一點靈活性，不要一下子把會談日期定死。」

中英會談剩下的最後一個難題就是航空權問題。如果香港回歸後，仍然只有一家國泰航空公司，就會形成英國人的壟斷。而且英國飛機在香港降落還有一個着陸權問題。

在這個最後的難題上，中方作了讓步，從而使它得到解決。

這個消息傳到香港，對政治問題一向敏感的股票市場立刻出現一股漲風，一下子漲了三十三點。到了九月二十日，恒生指數越過一千點大關。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香港出現了普通話熱，在香港報紙刊出僱人的廣告上，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把會說普通話作爲主要條件之一。

九月十九日，中英雙方分別宣佈已將協議文本提交本國政府研究。

伊文思眉飛色舞地告訴記者：「没有必要進行第二十三輪會談了。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的任務，爲甚麼還要再舉行一輪會談呢？」

三天之前，尤德就帶着香港行政代表團前往倫敦。他此行的重要任務就是向戴卓爾夫人匯報中英會談最後階段的情況。在他的公文包裏，放着一份最後確定的中英協議的文本。

戴卓爾夫人很快就接見了尤德一行，她對香港兩局非官守議員在中英談判過程中所提供的諮詢服務表示感謝。

九月二十日上午，英國内閣召開會議，批准了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協議草案。

九月二十一日，賀維舉行記者招待會。當記者問到中國領導人在北京向賀維作出的保證有多少可靠性時，賀維回答道：「這是兩個主權國家可以向對方作出的最莊嚴的保證。歸根結底是個信任問題，當今世界上許多事情都是這樣。當然，如果中國撕毁了五十年保留香港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協議，英國政府也是無能爲力。」

記者問：「英國是否爲香港人盡了力，還是僅僅爲達成協議而保持了務實的態度？」

賀維答道：「或許是三者兼而有之，我們不得不着手處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記者問：「英國爲甚麼拒絕給二百六十萬持英國護照的香港人以居住權？」

賀維答道：「對於我們來說，重要的事情是要設計好這艘大船，而不是着手建造幾艘救生艇。我們認爲，我們已經爲此做出了我們能夠做到的事情。」

賀維與其說是在答記者問，不如說是在向香港人民發表演說。他想讓香港人相信，英國人爲他們做出的安排是他們所能得到的最好結果。

九月二十二日晚，香港北角政府印務局裏燈火通明。這裏剛剛接到香港政府的緊急通知，要在二十五日前趕印出中英聯合聲明中文本一百二十萬份，英文本二十五萬份。由於時間緊，印量大，這裏的工人被告知要從現在開始吃住在局裏，加班加點日夜工作，直至完工。

爲了防止洩密，印務局的每個出口都有武裝軍警把守。印務局的員工可以用電話與家人聯繫，但電話只能打出，不能打進，而且所有通訊設備都被安上了竊聽裝置，每天三頓飯由專人包辦，按時送到工作現場。

二十五日下午，印務局保質保量地完成了這項特殊任務。

如今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人們在等待着中英協議草簽那個時刻的到來。

11 周南、伊文思大筆一揮，英國對香港殖民統治的歷史行將結束。香港市民排起長龍，冒雨索要《中英聯合聲明》。英國政界對中英協議普遍表示歡迎。

九月末的北京，郊外是一片深秋的豐收景象。香山紅葉如火，層林盡染。果園裏枝頭上掛着紅紅的蘋果，黃黃的梨子，讓人垂涎欲滴。

北京城裏，大街小巷早早就披上了節日的盛裝。天安門廣場上更是鮮花盛開，彩旗飄揚。中國人正在積極準備，歡慶三十五週年國慶。

在此之前，他們迎來了一個值得歡慶的日子。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將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有「中國議會大廈」之稱的西大廳裏舉行草簽儀式。

上午九時，一百五十多名中外記者就進入了鋪着紅色地毯的草簽儀式會場。胸前掛着採訪證的三十六名香港記者更是拿出衝鋒陷陣的架式，一入場便爭先恐後地搶佔有利的拍照位置。

西大廳中央放着一張鋪着墨綠色台面呢的長桌，桌中央插着中英兩國國旗，用紅色絨套裹着的《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文本，引人注目地放在長桌上，文本旁放着兩個印簽。正對着長桌的牆上掛着一幅「松柏長青」的巨型壁畫，畫面上蒼松翠柏，鬱鬱葱葱，七八隻和平鴿或雀躍枝

頭，或在半空飛翔。

在中國，鴿子象徵着和平，松柏象徵着堅定。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站在桌前五排木製托架上的記者們，正緊張地對手中的攝影機、錄音機、照相機做最後的檢查。

與此同時，香港各企業、機關、學校等單位都打開電視機，讓人們觀看中英草簽儀式。

街上的行人全都湧到電器商行門前，因爲這裏有電視可看。

在鴨寮街等拍賣區，過去一向充斥着流行歌曲的聲音，此刻卻回響着電台轉播的草簽現場錄音。

在一家醫療診所裏，醫生早早地就打開了電視機，他和病人一樣，都希望在第一時間裏看到草簽儀式現場情況。

九時五十五分，中國方面出席簽字儀式的姬鵬飛、姚廣、周南等二十五人步入會場。稍後，英國方面的代表伊文思、尤德、麥若彬、歐威廉等人魚貫而入。雙方成員一一握手，接着各就其位。

周南和伊文思分別坐在長桌的左右兩方，桌子後面的台階上分三排站立着四十一名中英官員。

中國外交部條約法規司副處長張愉和英國駐華使館一等秘書歐威廉來到長桌前，最後互相核實最後簽字的位置。

時針終於指向十時整，這個萬衆矚目的歷史性一刻終於來到了。

周南和伊文思分別來到長桌前坐下來，拿起簽字筆，先後在三份協議文本上簽字並蓋印。

周南和伊文思拿起的是兩支普普通通的簽字筆，但這一筆落下去卻意義重大，它宣告當年在英國殖民主義者炮火淫威下失去的香港即將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也宣告英國對香港進行殖民統治歷史行將結束。

就在他們手中的筆與桌上的文本接觸的一剎那間，整個西大廳被閃光燈和射燈照得如同白晝。簽字完畢，周南和伊文思起立交換文本，大廳裏響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在掌聲中，周南用西方人的禮節擁抱了伊文思，並且親吻一下他的臉頰。他倆相視而笑。

中英兩國談判代表團以及工作小組的成員們相互握手，共同舉杯以示慶祝。在談判桌上，他們是對手。如今他們都好像老朋友一樣，互相祝賀。他們全都開心地笑了。他們以日日夜夜的辛勤工作，終於完成了各自擔負的歷史使命。

周南首先舉杯致辭：「我們能夠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首先要歸功於中英兩國領導人遠見卓識的決策。協議草簽後，還要依照各自的法律程序進行審議，並於今年年底之前正式簽署。但無論如何，我們在一起已經邁過了決定性的路程。」

接着伊文思致辭：「中英聯合聲明體現了『一國兩制』這個富有想像力的構想，並且證明和平談判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最好辦法。」

伊文思以英國談判代表團全體成員的名義，對中國談判代表團全體成員表現出來的才能和致力於工作的態度表示讚揚。他這番話是由衷而發。

草簽儀式結束後，尤德急忙返港。在首都機場，他對記者說：「我對能來參加這個儀式感到很高興。」回到香港後，他又對記者發表講話：「凡是協議各款涉及到的所有人，也許不會對這份協議感到滿意，但沒有任何一項協議會使人人都感到滿意，在過去兩年的秘密談判中，我們在一直審慎地注意着並充分考慮香港人的看法。」

當晚七時，尤德向香港立法局特別會議推薦介紹中英協議，各國駐港領事館派代表出席旁聽。尤德又重複了一遍他在機場對記者說過的話。

尤德反覆强調這段話是有深意的。英國政府一直擔心，中英協議公佈後會引起人心浮動，往最壞處想還有可能發生騷亂。因此，在此之前港英政府一直唱低調，以免香港人因爲對中英協議抱的期望太大，出現較大的心理反差。

在印製《中英聯合聲明》時，港英政府已經有所安排，把一份早已起草好的引言印在前邊，一同散發出去，希望以此起到安撫人心的作用。

這份引言說：「爲避免有任何誤解起見，英國政府有責任清楚説明，除了接受這份協議外，沒有甚麼可行的辦法。要更改這份協議是沒有可能的，假如不接受這份協議，就會沒有任何協議，中國政府已經明確表示，假如這份協議不被接受，中國政府將不會重開談判，並且會自行公佈對香港的一套方案，這一套單方面宣佈的方案是否會包括這份協議草案內所載的各項條款，是不能確知的，而且也不會有兩個國家所簽訂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的同樣地位。因此，目前的選擇就是在

一項雙方同意而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協議下，把香港歸還給中國，或是在沒有這種協議的情況下，把香港歸還給中國。這並不是英國政府設法强使香港人接受的選擇，而是一項歷史事實遺留給香港人的選擇。」

英國人擺出一副可憐兮兮的模樣，好像他們與中國簽協議是無可奈何之舉。其實，這是一條「以鄰爲壑」之計，而且是無水先築壩，把香港人可能會有的怨氣全引發到北京方面。

結果，英國人的這份精明白白浪費了。

中英協議的內容傳到香港後，香港股票市場在經過數日徘徊後，掉頭上升，重越一千大關，創出五月以來的最高記錄。昔日美元兑換港幣的匯價一直徘徊不前，如今也是急升零點四，報七十四點零。

香港記者四處活動，到處收集香港各界的反應，也是喜大於憂。

一位辦事員說：「我們現在終於可以鬆口氣了。當事情没有定下來時，人人都爲前途擔心，現在事情至少已經清楚了。」

一位家庭主婦說：「我寧願持樂觀態度，看來這份協議是再好不過了。他們還能提出別的甚麼要求嗎？我相信中國所採取的行動，也就是香港人準備採取的行動。」

一位房地產巨商說：「我相信，中英協議草簽後，有助於恢復房地產市場的生機。」

二十六日晚上，香港下起了小雨，但這卻絲毫没有影響廣大市民索要《中英聯合聲明》的熱情。

下午五時四十分，在中區政府刊物銷售處門前就有人開始排隊，排在最前邊的是一個中學生。未過多久，在他身後就排出了一列上千人的長龍。

在灣仔政務處排隊的市民也是數以千數，人龍圍着軒尼詩道至菲林明道整整排了一圈。在龍尾，警務人員和政務處的工作人員手持話筒，告訴排隊市民這裏的材料不夠多，勸他們趕快到拱北行政府新聞處去索取，那裏通宵發放，但是很多人不聽勸告。結果，九時二十分，這裏的材料全部發完，排在後邊的失望而歸。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香港人都這樣關注中英協議。在中環天星碼頭，就出現了這樣的奇景：一邊是市民排着長隊索要《中英聯合聲明》，另一邊是賽馬迷們全神貫注地觀看賽場內的搏殺。

當然，香港也有持反對態度的人，尤其是那些從大陸偷渡到香港的人更是萬分沮喪。一位已獲得香港居留權的偷渡客說：「一切一切都完了！我們被出賣了！我們把性命交給了英國人，可英國人卻把我們丟進了深淵。」

二十七日早晨，在尖沙咀天星碼頭附近一個不太顯眼的廣告箱上，貼出了三張傳單，署名是「香港自救行動聯盟」。傳單上寫着這樣幾句話：「强烈抗議英國與中共製造的歷史大騙局！」「我們要自決！」行人們對這些傳單投以冷漠的目光，幾乎是視而不見。

中英協議草簽的消息傳到英國後，英國人普遍反應平靜。英國人原先存在着兩個擔心：一是擔心中英協議不符合香港人的意願和利益，導致大批香港人逃英；二是擔心再度發生文化大革命期間

一些過激分子要用武力奪回香港那樣的事件。

正在香港訪問的反對黨議員貝爾打消了公衆的前一個顧慮。他告訴英國人，他親眼看到了香港民心穩定，市民普遍歡迎香港回歸。

對於公衆的後一個顧慮，英國政府發言人說，要相信中國政府的誠意。英國議會香港問題小組主席布萊克說，他相信中英協議在國際法上有約束力。

英國政界對於中英協議普遍表示歡迎，而這在一向愛鬧分裂的政界是很少有的現象。

英國的官方反應是由賀維做出的。

九月二十六日，正在紐約參加聯合國會議的賀維接受了英國廣播公司的電視採訪，他告訴電視觀衆：「對於香港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內容豐富的協議，它使得香港人作出留在香港的決定是可能的、可取的、明智的。這個協議是能夠經受住時間考驗的。我們對這個協議抱有信心的真正原因，不僅因爲它是一項非常詳盡的具有國際約束力的協議，而且是因爲它是一項符合雙方利益的協議。」

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官邸裏，戴卓爾夫人一個人靜靜地觀看電視轉播。當中英協議草簽結束後，她長長地吁出了一口氣，最近一段時間，罷工和失業問題鬧得她狼狽不堪，尤其是長達七個月之久的礦工大罷工，更讓她頭疼。她希望隨着中英協議的草簽，中英關係進一步改善，會給英國人帶來成千上萬個就業機會。她知道中國人喜歡購買英國的飛機、計算機。英國人開採海上石油的技術也是世界一流的，中國人不能不需要。

訪。

中英協議草簽儀式剛剛結束，數名香港記者就奔出人民大會堂，來到天安門廣場上進行現場採訪。

在天安門廣場執勤的一位警察告訴記者：「我想香港人民一定很高興。我們大家都很高興。所有中國人都很高興。」

香港記者走進人群之中，要他們對中英草簽協議一事發表意見。一個年輕人說：「我們感到很高興，這是一個重大勝利。」

一位年老的工人說：「我想，無論如何英國人也應該把香港歸還給中國，香港在歷史上就是我們的。」

周圍的人紛紛點頭，對他的話表示贊同。

中國領導人選擇了一個恰當的時機，表達了中國官方對此事的反應。

十月二日，趙紫陽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以港英政府布政司夏鼎基爲首的香港政界知名人士訪問團，這個團體是到北京參加中國國慶三十五週年紀念活動的，其團員主要是兩局非官守議員，如鍾士元、羅保、沈弼、李鵬飛、林漢强等。趙紫陽對他們說，《中英聯合聲明》是中國和世界現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中英兩國政府能夠達成協議是由於雙方採取了互諒互讓的精神，今後協議的貫徹也必須依靠這種精神。

十月三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的全體成員。鄧小平再次表示，他

希望能活到一九九七年，親眼看到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鄧小平風趣地說：「現在有些人就是擔心我們這些人不在了，政策會變。感謝大家對我們這些老頭子的信任。我要告訴大家，我們的政策不會變，誰也變不了。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五十年以後，大陸發展起來了，那時還會小裏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

鄧小平說：「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我們相信自己會遵守，也相信英國人會遵守，更相信香港同胞會遵守。但是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執行。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人們議論的總是北京方面政策會不會變，卻沒有想到其他方面會不會發生變化。」

最後，鄧小平向香港五百萬各行各業的人士提出他的希望：「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團結一致，共同努力，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爲一九九七年政權順利移交作出貢獻。」

鄧小平的話使人們的思緒跨過十五年的時空，飛到一九九七年時的香港，飛到一九九七年以後的香港。

12

戴卓爾夫人與戈爾巴喬夫會談後，踏上了雄心勃勃的外交旅程。她帶給趙紫陽的禮物是一台電子計算機。胡耀邦告訴她中國有五千萬人在學英語。《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字，香港從此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時間的車輪駛入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後，全世界的新聞記者都在探聽這樣一條消息：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哪一天簽字？

英國外交大臣賀維、英國外交部、首相官邸統一口徑對外宣佈，協議將在年底正式簽字，但拒絕回答具體日期。

倒是戴卓爾夫人說得更確切一點。她在十一月十九日那天就告訴記者，她希望能在距十二月底前不太遠的時候正式簽字。

人們普遍推測，中英協議將在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日間正式簽字。

簽字時間遲遲不定，倒不是因爲又有了甚麼麻煩，而是因爲還有一些程序要走。

英國國會下議院將在十二月初對中英協議進行辯論，然後送交國會等待批准。

這種辯論此時已經成爲形式，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就是「走過場」。但是這個過場必須要走。

十一月三十日，尤德帶領由香港立法、行政兩局十二名非官守議員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倫敦，列

席旁聽英國國會辯論。

尤德告訴記者，這個代表團不是爲了反對中英協議而來。當然，這個協議中的若干細節還是令人擔憂和懷疑的，但不能要求這個協議使所有的人都高興。

尤德說這番話是有根據的。七月十八日，賀維宣佈在香港成立一個民意估評處，負責整理和評價香港市民對中英協議的意見。十一月九日，這個評估處對於收集到的來自個人和組織的三千五百五十九條意見進行分析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大部份香港人認爲中英協議可以接受。評估處的英國官員說：「這個反應令人鼓舞。雖然有人有保留，但應該看到，人們還是普遍接受這個協議的。」

英國國會中有些議員是反對簽訂這份中英協議的，他們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該協議不會爲香港人所接受。如今這份由英國人自己作出的評估，完全可以讓那些議員啞口無言。

十一月九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告訴記者，委員們認真地討論了中英協議包含的所有文件，認爲比較現實又合情合理，充分考慮到了中國人民和香港同胞的利益以及香港的歷史和現狀，一致同意將中英協議提交全國人大全體會議審查批准。

由此看來，中英協議正式簽字的日子爲期不遠了。

進入十二月中旬後，戴卓爾夫人身邊的工作人員全都像高速運轉的機器一樣行動起來。他們要爲首相制定一份詳細而周密的出訪計劃。

十二月十五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將率一個三十人的議會代表團訪問英國，這是戈爾巴喬夫決心擺脱孤立主義的重要步驟。戴卓爾夫人必須對他表現出相當的熱情來，還要藉此機會讓英國在世界上扮演一次强國的角色。戈氏訪英也給她訪華增添了一項內容，從中國領導人那裏瞭解中蘇關係的前景會怎麼樣，從而更好地確定如何發展多邊關係。

結束對北京的訪問後，她將途經香港暫停，然後經檀香山飛往華盛頓。預計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午，她將同美國副總統布殊共進午餐，下午到戴維營與連任總統的列根共進茶點。她將向列根介紹訪華以及與蘇聯總統會談的情況，以便英美兩國採取協調行動。

如此緊張匆忙的出訪使得爲戴卓爾夫人編排計劃的工作人員大爲躊躇。在不到六天的時間裏，在飛機上她就要呆五十四個小時。即使在剩下的時間裏不吃不喝不睡，似乎也難以把她要幹的事情幹完。這樣看來，她乘坐的那架速度本來就不太快的皇家空軍的 VC10 飛機就顯得太慢了。

戴卓爾夫人一向以她鐵一般的體質令人感到震驚。但凡是熟悉她的人都不能不爲她擔心，要是她堅持按這種速度辦事，早晚是要累垮的。

內閣的部長們在私下裏悄悄議論，在短短一週的時間裏能與中、蘇、美三個大國的領導人會談，這樣的機會實在是千載難逢。本來就雄心勃勃的「鐵娘子」豈能會白白浪費這樣的良機，她要以公認的世界女政治家的形象登上國際舞台。正是在這種不斷增長的雄心的鼓舞下，她才能開始這次驚人的外交冒險。

這些部長們只看對了戴卓爾夫人的一半心思。

這次訪華，一半是出於政治原因，一半是出於經濟原因。中英協議簽訂後，外國企業在香港的投資迅速增加。精明的企業家們都在打着這樣的算盤：既然香港的地位不會發生改變，那麽爲甚麽不及早在「這裏建立起立腳點呢？」五十年不變的允諾太吸引人了！香港的特惠關税、通貨交換、自由港的地位，對做生意的人，辦企業的人都有着無比的誘惑力。

在這場令人瞠目結舌的投資戰中，美國人和日本人捷足先登。美國第一花旗銀行火速決定在香港開辦兩家貿易公司。美國銀行着手在香港建立世界第一流的國際數據中心。大型零售業商業中心立刻建立爲香港中國百貨公司提供消費品的供給中心。日本大成建設公司在香港修建一座二十五層的大樓，其中八層租借給崇光百貨公司開辦香港最大的百貨公司。

吉田工業公司投資三億港幣在香港建立新廠。

講究紳士風度的英國人過了好半天才醒過味來。英國電報與無線電公司急急忙忙從香港電話公司購買了相當於二點五億美元的股票，總算在香港的投資戰中搶到了一筆買賣。

戴卓爾夫人對英國人的落後保守大爲不滿。在對華貿易中，英國有香港可以利用，本來大佔優勢，但卻遠遠比不上歐洲共同體中的法國和德國。一九八三年全年，英國向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只出口了大約二億美元的商品。

她要通過這次訪華的機會，鞏固和加强雙方在經濟方面的雙邊關係。她首先要和中國人談談準備在廣東大亞灣修建的核電站，法國的法美原子能設備公司已經把核設施的安裝搶走了，這次一定要讓英國的通用電氣公司把非核部份的設備包下來，這樣一筆生意就是數億美元。其次，她還要向中國人推薦英國的石油鑽探設備、煤炭開採和裝卸設備以及其他先進技術和設備。

如果能夠做成幾筆大買賣，也就算不虛此行了。

臨行前，她特地囑咐身邊的工作人員，爲她給中國領導人準備一件特殊的禮品。過去她給外國領導人送過陶瓷器和古玩，這次她要讓中國人見識見識英國人的高新科學技術。

十二月十七日，港督尤德抵京，他是來參加中英協議簽字儀式的，同時爲戴卓爾夫人訪華做一些先期準備工作。

在首都機場，他對攔住他去路的香港記者說：「我在熱切地期望着出席這一協議的簽字儀式。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這是過去兩年中一大批人辛勤努力的結果。」

在這一大批人，也包括尤德在內。

當記者問到戴卓爾夫人在北京三十六個小時停留期間的日程安排時，尤德用外交辭令答道：「我想，她來北京之後，將在這段時間內盡可能多地與別人會晤，盡可能多地做她所能做的事情。」

與他一同乘坐中國民航班機到達北京的還有一個名聲顯赫人物，他就是香港航運業巨頭包玉

剛。這次到北京，鄧小平預定要接見他。

十二月十八日，由來自香港政府、工商界、勞工界、法律界等方面一百零一名代表組成的觀禮團乘飛機到達北京。

邀請香港各界人士赴京觀禮，這是國務院港澳辦最早提出的建議，但最初只給六十至八十個名額，這顯然太少了。要求赴京觀禮的香港各界人士實在太多了。後來由新華社香港分社出面爭取，後來港澳辦同意把名額增至一百人，幾經斟酌後，提出了一百零一人的名單，港澳辦表示同意。

在戴卓爾夫人還未啓程之前，中國政府就通過新華社公告天下，中方將積極、熱情、友好、隆重地接待以英國首相爲首的英國客人。

十二月十八日這一天，天安門前懸掛起了中英兩國國旗，東西長安街上無數彩旗飄揚，從這一個小小的跡象就可以看出，中國將以最高規格接待戴卓爾夫人。

她在離開倫敦希思羅機場時，接受了英國廣播公司記者的採訪，她說：「我相信，這一協議將受到尊重，我們雙方都有義務，我們通過總理級來簽署就表明中國和聯合王國對香港將來保持現在的生活方式承擔義務。」

她乘坐的飛機跨過九個時區，於北京時間當晚八時三十分降落在首都機場。

機艙門打開了，身着冬裝，頭戴皮帽的戴卓爾夫人走了出來，緊隨其後的是英國外交大臣賀維。

閃光燈、聚光燈把機場照耀得如同白晝，使得冬夜的寒風似乎也失去了往常的威力。

戴卓爾夫人雖然顯得有些臃腫，但仍然不失風度。她微笑着接受了少年兒童的獻花，接着又與前來歡迎她的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及夫人、中國駐英大使陳肇源、港督尤德、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一一握手問候。

暢行無阻的國賓車隊很快就把戴卓爾夫人一行送到了釣魚台國賓館，她又住進了她曾住過的十二號樓。

這天晚上，戴卓爾夫人睡得很早；次日早晨，她起得卻不早。她要充分休息，因爲她知道在十九日這一天，她將有十二個小時得不到休息。

十九日上午，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主持歡迎戴卓爾夫人的儀式。

九時十分，戴卓爾夫人在尤德、伊文思、賀維、柯利達的陪同下，乘車來到廣場上。趙紫陽迎上前去向她問好。她一邊握住對方伸過來的手，一邊微笑着說：「我很高興再次見到你。」

一名少年兒童跑上來獻給戴卓爾夫人一大束鮮花。

在十九響迎賓禮炮的轟鳴聲中，趙紫陽陪同戴卓爾夫人檢閱了陸海空三軍儀仗隊。之後，她又與群衆見面，三百多名青少年揮舞着花束和彩帶向她歡呼致意，她也揮手向他們致意。

歡迎儀式結束後，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裏與戴卓爾夫人進行了友好的會談。趙紫陽讚揚了戴卓爾夫人在中英談判期間表現出來的政治家的風度和遠見卓識，並對參加談判的中英官員表示感謝。

戴卓爾夫人送給趙一件價值一萬英鎊的特殊禮物——中英文文字處理電子計算機。據稱它在技術上有重大突破。

把英語翻譯成中文極爲複雜，向來是個難題。製造這個電子計算機的英國賫倫蒂公司採取了特殊的處理方式，先把英語變成漢語拼音，再把拼音變成漢字。這種處理要比通常的文字處理時間長一倍。儘管如此，比起一般的翻譯來說，它仍是一個巨大的改進。

這個電子計算機的發明者叫布雷德·吳，在香港出生，現住曼徹斯特。他跟隨戴卓爾夫人一起來到北京。他將留下來對趙身邊的工作人員進行訓練，直到能熟練地使用這台機器爲止。

戴卓爾夫人希望趙紫陽能明白她送這份禮物的深意。

離開人民大會堂，戴卓爾夫人一行直奔釣魚台養源齋，會見中國的元老級人物，國家主席李先念。

李先念來到室外迎接客人。

冬日上午的陽光，曬在人身上暖洋洋的。戴卓爾夫人脫去了大衣，穿着一身深顏色的衣服，脖子上緊着一條花絲巾，衣領上綴着一朵小花。

李先念主席頗有感觸地說：「目前世界上有許多麻煩，但不管問題多麼複雜，只要坐下來談判，總是可以解決的。」

戴卓爾夫人深有同感：「談判是很需要的，只要有耐心和相互信任，問題就好解決，否則就難以解決。」

中午，李先念主席設宴招待了戴卓爾夫人一行。

下午，未作休息的戴卓爾夫人又趕到中南海，會見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

她這是第一次與胡耀邦見面，但是很快就被他的熱情所感染，所以從一開始兩個人就談得熱烈而融洽。

胡耀邦對戴卓爾夫人說：「中英聯合聲明是中英友好關係史上的里程碑，很值得紀念，它主要是首相您和鄧小平同志共同建造起來的。」

戴卓爾夫人說：「贏得榮譽是很困難的，保持榮譽更不容易。我相信我們一定能實行雙方達成的全部協議，好讓香港人民放心。」

胡耀邦點了點頭，說：「提到榮譽和信義，我們中國有句古話，叫作『百金求名，千金買譽』。中國是注重國際上的名聲的，決不會不顧名譽，自毀諾言。我們中國還有一句成語，叫一諾千金，也就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戴卓爾夫人微笑着點頭表示同意。

會見快結束時，胡耀邦提出要送兩件禮物給戴卓爾夫人，一件是新出版的中文版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第一卷，另一件是最新出版的英華大辭典。

胡耀邦告訴她，在中國，有五千多萬人在學英語，中英兩國人民可以有更多的共同語言。

戴卓爾夫人機敏而友好地回答道：「中國有這麼多人學英語，看來也應該有更多的人學中文。」

通過與胡耀邦的交談，戴卓爾夫人再一次感覺到，中國領導人把中英協議的簽訂視爲成功、光榮，引爲自豪和驕傲，因而決不會去做損害或破壞中英協議的事情。這裏的道理很簡單，誰願意把

成功變成失敗，把光榮變成倒霉呢？

在這穿梭式的會見中，戴卓爾夫人最爲看重的還是與鄧小平的會見。

鄧小平來了，他還像兩年前那樣神采煥發，好像時間老人不曾在他的臉上留下任何痕跡。

戴卓爾夫人來了，她還像兩年前那樣落落大方，讓人從外表根本看不出她性格中堅強的一面。

鄧小平和戴卓爾夫人走到一起來，真誠地相互祝賀中英兩國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

鄧小平說：「香港問題已經有近一個半世紀的歷史，這個問題不解決，在我們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總是存在着陰影。現在這個陰影消除了，我們兩國之間的合作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前景一片光明。」

鄧小平又談起了「一國兩制」：「當初我們商量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時，就認爲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和平方式，一種是非和平方式。而採用和平方式解決香港問題，就必須既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英國的實際情況，就是說，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會主義來統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強接受了，也會造成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爲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問題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國兩制』，允許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辦法。」

戴卓爾夫人由衷地讚揚鄧小平「一國兩制」這個非凡的構想。她確實從心底欽佩這個至今仍然使她捉摸不透的東方老人。

會見臨結束時，鄧小平請她轉達對列根總統的問候，並祝賀他連任美國總統。爲中美領導人充當信使，這使她頓覺自己身價倍增。

當晚五時三十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聯合聲明的正式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隆重舉行，這也是戴卓爾夫人此次訪華活動的高潮。

北京東西長安街上，華燈初放。

入夜的香港燈火輝煌，宛如一片由星光組成的海洋。

十億中國人民和五百多萬香港同胞通過電視熒光屏，注視着中英領導人如何親手翻開兩國關係史上閃光的一頁。

一張鋪滿墨綠色絨布的長桌擺在中間，桌上靜靜地放着《中英聯合聲明》的正式文本，桌子中間的支架上懸着中英兩國國旗，趙紫陽和戴卓爾夫人分別在本國國旗一側入座。

時間到了。他倆來到長桌各自一側，拿起放在桌上的中國產台式英雄金筆，代表本國政府在聯合聲明上簽字，然後互換文本。

在這一刹那間，全場一片寂靜，只有攝影機和照相機銀光頻閃。在現場採訪的二百多名中外記者，都唯恐他們的鏡頭漏過某個重要畫面。

被安排在長桌斜對面的香港各界人士觀禮團，更是一個個睜大了眼睛，注視着這具有歷史意義的場面。

當趙紫陽和戴卓爾夫人當衆交換聲明文本時，西大廳裏頓時掌聲雷動，好似春潮拍岸，一浪高

過一浪。

中英兩國領導人即席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趙紫陽說：「我們完成了一項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任務。確保中英聯合聲明不受干擾地全面貫徹實施，符合中英兩國的共同利益，也是我們共同的責任。中國政府願繼續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同英國一道，力促這一目標的實現。我們也希望廣大香港同胞和各界人士同心協力，爲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更加美好的未來作貢獻。」

戴卓爾夫人說：「中英協議的簽訂是香港這塊土地生活中的里程碑，是中英關係進程中的里程碑，也是國際外交史上的里程碑。我在這兒保證，英國政府將在它的權力範圍內盡力使這一協議成功地貫徹執行。在這裏我還要高度讚揚中國領導人和參加中英會談的中國官員，你們所表現出來的非凡眼光和遠見，值得我們欽佩。」

簽字儀式結束後，鄧小平、李先念笑容滿面地走到戴卓爾夫人身邊，舉起香檳酒向她表示祝賀。戴卓爾夫人也舉杯共祝。

感謝我們的攝影師，把這具有歷史意義的精彩瞬間攝入了鏡頭。

西大廳裏觥籌交錯，笑語飛揚。

在場的中國人無不心頭思潮翻滾。如果歷史往後推八十年，滿清王朝若是提修改條約或收回香港，結果會怎麼樣呢？誰敢說不會再演出一場八國聯軍血洗津京，火燒圓明園的慘劇？那時候的愛國志士縱有一腔熱血，卻回天無力。今天，唯有今天，有偉大强盛的祖國作爲後盾，我們中國人才

能在國際舞台上維護尊嚴，一洗前恥。

在場的中國人臉上全帶着笑，這是勝利的笑容，自豪的笑容。

鄧小平含笑走到記者身邊，對他們表示，要是到一九九七年體力仍可支撐，他一定要去香港看看。

在場的香港人士聽了十分高興，船王包玉剛、巨商李嘉誠、查濟民等人立刻表示，他們非常希望鄧小平在一九九七年以前就到香港看看，也歡迎其他中國領導人前往香港。

回港之後，包玉剛等人真的着手籌劃起迎接鄧小平訪港的事情。鄧小平來港住甚麼地方，這是件大事，住在酒樓賓館都不方便。包玉剛提議住在他在石澳的別墅，這裏靠山面海，風景極佳，住處也很寬敞，但隨從和保安人員無法安排。新華社香港分社也做了一些準備。他們從包玉剛手裏買到了原佳寧集團主席陳松青在赤柱的住宅，一個大院落裏有七棟住宅，作爲招待所使用，北京領導人如果來港，就可以到這裏落腳。

在這個標誌着香港舊時代結束，新時代開始的時刻，香港同胞的激動心情更是難以描述。

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訂後，香港《今晚報》的記者立刻在喧鬧的香港中區攔住一位正在採購日用品的年輕人。當記者問到他對此事的態度時，他聳聳肩，說：「當然很高興，我們是中國人。」

一位姓趙的工程技術人員告訴記者：「我對共產黨並不擔心，香港從來都具有活力，要操心的是如何利用香港回歸祖國後可能出現的繁榮，而不是擔心甚麼共產黨。」

每逢重大事件必定四面出擊的香港記者們，從來採訪都没有像現在這樣順利，這樣開心。過去

採訪，常常會遭到冷遇，甚至會被人家罵個狗血噴頭。今天採訪，所有的採訪對象都是滿面春風，有時候從電話機裏就能聽到採訪對象的朗朗笑聲。

全港上下洋溢着一片喜悦和熱列的氣氛。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那幾天，香港一直燈火輝煌，鱗次櫛比的建築物上全都掛上了耀眼的各式燈飾，使人恍如置身於珠環翠繞的天上宮闕。這樣的美景恰與香港人的愉悦心情相互映照。

香港報界的反應更是熱烈，所有報紙都安排最好的版面，對中英簽約做了圖文並茂的報道。

《成報》：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大功告成，中英雙方叫好，完成具有歷史意義大事值得高興，爲香港長期繁榮提供堅實基礎。

《中報》：中英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是鄧小平「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思的第一個碩果。英國是第一次這樣妥善地解決海外殖民地問題。

《財經日報》：中英簽約香港前途圓滿解決，英首相保證未來十三年繼續有效管理香港。

《東方日報》：「一國兩制」的構想歸功於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稱堅守諾言，願向英首相及全世界保證。

《天天日報》：香港主權重歸中國，炎黃子孫難忘此日。

《華僑日報》：自協議草簽以來，港元一直堅挺，已逐漸成爲國際上的強勢貨幣之一，這是聯合聲明所帶來的效果，它把香港人以前的種種疑慮和不安，縱使不全部亦大部份消除了，漸漸安下心來。

《新晚報》：香港問題終獲大團圓結局，可喜可賀。港人的創業精神和實際成就，也是使中英談判獲致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

《信報》：正式定期收回香港，中國領導人內心有一股「盡雪前恥，收回國土」的驕傲和喜悅；對於英國來說，在形勢比人强的條件下，從頑抗到馴服，終究以喜悅收場，同時亦爲未來的對華貿易奠下了基礎，無疑是外交和商務上的一大勝利。

中英協議正式簽字的消息傳來後，香港的股票市場立刻作出了最積極的反應。十二月十九日，股市收盤價達今年最高點，上升了七．一八點，達一一七三．三一點。次日，恒生指數上升到一一八七．五四，成爲本年的新高峰。

股票經紀人卡頓．普恩說：「如果說這不是對中英簽訂協議表示熱烈歡呼，也是對此表示出相當的敬意。」

在香港居住或經商的外國人也對中英聯合聲明表現出程度不同的歡迎。

著名的房地產顧問艾倫．希爾說：「市場所需要的恰恰是一劑最好的增强信心的藥，我想中英協議就能起到這個作用。」

香港怡和公司地區經理馬丁．巴爾說：「這一協議可能改善商業氣氛，因爲它可能開闢一個通向中國的新窗口，關鍵在於香港與中國更接近，它理所當然地要爲中國提供以前未能提供的機會。」

一些在香港投資的英國企業家用微帶苦澀的幽默表示接受現狀：「至少可以說，派一支艦隊來

是不切合實際的。而且，經過福克蘭群島之戰後，我們也沒有甚麼艦隊可派了。」

中英協議的正式簽字，給澳門問題的解決指明了方向。

葡萄牙《新聞日報》在十二月十八日發表文章，稱中英簽字儀式「對中國、英國和葡萄牙都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和政治意義，因爲英國的一些評論家認爲，不久將以類似香港方式解決澳門問題，一切表明，中國人將採取一種類似的程序在澳門接管權力。至少關於過渡問題他們將這樣做。衆所週知，葡萄牙在澳門的存在是有名無實和象徵性的。」

十二月二十日，澳門總督高斯達將軍發表談話說：「澳門不能如目前一樣長期存在下去。葡萄牙是基於與中國的合作和友誼，才在澳門擔負起管理的責任，並無物質利益。我們是從歷史的和文化的聯繫上，才接受了這一責任。澳門問題隨時都可以解決，只要雙方認爲時機成熟。葡萄牙政府在澳門問題上決不會表現出固執態度。」

中英雙方通過談判和平地解決了香港問題，也在全世界輿論界引起震動和良好反應。

《阿根廷時代報》發表評述說：「香港問題的解決，這是鄧小平的功勞，他將作爲不可逆轉地開始中國重新統一進程的人物載入史册。」

在中英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的前一天，意大利《前進報》發表了維托·拉波尼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沒有鄧小平，很難設想會簽署這個協議。香港協議是鄧的哲學和實踐的結晶。收回香港這塊前殖民地，是這個國家領土統一政策的一部份。……收復這塊前殖民地不僅是一個顯示民族自豪感的行動，而且反映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政治計劃，使這個資本主義堡壘變爲有

用之物，把它作爲工業化西方與這個國家現代化的實驗室。……在談判如此艱難的時代，能締結這個對中國和英國來説都是體面的協議，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説，至少是令人感到興奮的理由。中國和英國都表現出了政治現實主義和巧妙的外交手腕。」

日本《讀賣新聞》設在東京的總部立刻與北京、香港、倫敦三個分社舉行電話座談會。北京分社記者丸山、松永説：「確定把香港——因鴉片戰爭而割讓以及被租借的地方歸還中國，可以説是洗刷了中華民族的『污點』。」

倫敦分社的記者永井、望月説：「這裏的一般評論認爲，戴卓爾首相取得了外交上的勝利，因爲她得到了許諾，將盡可能地維持香港的現狀。」

香港分社的記者户張説：「目前，香港居民最關心的是，在關係到香港未來的基本法中將如何反映香港居民的意見。其中，他們最關心的是中國的態度。」

英國《泰晤士報》也發表了題爲《保持與香港的聯繫》的社論，對中英聯合聲明的正式簽字表示熱烈歡迎。但是這篇社論也透露出英國人在香港問題上獨特的着眼點：

「中國將需要很長的時間發展經濟，這一穩步發展將持續到本世紀的所剩時間，並將一直持續到下個世紀，這樣就有了擴大中英進出口價值三億英鎊的現有貿易現狀的可能性。

「美、日、德的一些公司正在努力在這個新市場上取得優勢，而英國在香港擁有將使我們佔據重大優勢的資本，各種跡象表明，這種優勢在中國得到賞識。

「香港的企業家對香港的未來抱有樂觀態度。他們認爲香港甚至要比中國最先進的城市還要先

進三十年。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香港不會被超過。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如果中國人想要從這塊已經完全歐化的土地上獲得好處，就要保持香港人的這種信心。」

在來自各方面的評價中，鄧小平的名字隨處可見，人們似乎把戴卓爾夫人遺忘了。不，中國人民不會忘記她。從某種意義上講，她是中國人的敵人，但中國人對她的魄力和智慧給予同樣的高度評價，是她以政治家特有的機智避開了中英談判航道上的暗礁，和中國領導人一起解開了香港問題這個難解的歷史之結。

《人民日報》於中英協議簽字當天發表社論，題爲《當代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盛讚了戴卓爾夫人：

「撒切爾夫人是具有國際影響的政治家。她的遠見卓識和明智決策，在香港問題的順利解決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從北京飛往香港的途中，戴卓爾夫人看到了這份報紙。她欣慰地笑了。

十二月二十日，戴卓爾夫人在香港立法局大樓對兩局非官守議員發表講話，她說：

「香港人現在可以有絕對的信心面對未來。我們在文件上簽字這就鄭重表明了兩國政府對於履行這項協議做了最高承諾。我保證英國政府在一九九七年以前全心全力地確保港府繼續努力，克盡其職地依照香港人的利益和意願好好地管好香港。我現在向各位作出英國政府無以復加的最高承諾，我們將盡其所能地促使協議得到切實履行。我們還將作出一些安排，讓香港人繼續發揮他們的

才幹，同時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

去年九月，希思曾對這些人講過類似的話，但卻遭到譏諷。今天還是這些人，卻對戴卓爾夫人的講話報以熱烈的掌聲。

世界在變，香港人也在變。他們在中英協議全部公開後再回顧中英談判的全過程，不能不對這段歷史作出重新評價。

一九八五年二月七日，英國國會下議院經過辯論三讀通過《香港法案》。該《法案》主要規定從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英國對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即告結束。三月二十八日，上議院三讀通過《香港法案》。四月七日，女王在這項法案上簽字，從而使它成爲一項法律。

四月十日，中國全國人大六屆三次會議經過審議，批准中英兩國政府簽署的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包括三個附件。

五月二十七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各自代表本國政府交換了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及其三個附件的批准書，並簽署了互換批准書的證書。

從此，香港地區正式進入過渡時期，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第五章

基本法制定與出台始末



1 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對制定基本法提出原則性建議。彭冲親自向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各位委員發聘書。金庸點頭稱許。

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發表後，香港正式進入了過渡時期。這時，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就成了過渡時期的重要工作。

在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説明》中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並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後，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中國政府這一正式的承諾，表示中國政府要用法律形式將有關香港問題的政策固定下來，以保持國家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等實施的法律性、穩定性和長期性，讓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動規範上有依據。

那麼，究竟如何制定特區基本法呢？當時一些參與制定特區基本法的人士感到摸不着頭緒，不知如何下手。

鄧小平——這位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非常自信地而且有條理地講了下述幾條原則性的建議：

一、基本法不宜太細。宜粗不宜細，應原則一些。

二、香港不搞社會主義制度，但也不宜全盤照搬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英國的代議制和美國的「三權分立」，都不適合於香港，香港應有適合自己特點的模式。

三、不贊成立即實行普選，即使立即搞普選，也應該逐步過渡，一步一步來。

四、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府要管一點。

鄧小平的上述意見，雖然當時傳媒沒有公開報道，但內部已有傳達。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鄧小平在會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全體委員時，又公開重複了上述政策。

中共中央確定了基本法起草原則之後，下一步就是決定草委的具體人員名單。

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北京。這一天北京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人民大會堂內，六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正在進行。會議的主要議程就是列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名單。經過反覆協商，最後，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冲公佈了該委員會的構成名單：

主任：姬鵬飛

副主任：安子介、包玉剛、許家屯、費彝民、胡繩、費孝通、王漢斌、李國寶

秘書長：李後

副秘書長：魯平、毛鈞年

委員：馬臨、王叔文、王鐵崖、毛鈞年、包玉剛、鄺廣傑、司徒華、鄔維庸、劉皇發、安子介、許家屯、許崇德、芮沐、李後、李國寶、李柱銘、李裕民、李福善、李嘉誠、蕭蔚雲、吳大琨、吳建璠、張友漁、陳欣、陳楚、邵天任、林亨元、周南、鄭正訓、鄭偉榮、項淳一、榮毅仁、

胡强、柯在鑠、查良鏞、查濟民、費孝通、費彝民、勇龍桂、莫應溎、賈石、錢偉長、錢昌照、郭棣活、容永道、姬鵬飛、黃麗松、黃保欣、釋覺光、魯平、裘紹恒、雷潔瓊、廖暉、廖瑤珠、端木正、譚惠珠、譚耀宗、霍英東

這個名單可謂包羅齊全，有國內各部門負責人十五名、各界知名人士十名、法律界人士十名，香港各方面人士二十三名。其中有些香港人士是大陸老百姓比較熟悉的，如武俠小說作家查良鏞(金庸)，香港著名企業家包玉剛、李嘉誠等，還有在港英政府任職的四料議員譚惠珠(她身兼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和區議會的議員四職)等。

這份名單公佈後，基本上得到香港和大陸大多數人的認可。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內，香港二十三位委員、內地三十六位委員悉數到會。大家都服裝整潔、精神煥發。彭冲身着中山裝，滿臉微笑地向各位委員頒發大紅燙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聘書」。每位委員都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聘書並道謝。

一位採訪過許多次人大會議的人民日報資深記者對香港著名作家查良鏞說：「據我所知，人大成立了許多委員會，但頒發聘書且由人大副委員長親自頒發，實屬首次。」

查良鏞點頭稱許。

在中英聯合聲明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後，發生了一件極不愉快的事情。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港英當局繼推出綠皮書後，又推出了「白皮書」。在白皮書和綠皮書中，

港英政府提出的目標是：「要逐步建立一個政權，使其權力穩固地立根於香港，有充分權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見，同時更能直接地向港人負責。要在政府中央階層逐步建立一個更直接向港人負責而又穩固立根於香港的代議制。」

港英當局的目的很明顯，就是要在香港建立一個代議政制，實施所謂「還政於民」，在九七香港回歸中國以前，對香港政府機構來一個徹底的改變。

香港的政權一般是由英國委任的港督爲最高行政長官。港督大權獨攬。香港政府的行政局、立法局只是諮詢機構，立法局也非真正的立法機構，不像英國本土那樣，是三權分立體制下的平衡機構。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以及鄧小平的原則意見，所謂「五十年不變」，是指香港當時的狀況不變，而不是九七年以後的狀況不變。港英當局如此行動，明顯是爲自己退出香港後留有退路，用十三年大變，以便達到間接繼續統治香港的目的。

對英國政府竭力推行代議制，想急劇改變香港政制架構的做法，香港社會不少人心裏很高興。當然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對大陸不放心的人。

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登出了一篇對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的專訪頗具有代表性：第一，九七香港回歸後，是否真正的港人治港，而不是北京人治港；第二，能否保證真的不干預，是否總公司對分公司的經理人所說的真正不干預；第三，中國能否保證繼續開放，不回到極左路線上去。

鍾士元的講話反映了港英當局以及某些香港人的想法：第一，爭取在九七香港回歸前，使香港的現狀發生大的改變；第二，改變的方法就是要「跟從一套民選的政制」。

對於港英當局的如此做法，中方是難以接受的。

在起草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時，中央的領導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在過渡期特別是香港收回以後，要繼續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

港英政府當時的年收入是三百六十億港幣，支出三百個億，這個數字是非常龐大的。當時，中國改革後較富庶的江蘇省，一年的財政收入也不過七十個億人民幣，其支出就更少於香港了。如果香港的經濟垮了，中央政府是無力負擔這筆巨大的財政支出的。這個經濟上的問題是中央領導人經常考慮的問題。在一次會議上，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曾提醒與會代表：香港收回後，首要問題是保持香港經濟穩定發展，如果香港經濟垮了，這個包袱太大，我們揹不了。

香港是七十年代後經濟騰飛的一個地區，與新加坡、韓國和台灣合稱「亞洲四小龍」。香港經濟發展原因很多，首先是香港一直相對穩定。自本世紀以來，除了日本佔領的幾年外，香港一直是英國統治，政策、環境有利於經濟投資。其次是香港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其三是英國政府的相關政策，英國人在本世紀大大落後於世界潮流，使上個世紀的世界第一號强國，淪落爲現在的世界二等國家。但在管理香港問題上，特別是二戰以後，卻表現出靈活的政策。其四是香港華人的努力。香港的今天，是與他們辛勤勞動分不開的。

香港又不同於台灣、韓國和新加坡。它地理疆域狹小，雖有九龍、新界等地，但仍爲彈丸之

地。在這塊地界上，卻生活着幾百萬人，有着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幾乎世界著名企業都在香港設有分支企業或辦事處。

鑒於這種形勢，如果香港經濟垮了，或者由於經濟原因引發社會問題，那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中英談判剛開始時，香港社會就出現了一系列問題，股票暴跌，地產下跌，移民潮，逃資現象等。

引發上述現象的基本原因，就是香港人對「九七」回歸之後的前途不甚瞭解。針對這種情況，中方做了大量工作，很快就使香港的人心穩定下來。

2 姬鵬飛在香港談笑風生。香港記者感謝姬鵬飛送給香港新聞界一個特別的「禮物」。基本法制定工作全面展開。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以後，爲了廣泛地聽取香港各階層人士的意見，決定成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不是立法性的組織，但卻是一個提供意見和反映香港人意見的組織。

經過一番努力，十二月六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舉行成立大會，出席會議的委員有一百七十七人。會議通過無記名投票，選出了十九名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

五天以後，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結果如下：主任：安子介。副主任：黃麗松、王寬誠、楊鐵樑、郭志權、李啓明。秘書長：毛鈞年。諮詢委員會下設三個工作委員會：財務委員會，臨時召集人：王寬誠；工作程序委員會，臨時召集人：楊鐵樑；小組策劃委員會，臨時召集人：黃麗松。會議還決定，在十二月十八日舉行成立大會，屆時將邀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姬鵬飛講話。

十二月十八日，香港一家著名的五星級大酒店會議廳。大廳內四週佈滿了鮮花，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第一次大會在這裏正式召開。主任安子介先致開場白，然後請姬鵬飛講話。

姬鵬飛在會上強調：起草基本法時必須從香港實際情況出發，全面貫徹執行中英《聯合聲明》所體現出的「一國兩制」的原則，把愛祖國和愛香港統一起來，達到既維護國家的統一，又維護香

港的穩定繁榮的目的。

當談到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作用時，姬鵬飛說：「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是香港各界人士與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聯繫、溝通的橋樑和對基本法起草工作反映意見和建議的重要渠道。諮詢委員會是有廣泛代表性的香港民間組織，起草委員會是全國人大起草基本法的工作機構，兩者之間沒有隸屬關係和領導關係，但是兩者有共同的任務和目標。」

講到這裏，會場裏掌聲雷動。

會後舉行了酒會。許多記者頻繁地提問，以致姬鵬飛與其他委員無暇交流。面對這些熱情的記者，姬鵬飛笑着說：「你們這樣圍着我以致於都沒有機會品嚐餐桌上的美味佳餚。這樣吧，你們現在放我一馬，在我離港前舉行一個記者招待會，專門回答大家的問題，諸位有甚麼意見？」

衆記者非常高興地允諾。

三天後，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內，姬鵬飛如約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他的答記者問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一、關於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現在還沒有具體的構思和範圍，也沒有固定的成見」，要在起草過程中廣泛徵詢意見。

二、基本法是全國人大制定的，解釋權和修改權理所應當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至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在貫徹執行基本法的過程中有一定的解釋權問題，將會在制定基本法時加以研究解決。

三、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以來，在執行方面總的講是良好的。相信中英雙方能夠繼續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妥善解決尚未解決的問題。

四、一九九七年後，香港特別行政區仍保持言論、出版和新聞自由，在遵守和不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前提下，各種新聞出版機構都可以自由地從事自己的工作和活動。

記者們對最後一條報以熱烈的掌聲，這也許與他們的職業密切相關吧！

會議結束後，香港無線電視台的一記者對姬鵬飛說：「姬主任，在八六年來臨之際，您這個招待會是送給香港新聞界的一個特別禮物。希望您在八六年能有更多的有價值的禮物送與我們。」

姬鵬飛笑着回答說：「禮物肯定會不少，但這要靠你們自己去搶嘍！」

經過三個月的努力工作，基本法結構草案基本成型了。

四月十八日——二十二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已連續開了五天會了，會議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第一個重要成果是成立了五個專題小組：

一、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問題小組(包括特區對外事務、基本法的解釋和修改)。

負責人：邵天任、黃麗松

二、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專題小組。

負責人：李福善、王叔文

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專題小組。
負責人：查良鏞、蕭蔚雲
四、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經濟專題小組。
負責人：勇龍桂、黃保欣
五、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教育、科學、技術文化、體育和宗教專題小組。
負責人：錢偉長、馬臨
第二個重要成果是會上還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結構(草案)》。
雖然這個草案只是個初步確定的大綱，但基本上勾畫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未來面貌，而且草案也成爲起草基本法細則的參考。
草案共分十章，各章名稱如下：
序言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第三章　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第四章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
第五章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經濟
第六章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教育、科學、技術、文化、體育和宗教

第七章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對外事務

第八章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區徽

第九章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法律地位和解釋、修改

第十章　附則

如果把制定基本法比作修建一座大廈的話，那麼這座大廈的地基和框架已經完工了。

3 尤德到江蘇訪問，住進了專門接待中央首長的南京中山陵賓館。尤德想起一件往事，當年他作爲英駐華大使館的情報人員，曾爲英國軍艦脫險立下大功。中英雙方在香港未來的政制問題上分歧嚴重。

香港基本法結構草案定下來以後，中英雙方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爲了增進雙方的感情，也爲了讓港督及在港的英國人士瞭解中國的改革開放情況，新華社香港分社邀請港督尤德訪問江蘇省和上海市。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南京中山陵賓館。

中山陵賓館座落在綠樹掩映的中山陵附近，賓館內有十幾座樓房，賓館周圍是高大的圍牆，有四個出入門口，還有草地、花圃、鹿苑和籐架等。這座賓館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專門用來接待中央首長的，其中一號樓爲毛澤東專用，二號樓爲劉少奇及其他中央首長專用，三號樓、四號樓也爲國務院副總理以上級別的負責人所用。

尤德下榻在五號樓，五號樓分上下兩層，尤德住在樓上，樓下爲警衛人員和服務人員。

下午三時。尤德爵士站在會客廳的窗前，等待着許家屯的來訪。他心潮起伏，想起了三十幾年前參加的一件往事來。

四十年代末，尤德也住在南京，他當時是英國大使館的參贊，但實際上卻是英國情報人員。一

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强渡長江，二十三日便佔領了南京。在這之前，尤德已隨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廣州市。爲了助國民黨内戰，英國的「紫石英」號軍艦還在江面上游弋，並不時開炮向解放軍示威。爲了教訓一下英國人，二野司令員劉伯承和政委鄧小平下令控制下游出口的江陰要塞，封鎖長江。也是在一天夜裏，尤德通過内線接到了這個情報，便火速通知了英國駐華大使。大使館命令四艘英艦冒險突圍。雖然「紫石英」號受傷停在鎮江江面，但其他三艘軍艦卻逃跑了。

英軍艦這次成功脱險，尤德功不可没，受到了英國國防部的嘉獎，從此開始青雲直上，以至三十幾年後，被女王委任爲香港總督。香港總督這個職位是英國外交界人士夢寐以求的肥缺。

「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喲！」想到這些，尤德不由自主地用漢語感嘆起來。

動身來江蘇時，就有人向他介紹過鰣魚是一道美味。

五六月份的長江地區，正是鰣魚肥美的季節。鰣魚，中國古代稱「鯛」，體側扁，成熟時一般長達七十厘米，銀白色，春夏之交，溯長江而上産卵，初入江時體内脂肪肥厚，肉味鮮美，爲名貴魚類。

可是，眼看訪問要結束了，也未見到鰣魚。負責接待的江蘇省旅遊局長趕緊跑過來解釋：這幾年長江受工業污染嚴重，加之捕撈過度，鰣魚逐年減少，市場上很難見到。

面對這位局長的尷尬，尤德卻不以爲然：

「局長先生，没有關係。就算我們積德了，多讓幾條生靈回歸自然吧！」

江蘇訪問結束後，尤德又去訪問上海。當時上海市長汪道涵在上海的五星級酒店錦江飯店設宴款待尤德。當酒席進行到一個半小時後，幾位漂亮的服務小姐端着漂亮的食盤走上來，盤中赫然擺着鰣魚！江蘇方面的陪同人員尷尬不已，自我解嘲地說：「汪市長，還是你們上海人辦法多，江蘇生產的東西，江蘇找不到，上海卻能有。」大家哈哈大笑。後來，有人向汪道涵打聽後才知道，原來他們是派了專人直接上漁船才買來了鰣魚。

就在尤德漫遊江浙時，中英雙方已經在某些問題上產生了分歧。英國已在香港推行代議制，而中方對此卻持不同意見。

中方認爲，由於香港沒有以往的民主傳統，在香港推行民主，尤其是「直選」，要一步一步走，不宜太急。未來特區政府要照顧、平衡各階層利益。香港大資本所有者最擔心的是搞民主的人改變港府現行的低稅制，要給大資本家以時間，讓他們組織起來，參加競選。

尤德解釋說：英國設計的是精英政制，不會專爲資本所有者利益着想。對於直選的制度，香港政府做過精密計算，自認爲有能力「控制」，中國政府可以放心，香港和英國的態度是慎重的。

雙方有關問題的分歧，在後來一段時間內仍沒有得到溝通和理解。

就英國和香港當局在進行「直選」的問題，六月五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李後在首批基本法諮詢委員訪京團座談會上指出，一九九七年後香港實施的政制，不管是「行政首長有權解散立法機關」，或是「立法機關可以罷免行政首長」等政制模式，都會導致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對

立，不利於香港的穩定。他認爲，未來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首長應有實權，而絕不應只是虛銜。行政首長要領導政府運作，如果他缺乏足夠的權力執行職務，政府的運作會出現困難。

在談到中英談判時對協議中「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時，李後指出「負責」一詞的意思包括下面一系列的關係：

1.行政機關要定期向立法機關報告工作；

2.行政機關有權審批財政預算；

3.行政機關要答覆立法機關議員的詢問；

4.當行政首長有犯罪行爲時，立法機關可以彈劾，報告中央，由中央處理。

六月十四日，港督尤德在出席慶祝英女王誕辰活動時向記者表示，中英協議中所叙述的行政機關需要向立法機關負責是泛指兩者之間一整套關係在香港的建立。

有記者問：「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地位是否平等？」

尤德回答説：「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各自的功能有相當的差異，行政機關負責執行，提出和制定政策，而立法機關負責制定和通過法例。立法局有權通過撥款，如不撥款，政府將無所作爲。」

如此看來，中英雙方關於香港未來政制的分歧是相當大的。

那麽，香港傳統的政制是甚麽形式呢？在這裏，讓我們費一些筆墨，對這個問題作一些簡單的描述。

自從上個世紀英國佔領香港以後，香港政制就是以英國海外轄區所採用的基本模式發展而成

的。英國女王是香港的最高統治者，香港總督是英國女王的全權代表，由英女王根據外交大臣的指名任命，總攬香港的行政、立法大權，並在名義上任駐港英軍總司令。港督下設五個系統：1.兩個帶決策性質的諮詢機構——行政局、立法局；2.以布政司爲首的行政部門；3.以首席按察司爲首的司法部門；4.以駐港英軍司令爲首的軍事部門；5.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

從上述結構體系來看，香港政府有三大特色，其一，是其殖民性。英女王委派的總督是香港絕對的最高首腦，他不僅掌握政權，而且還是當地的最高軍事長官，他可能又是這一地區情報系統的最高主管人員。香港政府不僅代表英國政府，也是英國資産階級利益的代表。

其二，香港政府是一個諮詢政府結構。香港立法局、行政局明確作爲港督的諮詢機構。行政局是港督進行諮詢決策的最重要機構，香港政府的一切重要決策都由港督制定。

立法局除了香港一部份政府官員當「官守議員」外，還吸收了一部份社會名流。

香港政府有三百多個諮詢組織，委員由港府委任，囊括了各行各業的名流，一般來説，某一問題，或某一行業有甚麼立法問題，有關部門就會向有關諮詢會徵求意見。

香港十九個區議會，也是一個諮詢性質的機構，目的是讓居民一定程度參與區域內的事務。區議會以聯繫基層或下層爲主，各區議會都推行「會見市民計劃」，以便區內居民可以約見區議員，就區内任何問題發表意見，提出改善辦法。

其三，是實行公務員制度。香港政府各部門的組成人員基本上是固定的，他們需要一定的條件（如專業知識），經過一定程序才能任職。

有人曾打趣地對尤德說：

「您在香港的權力，要比英國女王還大。你們女王在國內有名無實，而你在這裏卻有名有實，你一個人就是司法、立法、行政的代表。」

尤德没有辯解，也打趣道：

「誰説我是香港唯一的總督呢？香港人不是説香港有三位總督嗎？」

所謂香港三總督，首先是名正言順英王委任的總督。其次是滙豐銀行的董事長，可以稱得上是香港的「金融總督」。再一人就是馬會，它被某些香港人視爲「精神總督」。

香港人酷愛跑馬，每年六月至九月爲賽馬季節，每星期舉行兩次跑馬，一場賽馬投注額幾千萬。香港有兩個跑馬場，老的在跑馬地，新的在沙田。每次跑馬不僅馬場内幾萬人爆滿，而且還有場外投注，能吸引上百萬人，大家都想中彩。每星期有兩次機會在投注者中造成幾個暴發户和中小富翁，也有人破産、跳樓，大多數人可以説是向政府「自願繳税」。

總的來説，香港以往的政制不是一個民主政治，而是一個專制集權的政制。只不過這專制和集權不同於封建社會而已。在英國統治的一百幾十年内，在香港始終維持這種政制而没有改革，由此可見，英方是没有民主誠意的。但到了要將主權、治權還於中國時，卻突然大發「慈悲」，決定還政於民，這明顯是想給將來的香港社會製造麻煩，同時也爲英國繼續保留在香港的影響創造機會。

因此，中方對英方的這一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4

香港環保組織反對在大亞灣建立核電站。鄧小平親自指示，如果現在頂不住，將來香港政府遇事就更頂不住了。在一片不同政見的聲浪中，基本法起草工作照常進行。

就在中英雙方爲香港的未來政制進行鬥爭的時候，又發生了「大亞灣核電站」風波。

在七十年代末，還在華國鋒主持國務院工作期間，國家曾準備在江蘇江陰縣長山建一所核電站，發電量爲九十萬千瓦。後來江蘇方面因故停建，廣東省就將這個項目爭取到大亞灣上馬。大亞灣靠近香港，在深圳附近。在開始籌建時，港英政府、香港中華電力公司準備參與建設。但這時國際上卻發生了兩起意外的核電站爆炸事故，一起發生在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另一起發生在美國的三理島核電站。尤其是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意外事故，不僅當時就造成了大量的人員死亡，而且其危害的餘波至今仍未平息。由於出現了這兩起事故，使香港中華電力公司改變初衷，決定不與中方合作。

大亞灣核電站的核反應堆是由法國廠商製造的，發電設備則由英國廠商製造。大亞灣離香港約五十公里，處於香港的上風。在前蘇聯和美國沒有發生核電站意外事故前，大亞灣核電站建設計劃就已經遭到香港部份環保社團的反對，出現了這兩起事故，這些環保組織更是積極活動，他們甚至派人前往北京，主張向國務院請願，要求大亞灣核電廠停建或遲建、遷建。

於是，在北京就發生了中央主管部門與香港環保組織代表之間的一場唇槍舌劍：

香港代表：「如果核電廠發生意外，五百萬香港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有誰能夠負責？」

中方負責人：「我們經過反覆研究、實驗，證明是不會出現問題的，安全問題是有保障的。」

香港代表：「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中方負責人：「只要加强管理，保證不出問題。」

香港代表：「難道我們的管理水平能比美國、蘇聯還好嗎？他們尚且出現問題，況且我們呢？」

中方負責人：「我們可以打保票，在高科技管理方面，我們不比美、蘇差，甚至還要超越他們。」

香港代表：「有甚麼證據能支持你的觀點成立呢？」

中方負責人：「比如在核彈、衛星發射等方面的成功率。」

香港代表：「如果這樣，能不能緩建？」

中方負責人：「緩建也不可能，你們也知道中國電力資源緊張。」

香港代表：「那能不能換一個地方，比如內地，最好離香港遠一些？」

中方負責人：「難道內地的人民性命就不值錢嗎？他們就不會也像你們一樣反對嗎？」

雙方的會談不歡而散。

中央負責人決定對這個問題要再進一步研究。鄧小平對這個問題作出指示，要頂住，原地不

動。如果現在中國頂不住，將來香港政府遇事就更頂不住了。

經過一番工作之後，港英政府表現得非常合作。立法局、行政局先後派了一些議員到美國、日本，行政局先後派了一些議員到美國、日本、法國去進行考察，最後得出結論，認爲安全問題是有保證的。十一月，港府財政司翟克誠發表公開報告說，已批准向核電廠購電的合約，已批准的中電參與核電站建設計劃，都不能貿然撤銷，否則香港的信譽及對外關係將大受影響。

中英雙方在民間都做了許多工作，以增加市民對核電站的瞭解。

新華社駐香港分社還專門派副社長陳達明與中國科學院和大亞灣核電站籌備處進行聯繫並取得了中科院的幫助，公佈了對核電廠技術安全的研究報告，結論是一致的：法國核電制式反應爐是安全的，與前蘇聯用的不一樣。還組織內地專家到香港辦核技術展覽會，組織港人去大亞灣工地參觀。中國的核能專家、香港數所大學的自然科學教授，紛紛就世界核能科技的進步，洩出的輻射對人體的影響等，在香港的傳媒上發表文章，進行分析解說。

這些工作，都得到了香港政府的密切合作。雖然香港社會至今仍有不少人反對，但激烈的反對聲浪逐漸平息了。這也是中英雙方在圍繞基本法、政制等問題爭論過程中的一次友好合作。

尤德說：「這是一首美妙的小插曲，對改善雙方已呈緊張關係狀態是一副調合劑。」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廣東大亞灣核電站的貸款協定和供貨合同七項文件，在人民大會堂隆重簽字。

十月八日，港督尤德在立法局作施政報告，在展望港英未來的政制時指出：

一、一九八七年政治體制檢討是港英政府未來一年最重要的工作。

二、在檢討中將考慮是否應該作進一步的改革，包括立法局議員的成員組合和選擇本局議員的方法是否應進一步改變的問題。如果要進行改革的話，將在甚麼時候開始進行？

三、如果證實市民普遍渴望能更多地參與政府工作的話，我們必須正視，容許這種發展的需要。

四、肯定中英兩國政府隨時留意對方關切的事情和意見。

五、制定基本法是中國政府的責任，但所有有關方面都必須常常留心有關的討論。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二日，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乘專機到中國訪問，女王的丈夫愛丁堡公爵菲臘親王也隨同前來。在北京訪問期間，女王受到了中國的最高禮遇，鄧小平、趙紫陽都分別會見了女王夫婦，並與他們進行了友好的會談。訪問中國之後，女王夫婦又乘船訪問了香港。

由於中英關係的新發展，香港股票市場異常活躍。十月二十七日恒生指數升至二千三百四十七點，創歷史最高紀錄。十月份以前，每天平均成交額為八億多元，十月初以來，每日成交額十億多元。而至十月中旬，則每日成交額達到十七億元。

造成股市如此興旺的原因，一是中英關係的新發展，使大多數港人感到前景樂觀；二是外資大量湧入股市。

然而，關於香港未來的政制問題，仍有不少港人持有不同的看法。十一月二日，由九十一個團

體組成的「香港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在香港九龍紅磡高山劇場舉行大會，出席代表及社會各界人士約千人。大會提出「促進政制民主，發揮高度自治，落實港人治港」的口號。

十一月四日，七十一名工商專業人士方面的基本法諮詢委員舉行記者招待會，發出一份《選舉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的建議》，主張由香港社會各階層組成一個六百人以上的選舉團，由這個選舉團選出特區行政首長。選舉團下轄「提名委員會」，負責提出三名首長候選人名單。提名委員會則由選舉團互選二十人，只負責提名，本人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保證提名過程能夠更加客觀。

在這一片不同政見的聲浪中，中英雙方的接觸仍照常進行。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討論了多項議題，對公務員退休計劃達成協議，對居留權問題、參加國際電訊聯盟等議題都取得了積極成果。

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二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聽取了五個專題小組、香港居民的權利與義務小組初步擬出的報告，討論了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專題小組、香港居民的權利與義務小組初步擬出的基本法第二、第三、第七、第九章的條文草稿，提出修改和補充的意見和建議。會議還討論了特區區旗、區徽圖案徵集和審定辦法(草案)，認爲草案尚需進一步充實和完善，決定由教育、科學、技術、文化、體育、宗教專題小組修改補充，提交起草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會議決定將基本法結構(草案)的《序言》和第一章《總則》交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專題小組負責研究起草；第十章附則交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專題小組研究起

草。會議決定第四次全體會議於一九八七年四月中旬舉行，主要議程爲：

一、討論基本法的序言和第一章《總則》條文的草稿；

二、進一步討論基本法有關第二、第三、第七、第九章條文草稿；

三、討論區旗、區徽徵集和審定辦法草案的修改稿。

5

尤德在釣魚台國賓館連飲了幾杯茅台酒。半夜時分，尤德突發心臟病，逝世在任上，新任港督衛奕信來了。鄧小平肯定衛奕信的講話，衛奕信大爲高興。

當年尤德訪問江蘇、上海時，閒談中，他曾這樣說：「我如果不幹總督了，你猜想我下一步會做甚麼？我想留在中國研究中國文化。」

尤德自一九八二年擔任香港總督以來，至今已在任上過了五個年頭了。在這五年中，他大部份時間生活在香港，也經常到中國內地進行訪問遊覽。他深深被這個文明悠久的東方古國的燦爛文化吸引住了。他的心情常常處在矛盾之中，作爲港督，在中英交往中，他必須代表英方講話，而在內心深處，他卻對東方文明持有讚許的態度。他覺得這個文明古國有豐富的內涵，這個古國的人民有着西方人所沒有的真誠、樸實，可以信賴。

當他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之後，有人就建議他到西安看看不久前出土的秦俑。

「總督先生，西安是中國的古都，你只要到了那裏，才會感受到中國文化的博大與淵源。」

尤德聽後，表示一定在八六年底去西安訪問。尤德回港一直公務繁忙，始終未能成行，但西安方面卻做了邀請和接待的準備工作。這樣一直拖到一九八六年底。

十二月一日，以鄧蓮如爲團長的香港經貿代表團訪問北京，尤德隨團而行，準備參加貿易發展

局駐京辦事處和香港產品展覽會的開幕式。

尤德夫婦抵京後，由於尤德要參加十二月三日趙紫陽總理的接見會，所以其夫人由鄧蓮如陪同去西安訪問旅遊。夫婦倆約好，尤德公事完畢之後，立即乘機赴西安會齊。

十二月二日，趙紫陽總理會見尤德及香港經貿代表團成員。趙總理對尤德說，內地和香港進一步發展經濟、貿易、科技和資金方面合作的潛力很大，需要雙方共同合作挖掘，並探討新的合作方式和領域。尤德聽後深表贊同。晚上，姬鵬飛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宴會招待尤德一行。尤德情緒極好，談笑風生，還連飲了幾杯茅台酒。

回到賓館之後，尤德由於疲勞，就上床休息了。午夜後，他感到胸悶，便爬下床去取藥，結果卻倒在地上，由於心臟病發作，他再也沒有爬起來。

尤德是唯一一位病逝於任上的香港總督。

尤德在任總督期間，爲促進中英友好，不斷穿梭來往於香港、北京和倫敦之間，幾次中英談判，他都是當然的英方代表團成員。在他任總督期間，與中國很多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所以，對他的病逝，中方感到極爲悲痛。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對尤德去世表示哀悼，外交部長吳學謙等人也電唁尤德爵士逝世。十二月九日，在香港舉行了尤德爵士的喪禮。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英國政府與香港當局同日宣佈，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助理次官、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衛奕信博士出任第二十七任香港總督。

這位衛奕信不是別人，就是那位當年陪同麥理浩爵士訪問北京，後來又中途參加中英香港問題

談判的魏德巍。他和尤德一樣，也是一個中國通，精通漢語。衛奕信這個新名字是他自己給自己起的。他認爲，作爲港督，這個中文名字給中國人的感覺更好一些。

衛奕信正式接任港督職務是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這時，正值中國傳統節日春節即將來臨之時，大部份中國人都在忙活着節日的準備。因而，在春節前的一段時間內，中英雙方在香港問題上没有大的動作。

除夕夜，衛奕信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坐在電視機前收看中央電視台舉辦的春節聯歡會。聯歡會的高潮是台灣歌手費翔演唱的《冬天裏的一把火》和《故鄉》。這個曾迷倒了內地許多女孩子的歌星的歌聲，也傾倒了衛奕信。不過他卻聯想豐富：中國人還會熱情地進行改革開放嗎？看來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否則爲甚麼大陸人喜歡聽這首具有激情色彩的歌曲呢？……也許正像費翔在《故鄉》中唱的那樣，香港這顆孤懸於國境邊上的美麗的明珠，雖然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富裕，但由於没有回歸其祖國而感到精神上無所歸宿。可能香港就是費翔所唱的那個已厭倦旅行而感疲憊並迫切想回故鄉的遊子吧！

西方人一般喜歡做這種宿命論式的猜想。就在這些念頭縈繞在衛奕信的腦海裏的時候，就在億萬中國人民歡慶佳節的除夕之夜，他帶着幾絲朦朧進入了夢鄉。

春節後不久，也即三月十七日——二十日，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第六次會議在香港舉行。這次會議就香港一九九七年後繼續參加海關合作理事會問題達成協議，對一九九七年後香港繼續參加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活動，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見。雙方還就香港繼續參加國際勞工組織活動和香港有

關的國際勞工公約繼續適用問題交換了意見。小組確認了前幾次會議和專家會議討論的關於香港身份證在一九九七年以後的過渡性安排，並達成了協議。雙方同意，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前簽發的其有效期爲七年的簽證身份書，自該日起繼續使用，直到有效期滿爲止。雙方還就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衛和維持治安的規定，以及在這方面的順利過渡等交換了意見，並同意就此問題進行專家級討論。

四月十三日——十七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初步討論了第二、第三、第七、第九章的條文草案。委員們對某些條文提出了修改意見和建議，交由負責的兩個專題小組加以研究，進一步修改和完善。會議討論通過了教、科、技、文、體、宗教專題小組提出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的徵集和審定辦法》，並決定盡快展開區旗、區徽圖案的徵集工作。會議還決定了第五次會議日期和議程。

衛奕信雖然在一月十六日就被公佈爲香港總督，但他卻直到四月九日才正式到香港就職。在就職演說中，針對關於政制的銜接問題，他指出中英聯合聲明必獲穩步實施，將竭盡所能確保香港繁榮。他强調政制改革宜審慎從事，「珍惜安寧，循序漸進，維持獨特制度，有利吸收投資。」

這個講話傳到北京以後，據說得到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的肯定。

鄧小平的談話傳到香港總督衛奕信的耳朵裏，他感到非常高興，他爲中國這個舉足輕重的老人能當衆誇獎自己而有些受寵若驚。

「看來，起步還不壞。我們終於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了共識。」他自言自語道。

五月二十日，徵集和評選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的啓事見報，截稿時間爲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有關徵集和審定的辦法，要點如下：

一、在內地和香港刊登徵集啓事，廣泛徵集，全部來稿圖案版權屬國家所有。

二、圖案要能體現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位、特點和「一國兩制」的精神，形式莊嚴美觀。

三、圖案評選委員會由基本法起草委員五名，專家六名(內地、香港各三名)組成，由基本法草委會的教、科、文、技、體、宗教專題小組提出人選，報主任委員會議審定。評委會於一九八八年第二季度從應徵圖案中初選出各二十六件在全國和香港公佈，徵求意見。然後於一九八八年第四季度從初選中篩選出各六件，作爲複選圖案，提交基本法草委會，評選委員會可對提交的圖案提出修改意見。

四、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對複選的六件圖案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各一件，連同基本法(草案)於一九八八年底一起報全國人大常委會。

五、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確定。

隨着時間的發展，港英政府在政制改革問題上的態度又開始出現變化。五月二十七日，港英政府公佈了《一九八七年代議政制發展綠皮檢討書》。全書共計七章。綠皮書的內容，實際上分三個問題：一、綜合檢討地區、區域和政府各層次的政制發展情況；二、評議一九八四年代議政制白皮書發表以來的發展情況和市民對這些發展的反應；三、考慮一九八八年可能作進一步發展的各種可

供選擇的方法。一九八八年立法局是否直選？綠皮書列出四個選擇：第一，採用直接選舉選出立法局議員的做法並不可取；第二，採用直接選舉選出一部份議員的做法，在原則上是可取的，但不應在一九八八年推行；第三，一九八八年除現有議員類別外，應由一個全港性選區或若干按地區劃分的選民組別，以直接的方式選出部份議員；第四，在一九八八年應以以上選擇所述方法直接選出部份議員，但這些議員應取代由按地區劃分的選舉團組別所選出的議員。

港英政府呼籲市民在綠皮書發表至九月三十日這段時間，將意見以書面形式向民意匯集處提出，以便政府編訂和發展白皮書，列出政府在進一步發展方面的建議。當局宣佈，民意匯集處設專員負責，由副行政司許雄擔任。綠皮書發表後，進行了兩次民意調查，每次抽樣三千人。

香港評論家認家，一九八七年綠皮書是一九八四年白皮書的繼續，其策略與撰寫手法一樣，既寫激進改革的意見，也寫穩健變革的方案。政制改革是「急進」還是「緩進」，全看「民意」。港英政府則處於「超然的第三者地位」，靜觀其變。不難看出，英方企圖以「民意」爲籌碼，在過渡期內向中國討價還價，按英方意志影響和干預未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的制定。

面對英方的策略，中方馬上就作出了反應。先是吳學謙外長在訪問拉丁美洲後到達香港，與港督衛奕信會晤，並就直選問題交換意見。後來外交部發言人也强調，香港的政制改革必須同基本法銜接，中國政府闡明中國政府對有關問題的立場，根本上談不上是對英國在過渡期對香港進行管理的干預。

港英政府內部也有人反對港英政府的做法。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就表示：香港擁有一個效率

高而穩定的政府，是香港取得今天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希望九七年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能保留目前香港政府架構的優點，使香港繼續發展和保持繁榮。

八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繼續討論基本法的序言和總則、中央與特區的關係、特區居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特區對外事務、基本法的解釋和修改第五章的條文草稿，初步討論特區政治體制、經濟、教育、科學、技術、文化、體育和宗教第三章條文草稿。委員們就部份條文提出了修改意見。會議要求各專題小組仔細研究委員們所提意見以及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各專題小組最後報告所提的建議，對有關章節的條文草稿作進一步修改。在此基礎上，由秘書處按照基本法結構草案的順序，把各章條文草稿初步匯編起來，提交起草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討論。同時，經主任委員會決定，成立由包玉剛、胡繩兩位副主任主持，由各專題小組負責人和副秘書長參加的基本法總體工作小組，負責對基本法各章條文草稿進行總體上的調整和修改，提交一九八八年舉行的起草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審議。

6

香港股市暴跌。張百發為亞運籌款赴港，正好趕上「黑色星期五」，中國銀行出巨資挽救股市，香港股民感激中央政府。經過四年又八個月後，基本法起草工作終於進入最後一項程序。

就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緊張工作之際，在香港發生了一件震動人心的大事件。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美國紐約股市狂跌，世界性的股市危機波及香港，恒生指數狂瀉四百二十點。跌幅之大，打破了一九八三年股市風暴一日跌幅一百八十點的記錄，也是恒生指數創建二十三年以來跌幅最大的一日。恒生指數也兩度跌至停板。聯合交易所於二十日宣佈史無前例的停業四天。十月二十六日，股市重開之後，一天之內又狂跌一千一百二十點，跌幅達百分之三十三，恒生指數降低為一千八百四零點。股市總市值減爲三千六百八十八億元，兩度創下了跌幅最高的歷史性記錄。這次股市大地震，被人們稱爲「黑色的星期五」。香港股民惶惶不可終日，大有世界末日來臨之勢，到處是一片淒涼的景象。

正巧，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爲籌款辦亞運來到香港。新華社香港分社請了一批香港的富商巨賈，設宴於香港五星級的美麗華大酒店，準備席間向他們籌款。結果赴宴者有不少在這次股市風暴中損失慘重，雖人在席上，卻大多語無倫次，勉強應付，不到席終，就有不少人提前離席而去。面對這種情景，張百發哪裏還敢提籌款之事呢！

在這緊急時刻，匯豐集團主席浦偉士緊急約見中方有關部門領導，希望匯豐、港府和中國銀行集團共同出面，以救股市，要中銀出資五億。面對這麼龐大的數字，一般人不敢作主，只得緊急向中央匯報。這事驚動了國務院，趙紫陽親自主持開會討論此事。最後決定爲了中英兩國的關係，爲了香港人民的利益，中國政府決定予以援助。

十月二十六日，香港中銀集團負責人就香港股市問題發表談話：一、香港製造業及出口情況良好，經濟基本因素也是好的，我們對香港經濟發展有信心；二、中銀集團各行將照常做股票抵押貸款；三、保持香港股票市場及恒指期貨市場的平穩發展，對香港的經濟的穩定繁榮有好處，中銀集團將繼續在這方面做出努力。

經過匯豐、中銀和香港政府的努力，股市終於好轉。事後，有人說匯豐在這次股災中不僅未受損失，且借救市之名獲利甚豐，一些巨商也獲利不小。因此，有的傳媒認爲中國做了一件傻事，花錢幫助了資本家。但大多數香港股民還是非常感激中國政府的，認爲中國政府不完全是從經濟上考慮問題，確實對香港人民負責，表示了中國執行中英聯合聲明的誠意。

經這次事件，大多數香港市民開始轉變態度。十一月四日，港英政府公佈民意報告書，有百分之六十九的市民認爲在一九八八年不應實行直選。

十二月十二日——十六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廣州舉行。這次會議聽取了基本法草委會政治體制、經濟、科學、技術、教育、文化、體育、宗教等專題小組的工作報告，基本法草委會秘書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各章各條草稿匯編的說明，聽取了安子介副主任委員關

於基本法諮委會工作進展情況的介紹。委員們對所討論的有關章節條文草稿和基本法條文稿匯編提出了一些修改和調整的意見。會議要求有關的專題小組研究委員們提出的意見和基本法諮委會及各界的意見，對有關章節條文草稿作進一步修改，然後由總體工作小組對各章節條文草稿進行調整和修改，提出基本法草案(草稿)交下一次會議討論審議。在十三日分組討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特別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機構的產生問題時，委員們强調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時，新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的產生應體現政權的轉移、平穩過渡的原則。許多委員們主張第一屆行政長官通過協商產生爲好。

一九八七年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緊鑼密鼓的工作中過去了。一九八八年又來到了。

一九八七年裏，香港基本法草案(草稿)就已經初步形成。一九八八年首要的工作就是在香港和內地廣泛地徵求意見。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六日，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討論了基本法草案(草稿)公佈後的諮詢工作計劃。會議決定首先在香港進行爲期六個月的諮詢工作。徵詢意見工作分推廣、諮詢、整理三個時期，時間爲五月到十月，其中第二個時期即諮詢時期按基本法的專題分五個階段，即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居民的權利與義務、政制、經濟和文教。這樣做是爲了避免討論時過於集中在一兩個有爭議的問題上而延誤了整個基本法的討論。諮詢過程中，內地起草委員分兩批到香港直接聽取諮委會委員和市民的意見。諮委會也派出交流團到北京與草委會交換意見。爲確保諮詢工作順利進行，香港諮委會擬定了四條原則：

一、由於基本法是憲制文件，這次收集意見時應以針對初稿條文的整體性、原則性意見爲主，同時收集有關個別問題及技術性問題的意見；

二、充分發揮諮委會委員在諮詢過程中的作用，同時，通過各委員與其所屬界別或團體的關係，展開廣泛的諮詢活動；

三、應通過多種渠道、多種形式，進行宣傳推廣、收集意見的工作；

四、基本法内容較爲複雜，諮詢活動各階段應按不同的重點由淺入深地展開。

另外，從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四日開始，至一九八八年八月中旬爲止，在港九、新界巡迴舉行基本法與你活動。這項活動是由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舉辦。以展板和錄像的形式展出。内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基本法的由來——回顧由鴉片戰爭到《中英聯合聲明》簽訂的一段歷史；基本法的起草過程；說明基本法的内容；展出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初選圖案各二十六件，讓市民提供意見。

諮委會主任安子介在開幕致詞時强調，基本法是一九九七年後香港的法制基礎，這次展覽的目的是希望市民加深認識和瞭解基本法草稿，並多提意見。

一九八九年因「六四」風波的影響，基本法的起草和諮詢工作，基本上陷於停頓。一些香港人士先後辭去了基本法草委和諮委的職務，原定於六月三日舉行的諮委會第七次全體大會因北京和香港的形勢而宣佈延期。一些港人開始擔心，九七年之後，香港能否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中國能否兑現「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諾言，還有沒有民主和自由？因而，對基本法的政制

內容，在香港出現了激烈的爭論。

首先是香港駐軍問題。港英政府政務司屈珩發表題爲「收拾殘局」的講話，表示「六四」事件使港人的信心受到打擊，他要港人研究中國的駐軍問題。他這一講話，引起了不少港人的共鳴。

中國在香港駐軍的問題，中央早有態度，這是一個不容討論的原則的問題。八月十八日，新華社香港分社發表專論，指出屈珩這樣做違背了起碼的外交常識。外交部發言人也表示，基本法的起草和制定，是中國的事情，不容干涉。

其次，就是關於政制問題。本來港督衛奕信已發表講話，承諾「政改要循序漸進」。但「六四」之後，衛奕信又表示要加速政制改革的進程。中英在這方面幾經較量，終於以雙方的相互讓步而達成協議。

另外，還有居英權、特區政府的財經政策等問題，也成爲中英雙方爭執的焦點。

經過近一年的反覆討論，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三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最後一次基本法草委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開幕。這次大會的主要任務是要逐條表決基本法草案，將通過後的草案送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這是經歷四年八個月的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最後一項工作程序。大多數草委都懷着嚴肅多於歡欣的心情來參加會議。

經過幾天的研究討論，二月十六日，大會對草案逐條投票，表決的結果，均以多數票通過。

基本法草案通過以後，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在北京飯店貴賓樓宴請全體草委，會上大家興高采烈，敬酒唱歌，這是忙碌了近五年的工作之後，他們第一次徹底鬆了一口氣。

一九九〇年四月四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順利地通過了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特區法。

第六章

政治風波後的新一輪爭奪



1

港督衛奕信並未失蹤，而是一個人躲在屋裏看電視，聽廣播，北京事態的發展令他坐立不安。近萬名香港市民舉行和平大遊行。颱風襲擊香港，港督澈夜難眠。遊行隊伍擋住了港督的去路。

每年的春夏之交，香港地區都會出現持續高溫，來自大洋的颱風也會適時光顧，使這個彈丸之地上的居民時時產生風雨飄搖之感。

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之交也是如此，只不過多了一重政治的風雨和高溫。

在遠離塵囂的港督府邸中，現代化的空調設備保持着這裏的清新涼爽，然而這一切卻無法驅除港督府主人胸中的燥熱。

「這幾天怎麼沒有見到港督的面？」港督府中的工作人員私下裏都這樣嘀咕道。

港督衛奕信並不太喜歡鍛煉身體，但他每天早晨都願意早起一會兒，到港督府的小花園裏散散步，和花匠聊聊天。可是這幾天，他連這份閒情逸致也沒有了。

外界紛紛謠傳，港督回倫敦治病去了。

其實，衛奕信並未生病，而且哪裏也沒有去，就躲在港督府二樓的書房裏。正前方擺着一台電視機，伸手可及的右手一方擺着一架收音機。在一天二十四小時裏，除了睡覺、吃飯外，他不是看電視，就是聽電台廣播。

今年開春以來，首先由北京的大學生們掀起了一場名爲要求民主，懲治腐敗的運動，這股學潮不久就發展成了波及全國的大震盪。各界人士紛紛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的大學生們，而北京的大學生們則與政府開展了越來越强硬的對話，直至在天安門廣場上組織絶食活動，要挾政府答應他們提出的條件。

北京的局勢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一向敏感而又高效的香港傳媒自然不會落後，簡直是使出了全身解數。有的電視台每隔半小時就播放一次來自北京的新聞報道，電台則每隔十五分鐘播一次北京新聞。實際上，香港的各種傳媒是二十四小時連續播送北京方面的消息以及世界各地的反響。

一向對政治不大關心的香港人，這一次卻表現出了令人驚異的政治熱情。像北京一樣，也出現了大規模的群衆遊行，甚至還出現了靜坐示威、絶食等活動。

像北京一樣，以極大的熱情投身其中的主要還是那些大學生們，但其他人士也不甘落後，就連佛門子弟也出現在遊行隊伍中。

五月十七日晚，近萬名香港市民舉行和平大遊行，聲援北京的「民主」運動。遊行隊伍從維多利亞公園出發，來到灣仔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前舉行集會，直到深夜十一時才結束。

當日晚六時，香港學生聯合會也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了聲援集會。

還像北京一樣，香港的一些所謂民主人士也成立了支持内陸「民主」運動的組織，並正式註册登記，這就是「支聯會」。據内部人士透露，該組織通過募捐方式積累起來的資金已達港幣上千萬

元。

起初，衛奕信對這一切不過是冷眼旁觀，他不像某些西方人士那樣興奮，認爲中國這一下會乾坤倒轉。他很同意英國《泰晤士報》特派記者麥斯特的分析，站在北京街頭遊行隊伍中高喊民主口號的人，卻說不清到底他們需要甚麼樣的民主。在中國，還沒有出現具備改朝換代力量的政治派別。目前在北京發生的這場動盪的深刻程度，顯然被某些別有用心的西方人故意誇大了。

衛奕信原以爲，當人們的各式各樣的怨氣和青年人的激情發洩得差不多時，這場動盪就會自然轉入風平浪靜。五月初，從北京傳來學生們準備復課的消息，這似乎進一步證實了他的估計。然而，接下來事態的發展卻大大出乎他的預料。五月十五日，以開創民主自由新時代自詡的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抵達北京進行國事訪問，按慣例要在天安門廣場西側舉行歡迎儀式，而在這個事關國家形象的時候，廣場上橫躺豎臥着那麼多正在絕食的學生，顯然是大不雅觀。從政府方面來考慮，當然希望學生們以國家利益爲重，還天安門廣場以安靜與祥和。但是，這場「民主」運動的策劃者和組織者們，卻想以此爲砝碼迫使政府讓步，甚至還打算向戈爾巴喬夫進行請願，藉國際輿論做文章。

衛奕信出於港督的特殊地位，開始坐立不安起來。

自從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以來，雙方基本上能在聯合聲明基礎上保持友好合作關係，一些小的摩擦可以忽略不計。衛奕信上任後，更是與中方關係密切，從而保證了香港地區的形勢穩定和經濟繁榮。如果北京的局面發生惡化，中國政府勢必會採取非常手段來維護國家的安定。從現在的情況

看，「民主」運動已經造成北京的城市機能的大規模癱瘓，國家的權威已受到了嚴重衝擊，就連歡迎外國總統的儀式也無法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

下一步會怎樣呢？

會不會發生街頭流血事件？絕食的學生會不會死亡？……

再下一步會怎樣呢？

中國會不會改變改革開放的政策？會不會對西方社會採取敵視態度？西方有很多人已經在幸災樂禍地叫嚷，紅色中國要變色了，而中國人還願意和西方人交朋友嗎？

再下一步會怎麼樣呢？

衛奕信不敢想下去，也不知道該怎樣往下想，但有一點他知道得很清楚，來自中國方面的任何變化都會給香港帶來決定性的影響。中國如果就此關上改革開放的大門，說不定就會單方面收回香港，那時候不單是他這個港督當不成了，更嚴重的是香港就有可能成爲中英乃至中西方衝突的導火索。

衛奕信當然不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內發生這樣的事情，但是對於注定要發生的一切他卻是無能爲力而又束手無策。

衛奕信暗暗祈禱發生在北京的這場動盪能夠和平消弭。

衛奕信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到底還是發生了。

五月二十日凌晨，李鵬總理宣佈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組成的戒嚴部隊集結起來，開始維持秩序。

從電視畫面上，衞奕信看到了步兵、裝甲車和盤旋的武裝直升飛機。

很快，英國外交部就發表了這樣一份聲明：「中國當局認爲有必要在首都部份地區實行軍事管制，我們對此當然感到關注。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我們敦促有關方面採取溫和和克制的態度。」

衞奕信希望這不是英國外交部決策官員的官樣文章，至少是爲了香港的緣故，也不應該盼望中國出現內亂。

五月二十日，氣象台掛出了八號風球，一場颱風即將襲擊香港。

衞奕信暗中嘆道：自然界的風雨爲甚麼會與人世間的風雨配合得如此巧妙呢?!

當天晚上，他失眠了。

窗外，風聲雨聲不斷，讓人心煩。遠處，隱隱約約傳來遊行隊伍發出的陣陣口號聲攪得人心神不安。

衞奕信已經指示在遊行隊伍經過的路線上安排大批警察，防止不測事件發生。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既然是不測事件，又怎麼能防止得了呢？

「叮鈴鈴！」「叮鈴鈴！」

急促的電話鈴聲一陣緊似一陣。

衞奕信沒有去接。他猜得出這是甚麼人來的電話。今天一整天，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官員找過他

好幾次，請港府出面採取措施，維護香港的大局。他滿口答應，卻沒有採取甚麼實際行動。英國政府沒有給他發來任何指示，他不知道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怎樣做才好。

從消息靈通的人士那裏衛奕信得知，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官員是奉楊尚昆、李鵬等中央領導的指示來與港英政府交涉的。由此舉看來，中共領導人對香港的穩定極爲重視，衛奕信不禁大爲欣慰和感激。但越是這樣，他越無法給人家回話，他覺得愧對朋友。

五月二十三日，衛奕信在行政局特別會議上露面了。記者們立刻把他圍了起來，伸過來的話筒如同一片樹林。

記者們很想知道港英政府對於香港遊行示威活動頻繁的態度。

衛奕信嚴肅地說道：「香港人關注北京的事態發展，希望表達他們對這種發展的關心，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只要不違背法律，任何行爲都不會受到追究。不過，我建議，人們應該比較冷靜地留意北京的局勢是如何平息的，而這個解決辦法必定會影響這裏的人對中國的看法。」

衛奕信的回答顯然令記者們大爲滿意，他們很快就把話題轉開來。

「很多西方官員都把中國視爲一個危險的國度，請問港督，這種危險會不會影響香港？」

衛奕信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在北京現有香港商人三千名，現在恐怕還沒有一個人撤回來，他們應該比我們更知道那裏有多大危險。」

記者們的問題一個接着一個，衛奕信有選擇地回答了幾個問題後，就準備去開會了。臨走時，

他主動地說了幾句在場的記者們都不大感興趣的話：

「我希望大家能更多地注意一下別的事情，比如基本法和基本法的內容，這是關係到一九九七年以後香港五十年中發展的基礎。」

大多數記者沒有把衞奕信的這段話記錄下來。

立法局會議結束後，衞奕信乘車回港督府。沒走多遠，就被遊行隊伍擋住了去路。過去，香港人對於港督的車從來都是禮讓先行的，而今天卻沒有人對它投來敬仰的目光。人們大搖大擺地從車前走過，似乎根本沒有把港督放在眼裏。

衞奕信的心頭突然湧起一個古怪的念頭：假如倫敦發生了甚麼亂子，香港人會怎麼樣呢？他們肯定會站在一旁看熱鬧。而如今香港人對北京局勢的關心，恰恰說明他們是一家人，所以關心一家的事。有些英國人還以爲這是爭取香港民心的好機會，這真是太可笑了！

衞奕信的目光移向遠處，落在一座尚未竣工的摩天大樓上。這裏是新建的中國銀行大廈，高一千零四十英尺，通體呈三角形，外表裝飾着水晶玻璃。這座大廈是由世界著名的建築師美籍華人貝聿銘設計的，原定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完工，但開工後建築人員發現，爲了保持這座七十層大廈的穩定性，地基必須比原設計還要加深，這樣一來就把完工日期推遲到今年四月。日本熊谷組接手這座大廈的內部裝修任務後，又拖延了工期，使這座大廈要到今年九、十月份才能投入使用。

在這座大廈沒有建成之前，匯豐銀行是香港的第一高度，如今它的地位就要被中銀大廈取代

了。

望着這座摩天大廈，一陣悲涼感湧上了衛奕信的心頭。如果說匯豐大廈象徵着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地位的話，那麼中銀大廈就是中國一九九七年將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的一個凝固的象徵。英國人這回該走了。這種時候給中國人當總督，就好像在做一道實際上沒有答案的數學題，不管給出怎樣的解都不對。

就在這一剎那間，衛奕信做出了一個決定，馬上離開香港回英國，他可以找出回去的理由。

2 北京風波震盪香港，股市大跌，三天內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竟被提走一百七十億港幣。英國政府單方面宣佈中止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中英間關於香港問題的一切磋商暫告停止。衛奕信瞭解到了英國政府的決策內幕。

衛奕信回到倫敦後，還是天天看電視。這裏的傳媒不像香港那樣緊緊盯着北京，但是來自中國的消息還是能夠及時傳播出去。六月四日戒嚴部隊在北京驅散暴亂分子、恢復社會正常秩序的全過程，他便是通過 BBC 廣播公司提供的特別節目看到的。

他當時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香港要亂。

衛奕信的這個預感並沒有錯。

六月四日當天，香港的股市就下跌了一千點，市值損失二千億港幣，地產物業的市值至少也下跌了二千億港幣。僅股市和地產，就損失了近四千億港幣。

六月四日至七日，蜂湧而至的市民到中國銀行香港分行提走了一百七十億港幣，來勢異常猛烈。香港分行向港英政府和匯豐銀行緊急交涉，並從內地調來資金平息擠兌風潮。

「六四」風波後，本來已經穩定的香港民心又浮動起來，移民高潮隨之而起，外國領事館外排起了等候簽證的長隊。香港有不少公司企業擬議遷册。

由於西方傳媒對「六四」風波不顧真相的大肆渲染，再加上很多香港人對祖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瞭解不深，因而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偏見。

「六四」風波後，圍棋國手聶衛平要去東南亞參加比賽，途經香港，與他同行的還有浙江省橋牌隊。按約定，他們一行於下午四點鐘就到了新華社香港分社。橋牌隊的隊長要去九龍辦點事，說好了隔一會兒就到，可是一直到晚上九點鐘才到。一問才知道，香港的出租車司機拒絕運載前往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乘客。

衛奕信人在倫敦，可是香港發生的大事小情還是一無遺漏地傳進了他的耳朵。

這幾天，香港折騰得最歡的要數「支聯會」了，它募捐到手的資金已達二千萬港幣。有了錢，這個組織似乎變得神通廣大起來。他們先後幫助不少內地一些「民主」人士逃到香港，又由他們出頭和某些西方國家取得聯繫，送他們到那些國家「避難」。這些人在香港逗留期間，一應費用都是「支聯會」提供的，有些「民主」人士還住在「支聯會」頭面人物的家裏。

衛奕信清楚「支聯會」那幾個頭面人物的底細，如果沒有強硬的後台，他們絕對掀不起這麼大的風浪。這個後台是誰呢?很可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六四」風波前後，大批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人員雲集香港，與「支聯會」來往密切。他們還能幹出些甚麼呢?

衛奕信對此憂心忡忡。已經有人公開提出要把香港變成支援內地「民主」運動的基地，實際上就是把香港變成外部勢力顛覆中國的橋頭堡，中共能坐視不顧嗎?這樣發展下去，香港實在是後患無窮。

衛奕信還瞭解到，內地駐港各機構正在積極進行工作，準備邀請包玉剛、李嘉誠等知名人士，前往北京與鄧小平會晤。還計劃邀請其他一些資深人士，與中共新領導人江澤民見面。採取這些行動的意圖很明顯，就是要千方百計消除香港人的誤解，維護香港的穩定。

身爲港督，衛奕信再一次感到慚愧，本來是自己的份內之事，卻讓人家給幹了。看來，他不應該留在倫敦，現在他最合適的去處還是港督府。

就在衛奕信準備動身之際，從英國外交部傳來消息，英國政府單方面宣佈中止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和中英土地委員會的工作。中英之間關於香港問題的一切磋商，處於完全停頓狀態。衛奕信當即決定推遲歸期。這幾年的經驗告訴他，在香港問題上，如果得不到中方的合作和支持，英國人甚麼也幹不成。既然英國政府已經公開表明了不合作態度，那麼他這個港督回不回香港又有甚麼實際意義呢？

外交官的職業敏感告訴衛奕信，英國對香港的政策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作爲港督，他應該知道這個變化的內幕。可是能夠接觸高級機密的政府高層人士中，他還找不到一個知心密友。想來想去，他終於想起了一個人，這就是已經下台的外交大臣賀維。

賦閒在家的賀維臉上永遠掛着笑容，對於衛奕信的不請自至，他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吃驚與不快，而是十分熱情地把他迎進了會客室。

賓主坐定，很快就轉入了正題，衛奕信請賀維透露一些英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決策的內幕。

「我哪裏知道甚麼內幕呀！」賀維緊接着又說：「要是說有內幕，這也是盡人皆知的事情。我們的首相一切唯美國人的馬首是瞻，美國人要制裁中國，咱們英國人也得有所表示呀！」

「美國人譴責中國人使用暴力，可他們自己又怎麼樣呢？」衞奕信說。

衞奕信這句表示不平的話是有所指的。前幾天，已經下野的美國前總統列根公開發表談話，大講中國政府的壞話。有記者問他，你在一九六九年任加利福尼亞州長期間，曾動用國民警衞隊鎮壓加州大學校園內發生的示威活動，這又該怎樣解釋。列根辯解說，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兒，那次示威是左翼學生所爲，而且事先得到確切情報，共產黨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

列根的狡辯引起輿論界的一片嘲笑聲。按照他的解釋，北京方面採取的行動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現在有些英國人完全可以不長腦子，只要美國人說甚麼就跟着說甚麼就行了。你看看這個。」賀維說着把一摞文件遞給衞奕信。

衞奕信接過來隨便翻了翻，全是英國情報部門匯總的中國最新動態，耐人尋味的是，這些消息的來源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

「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的情報就那麼準確嗎？」衞奕信搖晃着手中的紙片說：「前些日子，他們剛剛鬧出了個大笑話。頭一天他們向白宮匯報，鄧小平已經昏迷不醒，生命垂危。第二天鄧小平就公開露面了，身體非常健康。聽說布殊總統對中央情報局長韋伯斯特的工作十分不滿，年底就讓他捲鋪蓋滾蛋。」

「美國總統可以不相信中央情報局的話，可是我們的人卻堅信不疑。」賀維遲疑片刻，說：「我可以先向你透露一下，國會的外交事務委員會成立了一個特別小組，正在對中國的局勢進行分析。按照他們得出的初步結論，北京政權不能自然維持到一九九七年。因此，我們的對華政策就不應固定在單一策略上，而要保持高度彈性，以適應中國的任何轉變。」

賀維思忖片刻，又說：「按我的理解，我國政府要在香港問題上表現强硬態度，過去講平穩過渡，以後我們要時刻提醒自己，一九九七年以後的香港很可能仍然會留在英國人手裏。我想，韓達德先生會把這一切都告訴你的，而且還會有更具體的部署。」

從賀維家中告辭出來，衛奕信很快又受到了外交大臣韓達德的召見。果然不出賀維的預料，一見面韓達德就興致勃勃地大講英國政府要改變在香港問題上沒有作爲的形象，要利用目前的天賜良機，接連打出幾張讓中國人難以招架的牌，讓香港的未來成爲英國人的天下。

衛奕信默默地聽着。他感到，住在倫敦的官僚們對於香港的瞭解，就像倫敦與香港之間的地理距離一樣遙遠，韓達德描述的香港遠景，無異於海市蜃樓。不過，他沒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見。他知道韓達德向他透露的那幾個「殺手鐗」，肯定又是戴卓爾夫人的心血來潮。而這位「鐵娘子」最近越來越專橫跋扈了，聽不進去半點不同意見。

衛奕信極不情願地離開了倫敦，但他沒有直接飛回香港，而是到日內瓦住了幾天。這是他的例行休假，別人不便干涉。

3 衛奕信以設宴待客為名，有意無意地問起北京方面對「六•四」風波的定性。姬鵬飛重申對港澳方針不變。港英政府暗中搗鬼。英方抛出「兩局共識」法案和「人權法案」。包玉剛的女兒、女婿開價十億英鎊，希望續租香港十年。

六月十六日清晨，港督衛奕信從日內瓦乘機返回香港。

他知道自己的行蹤無法保密，因而早就把應該對外界說的話想好了。一下飛機，還沒等圍上來的記者們提問，他就主動提出話題。他告訴記者們，他已經注意到北京方面已告誡香港人不要參予內地的「民運」，他希望香港人不要把這當成耳旁風。香港人要克制自己的行動，以免觸怒中央政府，引發不利於香港現狀的結果。

當天，衛奕信以及鄧蓮如等多位立法、行政兩局議員又分別發表宣言，諄諄告誡香港人在內地一定要遵守當地的法令，避免發生令人難堪的事件。

衛奕信在表明了寧事息人的態度後，又以設宴待客爲名，把中方駐港機構的部份官員請到中環路上的一家大酒店。在觥籌交錯之間，他有意無意地詢問起北京方面對「六四」風波的看法。當他得知這次風波被定性爲動亂後，半晌默然無語。

很快，港督的臉上又浮現出了一絲難得的笑容。鄧小平在中共內部做的一次談話傳到香港。他

鄭重地告訴那些懷疑中共政策會倒退的人，「我們的一切基本提法，從發展戰略到方針政策，包括改革開放都是對的。要說不夠，就是改革開放得還不夠。」

六月二十二日，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發表談話，再次承諾「中國政府按照『一國兩制』構想所制定的關於香港、澳門問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是不會改變的。」這是「六四」風波之後，中國高級領導人第一次對港澳問題正式表態，起到了澄清迷霧，穩定人心的作用。

來自北京的各種信息都能使衛奕信安下心來，而來自倫敦的壓力卻讓他心神難安。「六四」風波後，美國政府公開號召西方國家向它看齊，爲「民運」人士提供庇護。英國政府自然是積極響應，當即指示港英政府對來港的「民運」人士提供秘密幫助。衛奕信一邊佈置執行上級指示，一邊暗暗擔心，如此敏感的問題一旦處理不當，勢必會惹火上身。

衛奕信擔憂的麻煩很快就接踵而至。

北京市游泳運動員楊洋，到香港旅遊逾期未歸，隨即公開發表聲明，因爲怕回國受迫害而要求政治庇護。其實他並未受過任何迫害，只是自己不想回國。經過中方外交部門的多次交涉，港英政府表示，只要中方保證楊洋回國後不受處分，就可以按處理逾期居留者的慣例，將楊洋送回國內。

中方很快就作出了有關保證，可就在這時候，楊洋卻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領到了簽證，一轉身去了美國。中國外交部得知這個消息後，緊急與港英政府進行交涉，可是港府卻表示，人已經走了，「無能爲力」。

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而暗中搗鬼、不重信用、出爾反爾的總是港英政府。

還有一件讓中方感到氣惱的事情，那就是七月初，中方分別向英國外交部和港英政府提出取締「支聯會」、撤銷「支聯會」註册的要求。港英政府以「支聯會」註册不違反香港法律爲理由，拒絕了中方的要求。

在發生了這一系列不愉快之後，港英政府與中方的關係幾乎降至冰點。直覺告訴衛奕信，中方在忍無可忍之際，肯定會予以反擊的。

中方確實在籌劃反擊，而且已經找到了一個恰當的反擊點。

對於內地非法逃港人員，中港雙方以往有過協議，凡是非法逃港人員被抓獲後，當天都要予以遣返，中方要予以接收。如今中方正式通知港英政府，如果港府不能作出承諾，保證不再發生類似楊洋事件，中方就拒絕接收遣返人員。

中方不僅這樣説了，而且這樣做了，滯留在港的非法逃港人員越來越多，在香港各界引起了極大震動，港英政府感到壓力很大。衛奕信緊急請示國內，得到的卻是模棱兩可的答覆，讓他相機行事。

處在港督的特殊地位上，衛奕信深切地體會到英國政府在香港問題上自相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們很想利用這次政治風波收買香港人心，但是這樣做必然會直接造成香港的動盪局面；另一方面，他們很想維持香港的治安與穩定，但又恐怕這樣會失去爭取民心的機會。

眼下，衛奕信顧不得太多了，他要盡快擺脱危機，於是指示港府新聞處在《南華早報》的頭條新聞欄裏向中方作出公開承諾，表示港英政府「無意讓香港用作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地……港

府將繼續對香港的特殊情況、中國政府所關注的問題和利益，予以愼重考慮。」

一場危機很快就煙消雲散了，但衛奕信卻絲毫没有感到輕鬆。他知道英國政府下一步要打甚麼牌。不過，這一次他要充當一回看客了。

英國政府準備打出的第一張牌叫作「兩局共識」。所謂「兩局共識」就是港英行政、立法兩局抛出的加快立法局直接選擧的「共識」方案。該方案於七月份通過後，立刻緊鑼密鼓地開始實施。

香港立法局成立於一八四三年，從那時開始，就没有一個議員是由直接選擧產生的，而是委任的。這種不民主的作法本來是英國人搞的，但這回他們卻要講民主了，而且要大講特講。那個「共識」方案建議一九九一年立法局首次引進直接選擧議員，一下子就是二十席，一九九五年增加到三十席，一九九九年增加到四十席，到二〇〇三年全部議員都由直接選擧產生。

講民主當然是好事，中方擧雙手歡迎，這裏的分歧在於中方從香港的實際出發，認爲香港的民主發展要遵從循序漸進的原則。因此，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的決定中寫下了這樣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局議員每屆六十人，其中第一屆直選產生議員二十人，一九九九年的第二屆直選產生議員二十四人，二〇〇三年的第三屆直選產生議員三十人。

英國人並不是真的關心香港的民主建設，其目的不過是以此爲藉口向基本法挑戰。過去，他們對基本法的起草表面上是不聞不問；如今，他們擺出一副强硬的進攻性姿態。

八月十四日，港英政府政務司屈珩發表了題爲《收拾殘局》的談話，表示「六四」風波使港人的信心受到打擊，要求重新研究「九七」以後中國在香港的駐軍問題以及基本法草案中關於宣佈特

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的條文，他還提出希望中國政府延期頒佈基本法。

屈珩選擇這個時機發表如此內容的談話，向中國政府發動攻勢，顯然不是他個人的行爲。

對於英方咄咄逼人的攻勢，中方在原則上沒有讓步，但態度比較克制，一再督促英方回到與基本法銜接的軌道上來。在直選立法局議員問題上，中方還做了一定讓步，最後雙方同意一九九一年直選議席爲十八席。

英國人似乎覺得佔了大便宜，膽氣足了起來，迫不及待地又打出了一張新牌，這就是「人權法案」。

所謂「人權法案」，是指港英政府照搬一九七六年聯合國制定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內容，搞成了一個「人權法」，以法律形式在香港地區加以實施。

這又是英國人向基本法狠狠砍去的一刀。

基本法就是香港的小憲法，凡是與之抵觸的香港現行法律，在中國恢復行使主權後，都將由全國人大公佈予以廢除。英國人顯然不想讓未來的特別行政區政府順利地實行法治，他們要搶在一九九七年之前，根據這個「人權法」大肆修改或廢除香港的現行法律，達到完全架空基本法的目的。

英國人的心思是不難看透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專門發表談話，指出港英政府的「人權法案」完全違背了中英聯合聲明關於香港法律基本不變的精神，必須停止實施該法案。

這裏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插曲：中英雙方在香港問題上不斷發生衝突，使得本來晴朗無雲的香港上空出現了一片濃雲，很多人覺得香港的前途神秘莫測，難以把握。於是，香港的一些中外巨商

開始醞釀一九九七年以後向中國政府「租用」香港，有人甚至連租期都已確定下來，爲期十年。美、日、法的一些商界人士也躍躍欲試，提出各自不同的租借方案。有人開價每年租金一億美金，有人開價每年租金一億英鎊，以換取香港的「治權」。

包玉剛的女兒、女婿爲此事竟找到了新華社香港分社，一開口就開價十億英鎊，擬租十年。香港分社的官員好心地告訴他們：

一、可以代爲他們向北京高層領導人反映這個意見。

二、這是一個極敏感的問題，中國政府接受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

三、不要將他們的想法擴散出去，特別是不要通過傳媒擴散出去。

這個消息很快就傳到了衛奕信的耳朵裏，他苦笑着大搖其頭。在他看來，商人們有經濟頭腦，卻沒有政治頭腦。黃金有價，國土無價，主權更無價，中國政府和領導人在這方面是不會作出絲毫讓步的。

4 假護照在香港黑市上泛濫。英國國會通過「居英權計劃」，香港將有五萬個家庭共計二十二點五萬人被給予完全的英國公民地位。中國不承認香港同胞在「居英權計劃」中獲得的英國國籍。英國人又要在新機場建設上玩花樣。

一份由香港電台「視播縱橫」節目組搞的民意調查擺上了港督的辦公桌。

這份調查是在一千名香港居民中進行的，其中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對香港前途無信心，百分之四十七的人對香港前途有信心，而在獲得英國居住權的人當中，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對前途有信心。另外，有百分之八十四的香港人支持爭取英國居住權，有百分之九十二的人表示願意堅守崗位，促進香港繁榮。

這份調查是有來由的。「六四」風波後，有些香港人看不清形勢，紛紛離國而去。有些人身在香港，卻挖空心思地弄一張外國護照，結果使得製造假護照的人大發橫財，一份假湯加護照，竟賣到三點五萬美元。有些外交官也利用手中簽發護照的權力，大肆收取賄賂以至南窗事發，委內瑞拉駐港總領事沙里奧•哥拉斯就在這方面栽了跟頭。

這幾天，衛奕信接待了好幾位香港知名的企業家，他們全都叫苦連天，說移民太多影響了企業的正常運轉。他們又衆口一辭地要求港督幫助解決「居英權」問題，即爲企業員工先辦好赴英的准

遷手續再讓他們留下來工作，這樣就等於給每人服了一個「定心丸」，開出了一條退路，一有風吹草動就可以去英國，風平浪靜時就留在香港安心工作。

這一想法着實讓衛奕信興奮了一陣兒，他覺得起碼應該讓那些正在爲港英政府服務的公務員獲得「居英權」，這樣就會得到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

他曾就此事向中方駐港有關人士做過試探，得到了這樣的答覆：

「假如把『居英權』應用在公務員身上，九七年以後的特區政府在連續運作上會產生很大困難，有『居英權』的公務員，對未來特區沒有信心，大部份走了，特區政府內將缺乏熟悉情況的人。假如那時香港情況好，大部份公務員有信心，拿着『居英權』不走，又會給特區政府造成被動……」

衛奕信覺得這種分析有一定道理，就不打算再提這件事了。可是他沒有想到，這件事很快被反映到英國國會的一些議員那裏，英國國會對此展開了多次討論，最後竟然通過了一項龐大的「居英權計劃」。

根據這項計劃，香港將有五萬個家庭共二十二點五萬人被給予完全的英國公民的地位。在香港，持有英國護照的人多達百萬，但英國政府並不全部給予居英權，而是根據特殊的計分形式，將香港人分成許多等級，只有那些達到一定等級的人才能獲得居英權。

「居英權計劃」在英國國內引起了激烈的反對，保守黨主席諾曼·特比特在下議院後座議員中帶頭抨擊這個計劃，他預言這個計劃的實施將帶來一個可怕的移民浪潮。前國防大臣韓俊廷發表聲

明，認爲最好的辦法不是實施「居英權計劃」，而是邀請中國政府參予對香港的管理。

儘管反對之聲不絕於耳，但英國政府還是執意維護「居英權計劃」。他們的目的是想讓香港社會出現分化，把那些獲得居英權的人培養成爲忠於英國的一股勢力。

英國的「居英權計劃」一公佈，中國外交部就發表聲明，不承認香港的中國同胞在這個計劃中取得的英國國籍。同時，基本法還針對這種情況作出規定：非中國籍的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立法局全體議員中所佔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

兵來將擋，水來土淹。英國先後打出的幾張自以爲頗具威力的牌，都被中國人毫不客氣地封了回去，這時候他們才發現自己到頭來還是兩手空空，甚麼便宜也沒佔到。他們還發現，在香港問題的較量上，中國人總是佔有先天的上風，因爲那畢竟是人家的地方。看來，他們的唯一致勝之道還是打經濟戰。

一九八九年十月，港督衛奕信在其《施政報告》中突然正式公佈了興建新機場的計劃，並且立刻希望得到中國政府的確認和支持。這就是英國人打出的最後一張王牌——新機場建設。

香港要建設新機場，這本來不是甚麼秘密。香港現有的啓德機場，是一九二〇年由香港律師何啓與好友歐德在九龍海濱荒灘上共同建造的，租賃給香港飛行會使用，並以兩人名字的合稱爲機場命名。該機場於一九三六年投入正式營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成爲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每週有全球數十家航空公司的一千多個定期航班往返，平均每二分多鐘就有一架飛機起落。

啓德機場太繁忙了！

其實，它的合理容量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接近飽和。它的設計最高能力是每年處理二千四百萬人次乘客和十三點四萬班航班，而一九九〇年全年接送旅客已達一千八百七十萬人次，處理航班十點七八萬班。倘若按過去十年乘客量和航班機次的平均增長量計算，啓德機場到一九九三年就將達到極限使用點。啓德機場經受不住如此頻繁的起落，它的每一根鋼筋鐵骨都發出了脆弱的呻吟。

建設新機場刻不容緩，否則將動搖香港作爲國際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這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

早在一九七二年時，港英政府就着手研究過興建新機場，但終因建設費用龐大而久議未決。一九八三年，港府又計劃在赤鱲角興建新機場，僅爲此事花去的顧問費用就高達一點八五億港幣。後來，香港財政司宣佈放棄這一計劃，理由是港府無力擔負四百億港元的工程費用。然而據知情人透露，當時港英政府的財政儲備已多於四百億港幣。

中國方面一向支持興建新機場。早在一九八四年，中國政府就向香港方面提出過盡早建設新機場的建議。李鵬總理還親口對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講過：香港確實需要建一個新機場，現在的啓德機場太小，位置也不好，影響香港的發展。

既然大家意見一致，那就動手幹吧，恰恰就在怎樣動手這個環節上，英國人玩起了花樣。

港英政府對於修建新機場早有謀劃，但對中方一直嚴加保密，只是在找外商融資時遇到了意想

不到的困難，這才意識到爭取中方支持的重要性，於是回過頭來要求中國政府表態支持。表態可以，但總得來一番研究論證，於是，中方合乎情理地要求港英政府提供有關資料。到了這個節骨眼上，英國人變得磨磨蹭蹭起來，直到一九九〇年三月至四月間，港英政府才把有關資料斷斷續續地交給中方研究參考。在近半年的時間裏，中方收到的資料竟然只有九頁紙。

英國人的悶葫蘆裏到底賣的是甚麼藥呢？

英國人實在不想讓中方知道修建新機場計劃的內容。他們明白，保密和出其不意是造成既成事實的最好手段。

然而，保密總是有一定時間和範圍。不過，出其不意的效果倒是達到了。當這份計劃的詳細內容出現在中方有關專家的面前，他們的確是吃驚不小。

港英政府計劃修建新機場的龐大工程被稱爲「玫瑰園計劃」，核心項目是在大嶼山赤鱲角劈山填海，修建一座現代化的國際機場，此外還要修建港口、鐵路以及各種必須的配套設施。以一九九〇年物價推算，該計劃開支高達一千四百億港元，超過了本世紀歐洲最大的工程——英法合建的英吉利海峽海底隧道的造價(七十七億英鎊，約合一千一百億港元)。新機場預計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前完工，並啓用第一條飛機跑道，週邊工程將到二〇〇六年完成。

新機場佔地一千二百七十五公頃，是啓德機場的四倍，其中四分之三的佔地要填海而成。這相當於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的面積，是香港歷來最大的填海造地平整工程。整個工程得挖走七千萬

立方米的海底沉積物，要削山移走八千五百萬立方米的岩石，需一億八千萬立方米的填海材料。單單是填海材料，若以現在一般卡車裝載八立方米重量計，需要動用八百輛卡車每日往返四十次，要兩年時間才能完成。後來，承包這項工程的建築商特意定製了一批車輪直徑達一層樓高的巨型運土車，每輛可裝載二百噸材料。

龐大的工程，巨額的耗資，使得中方決策人物不能不謹慎從事。

中方謹慎從事的原因，還在於實施這項計劃有着更微妙的底蘊。如果讓英國人按現計劃如願以償，他們起碼能撈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好處：

第一，在政治方面，英方會在撤離香港之前留下一座光榮的「紀念碑」。

第二，從經濟方面，可以把香港歷年來的財政儲備花光，還會給未來的特別行政區政府留下一大堆債務。

第三，從長遠方面，英方單方面決定這樣一項跨越政權交接時間的工程，爲他們日後插足香港事務埋下伏筆。

如果不想讓英國人如願以償，中方只有動用否決權，不讓新機場建設開工，而這又是香港本身的發展不容許的。

英國人在暗中竊笑，他們以爲這一回是勝券在握了。

5

第一輪專家小組會議召開前夕，港英政府突然單方面宣佈自行集資七十億港元，興建青馬大橋，企圖造成既成事實。中英關於新機場建設的談判陷入僵局，焦點是留給未來的香港多少錢。韓達德訪華前夕，流言四起。

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四日，英國外交部主管香港事務的次官莫德來到北京。

在此之前，來自香港的消息使莫德十分沮喪。英國人推出「居英權計劃」後，本來以爲香港人會趨之若鶩，因而事先設了最高限額，沒想到申請居英權的人少得可憐，只有幾萬人。「安居樂業故國地，不去英國當下人」，這樣一副對聯透露出了香港人的心情。看來，「居英權計劃」將以慘淡的結局收場。「人權法案」也由於中方的堅決反對而失去了實際意義。而唯有新機場建設計劃還有商討的餘地，中方表示還要看一看，研究以後再作決定。莫德此次北京之行的真正目的，就是摸清北京在這個問題上的底牌。

七月二十五日，莫德受到了李鵬總理的接見。趁此機會，他建議中英雙方專家可就機場問題進行討論。李鵬對他的提議很感興趣，當即表示接受，同意中英雙方專家組對新機場問題進行磋商。

莫德暗暗有些吃驚，他沒有想到中英關於香港新機場問題的會談竟這樣迅速而輕鬆地拉開了帷幕。

由於英方缺乏誠意，這次談判從一開始就一波三折。就在第一輪專家小組會議召開前夕，港英政府突然單方面宣佈自行集資七十億港元興建「玫瑰園計劃」中的關鍵項目——青馬大橋。青馬大橋是計劃中連接新機場和港九的必經之途，工程十分浩大，單是橋墩就高達一百九十六米，比匯豐銀行總部大樓還高，所需鋼材量是匯豐大廈所用鋼材的一倍半。全橋跨度長達一千三百七十七米，落成後是全球最長的公路、鐵路兩用巨型橋樑，工程費用預算達六十億港元。這樣一個工程開工後，下馬談何容易，實際上就造成了赤鱲角新機場建設的既成事實。既然成了事實，還談判甚麼？英國人的如意算盤打得好精明喲！

國務院港澳辦公室負責人立即發表談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作法是港英政府企圖造成既成事實迫使我方接受。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中國專家組赴港與英方進行了第一輪會談。雙方就新機場選址、規模、投資等問題交換了意見，沒有甚麼實質性進展。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日至二十日，中英專家組第二輪會談在北京舉行。港府公佈了十二項與新機場有關的工程項目，會談向縱深方向發展。但雙方的爭執焦點卻涉及重大原則，使得這次會談並未取得進展。中方堅持認爲有權過問香港涉及「九七」後重大事務的決策，英方卻以「九七」前對香港負有管治責任爲由加以拒絕。

一月二十三日，衛奕信急匆匆趕到北京，面見李鵬總理，他希望能消除雙方存在的分歧，使修建新機場問題的談判得以繼續下去。

二月二十一日，中英專家小組第三輪會談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英方在這次會談中提出了機場核心計劃可供選擇的方案，中方提出了有關財務安排與成立機場管理局和諮詢委員會「三位一體」的建議方案。

三月，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赴港與港督衛奕信進行了兩次會談，雙方在財務儲備安排、成立新機場管理局和大型基建諮詢委員會等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中英港三方就新機場問題進行的接觸次數越來越多，級別不斷提高，給外界造成了很樂觀的印象。而就在這時候傳來談判陷入僵局的消息，不能不使很多人感到意外和震驚。

中英談判陷入僵局的真正原因在哪裏呢？用一句話概括起來就是：究竟留給未來的香港多少錢。

港英政府現有財政儲備七百五十億港元，港府打算從新機場談判達成協議開始，預撥一百四十億港元的財政儲備，按年利息百分之八計算，到一九九七年約有二百多億港元留給特區政府。這個數字和中方的要求很接近。但與此同時，港府爲修建新機場將發行一百億港元的債券，這筆款項連同日後的利息加起來約一百八十億港元左右，要由未來的香港特區政府負責償還。這樣一來，留給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實際上只有五十億左右，只是港府目前財政儲備的「零頭」。中國領導人把這種不合理的情形形象地稱作「你請客，我會鈔」。

此外，中英港三方在新機場建設的財政開支方面也有着嚴重的衝突。

中方要求所有工程預算的修訂應有一個極限，即成本上限封頂，但港府卻不願意作此承諾。如

果機場造價一升再升，豈不是個塡不滿的無底洞，會把香港所有的錢都花光的。後來的事實證明中方的這個擔憂是很有道理的，才到一九九一年底，新機場建設財務預算就比一九八九年時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三。

負責建造新機場的監機局和承辦新機場鐵路的地鐵公司，是兩個港府全資擁有的企業，它們大量舉債，總額高達七百三十億港元。這些巨額債務都是要在一九九七年以後償還的。

爲了支付龐大的基建開支，港府計劃通過壓縮經常性開支和加稅來彌補虧空，而中方不同意因此而增加香港市民的負擔。

港府還打算出賣新機場鐵路沿線的六十二公頃土地，收取四百億港元投入新機場和鐵路建設。此舉其實是提前挪用「九七」後特區政府的錢，也遭到了中方的拒絕。

中英新機場問題談判在最後階段擱淺，一時間流言四起，外界紛紛傳言新機場建設計劃將擱置，投資者觀望不前。

如此僵持下去，顯然對新機場建設計劃的實施極爲不力，英國人着急了。

一九九一年四月一日，英國外交大臣韓達德動身前往香港，開始了他的訪華之行。

韓達德此行是受英國首相馬卓安親自指派的。去年十一月，年僅四十八歲的馬卓安接替執政十一年半之久的戴卓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入主唐寧街十號，成爲一八九四年以來英國歷史上最年輕的首相。馬卓安上任後一個多星期，英國政府就決定恢復第二批總額爲三億英鎊的對華軟貸款。他

又致信給李鵬總理，希望將中英關係恢復到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前的水平。李鵬對英國的態度十分讚賞，並在覆信中表示了同樣的意願。

對於韓達德此次訪華的真正意圖，外界有很多傳言。他這邊剛上飛機，香港那邊就得到消息，說他會在香港機場發表措辭强硬的聲明，引得大批記者湧到啓德機場。

在啓德機場，韓達德真的發表了談話，措辭確實强硬，他說英國不能被中國控制，修建新機場的決定權在港英政府。不過他又說，這個計劃進行到甚麼程度，也取決於與中方的磋商。

韓達德剛離開機場，一些消息靈通人士又送來最新消息：如果北京堅持在新機場問題有否決權，雙方僵持不下，韓達德有可能會離開會場抗議。

韓達德萬里迢迢前往北京，難道是爲了表示他的强硬嗎？如果根本達不成協議，他還去幹甚麼？韓達德的强硬姿態會不會是他的一種政治手腕呢？

香港這邊議論紛紛，迷惑不解，而北京那邊卻鎮定自若。中方專家組組長説得最爲直率，他根本不相信英方會擱置新機場計劃，不信請走着瞧。

四月三日傍晚，韓達德乘坐的專機在首都機場降落。

一到北京，韓達德就好像變了一個人一樣，臉上笑容可掬。他笑眯眯地與前來歡迎他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田曾佩、英國駐華大使唐納德握手，又笑眯眯地對記者們說，他曾在北京工作過三年，又曾跟隨希思先生、戴卓爾夫人訪華，對這個城市留下極爲愉快的印象。

在接下來爲期三天的訪問中，他還能不能加深這種愉快的印象呢？

這個問題很快就有了答案。

四月四日上午，中國外長錢其琛在釣魚台國賓館與韓達德舉行會談。錢外長向他保證，中國無意干預純屬一九九七年以前香港的行政管理事務，根本不存在「共管」、「控制」和否決權問題。但是對於像新機場建設這樣跨越一九九七年的重大工程和龐大支出，中方應該過問、審議。

下午，韓達德與魯平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會晤，雙方同意加快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

四月五日上午，江澤民主席在中南海會見了韓達德一行，他親切地對韓達德說：「你五十年代在中國工作，七十年代又來過，可以說是中國人的老朋友了。在香港過渡時期內，中英兩國是在一條船上，我們要同舟共濟。只要本着這個精神，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當天下午，李鵬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韓達德。他滿面春風地說：「春天已經來到，希望閣下此次來訪，就像今天春光明媚的天氣一樣，促進中英關係全面恢復和發展。」

四月六日上午，韓達德在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他只是籠統地告訴記者，中英雙方縮小了分歧，加深了瞭解，卻沒有告訴記者，英國政府已經作出重大讓步，向北京保證不會因爲修建一個數十億美元的機場和港口而到一九九七年移交給中國一個財庫空空的香港。

中國人對韓達德的承諾表示滿意。韓達德也圓滿地完成了與中國修好的任務，當天下午，他心情愉快地離開北京，到山東、廣東兩地參觀訪問去了。

6 中英談判的最後拍板工作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在長達九個月的新機場問題談判中，雙方所用紙張竟達半噸重，馬卓安首相訪華，諒解備忘錄正式生效。爭奪還沒有結束。

韓達德一個人走了，留下了他的副手和港方的機場專家小組。根據馬卓安首相的指示，新機場問題要很好地迅速解決，以免分散他的精力，妨礙處理國內的政治、經濟事務。

英國人開始有了更多的誠意，重新開始的談判變得意外地順利起來。

四月五日至十三日，中英兩國政府工作小組在北京舉行了第一輪會談。中方首席代表爲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一司司長陳佐洱，英方首席代表爲英國外交助理次官柏恩斯。雙方在中方人員入機管局、留儲備金給特區政府問題上達成共識，但對中方在香港跨越「九七」的重大問題的審議權上，雙方仍有不小差距。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中英兩國的原班人馬又在北京舉行了第二輪會談。雙方集中就財政儲備、協商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進一步交換了意見。

六月二十六日，馬卓安派出他的外事顧問珀西•柯利達作爲首相特使抵達北京。二十七日至三十日，柯利達和魯平在北京舉行緊張的會談，經過反覆磋商，雙方分歧已經所剩無幾。

六月三十日晚，中英雙方終於在香港新機場建設以及有關問題上取得了一致意見。談判最後敲

定，魯平主任和柯利達特使分別代表本國政府草簽了《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

為了這一份薄薄的備忘錄，中英港三方進行了長達九個月的談判。據知情人士透露，僅是雙方用去的紙張就達半噸多重！

這份備忘錄在開頭部份就寫明了兩國政府的共識：香港需要一個新機場，以保證並發展其繁榮穩定；機場項目應符合成本效益，而且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以後不應在財政上給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造成負擔；需要制定一套切實可行的安排，以使與新機場有關的工程能夠迅速有效地進行。

這份備忘錄的主要內容有：

1.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港英政府負責建設香港新機場十項核心工程項目（機場第一條跑道和有關設施、機場鐵路、青衣至大嶼山幹線、西九龍填海、三號幹線、西區過海隧道、北大嶼山高速公路、東涌一期發展工程、與機場鐵路有關的中區及灣仔填海部份）；

2.機場建設應成本低、效益高，不給特區政府造成財政負擔；

3.到一九九七年時，香港機場的總債務不超過五十億港元；若超過五十億港元的舉債，須由雙方對該舉債建議取得一致意見後方可舉債；

4.港府應留下二百五十億港元的財政儲備給未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一九九一年七月四日，北京時間下午四時，中英兩國同時公佈了這份諒解備忘錄。香港各界均

表示歡迎，認爲此舉有利於香港過渡期的平穩。馬卓安首相也歡迎英中雙方達成這一協議，認爲這有助於增加香港的信心。

與此同時，英國外交部宣佈，馬卓安首相即將訪華，主要目的是同中國領導人正式簽署這份剛達成不久的諒解備忘錄。

九月，北京又開始進入它最好的季節，輕風徐來，傳送着微微涼意。

九月二日下午，馬卓安首相一行乘坐的專機降落在首都機場，開始了他爲期三天的正式友好訪問。

由五輛白色摩托車引導的國賓車隊駛上寬闊的長安大街，高懸的中英兩國國旗在微風中獵獵作響，數以百計的彩旗在陽光下顯得分外鮮艷。東西長安街兩側，每隔三十米就肅立着一位一動不動的武警戰士。

人民大會堂東門外的台階上，兩列威武挺拔的年輕軍官成雁翅排開，一條深紅色的地毯從他們中間向大會堂深處延伸。

下午四時，英國客人乘坐的汽車由北向南駛到人民大會堂東門外。馬卓安首相笑容滿面地走下車來。跟隨在他身後的有外交大臣韓達德、港督衛奕信以及柯利達、麥若彬，還有首相議會私人秘書布賴特。

李鵬總理迎上前去，與英國客人握手，跟隨在他身後的有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榮毅仁、外長錢其

琛、經貿部長李嵐清、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還有能源部長黃毅誠，他是中方為這次來訪的英國客人指派的陪同團團長。

歡迎儀式開始了。中國政府以最高規格迎接首次來訪的馬卓安首相。獻花、鳴禮炮、高奏國歌、檢閱儀仗隊，一切都按程序熱烈而莊嚴地進行着。

歡迎儀式結束後，英國客人前往釣魚台國賓館稍事休息。接下來在當天晚上，賓主又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見面。

雙方交談甚歡。李鵬總理對馬卓安首相說：「中英雙方有許多共同點，也可能有些不同看法，但這不要緊，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地球上，我們需要互相來往。」

馬卓安首相點頭表示同意。

李鵬總理又說：「閣下是第一次訪問中國，可惜這次時間太短，不可能對北京的建設情況和名勝古蹟進行參觀，只能靠你夫人來彌補了。」

話音剛落，周圍便響起了一片歡快的笑聲。

九月三日下午，在寬敞明亮的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裏，桌上插着的中英兩國國旗格外醒目。十一時四十三分，李鵬總理和馬卓安首相分別在備忘錄上簽字，然後雙方交換簽字文本，互相握手。

在場的記者們紛紛拍下這個歷史性的瞬間，在場的高級官員們熱烈鼓掌。從這一刻開始，《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正式簽署生效。

簽字儀式結束後，李鵬總理和馬卓安首相分別發表了簡短的講話。

李鵬說：「諒解備忘錄的簽署是一件令人高興的大事，是中英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

馬卓安說：「這是一份至關重要的文件，它標誌着倫敦—北京—香港之間的關係跨入一個新階段。」

致辭完畢，李鵬和馬卓安舉起酒杯，互相祝賀。在悅耳的碰杯聲中，金色的香檳酒香四溢，這個當年簽署過中英聯合聲明的大廳裏彷彿再現了當年的輕鬆歡快氣氛。

九月四日下午，錢其琛外長和隨同馬卓安來訪的韓達德舉行了會談。

這兩位外長級人物的會談很有一些實際內容。

隨着中英關係的好轉，中英貿易也活躍起來。今年上半年，中國對英出口比去年同時期增加了兩成。中國赴歐採購團還同英方簽訂了價值五點五億美元的合同。七月份，英荷殼牌石油公司又同與香港近在咫尺的惠州石化公司達成合資協議，總額爲二十五億美元。然而英國人還不滿足，韓達德請求錢其琛答應今後能更多地購買英國產品。

當時，中國正在鬧水災，英國已經捐款二十五萬美元。爲了表示友好，韓達德當場表示再捐二十五萬美元。

兩國外長還達成協議，今後每半年要會晤一次。除此之外還要拓寬溝通渠道，比如兩國外交部與對方使館、港府與新華社香港分社、港督與魯平主任之間經常接觸，以增加相互合作和瞭解。

九月五日，馬卓安結束了對北京的訪問來到香港，出席香港社會賢達爲他舉行的歡迎宴會。他在講話中對這次中國之行大表滿意，聲稱得到了中國政府多方面的承諾，對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

他還告訴在場的香港名流，中國方面原則上同意在香港設立終審法院，只剩下一些細節有待商談；關於香港用於軍事目的的土地問題的談判即將開始；中方同意盡快落實港府提出的將高雲樓現址作爲建設將來的英國駐港總領事館辦公大樓的提議。

從馬卓安神采飛揚的表情中，人們感覺到他此次訪華取得的成果遠不止這些。

馬卓安帶着簽着中英兩國領導人大名的諒解備忘錄走了，善良的人們以爲香港新機場的建設從此就會步入正軌，可惜這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望，英國人不會就此善罷干休。他們節外生枝，幾次提出了違反備忘錄規定的財務方案，使香港新機場的建設問題又拖了三年多時間才得以解決。

第七章

最後的港督



1

彭定康接替衛奕信，就任香港第二十八任總督。彭定康信誓旦旦，要維護港人利益，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英國外交部次官顧立德在香港爆出「驚人之語」：「基本法是可以修改的。」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日，現任港督衛奕信一個人躲在粉嶺私人別墅裏，靜靜地等待着英國政府宣佈一個與他有關的人事任命。

這個任命是由馬卓安首相親自宣佈的：由保守黨主席克里斯·帕騰先生接替衛奕信的港督職務，於七月份正式赴港上任。

馬卓安在宣佈完這項任命後，發表談話說：「管理好到一九九七年的過渡時期從而確保香港的自由、穩定與繁榮，是政府最爲優先考慮的問題之一，而帕騰先生是最爲合適的港督人選。」

這位爲馬卓安首相大爲推崇的帕騰先生是英國政壇上的職業政客，曾爲戴卓爾夫人撰寫保守黨年會報告及黨內重大政綱文件，是赫赫有名的御用文人。一九八九年，戴卓爾夫人讓他晉陞內閣，出任環境大臣。一九九〇年他又當選爲保守黨主席。

帕騰出沒英國政壇近三十年，並不總是一帆風順。一九九二年，雖然保守黨在大選中再度執政，但作爲保守黨主席的帕騰卻慘遭冷遇，接連失去巴斯選區的議席和連任十三年的下議院議席，與內閣無緣。就在他失意之際，馬卓安感念他當年支持自己登上首相寶座有功，便委任以港督之

職，接替半年前就被英方宣佈撤換的衛奕信。按輿論界的說法，帕騰出任港督是獲得了一個「政府安慰獎」。

對於這個新來的港督，香港各界普遍表示歡迎。立法局議員鮑磊說：「香港人能有這樣一位引人注目的政治家作港督實在是幸事。他可以直接同唐寧街通電話，我認為他會因此受到北京方面的歡迎。」

行政局首席議員鄧蓮如說：「帕騰先生能夠接近首相和外交大臣，這就可以確保香港問題在英國政府的議程上佔突出地位。」

香港城市理工學院的政治學講師簡·李說：「我們需要一位更為強有力的總督，現任總督太軟弱了。」

當然，在香港輿論界也可以聽到不同意見。刊登在《明報》上的一篇文章不無憂慮地說：「處於過渡期最後五年中的港府，將由一位對香港和中國事務不熟悉，在英國政壇新遭慘敗的人來領導，這不能不說是一大諷刺，更不能不令人對英國政府漠視香港利益的作法深感失望。」

說帕騰完全不熟悉中國事務，實在是委屈他了。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間，他作為國會議員出任英國外交部海外發展次官，經常出國訪問，也到過香港，曾就一些經濟援助問題與中國打過交道。但是港督一般都會說中國話，而他卻不會，這實在是對開展工作十分不力。

就在一九八八年訪問香港時，他的中文譯名被寫成「彭定康」，取義「穩定安康」，他感到很滿意。這次出任港督，中文公事管理局照例送上幾個譯名供他選擇，他一眼就相中了「彭定康」三

個字。

自一九七二年以來，歷任港督及所有外籍公務員的中文譯名，都由中文公事管理局提供，但也有人不予採納。比如衛奕信原來的中文譯名是魏德巍，用意取自中文老師的贈聯：「德者當以道爲本，巍峻應有穩定基。」但有人說「巍」、「魏」雙鬼出頭，諧言「危」、「僞」，不甚吉利，他便自作主張改成現名。

衛奕信人如其名，重信重義，與中方一直友善協作，因而引起英國政府的不滿，這也是他被撤換的主要原因。

對於此次自己被解職，衛奕信早有心理準備。幾年來，他領導的港府不斷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批評。香港人批評港府是家常便飯，連天氣不好也要罵上政府幾句。英國政府一與中方發生摩擦，總是責怪港府辦事不力。在香港公衆面前，他覺得自己好像是金魚缸裏供人觀賞的游魚；在英國政府面前，他覺得自己好像是兩扇磨盤中的磨心。這樣的日子太難過了。如今是無官一身輕，他該享享清福了。退路不用考慮，英國國會上議院裏有他的現成位置。

他早已做好了準備，一等新總督的任命發佈出來，就立刻回國述職。他要盡快地把香港的大小事宜交待給那位陌生的帕騰——彭定康先生。

對於這位新任港督，衛奕信既沒有甚麼好感，又沒有甚麼惡感，但他總覺得有幾句話應該對彭說出來，而當面說出來似乎有些不妥，正好這時候英國廣播公司的記者前來採訪，他便藉此機會談了一些對新任港督的期望。

「在未來的五年內，彭先生需要同中國的領導人保持最良好的關係，不應觸怒中國，而應解釋困難所在並嘗試找出可行的辦法。港督不能因爲維護英國的利益而損害港人的利益，因爲維護港人的利益是港督的職責所在。」

衛奕信希望他的繼任者能夠悟出藏在這番寄語中的良苦用心。

四月二十日下午，新任港督彭定康在英國外交部新任專責香港事務的次官顧立德陪同下，來到記者招待會會場。彭定康告訴記者，他要以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是一個管理香港的出色人物。他要把維護香港六百萬居民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對中國，他表示建立良好關係是處理對華關係的首要事項。他還說，他本人與首相和外交大臣個人關係密切，這有利於他在港開展工作。

彭定康的這番談話換來了一片讚賞聲。很多人沒有想到像他這樣一個有着政治背景的人物如此謙恭，不由得好感大增。他那結好於四方的表態，又讓人對他的穩重多了幾分放心。

五月十日，彭定康接受英國電視節目主持人採訪，再次表示出任港督的首要任務是維護港人的利益，與中國政府有效地一同工作，制定短、中、長期工作目標，促進平穩過渡。他還許諾上任後將在短期內訪問中國，向他們表明按中英聯合聲明辦事的重要性。

彭定康的這些談話給人造成了這樣一個印象，他將成爲中國政府和香港居民的好朋友。

然而，在彭定康上任之前，卻出現了一些讓人很不放心的跡象。

五月二十二日，香港立法局內最大的反對派——港同盟主席李柱銘、副主席楊森到倫敦訪問。

這個李柱銘曾在香港當衆燒燬過基本法，鼓吹重寫中英聯合聲明，卻受到了保守黨的禮遇。候任港督彭定康與他們親自交談，會談後還親自送到門口。連馬卓安首相也破例接見了他們，待以「元首級」禮節。在長達四十五分鐘的會談中，李楊二人翻來覆去向馬卓安表示，他們此次訪英的主旨只有一個，那就是敦促英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加速香港民主步伐的要求。馬卓安首相則表示，在香港問題上，英國一向主張把維護「自由民主」放在維護「穩定繁榮」之前。

會見之後，李楊二人大受鼓舞，在倫敦到處發表演説，一時間忙很不亦樂乎。

五月二十四日，英國外交部次官顧立德抵港，進行爲期五天的工作訪問。他聲稱，此行是爲彭定康正式就任港督做準備，同時又聲稱英國支持增加一九九五年直選議席的數目，英國會在適當時機與中方商討此事。

顧立德在港期間，多次會見各方政界代表，反覆强調增加直選議席是加快香港民主化步伐的重要步驟。他心裏當然明白，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要想增加直選議席，需要等到「九七」後，得到特別行政區三分之二立法局議員和三分之二全國人大香港地區的代表同意，再經特別行政區長官同意，方可提交全國人大審理批准。於是，在五月二十八日返英前舉行的記者簡報會上，他有意爆出「驚人之語」：「如果中國有決心，如果政治上有必要，中國人大可以在一九九七年以前修改基本法。」

顧立德的這番言論立刻在香港掀起一片波瀾，一時間竟出現了一股要求增加一九九五年直選議席，要求修改基本法的小小聲浪。英國政府則來了個順水推舟，表示香港的政制改革要留待彭定康

上任後再着手解決。
台子已經搭好了，就等着新任港督彭定康上台演戲了。

2 彭定康身着便裝出現在港督就職宣誓典禮上。他在就職演說中不提女王陛下，卻大談他與首相的私交。彭定康破天荒地開放總督府舉辦音樂會。以「和善」面目出現的港督大人來者不善，迫不及待地拋出「憲制方案」。

衞奕信留在港督府裏的日子屈指可數了。

六月二十九日，衞奕信出席了香港記者協會及新聞行政人員協會爲他舉行的餞別午宴。他深情地寄語香港市民，要放眼「九七」以後，從現在起就要做出計劃。他還希望關於新機場建設的財務談判盡快舉行。

七月一日，他最後一次以立法局主席的身份出席立法局會議，不無傷感地向在座的議員們道別：

「在以後的立法局會議上，仍然會有提問、議論、爭辯、解釋，但我希望諸位不要爲提問而提問，爲爭辯而爭辯，而是要爲了香港人的利益去提問，去爭辯。」

七月三日下午六時半，衞奕信夫婦帶着他們的兩位公子出席了最後一次餞別酒宴，有五百多名賓客應邀出席。酒宴結束後，衞奕信在香港大會堂前的愛丁堡廣場檢閱了由四百多名男女童子軍、少年紅十字會組成的歡送儀仗隊。身穿禮服的一男一女兩個小孩跑上前來，向他獻上由中文大學的

大學生們製作的一幅《八仙嶺》。

記者不失時機地採訪了在場圍觀的香港市民，幾乎衆口一辭，全都稱讚衛和藹可親，處事穩重。一位二十八歲的張姓女士感嘆道：「他是個好人，好人難做呀！」

晚八時左右，衛奕信與衆人一一告別，帶着一家人登上「慕蓮夫人」號渡輪。汽笛一聲長鳴，駛離維多利亞港，向啓德機場方向開去。

衛奕信的目光久久沒有收回來，他在心裏暗說：「也許我從此後再也不會回來了！」

這邊有人心灰意冷而去，那邊卻有人雄心勃勃而來。

六月三十日，彭定康在倫敦與記者共進午餐，儼然一副港督的口吻：「不管誰想進行政局，都要由港督決定。」

七月三日，彭定康在倫敦接受香港《南華早報》總編輯的採訪。他又拿出港督的派頭侃侃而談：「從我上任後的第一天起，就要採用我自己的風格，拋棄外交的繁文縟節和傳統的禮儀，盡可能與更多的港人打交道。我要在辦公室外花費更多的時間。我在公開場合裏說的和私下裏說的一樣，我没有秘密議程，我希望人們知道我所講的就是我要做的。」

七月九日下午三時，彭定康帶着妻子和兩個女兒，結束了在新加坡的三天休假，搭機抵港，在啓德機場受到了布政司霍德爵士等人的歡迎。

在機場休息室裏稍事休息後，彭定康換上一身白恤衫和灰色西裝，他的夫人林穎彤則由一身深

藍色套裙換上紅色套裙，他們的兩個女兒則由便裝換上了盛裝華服。

三時五十分，由警方乘兩輛黑色轎車前往九龍公衆碼頭，五分鐘後，彭定康在公衆碼頭乘上「慕蓮夫人」號渡輪，前往維多利亞港。

渡輪駛出後不久，兩艘紅色的消防船就向空中噴山多條大型水柱向新港督致敬，一艘海軍艦隻和兩艘小艇在遠處海面上巡行。天空上，六架皇家輔助空軍的飛機、直升機以及六架英國皇家空軍的飛機在做飛行表演，不時引來一陣陣讚嘆聲。

當渡輪駛近添馬艦海軍基地時，基地裏響起十七響禮炮，對新港督表示歡迎。

渡輪駛進維多利亞港。彭定康離船登岸，與等候在這裏的首席按察司楊鐵梁、新華社香港分社署理社長鄭華等人握手寒暄。

在愛丁堡廣場上，聚集着數千名渴望一睹新港督風采的市民們。彭定康滿面笑容地向他們揮手致意。

在愛丁堡廣場上，彭定康神采奕奕地檢閲了儀仗隊，軍樂隊高奏歡迎曲，把歡迎儀式推向高潮。

彭定康正在得意地左顧右盼之際，忽然發現圍觀群衆中有一個男子舉起一幅漫畫，上邊畫的是一頭肥豬被兩名官員模樣的人緊緊掐住。他覺得有些可笑，但不明白是甚麼意思，旁邊有人低聲告訴他，這是諷刺港府最新財政預算中規定的徵收高税的作法。

四時三十分，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裏舉行新任港督宣誓就職典禮。大廳裏擠滿了來自各界的社

會名流，從四面八方趕來的新聞記者們在大廳內外川流不息，香港的幾大電視台更是把自己的人馬安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他們將向全世界轉播大英帝國在香港的最後一名總督的宣誓就職盛況。

按照英國的憲制，港督的任期一般爲五年。從現在算起到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一九九七年，正好是五年。這就意味着，今天在這裏宣誓就職的港督是香港的最後一名總督。

宣誓就職儀式開始了。彭定康出現在衆人面前。他身着便服，而不是傳統的總督制服，這讓人感到意外，也帶來幾分新奇。人們感到意外的另一點是，他没有像以往的港督那樣先接受封爵，而是以彭定康先生的頭銜上任。

彭定康莊嚴地伸出右手，按在聖經上，由楊鐵樑監誓，分別作效忠、就任與司法宣誓，接着簽署誓章。再接下來是霍德爵士和鄧蓮如議員致歡迎辭。

最後是彭定康發表就職演説。人們注意到，在簡短的演説中，彭定康没有提他所代表的女王陛下，從憲制上説他是英國女王的個人代表，反倒一再强調他與首相和外交大臣過乎常人的私交。

彭定康的這些反常之舉彷彿在提醒人們注意，他與以往歷任港督大不相同。

與衆不同的彭定康上任了。

他身穿便裝到處巡視，和市民一起擠地鐵、喝涼茶，抱起路上的小孩親兩口，還替電台主持古典音樂節目，更破天荒地開放港督府舉辦音樂會。

香港人感動了，街頭巷尾都在議論來了一位平易近人、愛民如子的港督。一個小販逢人便講，

港督對他問長問短，還和他握了手。

在港府內部，彭定康又搖身一變成了一個禮賢下士的「明君」。他鼓勵下屬當面直言，開展平等討論。他還網羅人才成立「智囊團」，爲自己出謀劃策。

彭定康究竟打算幹甚麼呢？

九月十四日，彭定康飛回倫敦述職，十六日又匆匆返回香港。在啓德機場上，他得意洋洋地告訴記者們，他在倫敦度過了緊張而又有趣的三十六個小時，在這段時間裏，他會見了首相、外交大臣和十名高級內閣部長，聽取了他們的很多建議。

他又向記者透露，他的治港藍圖已經得到英國最高層的認同。他將在十月七日在立法局發表施政報告，他拒絕透露報告的內容，但他保證這份報告將受到香港人的熱情支持。他目前心情開朗，正在對這份施政報告做最後的斟酌。

有記者問到，是否打算把這份報告的內容事先告知中方。彭定康肯定地說，按照雙方加強磋商和合作的協議，英方當然要這樣做，只不過這種接觸要絕對保密。

其實，彭定康並不想讓中方事先得知他的施政報告的內容，他知道中方一旦得知詳情，一定會激怒反對，說不定會使他的計劃胎死腹中。不過，他也不敢對中方嚴格保密，那樣又會給對方留下把柄。

怎麼辦呢？彭定康玩起了他那政壇老手的得意把戲。

九月二十五日，英國外交大臣韓達德在紐約會見中國外長錢其琛，彭定康借韓達德之口極爲簡

單地轉述了他施政報告的一些內容。

九月二十六日，英國駐華大使麥若彬向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王啓仁轉交了彭定康給魯平主任的信，也是簡單地通報施政報告的內容。

十月六日下午三時，彭定康約見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王品清，還是口頭上簡單介紹施政報告的內容。直到次日上午九時半，新華社香港分社才收到施政報告的文本。而這時候，彭定康已經在立法局裏捧着他這份施政報告公開宣讀起來了。

香港人被吊足了胃口，他們都想知道彭定康究竟在他的施政報告中講了些甚麼，但彭定康守口如瓶，一點風聲也不漏。

終於盼到了十月七日，彭定康面對立法局翹首企望的議員們，亮出了他的這個寶貝——長達三萬字題爲《香港大計：五年大計展新猷》的報告。

這份施政報告的核心部份是憲制方案，即對香港的現行政治體制作出重大改變：

1. 把行政局和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分開，使兩局議員的身份不重疊，以使立法局成爲一個制衡政府的獨立組織(目前部份議員身兼行政、立法兩局議員)；
2. 行政局非政黨化，不委任有政黨背景的人士入局；
3. 港督不再擔任立法局主席，主席由議員互選產生；
4. 成立由政府官員和立法局官員組成的事務委員會，以商討處理有關立法及財務計劃方面的事宜。

對於一九九五年的選舉安排，彭定康在報告中提議：

1. 選民的投票年齡由二十一歲降至十八歲；
2. 分區直選實行單議席單票制；
3. 擴大功能組別選民數目，改變現有功能組別中的法人團體投票，在新增設的九個功能組別中，選民資格包括所有在業人員，並實行一人一票制；
4. 擴大區議會職權，取消區議會及兩個市政局的委任議席。
5. 負責選出十名立法局議員的選舉委員會的成員的全部或大部由直接選舉產生的區議員組成。

彭定康拋出這份施政報告時，就想到了會引起中方的激烈反應，但卻沒有想到由此引發的嚴重後果，幾乎把他的個人前程和香港的前途完全斷送了。

3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引起了中方的強烈反響。彭定康來到北京，魯平沒有到機場迎接他，錢其琛當着記者的面不與他握手。彭定康惱羞成怒，揚言要單槍匹馬幹到底。

就在彭定康發表施政報告的頭一天晚上，這份報告的文本才由麥若彬大使在北京轉交到港澳辦公室副主任陳滋英的手裏。

中方接到這份文本後，迅速作出反應，外交部、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和新華社發言人先後發表談話，指出彭定康的憲制方案對香港現行政制作重大改變，事先不跟中方磋商，不符合聯合聲明中有關中英兩國政府要在後過渡期加强磋商與協作，共同審議爲平穩過渡所要採取措施的規定，違背了中英雙方關於要使香港政制發展同基本法銜接的承諾，違背了中英雙方已達成的有關諒解，必然會給香港的平穩過渡和政權的順利交接造成障礙。如果香港在後過渡期發生的任何改變不能與基本法銜接，其責任不在中方，所有後果要由英方負責。

「哼！官樣文章！」彭定康把英文版的《中國日報》拋在一邊，拿起一份剛剛送到的《泰晤士報》，他立刻眉開眼笑起來。

在這份報紙上，登出馬卓安首相剛剛發表的講話全文，馬卓安說：「彭定康的計劃是這個殖民地未來發展的最佳方式，我完全贊同他的計劃。」

明眼人一看便知，彭定康上任伊始便抛出政改方案決不是他個人的一時心血來潮。英國政府早在一九八九年就想改變在香港問題上的政策，只是還未找到合適的時機和合適的執行人。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對香港記者說：「早在（一九九二年）一月前，這個劇本已經由馬卓安的班子擬好了。」此言可謂一語中的，彭定康只不過是這個「劇本」的執行導演罷了。

彭定康之所以如此有恃無恐，還有個重要原因，那就是馬卓安在後邊給他撐腰。今年夏天，馬卓安首相和李鵬總理一起去里約熱內盧參加世界環境保護與發展大會，馬卓安當面告訴李鵬，今後凡是有關香港的一切問題，包括新機場建設在內，北京方面都要與彭定康直接打交道。馬卓安不僅支持、信任彭定康，還賦予了他很多特權。

在這份報紙上，彭定康還看到了幾篇爲他叫好的文章，有一篇文章的作者這樣寫道：「在英國處於守勢達十年之久後，彭督終於着手把政策上的主動權從北京手裏重新奪回來了。他的勇氣值得每個英國人尊敬。」

當然，報紙上也有讓彭定康不快的東西。美聯社的一位記者用冷嘲熱諷的口吻說道：「彭氏用決心實現民主的措辭來表達他修改基本法的願望。他的原則性講話表明了政治家的大膽，而他採取的手法則表明了律師的狡詐。」

發表在法國的《費加羅報》上的一篇文章也用不友好的口吻說：「一百五十年前，英國人迫使中國人吸食鴉片。如今，他們又打算利用對這個地方進行統治的最後五年時間裏，迫使北京政府和六百萬香港人接受他們的民主原則。」

《紐約時報》的記者不無憂慮地寫道：「雖然彭定康的某些建議不需要得到中國人的同意就可以實施，但其蔑視中國的做法卻會引起北京方面的憤怒，這絕不僅僅是會引發一場唇槍舌劍，更危險的是中國人有足夠的辦法讓彭定康的政改搞不下去。」

彭定康的目光久久地凝視着最後這句話，他不得不在心中承認這個記者的分析是正確的，看來他很有必要去北京走一趟，他不指望中國人會支持他，但他希望能説服中方理解他的作法。

十月二十日，彭定康啓程來京。在啓德機場，他談笑風生地告訴記者，他的政改方案不過是順應了港人的意願，他相信北京領導人能體察民意，改變對他本人的成見。

經過五個小時的空中旅行，彭定康來到首都機場。按照外交禮節，應該由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來接迎他，然而魯平沒來，據説是開會脱不開身，代替他的是副主任陳滋英。

彭定康明顯感覺到了對方的冷淡和敵意，但此時此地他只有故作不知。在機場一間擠滿記者的屋子裏，他强自鎮靜地説：「我這次來很想聽聽中國同事提出的任何反建議。在關鍵問題上，我將勇敢地面對中國政府。我深深地認識到，在今後幾年內我們將有一系列棘手難辦的問題有待於解決。」

十月二十一日，彭定康和魯平進行了長達六個多小時的會談。

會談結束後，彭定康臉色陰沉地告訴記者，雙方未達成一致意見。他又强硬地表示，他雖然願意聽取北京的新建議，但在一九九四年香港開始選舉之時，無論是否得到北京方面的同意，他都將

在政改方面自行其是。

他没有告訴記者，在會談中魯平不厭其煩地告訴他，他那個政改方案既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的精神，又違反了與基本法相銜接的原則，還違反了中英已達成的協議和諒解，不會被中方接受。魯平還勸他及早迷途知返，但他仍執迷不悟。

十月二十二日，錢其琛外長會見彭定康。在衆目睽睽之下，彭定康把手伸了出去，但錢外長卻未和他握手。彭定康明白這是人家故意冷落他，心裏又氣又惱，但又不便發作。

不久，彭定康又被告知，李鵬總理拒絕會見他這位新任港督，原因不言自明。

錢外長與彭定康進行了十一個半小時的會談。錢外長義正辭嚴地重申中方立場，指出彭的政改方案是對中英合作的挑戰，勸他丢掉癡想。彭定康則喋喋不休地解釋他的方案如何如何符合香港人的利益，結果把嗓子都累啞了。

離京之前，彭定康趕去參加新聞發佈會，途中不巧汽車輪胎破了，耽誤了他不少時間，這更使他氣急敗壞。

在新聞發佈會上，他擺出了一副一意孤行的架式，氣勢洶洶地表示，如果在民主改革和修建新機場這兩個問題上不能和北京達成協議，港府將單獨幹。他故作樂觀地說，反正到了一九九七年卸任那一天，他將從新機場登機返回英國。

彭定康挾着空空的皮包走了，但他的狂妄與蠻横卻燒起了一把怒火。十月二十三日下午，魯平

主任就此次港督來訪舉行記者招待會。針對彭定康昨天的公然表態，魯平也不容置疑地表示：假如港英政府不徵得中國的同意就修建新機場，那麼在這個機場上起落的飛機將不得使用中國領空。

如果港英政府單方面違反中英雙方關於新機場問題的諒解備忘錄，那麼在新機場建設方面所有需要一九九七年以後由特別行政區政府承擔的債務和合約等，一概不予承認。

魯平又指出，中國一貫主張在香港發展民主，但要循序漸進，政制改革要與基本法相銜接。否則，屆時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有關機構將不得不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的有關決定重新建立。

魯平的談話傳到香港後，各界人士紛紛發表談話，指責彭定康與中國對抗乃引火燒身之舉，就連那些支持過彭定康的人也急忙改弦更張。很顯然，要是得不到中國政府的承認，新機場建成了也是一個廢物。要是得不到中方的允諾，那些與港府打交道的承包商們就會心裏暗自嘀咕：「這個合同有效性到底怎麼樣？」

十月二十八日，中國政府公佈了一九九〇年一月十八日至二月十二日間，英國外交大臣韓達德與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之間的七封往來信函及附件。從這些外交文件看，中英雙方當初就香港的政治體制進行了多次協商，並就議員議席數目、選舉委員會組成等具體問題達成了協議。如今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推翻了這些協議，顯然是英國人自食前言。

這些外交文件的公佈於世，使英方大爲被動，英國外交部的官員只得狡辯說：「也許是我們對這些信件的理解與中國人不同。」

不管英國人怎樣狡辯，公理自在人心。兩國既有約在前，又張本於後，彭定康實在是無理可

講。

十一月十六日，朱鎔基副總理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發表演説後回答聽衆提問時説，中英「在香港問題上發生了對抗，這不是我們挑起的，我們希望合作，不希望對抗。但是，不要以爲對抗可以迫使我們在原則問題上讓步，對此，任何人都不要做出錯誤的估計。」

據來自北京的消息，朱鎔基臨行前得到了鄧小平的指示，要堅決反擊彭定康那個政改方案。朱副總理的講話斬釘截鐵地表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震動了英國朝野。

4 民意調查顯示，彭定康正在失去民心。彭定康生病住院，引得流言四起，港督新聞秘書不得不出面闢謠。彭定康悍然將政改草案刊登憲報，激怒中方。李鵬臨時修改政府工作報告，措辭嚴厲。

彭定康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

五百名香港企業家聯合批評他的政改方案不現實，建議他收回方案。在這些人當中，有許多一向保守的金融界人士。

香港《南華早報》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發表的民意調查顯示，彭定康的支持率由過去的百分之五十六下降爲百分之三十五。一家顧問公司公佈的調查結果也表明，百分之七十三的中小企業家支持中國政府過問香港事務，支持彭氏政改方案的人數明顯下降。

一九九三年一月四日，有記者詢問彭定康，中英雙方在政改問題上有無妥協餘地，彭定康隨口說了一句「有可能」。他沒想到這句話一見報，當天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數就上升了百分之一。這個小插曲足以說明人心的向背。

三個月前剛被彭定康任命爲行政局議員的麥列菲菲女士，本來是他政改方案的堅定支持者，如今也開始打退堂鼓。她擔心中國對政改方案的不斷攻擊會影響香港的經濟，而經濟又是港英政府與北京方面討價還價的唯一王牌，由此看來，還是收回政改方案爲妙。

從英國國內也傳來了反對的聲音。前任港督麥理浩、衛奕信接連發表談話，警告彭定康絕不能干預中國內政，這才是香港的求生之道。多聽聽中國有甚麼建議，才有望打破僵局。

彭定康不是個輕易屈服的人，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勸告、抨擊、指責，他全都置之不理，將其稱作「背景音樂」，他要我行我素幹到底。

爲了向中方示威，他打破了四十多年來香港官方不與台北來人接觸的禁令，在港督府裏接見了國民黨中常委許勝發等人。

爲了尋求國外支持，他不辭辛苦，到日本、加拿大等國遊説，企圖將香港問題國際化。

爲了給英國政府辯解，他可以信口開河。在日本的一次演説中，他竟然説「中英聯合聲明肯定了英國對香港的政制及『一國兩制』負有五十年的責任。」

彭定康一邊大造輿論，一邊繼續推行它的政改方案。他親自向港九、新界、六區的政務專員面授機宜，讓他們以徵求意見爲名到香港市民中宣傳政改方案。他又把同樣的任務佈置給東區、油尖旺、深水埗、觀塘、沙田、屯門的政務專員。細心的香港人發現，這些政務專員好像受過專門訓練一樣，説出的話竟然是一模一樣。

彭定康眼見得時機已到，又要耍花招了。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日，香港行政局通過了政改草案法例。就在這一天，彭定康突然宣佈他的健康出了問題，心臟的兩條冠狀動脈變窄。他已打電話告知馬卓安首相，要住院治療一段時間，港督

一職暫由布政司霍德爵士代理。

彭定康此時住院，引起了很多議論。有人說英國政府正好趁此機會撤掉彭定康，這樣無須作出讓步就可以讓北京滿意。英國《衛報》又登出消息說，彭定康已告知馬卓安首相，如果放棄他的政改方案，他立刻辭職。還有消息說，英方的一個談判代表團正在和中方進行秘密談判，考慮怎樣修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

流言越傳越多，越傳越像，逼得港督新聞秘書韓新不得不站出來闢謠。赫德也表示中英並未舉行秘密談判，他和首相仍然像以前一樣全力支持彭的政改方案。他還說，雖然中方堅持把港英政府的代表從中英談判中排除出去，但他極力主張讓彭參加中英談判。

二月六日，彭定康指示把政改方案的草案副本轉交給魯平主任，並聲稱願意在任何時間及沒有先決條件的情況下與中方談判。魯平很快就把信息傳遞過去，中方願意在三月中旬或三月底重開談判，具體日期再行確定。

中方已經把意思表達得再明確不過了，但彭定康卻鷄蛋裏挑骨頭，硬說中方不給談判定出具體日期，於三月十二日突然將政改方案草案刊登憲報。

消息很快就傳到了北京。當時北京正在召開全國人大八屆一次會議，李鵬總理準備在會上做政府工作報告，這個報告已提前打印好了發給了與會代表。為了回擊彭定康的一意孤行之舉，中國領導人立即決定對報告臨時加以修改。原稿中的「英國政府只有改弦更張，早日回到雙方簽署的有關文件和達成的諒解的軌道上來，才是唯一的出路」這樣一段話，被緊急改成「英方又為合作製造了

人爲的障礙，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嚴重後果只能由英國政府完全負責。」

對於這個改動，外電評論爲「措辭嚴厲，前所罕見」。外國記者又注意到，在李鵬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講完了香港問題後，緊接着的一段就是講加速軍隊現代化，這種安排不會是偶然的。

作爲客人身份列席這次會議的英國駐華大使麥若彬，離開會場後對記者說，他對臨時加上的那一段話感到不快，有些事情本來可以通過談判解決。

現在英國人才想起來要進行談判，實在是有點馬後炮的意味。

彭定康的作法激怒了中國人。魯平主任稱彭定康將成爲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港英政府的發言人急報，自從政改方案刊登憲報之後，中方斷絕了與英方的一切外交接觸。這場危機還有可能使正在發展中的中英雙邊貿易關係發生惡化。

三月十八日，經貿部長李嵐清被記者三次追問，中英雙方目前的爭執是否會影響到雙方經貿關係，李部長回答說，要彭定康就一切後果負完全責任的意思，就包括了中英貿易往來關係的責任。

危機在迅速加深。正在養病的彭定康坐不住了。他急忙召集他的「智囊團」，幫助自己籌劃度過危機的良策。

有人給他打氣：「現在只有咬緊牙關幹到底，讓步就意味着完蛋。」

有人給他出主意：「趕快找馬卓安首相出面，向美國人求援。中國人要求美國延長最惠國待遇，還要加入世界關貿協定，如果美國人能施加壓力，中國人就能在香港問題上讓步。」

也有人認爲：「光有美國人不行，還要爭取世界輿論的支持，讓各國的政治家爲我們說話。中

國人歷來注重國際影響，說不定會就此讓步。」

彭定康這回可真是「從善如流」，立刻收拾行裝，開始週遊世界，到處宣講「民主的香港將有利於世界」。

彭定康此舉到是立見成效，英國的盟友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一些歐洲國家的政界人士都明確表示支持彭的政改方案，然而，過了不久他就發現，很多人一邊爲他彭定康喝采，一邊又忙着和北京政府拉關係。德國人忙着向中國賣汽車，美國人忙着向中國人賣波音飛機，澳大利亞的麥子等待裝船往中國運，歐盟更是一心想打入中國市場。英國商人們覺得自己的國家被人愚弄了，紛紛致信馬卓安首相：「中英兩國其實並沒有真正的利益衝突，我們爲甚麼不能從中國的經濟騰飛中獲得好處呢？讓彭定康和他的政改方案滾到魔鬼那裏去吧！」

彭定康花了幾百萬港元，除了得到一些廉價的口頭支持外，一無所獲。有記者注意到，他訪日歸來時，下了飛機沒有和任何人說一句話，鑽進汽車就走了。

彭定康回到香港後，發現自己的後院也不安穩了。擔任房屋委員會主席達五年之久的鍾逸傑爵士，這位六十五歲的前代總督突然宣佈辭職，理由是與彭政見不合。北京方面立刻委任鍾逸傑爲港事顧問，使他成爲港事顧問中第一個移居香港的英國人。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好像有意出彭定康醜似的，在這個時候搞起了民意測驗：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公佈僅六天，他的聲望就下降了六個百分點，降到百分之五五·二八。在接受調查的人當中，只有百分之二六點八的人支持彭定康。

彭定康徬徨回顧，找不到支持者，真是舉目無親，衆叛親離。

三月三十一日，彭定康接受新加坡廣播公司採訪，神情蕭索，他告訴記者，中英之間信任不足，他不排除自己有被提前解職的可能性。

此言一出，香港的股市竟在一天之內上漲了八三・五九。

5 中英雙方又坐在談判桌前。兩輪談判過後，外界輿論一片樂觀。彭定康在白宮受到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接見。戴卓爾夫人親自到香港參加彭定康的生日宴會，使他受寵若驚。

四月二日，彭定康返英述職。

他像以往一樣，很快就見到了馬卓安首相、韓達德大臣以及其他一些內閣大臣。他們還像以往一樣，親熱地拍着他的肩膀，說些支持和鼓勵的話。但是他很快就覺察到事情有些不對頭。英國的輿論界不再像以前那樣對他的勇氣致敬了，有人開始批評他的魯莽、好鬥。就連白髮蒼蒼的英國前首相希思也站出來，指責彭定康走得太遠了：「中國人會說，看，你們擁有香港超過一百多年，你們為民主化做過甚麼呢？一點也沒有。現在突然問你們告訴我們說要擴大香港的投票範圍。我們已經看到香港的大部份反應是懷疑的。」

希思的確說的是公道話。英國人實在理虧。

彭定康還發現，英國外交部正在秘密與中國人接觸，試圖進行談判。據說是韓達德主動致函錢其琛，要求打破僵局。錢其琛也通過麥若彬暗通消息。有人偷着告訴彭定康，中英雙方目前正在為談判人員的身份和資格討價還價。

外交部次官顧立德在下議院裏發言時，還說了這樣一句話：「要不惜一切代價換取中國的諒

解。」

這是甚麼意思？彭定康去找韓達德，韓達德笑着安慰他，英國政府不會與中國搞秘密協定，即便是談判，也不會有甚麼先決條件，更不會出賣他彭定康。

從韓達德的話中，彭定康多少還是聽出了一些弦外之音。

回到香港後不久，彭定康就得到了中英準備開始談判的確切消息。四月二十二日，中英雙方用一張只有十一行文字的聲明公佈了這個消息：「中英雙方根據一九八四年達成的協議，就香港一九九四——一九九五年的選舉安排舉行會談。」

在這個聲明正式發表前，韓達德特地從倫敦給彭定康打來電話，他告訴彭定康，如果中國人不滿意，就很難推行彭在香港擴大民主的方案。韓達德再次保證，在舉行談判之前，英方沒有對中國人作出任何讓步。

「誰知道你們背後都搞了些甚麼鬼！」彭定康强忍着沒有讓這句話罵出口。

不大一會兒，彭定康又笑嘀嘀出現在記者面前，他說：「這次恢復會談是雙方共識的勝利，我感到非常高興。」

有記者問道：「聽說在這次英方談判代表團的名單上，沒有港督的名字，你對此有何理解？」

彭定康故意用調侃的語調說：「像這樣並非輕鬆的談判，我的心臟是吃不消的。」

在確定這次談判代表團成員名單的過程，中英雙方都費了不少腦筋。中方宣稱過這是中英兩國的談判，不能讓港英政府的人進來，這話當然不能收回，但沒有港方的人，在商談香港選舉安排的

具體問題時，顯然有諸多不便。思考再三，最後決定把它變成外交特使級談判。英方的外交談判特使是麥若彬，中方是外交部副部長姜恩柱。他們二人各帶幾名顧問、專家協助工作，這些人不算談判代表。

協助麥若彬工作的人有：港府憲制事務司施祖祥、政治顧問歐威廉、外交及聯邦事務部主管香港事務官員李啓恩和副憲制事務司黎慶寧。

協助姜恩柱工作的人有：外交部港澳辦公室主任趙稷華、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二司司長王鳳超、新華社香港分社研究室主任陳偉和港澳辦公室研究員衛凌燕。

雙方人員齊整，旗鼓相當。

四月二十二日，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選舉問題第一輪談判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十號樓舉行。這輪談判歷時三天，但每天只用一小時。很顯然，在這樣短的時間裏，不會就某個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正如談判結束後麥若彬告訴記者的那樣：「我們都同意對會談內容保密，所以我恐怕不能做甚麼評論，重要的是我們目前正在談判。」

四月二十四日談判結束，當天晚上，姜恩柱宴請了麥若彬及其協助人員，中方的協助人員出席作陪。

吃頓飯是件小事，但這件小事卻說明這次談判起碼沒有破裂。

四月二十八日，一場春雨過後，北京市區空氣清爽宜人。中英第二輪談判如期進行。

談判開始前，留給記者十五分鐘的拍攝時間。雙方代表在攝影機前始終露出輕鬆的笑容。麥若彬微微側過頭去，對姜恩柱說：「夜來一場春風，真是個好兆頭呀！」

姜恩柱微微點頭，表示同意。

兩位外交官貌似閒聊的對話，引起了在場記者們的極大興趣，他們紛紛預測這次談判會很順利。

果然，談判進展順利的跡象不斷出現。先是談判的時間延長，上次是每天一小時，現在是一天四小時，這起碼說明雙方有話可說，也願意聽，沒有一拍兩散。

上次談判結束後，整個下午中英雙方都未透露是否會發表會談公報，直到當天晚上才見到了會談公報。這一次卻完全不同，二十九日上午記者們就被告知將有會談公報發表。果然，當天中午會談結束後，下午很快就把公報發表出來了。這些說明雙方工作節奏加快了。

談判結束時，姜恩柱和麥若彬一起會見記者。姜恩柱告訴記者，會談正在正常進行，他表示希望能夠取得積極的成果，恢復雙方在香港問題上的密切合作。麥若彬表示同意。

兩輪談判結束後，外界輿論一片樂觀。然而，這種從表面現象得出的樂觀多少有些盲目。

在這兩輪談判中，中英雙方都有意識地迴避正面交鋒，只是分別闡述自己的原則立場。

中方的原則立場簡單明確，那就是在處理香港問題上，一切都要符合基本法、符合中英聯合聲明、符合中英過去已達成的有關協議和諒解(簡稱「三符合」)。對於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和兩國已達成的協議和諒解中沒有明確規定或沒有商量過的事情，中方願意同英方商量，尋求雙方彼此都

能接受的解決辦法。

英方口頭上也同意以「三符合」作爲談判的基礎，但一到具體問題上，就把彭定康「三違反」的方案端出來。

彭氏政改方案首先違背了基本法規定的香港的民主發展要循序漸進的原則。港英政府從一九八五年開始在全港推行功能團體間接選舉制度。它將香港社會的各界分成若干組別，如工業、金融、教育、法律等，其中有的以法人團體爲單位來投票，有的由獲得專業資格的個人來投票。實施這種選舉制度，其目的是爲了確保香港財經界及一批有特殊作用的團體和專業人士能有代表進入立法局。後來英方將這一選舉制度推薦給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中方對這種制度給予了肯定，將之寫入了基本法。如今彭定康卻想全部取消法團投票，改爲個人投票，並使功能團體的選民基礎由一九九一年的不足十萬人，一下子擴大到二百七十萬人，增加了二十六倍。

彭定康還提出，一九九五年選舉產生十名立法局議員的選舉委員會全部由直接選舉的區議員組成。而按照一九九〇年初中英兩國外長達成的協議，這個選舉委員會按基本法附件一第二款所規定的成分和比例組成。

在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選舉問題上，彭定康主張取消全部委任議席。中方認爲，從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的實際運作看，保留委任議席符合香港的實際，可以彌補直接選舉的不足，應該加以保留。但可以逐漸減少。

中英雙方分歧較大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有沒有所謂的「直通車」。按正常任期計算，一九九五

年選出的香港立法局議員，其任期將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份終止，也就是說，他們有可能在兩個不同性質的政權下任職。這就好像一列從殖民地車站開出的火車，駛進了一個主權國家的軌道。有人把這種情況形象地稱爲「直通車」。

英方要求讓一九九五年選舉出來的立法局議員坐上「直通車」，只需在政權交接時履行個宣誓手續就行。中方則指出可以有「直通車」，但這些議員的資格要由全國人大授權的機關加以確認。

從以上這些方面看，中英雙方確實存在着比較大的分歧，因而也就有必要坐下來會談。有會談總比沒有會談好。恢復外交接觸本身就意味着合作的開始。

五月十一日，恢復會談的中英土地委員會就政府土地出售計劃達成協議，批准港府在一九九三——一九九四財政年度裏出售一百二十七點八公頃土地。

在香港，除了聖約翰大教堂佔據的一大片土地外，其餘的土地全歸港府所有，港府每年都可通過拍賣土地募集到數十億美元的資金。根據中英聯合聲明，賣地收入要一分爲二，一半歸港府使用，另一半留給未來的特別行政區政府。

五月二十日，停止接觸已有半年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首先恢復了法律專業小組的會談。

六月十八日，北京方面批准「玫瑰園計劃」中的海底隧道工程。

六月二十一日，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舉行會談。英方負責人托尼・高爾斯沃西滿臉笑容地走向會場，他告訴記者：「這是六個月來的第一次會談，我猜想，中國人同意開會就說明他們要同意做一些事情了。」

會談結束後，高爾斯沃西又是滿臉微笑地走出會場。

進入五月份以後，所有關注中英談判的人都有了好心情，就連彭定康也不例外。

五月初，他前往美國訪問，在白宮受到了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接見，成爲首次受到美國總統接見的港督，也是第一位就最近的香港事務與美國總統直接商談的港督。

他此次去美國，公開的目的是要求美國無條件地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的待遇，如果取消這種待遇，香港每年要損失二百一十億美元，還有使七萬人的就業受到影響。

至於他的真正目的，英國外交部的一位官員替他說了出來：「不管會談的內容是甚麼，只要能得到一張與克林頓在白宮總統辦公室裏交談的照片就夠了，它能證明彭是一位可以和美國總統促膝談心的政治家，北京方面也就甚麼都明白了。」

彭定康剛從美國回到香港，戴卓爾夫人又來了，她是應彭定康之邀來參加他的生日宴會的。彭定康知道，戴卓爾夫人雖然已經不是首相了，但仍然能夠影響英國政府的香港政策。戴卓爾夫人能來慶祝他的生日，而且一到香港就對他的政績讚不絕口，他真有點受寵若驚了。

對於正在進行中的中英談判，他也顯示出了出人意外的樂觀。五月二十八日下午，在接受香港《快報》記者採訪時，他說：「正在進行的中英談判，是在相當良好的氣氛下進行的。一週前我曾用登山來形容這次談判，說雙方已建立起了登頂的營地。現在我要説的是，我相信我們可以攀上山巔。」

另一個心情愉快的英國人是麥若彬。

五月二十二日，第三輪談判開始後的第二天，他就高興地告訴記者，會談氣氛良好。按照中英雙方談判開始前的約定，對於談判內容要絕對保密，說起來時連形容詞也不能用。如今麥若彬用了「良好」這樣一個形容詞，這說明了甚麼呢？

有記者立刻抓住這一點提問，麥若彬幽默地回答：「你可以得到一個新聞重點了。」緊接着他又補充了一句：「但是不能以此引伸爲第三輪談判比前兩輪好。」

麥若彬心情愉快不是沒有原因的。在這一輪談判中，中方作了一些讓步，同意在一九九五年選舉中增加直選議席，減少委任議席的比例，可以從現在佔全部議員的三分之一多，減至約四分之一。

不過，沒過幾天，麥若彬的心情就不那麼愉快了。

6

談判氣氛產生微妙變化，麥若彬開始抱怨「沒有時間沒完沒了地開會」。彭定康回國參加英國政府內閣會議，腰桿又變硬了。錢其琛在紐約向韓達德提出打破僵局的建議，竟被當場拒絕。

五月二十八日，中英第四輪談判結束。

在這輪談判開始前，中方談判代表姜恩柱極爲簡短地講了幾句話：「中國方面始終如一地具有誠意，盡最大努力縮小彼此間的分歧。」

談判結束後，麥若彬對記者說的話要比以前多多了：「我無法告訴你們討論將會進行多久，不過，在這輪會談後，我仍然希望繼續我們的討論。我認爲我們已經十分瞭解彼此的立場，我總是對每一個人說要有耐心。」

仔細對比他們兩個人說的話，人們似乎可以體會出一些滋味來。

五月二十九日，英國外交部次官顧立德在動身前往香港之前，在倫敦接見記者，表示會談不會無限期地進行下去，又說英方談判代表會以最大的耐心堅持不懈地談下去。

六月十六日第五輪談判結束後，麥若彬再一次强調要有耐心。

第六輪會談開始前，英國外交部官員早早就放出風來，這一輪會談將要接觸到實質性問題。與此同時，英國報紙上出現了帶有警告意味的語言：中英會談必須在十月之前取得實質性進展，否則

就會影響香港將於一九九四年九月開始的選舉。

六月二十四日第六輪談判結束後，麥若彬一邊聲稱會談進行正常，一邊又不停地抱怨「沒有時間沒完沒了地開會」。而這句話據説是出自英國外交大臣韓達德之口，麥若彬不過是學舌而已。

左一個要耐心，右一個要耐心，恰恰説明英國人正在失去耐心。

也許是前幾輪的良好氣氛和中方的讓步使英國人產生了誤解，他們以爲中國人不過是擺擺樣子，還會繼續讓步，於是得寸進尺，不僅拒絕按照基本法提出自己的方案，而且對過去兩國已經達成的協議和諒解也拒不承認。他們不僅硬要中方全盤接受他們的主張，還提出了一些本屬中國主權範圍之内並且與談判主題無關的問題。

事關原則和主權，中方不能讓步了。中方代表指出，必須先過「三符合」這一關，否則免談。

按照「三符合」，有很多問題也能夠得到解決。比如在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的選舉問題上，中英雙方的立場比較接近，完全有可能就此達成協議。但是英國人既然挑起了這麼大一場風波，豈能如此草草收兵，他們要拿到更多的東西。

在第六輪談判中，雙方第一次短兵相接。

麥若彬口若懸河，大講特講關於香港未來政制的構想。

姜恩柱少説多聽，只作簡單的提醒和點評。

麥若彬見正面進攻撈不到便宜，又想轉換話題，改變方向，但每一次都被姜恩柱不客氣地擋了回去：咱們還是談正題。

麥若彬連連搖頭，直到這輪談判結束後，來到記者面前，他還是大搖其頭。

七月一日，英國政府將召開內閣會議，專門研究香港問題，並將確定中英談判的重大政策。麥若彬、彭定康以及參予中英談判的英方人員都應邀前往倫敦，參加這次重要會議。

六月二十九日晚，在動身之前，彭定康在港督府接見記者，而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事情。有記者問道：「聽説英國政府規定九月份爲『死線』，到那個時候如果還達不成協議，就不再談判了，請問總督有這回事嗎？」

彭定康沒有正面回答記者的提問，而是藉着這個話題講開了：「我從來都不喜歡用『死線』這個詞，死線的指示一出，就等於説達到了一個不可能再有任何前進的時刻。中英雙方要達成協議，還需要走很長一段路，但我對前途充滿信心。」

六月三十日，在倫敦又有記者問起「死線」這個問題，彭定康用外交辭令回答：「我將要向馬卓安首相説明，到了甚麼時候我們就不能繼續談判下去了，但我不願意把某個日期當成大棒來使用。」

從彭定康閃爍其辭聯想到不久前韓達德、麥若彬等人的抱怨，人們很容易就會想到，英國人有了一個新策略，那就是給中英談判設立最後期限，迫使中國人讓步。

英國《每日電訊報》發表文章説：「設立最後期限不失爲一種好的談判策略，但在進退的時機上必須把握得非常準確，否則就會弄巧成拙，玩火自焚。」

果然，七月一日這一天，在參加完英國內閣會後，彭定康立刻會見記者，用明顯變得強硬的口氣說：「我們不能無限期地談下去。我們希望在今後的一兩週內能出現較大變化。如果下週在北京舉行的第七輪會談仍然達不成協議，我將向香港立法局提交我的政改方案。」

彭定康的腰桿又硬了，當然是有人在背後給他撐腰。果然，韓達德很快就站出來告訴記者：「英國政府一心一意地全力支持彭定康的立場。」

彭定康神氣活現地返回香港，麥若彬也帶着新的指示回到北京。七月六日，中英第七輪談判結束，麥若彬走出英國大使館，有些不耐煩地對守候在外邊的記者說，會談取得了少許進展。很快就有記者問起英國外交大臣韓達德即將訪華一事，麥若彬仍然不耐煩地說：「他是來瞭解會談情況的，也許會帶來新的指導原則。」

韓達德訪華是臨時決定的，一週前才通知北京方面。七月初馬卓安將參加在東京舉行的一年一度的世界七國首腦會議，韓達德陪同前往，他準備利用這個機會來北京一趟。

七月八日，韓達德在北京與錢其琛外長舉行了會談，又受到了江澤民主席的接見，這是事先沒有安排的。

韓達德只在北京逗留了一天，就回到了香港。在啓德機場，急於瞭解此次兩國外長會談內幕的記者們把韓達德團團圍住，問東問西，問長問短。

韓達德沒有表現出絲毫不耐煩，他告訴記者們，他此次前往北京沒有帶去甚麼新建議，他的任務不是談判，而是推動談判。他還樂觀地表示，中英會談即將取得實際進展。

接着他又提醒道：「如果認爲從現在起一切都會很順利，那是過於輕率的想法，有些事情確實棘手。」

他還說：「我没有提到會談存在着最後期限，但時鐘正在嘀嗒作響。期限不是遙遙無期的，中國領導人也對這一點表示贊同。」

中英兩國的會晤似乎給談判帶來了光明的前景。

七月二十日，中英談判進入第八輪。在結束了上午三個小時的會談後，麥若彬和姜恩柱並肩走進釣魚台國賓館中一個擠滿記者的大廳。

麥若彬告訴記者們，兩國外長的會晤給談判帶來了新的精神，新的指導方針，中英談判從此將進入新的階段。

姜恩柱則表示，要努力工作，加快談判步伐。

有記者詢問，外界紛傳中英雙方態度僵硬，誰也不肯讓步，不知有無此事。

麥若彬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他說：「所有的談判在本質上都意味着彼此可以讓步。」

第二天中午談判結束後，麥若彬又告訴記者：「我認爲雙方對甚麽是重要問題的認識有了共同點，雙方對會談都有了自己的方針，會談進展順利。」

有記者要求麥若彬概括一下這次談判的困難，他機智地回答：「我没有權力談論障礙。」

八月十七日，第九輪談判結束，麥若彬又樂觀地告訴記者：「我們已經爲九月份的會談制定了行動方案。」

然而，有了上一次的教訓，這一次人們可不能太樂觀了。不能光聽麥若彬這邊是怎麽說的，還要看彭定康那邊是怎樣幹的，也許後者更說明問題。

就在第八輪談判開始的第一天，彭定康在香港對路透社記者說，他將在十月份對香港問題做出全面解釋。

路透社記者問：「這是不是意味着最後期限？」

彭定康說：「從我嘴裏不會說出最後期限這個詞。」

七月二十三日，彭定康正式任命了一個選舉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根據彭的政改方案設立的，任務是劃定選區和保證在立法局選舉中不會出現弊端。

還有來自港府內部的消息透露，彭定康最近正在日以繼夜起草他的第二份施政報告，內容與上一份大同小異。

九月五日，中英第十輪談判結束後，彭定康又表示，中英達成協議需要的時間不太夠了，他準備爲達成協議盡心竭力，但絕不卑躬屈膝。

彭定康一系列言行告訴人們，他要拋棄中英談判，自己「單打獨鬥」了。

彭定康這一次可不是擅自行動，他是按照七月一日英國內閣會議決定的方針幹的。不管北京那邊談判結果怎樣，他在香港都要按原計劃推行他的政改方案。每次中英談判結束後的當天，施祖祥就會返回香港，向彭定康匯報談判的進展情況，再由施祖祥把香港方面的情況和彭定康的意見帶回北京，向麥若彬轉述。這樣一來，中英談判的英方代表實際上就變成了彭定康，這就難怪爲甚麼中

方做出了那麼大讓步，而英方卻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僵硬態度，非要中方全面接受彭氏的政改方案不可，連商量的餘地都沒有。這哪裏叫談判呀！

九月十日，中英第十一輪談判結束，雙方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九月下旬，中英第十二輪談判開始前夕，又傳出談判已經瀕臨破裂邊緣的消息。正好在這個時候，人民日報在第一版最顯著的位置上刊登出一九八二年鄧小平接見戴卓爾夫人時的談話，其中有一段令香港人睜大眼睛仔細看的話：如果在過渡期內香港發生動亂，中國將對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再作考慮。很明顯，中方是在用這種特殊方式對英方表示强烈不滿和抗議。

九月二十五日，中英第十二輪談判結束。在這次會談中，一些本來已經取得進展的問題又回到原地，雙方互相指責對方拖延談判時間，破壞談判進度。

談判結束時的當天中午，麥若彬只告訴記者一句話：「會談仍在繼續。」他拒絕對談判作任何評論。

至此，已經沒有人對中英談判抱樂觀態度了，但還沒有徹底失望，很多人寄希望於十月一日兩國外長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的會晤，也許這次高層接觸會使中英談判「起死回生」。

然而，從紐約傳回來的消息同樣令人失望。爲了打破僵局，錢其琛外長向韓達德提議，將雙方立場比較接近的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的選舉問題與立法局的選舉問題分開討論解決，卻被韓達德當場拒絕。

十月六日，彭定康在立法局發表了他的第二份施政報告。會後，他在接見記者時公開表示，給

中英談判留下的時間不是幾個月，而是幾週。他還表示，很有可能不徵得中方同意，就將選舉方案提交立法局討論。

中英雙方在這次會談中有過明確協議，如果英方將有關法律草案提交立法局討論，那就意味着談判的中斷。因此，如果彭定康真的像他說的那樣做了，就等於是拔掉了中英談判的「插頭」。

很多英國的外交官員已經在公開場合談論起談判破裂的可能性。他們全都悲觀地認爲，中英雙方讓步的可能性都幾乎等於零，這時候只有鄧小平改變主意才能使事情起變化。

7

中英談判出現曙光。彭定康得到英國內閣授權，聲稱準備退出中英會談。彭定康悍然將第一部份立法草案提交立法局討論，中英談判破裂。香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市民狀告港督事件。

十月十日，中英第十三輪談判在北京如期舉行，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以往每次開始會談前，雙方代表都很客氣地寒暄幾句，這一次卻省略了這個開場白，一上來便是正面交鋒，針鋒相對。

姜恩柱說：「中英會談正處於十字路口，面臨着談得成與談不成的兩種前途。如果雙方能達成協議，這將有利於一九九七年香港在政治體制上的平穩過渡，也符合廣大港人的意願。」

麥若彬抓住機會接口道：「彭先生的政改方案得到了香港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很多國家領導人的支持，中國朋友不會否定一個已經爲香港人、外國政府所接受的民主的政改方案吧？」

姜恩柱反駁道：「這種說法是沒有事實根據的。香港絕大多數人都希望與內地保持良好關係，希望實現平穩過渡。至於說的民主，我還要强調一遍，我們現在的爭論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守不守外交信義。」

麥若彬拉開話題：「英國政府也希望平穩過渡，所以才十分關心與中方達成協議，只不過這個協議要公平。如果達不成公平的協議，我們就要按公平的辦法行事。」

姜恩柱的聲音略有提高：「達不成協議也沒有甚麼，只不過到時候我們就要按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辦事。我在這裏再强調一遍，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責任不在我們這一邊。」

麥若彬沒有作聲。

姜恩柱又說：「前幾天，彭定康公開講中英談判只剩下數週的時間，這種言論是爲談判設置新的障礙，我在這裏正式提出抗議。」

麥若彬兩手一攤，做了個無可奈何的姿勢：「彭先生的說法不過是指出了一個事實。」

當天上午的會談不歡而散。

在第二天會談以及接下來的兩輪會談中，在中英代表之間雖然時常發生激烈的爭吵，但談判竟然奇蹟般地向前推進了很遠。

首先是英方接受了錢其琛外長提出的「分拆」建議，但緊接着他們又提出了三項先決條件，即在選民年齡、投票方法和委任議席這三個方面，中方必須同意英方的安排。

在委任議席問題上，中方本來已經同意減少委任議席的數量。但爲了維護會談的大局，中方做出了最大程度的妥協，默許了在一九九七年可以在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中全部取消委任議席，一九九七年後再由特別行政區政府決定增設委任議席的數目。

關於投票年齡，中方同意英方提出的主張，將選民年齡從二十一歲降至十八歲。

對於英方提出的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採取「單議席單票制」的投票，中方也表示不持異議。

這樣，中方實際上已採納了英方的全部意見，滿足了英方的要求。雙方完全有可能就區議會和

兩個市政局的選舉問題達成協議。

中英談判神奇般地亮出了一線曙光。

中英第十六輪談判定於十一月十六日在北京舉行。就在談判開始前不久，麥若彬突然不辭而別，據説是身體欠佳，回國養病。接替他的是英國外交部助理次官韓魁發。

麥若彬這邊剛從北京動身，彭定康這邊已經從香港飛到了倫敦。十一月十日，他旁若無人地走進唐寧街十號，直接找到馬卓安首相進行秘密匯報。

當天下午，他毫不掩飾地告訴記者，英國政府有三個堅定不移的立場：

1. 必須成立一個選舉委員會；

2. 必須擴大功能團體選區；

3. 一九九五年當選的香港立法局議員必須坐上「直通車」。

三天之後，他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電視台採訪時，又毫不掩飾地説：「內閣十分清楚我們的基本目標，如果我們不能在剩下的時間裏達到基本目標，那麼恐怕我們將不得不退出會談。」

自稱得到英國內閣授權的彭定康，一回到香港就通知已經住進英國駐華大使館的韓魁發，讓他通知中方代表，必須讓「單議席單票制」的投票方法也適用於一九九五年的立法局分區直接選舉。

英方的這一要求顯然是節外生枝，故意刁難。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的選舉是在一九九四年九月和一九九五年三月舉行，而立法局的選舉要到一九九五年九月才進行，完全可以在稍後拿出時間集中討論。英方又提出將「單議席單票制」的投票方法寫進雙方就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選舉安排達成

的諒解備忘錄中，英方的這一無理要求中方當然不能接受。

中英第十六輪談判結束後，瘦瘦的英方臨時談判代表韓魁發面無表情地告訴記者：「此次會談雖然長達四個小時，但我們雙方並未達成共識，也沒有就比較簡單直接的項目達成協議。」

記者們知道從外交官嘴裏是掏不出真正有價值的信息來，就請韓魁發形容一下中英談判目前處在甚麼狀態，是停在十字路上，還是上了高速公路。

韓魁發仍舊面無表情地回答：「我們仍在路上，我不清楚這是一種甚麼樣的路，但我們仍舊在路上，朝着正確的方向前進。」

韓魁發沒有告訴記者，這一輪會談結束前他已奉命通知姜恩柱，第十七輪談判是雙方達成第一階段諒解的最後機會，他的話勿需任何解釋，誰都明白其中的含意。

與此同時，彭定康在香港用一副幸災樂禍的口吻表示：「我們已經作出了很大讓步，我們希望我們的中國朋友也能有同樣的行動。假如故事沒有一個即時的喜劇結局，我們將要嘗試確保把香港的浪漫故事寫得盡量好。」

十一月二十七日，中英第十七輪談判尚未結束，英方就單方面宣佈中斷談判。韓魁發走出英國駐華大使館，如釋重負般地說：「我現在可以告訴諸位，我們沒有達成協議。我認爲，現在所有需要的決定，都要由英國政府的大臣們和香港總督來做出。」他還輕描淡寫地告訴記者，英國人希望進入下一輪談判，但雙方沒有按慣例定出下次談判的具體日期。

韓魁發還沒有把談判大門完全關死，中方也沒有立即做出激烈反應。十一月二十九日，魯平主

任在會見香港電影界代表團時表態：「中英談判要談多少輪就可以談多少輪，問題是英方要有誠意。」

中方還在等待着英國人帶着誠意回到談判桌旁來。

十二月三日，中方等到的是彭定康的一紙聲明，他宣佈港府將單方面推行民主改革方案，並決定於十二月十日將有關香港選舉的第一部份立法草案刊登憲報。十二月十五日，彭定康又將這份草案提交立法局討論。

對於有些立法局議員提出的押後提交政改草案的提議，彭定康代表港府斷然拒絕。他說：「改革必須如期完成。」他還把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定爲立法局表決通過部份政改草案的最後期限，理由是港府需要有充足的時間安排在一九九五年四月進行的選民登記。

十二月十六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吳建民在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他告訴記者，彭定康採取的行動導致了中英談判的中止。這個結果是英方一手造成的，而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也只能由英國人自己承擔了。吳建民還重提一九八二年鄧小平和戴卓爾夫人的談話，意味深長地暗示中國政府提前接收香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彭定康當然知道中止談判的嚴重性。由於中英雙方未能就香港一九九四—一九九五年選舉安排達成協議，港英最後一屆立法局、兩個市政局和區議會的議員的任期只能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爲止，屆時中方將根據全國人大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另起爐竈」，重組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和區域組織。

彭定康當然不想自己揹這麼大的罪名，他於十二月二十日致信魯平主任，建議就「直通車」問題重開談判。他在信中這樣寫道：「我希望現在就舉行會談，中國官員願意甚麼時候進行討論就甚麼時候進行討論。他們知道我住在甚麼地方。」

彭定康話雖這樣說，做起來卻還是原先那一套。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香港立法局通過了彭定康提交的第一部份立法草案，從而把恢復談判的大門徹底關死了。

當天下午四時，英國外交部、港英政府和英國駐華大使館分別在倫敦、香港和北京發表了《香港代議政制》白皮書，披露了中英談判的所謂「真相」。英方此舉的用意很明顯，就是企圖把談判破裂的責任推到中方頭上，以平息英國國內和香港地區日漸上升的强烈不滿。

英方歪曲事實的强詞奪理一時蒙蔽了不少香港人，他們要求中方也公佈談判真相。爲了澄清事實，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於二月二十八日公佈了《中英關於香港一九九四／九五年選舉安排會談中幾個主要問題的真相》。

都是公佈真相，究竟誰真誰假呢？

香港有人提議把這兩份文件並在一起讀，這倒是一個好辦法。兩相對照之下，人們很快就發現了一些破綻。

中方對於功能組別的選舉建議，最初只是提了一個方案，爲了照顧英方的立場，中方在會談中多次對這一方案進行調整。而在英國人發表的白皮書中，卻對這一事實迴避不談。

英國人在會談中曾提出要設立公務員這一功能組別，這明顯損害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原則，中方

沒有同意。英國人在白皮書中對此又是避而不談。

中方在談判中曾提出成立一個由六百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的方案，當時英方沒有異議。而在白皮書中，英國人卻抓住這一點對中方大肆攻擊。

英國人的白皮書很快就在香港人中失去了市場。

彭定康決心一條路走到底了，哪怕這是一條死路。

一九九四年三月九日，他又將第二部份立法草案提交立法局討論。

六月三十日凌晨，香港立法局以三十二票對二十四票通過了這一草案。

神色倦怠的彭定康回到港督府，卻無論如何也睡不着。經歷了近兩年的風風雨雨，他精心構思的政改方案終於可以全面實施了。按理說他應該感到輕鬆才是。可是他也不知道爲甚麼，他的心頭總感到好像壓上了一塊大石頭那樣沉重。

去年底中英談判中斷後，立刻在英國上議院裏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很多議員都把矛頭對準了彭定康，指責他把英國引進了一條死胡同。

英國尚健在的三位前首相中，有兩位對彭定康大加斥責，他們是年邁的希思和前工黨首相卡拉漢，曾對彭定康大加讚賞的戴卓爾夫人儘管仍然支持他，但從她的嘴裏已經聽不到對彭的誇獎了。

保守黨議員巴利說，當年戴卓爾夫人曾向他徵求過意見，派甚麼人出任港督好。他當時回答，派甚麼人都行，就是不能派政客去，他會把事情搞得一團糟。他的話不幸而言中，英國政府真的派

了一個政客當港督，而且他也真的把事情搞得一團糟。

工黨議員博頓利警告説，中國最近取消了同英國通用電器公司簽訂的修建地鐵的協議書，説到底這就是彭定康幹的好事。

今年年初，在英國國會進行的關於香港問題的辯論中，只有一個議員站出來支持彭定康。

在香港，他更是人心喪盡。根據最近幾次公佈的民意調查，他的個人聲望降到了上任以來的最低點。《明報》還委託一家獨立機構進行了專項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大多數香港市民希望他立刻下台。

那些日子，還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搞得他心煩。

二月十四日，家住觀塘的一位名叫林祥勇的商人走進香港高級法院，控告彭定康、前憲制事務司施祖祥和立法局「誤導公衆」，並要求賠償他的經濟損失。

這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市民狀告港督，不甘寂寞的新聞界聞風而上，很快就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調查清楚了。

林祥勇實實在在是一個香港的普通市民，這個事件也沒有任何政治背景。事情的起因是一九九二年十月，彭定康公開呼籲給他的政改方案多提意見，並允諾把有關建議收入憲制事務司出版的《建議集錄》中去。林祥勇自己動手寫了一份意見書，寄給了港督。他認爲自己的意見肯定會被收入《建議集錄》中去，就與一個好朋友打賭，要是沒有收進去，就輸給對方一大筆錢。一九九三年一月份，《建議集錄》印出來了，不見林祥勇的那份意見，他大爲氣憤，寫信指責港督説話不算

數。彭定康讓自己的私人秘書給林祥勇回了一封信，反過來指責他無知，林祥勇一氣之下，就向法院遞交了起訴狀。

當時，彭定康正在澳大利亞訪問，他立刻指示律政署設法平息此事。很快，法庭就宣佈對立法局的控告不能成立，但對彭定康和施祖祥的控告卻可以成立。大法官在一份長達十六頁的書面判詞中指出，公開呼籲就構成了一份可以執行的合約，因此港督確有誤導之嫌。

不久，林祥勇又告訴記者，他已經同那個朋友私下裏了結了打賭一事，不再要求港督賠償他的經濟損失，但他決不撤訴，他聲稱要爲真理而戰。此言一出，新聞界一片叫好聲，有人還大聲呼籲要保護市民向港督權威挑戰的積極性，這才是真正的民主，一時間弄得彭定康好不難堪。

唯一使彭定康感到欣慰的是，他還有一個堅定的政治盟友——外交大臣韓達德。二月八日，韓達德出席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舉行的一次聽證會，有一位委員提議撤掉彭定康，韓達德當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表示，絕不能撤掉現任港督，否則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韓達德還聲色俱厲地指責那位委員，不要落入將問題個人化的陷阱。

然而，最近從倫敦傳來消息，韓達德不久就將離任，馬卓安首相爲他安排了一個閒職。

還有令彭定康更不安的消息，種種跡象表明，英國政府正在謀求與中國人修好。正在養病中的麥若彬被派回北京，外交部次官顧立德下個月也將出使北京。不用說，他們都是去討好中國人，換來經濟上的實惠。

在英國政壇混跡多年的彭定康深深懂得，在政界甚麼事情都可能發生，說不定就在明天晚上，

英國首相就會跑到北京人民大會堂去喝烈性茅台酒，而把屎罐子一下子扣到他彭定康頭上。

彭定康可不想落個這樣的下場，半個月前，他給魯平主任寫了一封信，要求緩和緊張空氣，也帶有討好的意思。可是信剛發出去，就有人把風給漏出去了，立刻引來一片嘲笑聲。身兼自由黨常委主席的立法局女議員周梁淑怡揶揄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當初，彭定康是滿懷雄心而來，他本指望能在英國遠東殖民的歷史書的最後一頁上寫上自己的光輝名字，再加上一枚英國女王親自頒發的勳章。萬萬没有想到，他的名字是伴隨着一段恥辱留在了香港。說不定日曆尚未翻開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這一頁，他這位最後的港督就早已帶上隨從，挾起公文包，灰溜溜地離開了香港。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呀！」彭定康長嘆一聲，合上了眼睛。

第八章

香港回歸倒計時



1 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預備會在人民大會堂成立，喬石委員長向全體預委會委員頒發任命書。在籌委會九個副主任委員中，香港人佔了五個。文化工作專題小組提議建立香港回歸紀念碑。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香港是中國人民自己的，即使沒有英國人的合作，中國人民也能按期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並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可惜的是，彭定康等人過了很久也沒有想通這個道理。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六日，人民大會堂裏鋪上了紅地毯，裏裏外外洋溢着節日氣氛。全國人大常委會下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將在這裏正式成立。

預委會由六十九名委員組成(包括一九九四年五月增補的委員)，其中內地委員三十二人，香港委員三十七人，主任委員由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錢其琛擔任。

預委會下設政務、經濟、法律、社會及保安、文化五個專題小組。各組分別由一個內地委員和一個香港委員共同擔任召集人。預委會的職責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成立之前，爲一九九七年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實現平穩過渡，進行有關準備工作。

預委會第一次會議前，由田紀雲副委員長主持了任命書頒發儀式。預委會全體委員神情莊嚴地

走上前來，逐一從喬石委員長手中接過大紅燙金的任命書。這標誌着預委會正式開始履行全國人大常委會賦予的職責。

喬石即席發表講話，他希望預委會全體委員「緊密團結，同心同德，全力協作，做好各項有關工作，爲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的成立創造條件。」

當天上午，江澤民、喬石、李瑞環、朱鎔基等中央領導同志接見了預委會全體委員，並合影留念。江澤民也講了話，其中給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句是：「預委會的成立標誌着我國在香港行使主權的準備工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七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爲香港平穩過渡做好前期準備工作》：「『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現在距一九九七年還不足四年時間，而香港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接涉及到政治、經濟、法律、文教、社會等各個方面的事務，如果等一九九六年籌委會成立了再着手進行，時間顯然不夠，因爲需要預委會爲籌委會做前期準備。」

預委會的成立在香港各界引起良好反響，但也引起了一些錯誤的臆測。七月十七日，魯平主任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招待會，他代表中國政府告訴在場的中外記者，預委會的任務只是提出有關方案、意見、建議，供有關方面決策參考，它沒有決定權，因而不會成爲第二權力中心或「影子政府」，也不會干預後過渡期的香港政府的日常管理，預委會不會代替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凡是涉及跨越「九七」或有關過渡的問題，原來需要由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討論的，今後仍然這樣做。

魯平在這裏雖然不是做保證，但預委會的工作卻很快證明了他所言不虛，也證明中方成立預委

會完全是放眼未來，並不是想搞小動作。

預委會在成立後的兩年多時間裏，各專題小組對一些重大的、帶有緊迫性的以及香港人密切關注的問題展開了研究工作，並提出了初步方案和意見。比如，政務專題小組着重研究了香港公務員隊伍的穩定及有關制度的銜接等問題。社會及保安專題小組着重討論了居民出入境自由、永久性居民定義、特別行政區護照、退休保障制度等問題。

爲了廣泛地聽取港人的意見和建議，發動更多的愛國愛港的香港人積極參與過渡時期的各項事務，預委會第二次會議提議，增加預委會委員和港事顧問的數目，盡量把那些有不同背景的人吸收進來。

從一九九二年開始，中國政府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兩家的名義，聘請了三批香港事務顧問共一百四十一人。另外，新華社香港分社還聘請了二百七十四人爲第一批香港區事顧問，這些顧問們以對香港未來負責的高度責任感，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意見，起到了很好的智囊作用。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四日，預委會第五次會議對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有關事宜提出如下建議：

1. 籌委會於一九九六年一月成立。

2. 籌委會人數爲一百二十六人至一百五十人，其中香港委員佔百分之五十以上。

3. 籌委會設在北京，在北京和香港設立辦事處。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八日，預委會最後一次會議結束。爲期兩天的會議，全面回顧了預委會兩年多的工作，人們可以看到，預委會全體委員們做了大量具體的工作。他們的辛勤勞動將寫入香港回歸祖國的歷史中。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在北京正式成立，主任委員仍是錢其琛，副主任委員有王漢斌、安子介、霍英東、魯平、周南、王英凡、李福善、董建華、梁振英。在這九位副主任委員中，有五位是香港人：安子介是香港南聯實業董事會主席，霍英東是香港有榮有限公司董事長，李福善是前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董建華是香港行政局議員、香港東方海外董事，梁振英是香港梁振英測量行董事兼副經理。

籌委會的委員共有一百五十人，其中內地委員有五十六人，主要是負責香港事務、與香港聯繫密切的人士以及專家學者；香港委員有九十四人，涵蓋了香港各界，佔籌委會委員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三，大大超過了原來全國人大決定的香港委員不少於百分之五十、預委會建議的多於百分之五十的比例。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在接受香港記者採訪時指出，籌委會中香港委員比例的增大，很好地體現了中方「面向港人，依靠港人」的方針。原來預委會的成員都加入了籌委會，這就保證了工作的連續性，有很大好處。

一月二十七日，籌委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新聞發佈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籌委會副秘書長陳滋英主持了會議並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在回答有關中英合作問題時，陳滋英説，中國政府在香港問題上一向堅持「以我爲主」的政

策，同時我們也一貫主張並推動雙方在中英聯合聲明基礎上真誠合作。

關於衆人矚目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問題，陳滋英告訴記者，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第一任行政長官必須年滿四十週歲，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在外國無居留權。由香港各界四百名香港永久性居民組成推選委員會，再由該委員會通過協商後提出人選，然後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籌委會成立的消息傳到香港，引來一片歡呼聲。一月二十六日早晨，由香港九龍兩區各界協會和九龍東區各界聯合會合辦花車巡遊活動，改裝成花車的巴士，由尖沙咀中間道出發，沿彌敦道西行，環繞九龍區，將喜慶訊息帶給市民。

一月三十日晚，香港各界在港島新光戲院舉行聯歡會，熱烈慶祝籌委會的成立，盛況空前。

籌委會的成立也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廣泛注意。美聯社記者從北京發回報道說：「中國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計劃隨着一個强大的委員會的建立進入最後階段。」「籌委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召開，象徵着香港回歸問題已進入實施階段。今後香港將逐漸進入中國的保護傘下。」

日本《讀賣新聞》的記者則注意到：「中國方面把籌委會成立的日期定在一月二十六日，這正是一八四一年英國軍隊進駐香港島的日子，而且還把下次全體會議召開日期定在台灣選舉總統的投票日(三月二十三日)，從而向國內外表明決心把與台灣統一作爲最終目標。」

經過兩天的會議，籌委會第一次全會在人民大會堂閉幕。在這次會議上，討論通過了籌委會的工作規則，決定籌委會先設推選委員會小組、第一任行政長官小組、臨時立法會小組、法律小組、

經濟小組、慶祝活動小組等六個工作小組，並確定了各組的人員組成。

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很快就開始正式運轉。開展和完成基本法規定的各項任務，如籌組第一屆特區政府，籌組香港特區的立法機關等，哪一樣也不輕鬆，但哪一樣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

在這裏我們不妨着重介紹一下文化專題工作小組提出的一些建議和做出的一些規劃。

這個小組建議成立一個「香港同胞慶祝香港回歸活動籌備委員會」，由該委員會全面籌劃香港回歸的慶祝活動。慶祝活動初步計劃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開始，在港島、尖沙咀等主要燈飾地區，華燈齊放。七月一日，在維多利亞港等地燃放煙花，慶祝活動期間，還要在部份公園舞花燈、開花市。此外，還要舉辦各種形式的文藝演出和體育競賽活動，競賽活動可命名爲「回歸杯」、「紫荊杯」等。

這個小組還建議，爲了永久紀念香港回歸祖國這一事件，可在香港建造一座紀念碑。紀念碑的建造方案可邀請國內外著名雕塑家設計或向社會徵集，碑文可邀請專家撰寫，主要內容爲記叙香港被英國割佔和我國收回香港的歷史過程，以及我國政府對香港採取的「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

香港回歸紀念碑的奠基儀式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或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特別行政區成立一週年時舉行。在儀式上將放飛一千九百九十七隻由內地各省市送來的信鴿，它們在天空盤旋後全部向北飛回，象徵香港的回歸，也象徵着香港同胞與全國人民心連心。

藍天、白雲、信鴿、紀念碑，這是一幅多麼和諧而美妙的圖畫呀！

全國人民和香港同胞都在熱切地盼望着能早日目睹這一歷史性時刻。

2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大有來頭。香港記者闖進軍事禁區，發現駐港部隊官兵訓練有素，而且禮貌周全。駐港英軍做好撤退準備，蘇格蘭高地警衛團第一營返回英國。中國銀行在香港發鈔。英國新任外交大臣表現出務實態度。

近了，一九九七年越來越近了。中國爲迎接香港回歸做的各種準備工作都在順利進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項是組建駐港部隊。

在深圳同樂邊防檢查站附近的一座小山下，有一座現代化的兵營，裝甲車在營內穿梭不絕，認真操練的士兵的身影隨處可見。

這裏就是「九七」後駐港部隊步兵旅的深圳臨時駐地。

說起這支部隊的來頭那可真是響噹噹的。它的主體是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時誕生的「紅一團」。從這支部隊中曾經走出過羅榮桓、粟裕、譚政、楊得志等一百多名高級將領，全國解放後，這支部隊曾經參加過抗美援朝，戰功卓著。

同陸軍一樣，駐港部隊的海軍和空軍同樣大有來頭。海軍部隊的前身是成立於一九五九年的海軍獵潛艇某大隊。它的先鋒一號艇曾在萬山海戰中創造過中國海軍首次海戰的英勇戰例。近年來，這支部隊還多次圓滿地完成南沙、西沙、北部灣戰鬥執勤以及重大演習任務。

空軍部隊的前身也是戰功赫赫，參加過西沙群島保衛戰等重大軍事行動，多次完成保障導彈、衛星等軍事科研的飛行任務。他們還擔負過中國領導人周恩來、鄧小平等專機、值班飛機任務。在營口地震、唐山地震、河南駐馬店水災以及大興安嶺火災等搶險救災中也作出過突出貢獻。

這支部隊裝備精良，武裝直升機、巡邏艇等十分先進，但卻沒有配備重型、攻擊性武器。

組成這支部隊的人員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幹部來自全軍一百多個團以上單位，絕大多數經過軍事院校的正規培訓，具有大專以上文化水平，有的還是碩士畢業。戰士是在同等條件下擇優選拔的，但必須具備高中畢業的文化程度。

早在一九九三年，中方就着手組建駐港部隊，這早已不是甚麼秘密的。但直到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它才向世人撩開神秘的面紗。這一天，數百名香港特區籌委會委員、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港事顧問以及上百名中外記者，應邀前來參觀。

駐港部隊司令員劉鎮武少將向來賓介紹，駐港部隊首重軍紀，營地採取封閉式，軍人不得擅自外出，他們須遵守特區法律，還不准經商。

在戰士的宿舍裏，記者們注意到幾乎每個床頭櫃台上都放着一疊書，有《當代實用英語精華》、《學英語竅門》、《香港知識手冊》，還有《香港現行法律選編》等。

記者隨意採訪了幾名戰士，發現他們竟然能用流利的英語、粵語和記者交談。

一月二十九日之前，駐港部隊對外一直嚴格保密，駐地屬軍事禁區，不准拍照。一月二十八日那天，香港《東方日報》的記者來到駐地對面的工地拍攝軍營照片，很快就被發現了，兩名中尉軍

官帶領大約三十名士兵跑過來，將他們帶進軍營。記者發現，這裏的官兵一個個訓練有素，而且禮貌周全。他們在檢查了記者的有關證件後，又向他們解釋了不准拍照的原因，便由那兩名軍官護送他們離去。臨分手時，那兩名軍官一起向記者敬了一個軍禮。

回到香港後，這位記者立刻發了一篇報道，稱讚駐港部隊是文明之師、威武之師、正義之師。

與此同時，英軍駐港部隊正在做好全面撤離的準備。

英軍駐港部隊有七千人左右，一九九四年下半年，蘇格蘭高地警衛團第一營便已返回英國，剩下的兩個啹喀營合併成啹喀步兵旅第一營。這支由大約九百名精銳的尼泊爾人組成的部隊留駐到一九九三年。後勤基地支援部隊的人數也在相應減少，到了一九九五年，大約只留下三千人。目前駐香港的三艘皇家海軍巡邏艇和皇家空軍威賽克斯直升機中隊都將留駐到香港移交。

英軍在港的駐地有二十多處，分散在港九、新界和港島。根據英軍所做的交還方案，英軍最後撤走時，將把這二十多處兵營一部份交給中國，這主要是新界等邊沿地區的駐軍點；一部份交給特區政府，作爲紀律部隊(即警察)等部門使用；還有一部份位於市區的，改爲商業用地，這包括添馬艦海軍基地和窩打老道兵營等地。

英國駐港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就設在添馬艦基地，這裏不僅是英軍的總指揮部，還駐有許多特殊部門，許多現代化的偵察手段、設備，都集中在這裏。英國政府曾試圖在「九七」後將這裏改爲總領事館，還放出風進行過試探。中方没有同意，後來英方單方面決定將海軍基地搬遷昂船州，又單方面宣佈將於一九九七年以後把添馬艦三軍總部移交給中國。中方以總參謀部爲主組成了

一個專門小組，對香港進行了實地考察，未完全同意英方的軍事安排。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六日，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取得了進展，中英雙方就香港軍事用地交接事宜達成了共識。

英國最後一任駐港三軍司令鄧守仁少將又致函劉鎮武少將，歡迎他親自來港考察軍事設施，趁機敲定已在專家小組討論過的防務交接細節。

隨着一九九七年的臨近，香港的英國殖民地特徵正在迅速消失。過去，香港的許多公共機構都喜歡冠以「皇家」字樣，或者以英國皇家成員和歷任總督的名字命名，連賽馬會也要稱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到了英國女皇生日這天，還要放兩天假。如今，很多機構忙着改換名稱。有些企業家等不及香港回歸，就在自己的管轄範圍內取消了英國女皇生日假期，而在「十一」放假慶祝自己的國慶節。

過去，香港的公務員動不動就稱「女王陛下」，更把說一口流利的英語當成了有教養的標誌。現在，他們一個個忙着學習普通話和漢語。

過去，香港上流社會的很多人都以能獲得由英國女皇頒發的榮譽頭銜爲炫耀的資本，現在令他們眼饞的是籌委會委員、港事顧問、區事顧問。如今這些頭銜在香港享有極好的聲望。在一九九四年九月結束的區議會選舉中，六十三名港事顧問全部當選，七十四名區事顧問有五十六人當選，其比例高得讓人羨慕。

這一切都在告訴人們，大英帝國在香港的統治不用等到一九九七年實際上就已經結束了。

經濟界人士對這一點認識得更早更明確。香港太古集團負責人尼克·羅茲說：「對於我們來說，一九九七年是日曆上的另一個時間，在一九九七年到來之前，中國的資金已經大量湧入這裏，中國人正在對這裏的一切進行全面投資，中國人正在提前接收香港。」

到一九九四年底，中國已經排在日本、台灣之後成爲香港地區的第三大投資者。在銀行業，中國人控制了百分之二十的存款；在商貿界，中國人佔有百分之二十的份額；在運輸業，有百分之十五的營業額屬於中國。據德國外貿情報處的彼德·許森透露：「來自中國的企業已經控制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在香港股票交易所登記的公司。」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港英政府批准中國銀行在香港發鈔，成爲繼滙豐、渣打之後在香港獲得發鈔權的第三家銀行機構。此舉不會改變香港目前的發鈔機制，但意義十分重大，在政治上它是主權的體現，在經濟上它表明了中國銀行在香港銀行界的實力和聲譽。

隨着一九九七年的臨近，也使越來越多的英國人認識到香港回歸已是大局已定，大勢所趨，就連彭定康也終於公開承認這一點了。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彭定康在美國舊金山出席一個午餐會，當有人問到香港的前途時，他帶着滿懷的傷感和無奈說：「越接近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一個即將離任的英國總督所能做出的保證就越少。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都去聽中國官員做保證。我的保證只能持續到一九九七年六月

三十日午夜，即英國擁有香港的最後一刻。在此之後會發生些甚麼事，只有去問中國人了。」

即將離任的外交大臣韓達德則在倫敦告訴記者：「我們並不是搶劫後匆忙逃走的不受歡迎的外來者，也不是想在我們走後留下一片混亂的掠奪者，我們英國人要莊重而體面地離開。」

由於來自英方的干擾越來越少，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各種會談進行得越來越順利。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四日，歷時兩年半之久的關於香港新機場財政問題的談判終於達成了協議，參加談判的中英官員舉起香檳酒，慶祝這一來之不易的協議的簽署。

據透露，為了達成這一協議，雙方都做了比較大的讓步。中方過去只同意港英借債五十億港元，最後同意將這一限額增至二百三十一億港元。

一九九五年十月，錢其琛和英國新任外交大臣聶偉敬在倫敦舉行會談，各自都表現出了以前未曾有過的務實態度和禮讓精神。外電對此作出的評價之語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一九九六年一月九日，聶偉敬與錢其琛在北京再次會談，很快就簽發一九九七年後香港特區護照的簽發、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問題達成協議。至於爭執了三年多的九號貨櫃碼頭問題，雙方也達成了共識，中方同意在各個財團就經營權取得協議之後，再與英方共同確認有關的協議。

英國人越來越務實了，他們小心地避開主權和政制之爭，而在經濟上多打主意，他們在特區護照上持合作態度，以換取中方同意由英資的怡和財團來承造九號貨櫃碼頭。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會議越來越頻繁了，兩國的官員和專家們越來越頻繁地往返於北京、倫敦、香港三地之間。「九七」後土地基金的移交管理問題、港人出入境的自由問題、延續香港現有

的社會福利制度問題等等，都在一一得到落實。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香港完璧歸趙的時刻越來越近了。

3 港府設立移交大典統籌處。中方堅決不同意讓彭定康出席移交儀式。彭定康在美國信口開河，一回到香港就碰上了一群示威者。

那個彭定康到哪裏去了呢？

他還是當他的港督，只不過出頭露面的機會越來越少了，或者說人們對他越來越不看重了。一位銀行家帶着不屑一顧的表情說：「在華人巨富和英、美、日大老闆的眼裏，彭定康不過是個光榮的看守人，他的任務就是監聽香港這個賺錢機器出沒出現危險的噪音。在香港，他頂多是第六位最有勢力的人物，也許這已經是夠抬舉他了。」

彭定康也覺得他在香港可做的事情越來越少了，於是頻頻出國訪問。反正花的是香港納稅人的錢，不花白不花，花少了他還覺得不解恨呢！

彭定康懶得管閒事，也懶得去過問港府中那些熱心香港回歸的華人官員張羅成立甚麼移交典禮統籌處。據說要由一名首長丙級政務官出任移交典禮統籌專員，下有十名輔助人員，統籌所有移交大典的工作，這個機構將工作十八個月，估計一年開支爲六百多萬港元。

中英雙方都表示希望把移交大典辦得莊嚴、宏偉、體面，但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在就移交的具體事宜開會時就發生了爭吵。中方堅持不讓彭定康出席移交儀式，英方則堅持認爲移交儀式絕不能少了港督。

在彭定康聽來，這實在是個好消息。他從心底希望這是真的，中國人和英國人打得越熱鬧越好。最近，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英方首席談判代表休・戴維斯私下裏向他透露說，兩國外交官目前正在一系列關鍵問題上爭吵不休，其中包括立法機構、文職人員的命運以及預算管理等問題。戴維斯還巧妙地暗示，設想中的中英兩國在一九九七年共同舉行的移交儀式很可能舉行不了。

彭定康心頭一陣暗喜，他從心底希望這是真的。

從戴維斯的暗示中，彭定康似乎又一次摸到了英國政府的脈搏。一九九六年五月，他出訪北美，到處信口開河：「英國在一九九七年以後仍然會過問香港事務五十年，中國人如果不明白這一點，那將是大錯。」「不要讓任何人都以爲，一過了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英國人就會『金盆洗手』，丟下香港不管了。」

五月十一日，彭定康回到香港，一下飛機，就有二百多名示威者向他湧上來，一幅大標語牌醒目地寫着這樣幾個大字：

「彭定康，閉上你的嘴巴！」

示威者還向彭定康遞上了表示不滿的訴狀。

「有甚麼不滿你們去找中國人說去吧！」彭定康雖然表面上不失港督的傲慢，但心裏卻感到一陣陣凄涼。四年前，他到任之初，曾經受到很多香港市民的盛情歡迎和敬仰，如今卻是這般威信掃地，到處射來蔑視的目光。

彭定康躲開示威人群，鑽進港督的專用小汽車，一溜煙似地開走了。

夜深人靜，輕風徐來，海浪輕輕地拍打着夢一般安謐的香港，好像在訴説着一個古老而動人的童話……

在這樣一個夜晚裏，讓我們輕輕扯下一頁日曆，默默地把香港回歸祖國的倒計時天數再減去一個數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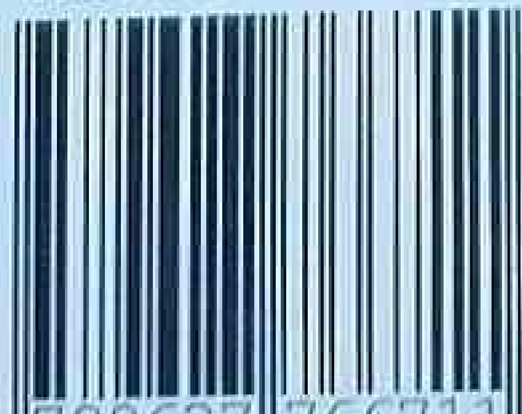
附錄：香港歷任總督任期表

任別	姓　名	任　　期
一	砵甸乍	一八四三——一八四四
二	戴維斯	一八四四——一八四八
三	般　含	一八四八——一八五四
四	寶　靈	一八五四——一八五九
五	羅便臣	一八五九——一八六六
六	麥當奴	一八六六——一八七二
七	堅尼地	一八七二——一八七七
八	軒尼詩	一八七七——一八八二
九	寶　雲	一八八二——一八八九
十	德　輔	一八八九——一八九一
十一	威廉・羅便臣	一八九一——一八九八
十二	卜　力	一八九八——一九〇四
十三	彌　敦	一九〇四——一九〇九
十四	盧　押	一九〇九——一九一二
十五	梅含理	一九一二——一九一九
十六	司徒拔	一九一九——一九二五
十七	金文泰	一九二五——一九三〇
十八	貝　璐	一九三〇——一九三五
十九	郝德傑	一九三五——一九三七
二十	羅富國	一九三七——一九四一
二十一	楊慕奇	一九四一——一九四七
二十二	葛量洪	一九四七——一九五七
二十三	柏立基	一九五七——一九六四
二十四	戴麟趾	一九六四——一九七一
二十五	麥理浩	一九七一——一九八二
二十六	尤　德	一九八二——一九八六
二十七	衛奕信	一九八六——一九九二
二十八	彭定康	一九九二—

在國際政治戰場上，烽煙從不曾平息，特別在重大的歷史事件中，國與國之間的明爭暗鬥、合縱連橫，更是必不可免：此刻即是政治領袖最能表現自已深遠的洞察力和超凡的智慧之時。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國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而在此之前，中英兩國進行了長達 15 年的政治苦戰，好戲連場，誠為當代東西方謀略範例之大成，很值得深思與參考。本書詳盡地記錄了這場世紀未政治角力的風風雨雨，並首次大膽披露了談判桌後兩國最高領袖的決策過程，這對於處身巨大歷史轉變中的香港讀者尤其重要。

ISBN 962-7766-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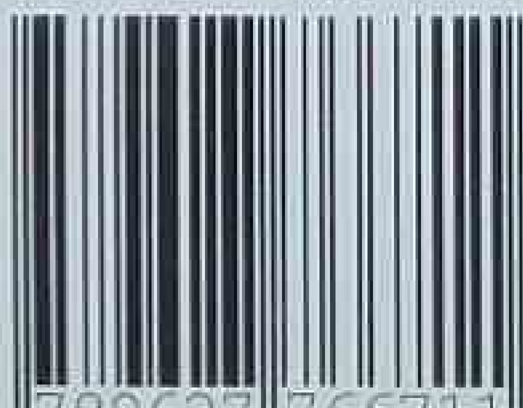
HK $97

Printed in Hong Kong

封面設計●李中威

在國際政治戰場上，烽煙從不曾平息，特別在重大的歷史事件中，國與國之間的明爭暗鬥、合縱連横，更是必不可免：此刻即是政治領袖最能表現自己深遠的洞察力和超凡的智慧之時。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國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而在此之前，中英兩國進行了長達 **15** 年的政治苦戰，好戲連場，誠為當代東西方謀略範例之大成，很值得深思與參考。本書詳盡地記錄了這場世紀未政治角力的風風雨雨，並首次大膽披露了談判桌後兩國最高領袖的決策過程，這對於處身巨大歷史轉變中的香港讀者尤其重要。


ISBN 962-7766-71-2
9 789627 766711

HK $97

Printed in Hong Kong

封面設計